

目 录

汤化龙行状.....	(1)
徐世昌年谱 卷下.....	贺培新辑 (12)
胡嗣瑗致刘廷琛密函.....	吉迪整理 (60)
庚子赔款的“退还”和使用.....	黄廷复 (63)
郭松龄事件.....[澳]加文·麦柯马克著 毕万闻译	(116)
法科六日记.....	蔡公椿 (147)
伪满洲国皇帝的直隶机构.....郑谭毅张晓光丁晓华	(154)
梅贻琦日记选.....黄廷复整理	(161)
马占山与北京和平解放.....	蔡运升 (217)
抗战时期昆明救亡戏剧运动.....	龙显球 (215)
里见甫与宏济善堂.....任常毅译	(247)

汤化龙行状

编者按：《汤化龙行状》，原载《蕲水汤先生遗念录》，系1918年铅印线装本。原书每页13行，行33字。汤化龙于1917年在加拿大被人暗杀，此书在汤死后一年即问世，但印本不多。《行状》对汤化龙一生作了概括介绍，特别对汤的政治思想多所论列。可供研究汤化龙其人参考。

原文无标点，不分段，原标题为《蕲水汤先生行状》，今酌改为《汤化龙行状》，并略加整理。分段标点，刊出供参考。

先生讳化龙，字济武，湖北蕲水县人。曾祖讳英信。祖讳德澡，字兰生。父聘莘，字意诚。母氏张，以清同治甲戌年十月十九日生先生。自先生之上世，用商业积累百年，称富裕，遭咸同兵祸^①骤衰。兰生公为邑名诸生，读书攻苦至失明，家计益绌。意诚太翁乃辍儒业，规以废居复旧产，往来孔垅、九江、安庆间，旧肆之毁于兵者，清其逋负而第其存废，凡屏营拮据亘数年，所料算稍有绩绪。

先生之生盖际邑里兵燹之馀，而家室喘息初定之后，墮地见光声色异常儿，四、五岁时即好访变乱轶闻，往往溽暑之夜，席地踞坐，索老人谈故事及避兵历险状，抵漏分倾听忘倦，时憇时泣时笑舞，呼菩萨不置。其留意世事而以振奇自喜，出天性，自童龀时然矣。

^① 指太平军起义。

稍长，从族父庆辉受章句，聪颖善记，弱体而强于心，无童嬉之失。

十四岁，随季父聘尹馆同邑蔡氏，一日主人因事宴他客，忘视馆中餐，迨夜客散知而责仆，则先生已竟日饿而读书自若，初未以为言。其强忍高旷如此。

逾年，太翁建家塾成，先生归就家塾，与两弟俱治帖括业。每有所作恒申旦不休。张太夫人数以劳苦伤生成戒之，且曰：“凡人存非分想，即非惜福之道，吾家累世无以科名显者，吾望汝不在此。且人轻重不恃科名。”先生权词谢母毋忧，而治业益勤。

年十九，以县试第一，旋补县学附生。属有非意之讼，家几再毁，举债逾千金，太翁顾不忍质先畴于人，则敝衣缩食肆力作苦为偿债计。先生亦期以笔耕澹家累，邑中官师月课，一投辄十余卷，兼启帐授生徒，积奖金并束修所入为太翁助，不三年债竟毕偿，而志学之锐不因此中挫；且益涉猎群籍，识趣愈远。学使王同愈用时务试士，得先生文大激赏之。

年二十四，补廪膳生。黄州经古书院者，南皮张文襄^①督鄂时所设，先后聘罗田周锡恩、姚晋圻为院长，号以实学造人材，先生实及门焉。其学分考据、性理、经济、词章，条目繁委。每课试非素穷极蒐讨能凿立心解者，恒有曳白^②之苦；先生旁午兼治剖心辩核，仍时与同学上下榷兑，证其乖，合一卷成，动逾万言，精博常为一院冠。

当是时，国家外不宁而内窳，科举敝已极，忧危之士欲颇矫学非所用之病，则唱治所谓实学者，自今视之，其去政学一贯之途盖远；而处政教严毅风习胶固之会，要非志气特异不专专然弋猎科名者，未能与于斯。先生道德文章所以发扬光大、穷变化而不摇落者，即于斯植根底焉。

①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省）人。谥文襄。

② “曳白”，即交白卷。

清季州县官残民之政，命案为最，虑无非土豪恶胥役与官因缘，惩死人为奸利。一命案出，旁近十里村落无完户。先生家尝两遭其毒，即所谓非意之讼者。方事之急，家人皆远避，独先生侍太夫人，挟少弟毓龙留匿暗室中，塞门藉草而卧，灯才如豆，毓龙寒而号，太夫人曰：“忍之勿声。”先生强言曰：“儿将来为御史者，必除此虐政。”盖推所身受而为天下不忍，而以革涤恶政重自肩荷，至于死不稍息，于是为涓涓之始。戊戌政变后，益治国闻，介然识革新之路。

光绪壬寅，^①乡试中式。甲辰^②赴礼部试，出闱，应山西学使宝熙聘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旋成进士，授刑部主事。见世变益亟，朝局至不可问。发愤谓：“政治不革新，国亡不可救，而欲救国必更博求新知，止旧学不周于用。”

先是，仲弟芗铭由湖北文普通中学生中乡试式，因入留学法国之选；而科举犹未废，亲故多谓留学非计，甚有以异域难返相怵者。先生意独不然，芗铭亦自勇断，辍礼部试竟行。先生寻复令从弟丙南入省立农业高等学校，季弟毓龙入省立工业学校，而身自请咨送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听讲之外，博涉东籍，尤致力公法家言。尝著书曰《违警律释义》，骈罗诸家之说贯穿断制之，一洗剽窃转贩之陋。

宣统己酉^③，毕业自日本归。归之前与乡人留学者倡设湖北教育会，相约归而实行之，是为先生合群谋国之发轫。

己酉者，清廷所定预备立宪、开各省谘议局之岁也。鄂都【督】陈夔龙以荐者言，奏调先生还鄂筹备自治事宜。寻被举为湖北谘议局议长。预备立宪之诏，在清廷特姑用以缓塞国人号叫，非真有是意，故号称预备，而断断与国人争国会早迟。非独吝国会，

① 即1902年。

② 即1904年。

③ 即1909年。

即谘议局之权在章程者，亦为疆吏舞文横夺，无所能举；而于预算闭拒特甚，以是各省谘议局愈望速开国会，请愿国会之声遍全国，所在皆谘议局为中坚。

明年庚戌^①，开谘议局联合会于北京，推先生主席斯会，以求开国会及结合谘议局争预算为职志，而因聚气类谋树政党基础，先生盖其中持议最恳挚者。会罢还鄂，鼓吹国会事益力。舆论既激昂，先生复出入北京武汉商团，时开会发电与各省相呼答。

辛亥五月，谘议局联合会再开，先生自鄂入京，发汉口时，送行者达万人。先生演说至愤激，誓不获所求不止。未几四川以争路事，谘议局议长蒲殿俊辈九人为赵尔丰所逮，全蜀骚然，操兵反抗者麻起，联合会决议各省前期开会，图为四川争救。

八月先生还鄂，十九日遂有武昌革命之事。兹事发仓卒，初无全算，总督瑞澂既逃，首事者相顾莫适为主，始议戴黄陂黎公^②，黄陂以民意所萃在谘议局，再三让，乃群奔至谘议局问汤议长安在？先生是夜适家宿不在此。众则大哗曰：“今机事微危如一发，若议长又不出系众心，将不堪问。”正惶遽中，先生自家至，众惊喜，欲即以都督相推。先生谓：“是非书生事，战且方始，必宿将有德望为诸军所诚服者乃可。”众曰：“然则仍莫若黄陂矣。”乃坚请黄陂而属先生为之辅。黄陂单骑至，军民大欢呼，遂定以为都督^③，建鄂军政府，发独立檄告天下，约先生同署名，而先生又自通电各省谘议局促响应，故时有讹传先生为都督者。

鄂军政府既立，北军水陆狎至，日惟备战筹饷，内政外交一切停顿，所属地方官吏不见文告，有携印窜去者，有人省城求解印【者】，若〔有〕以文电请进止者，旁皇纷午，若纽弛獸骇；而新被

① 即1910年。

②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下同。

③ 此处所记事实有误。

大水后，流殍盜賊交错，满地蒿然，无谁何过问。先生乃言于黃陂，宣布义军旨趣，使吏民还职业，蠲全年丁赋，以纾困敝。檄移所至，人情帖然。先生又以百度草创，事无巨细一須咨白军政府，而军政府方用兵，自无暇问民政，非建军民分治之制，必以畸废害事。黃陂韪其议，就属先生为草稿，厘军务政事为二部，部各置长，总成于都督。竟夕成事例若干条及图表以进，黃陂立颁行之，推先生为政事部长，军政府始井井有条理可观矣。

武汉地处全国之中，异邦人士所辐凑。自义军有武昌，其领事官访谒军政府者踵相接，数目不得要领。至二十二日美领事又来，黃陂乃与先生亲接谈。其所问三事：

- 一、清政府国际条约及债务；
- 二、鄂省荒政；
- 三、革命后国体政体。

先生一一为具答。谓：清政府条约若债务在八月十九日前者，军政府当继之，非是则不承。鄂境水荒当特举富绅筹振济。革命后当废帝国建民国，用共和政体。美领事欢然悉笔记其言去。次日即以上其公使，复为文称美，载英文日刊遍布之，列国翕然。用国际先例承认鄂军政府为交战团体，革命军被承认之速，无如吾国辛亥之役者。

先生在政事部虽不久，凡所赞划犖犖皆有立国规模，而尤措重者，以谓革命非立国之究竟义，国所以立必有统一之法，以蕲循轨之政。斯时武汉战方亟，南京未下，各省未尽响应，而先生已日夜究心以制约法为一大事。四方豪杰才智之士集武昌者，如黃兴克强、宋教仁遁初见先生皆交相爱重。而先生与遁初语此事尤投合，遂除室馆之夜分人寂，对灯促膝，所谈无非约法者。如此二十馀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而力避偏枯拘繫之病，其草稿出遁初手，厥后南京参议院定约法，取材于此，其所增损或有大非先生志者。要之，民国约法谓之权舆先生及宋

氏，不诬也。

先生既以国家统一政治循轨为蕲向，适仲弟芗铭以海军应黄陂，武昌战事解。先生谓此间事粗定，不烦屑屑，适又有不便先生居此者，先生遂解政务部长，去之上海。因黄克强约，同往南京视临时政状。政府用宋遵初为法制院总裁，用先生为副，先生未就。

会南北和议成，民国元年四月参议院及政府皆移北京，先生至北京寻被举为参议院副议长。务持大体，不为琐细偏戾。而涉国计尤宏巨者，独不苟随和。在院尝一以财政事质问政府，为书五六千言，于国家岁出入如亲握筹而数，一二批隙抵虚受诘者，几不能为辞。

二年国会开，被举为众议院议长。立宪政治者、责任内阁者、政党议会者，皆先生夙所梦寐祷祈，谓非是不能救国图强，而今且庶几见之，因益愤发笃摯，誓擷其实。

民国之初，党势既茁矣，谘议局联合会之蜕变曰民主党，先生实主干之。及是，以同志人材不宜有区畛，遂约合共和党、统一党为进步党，与国民党并在会中期攻错相成一會，而毕制宪大业。

属项城袁氏自临时大总统被举即真，旋用九江兵变事^①连国民党议员被夺职逾半数，国会一旦顿僵槁，先生痛之极，争之切。谓议员罪应黜否？在法，总统得黜议员否？事须别论，要不能藉口仆国会，无国会非立宪也。今宪法尚未成，即国会竟寝罢，公将何以处民国？项城不为动，然尚姑与委蛇，冀终为国家得一当。

三年，为教育总长，抑郁已非其志，顾于教育事犹多所筹计，不孤其职。人有希项城旨，请以复古为教者，骎骎大变学校教法。先生具牘以去就争，得格不行。

四年七月，筹安会起，帝制议寝盛，先生始绝望，知不可将

① 指二次革命。

就，而项城亦诡，先生终不为屈。侦伺甚密，先生先托就医，至天津以书辞职，仍置家北京，示无他适意，而密谋用计出黄陂，奉以讨袁氏，所虑划至奇秘，因有所牵梗，未遂。十二月乃改计附他国船，纤道大连间，行至上海时，滇、粤、蜀、桂已次第独立，用护国军名设军务院于肇庆。方视湖南转移为大局轻重。

湖南将军先生弟芗铭也。以审度兵形未即发，及先生既得脱，太夫人亦出居天津，无可虞，于是先生数使人往还期约，而湖南遂以五月二十八日独立。

先生顾自谓兹役于西南军事无所尽力，不愿冒举义名，而抵排帝制则心事无稍回曲。项城视事势渐不利，欲谢皇帝复为总统，持此风示求罢兵。西南固不许，而先生执言尤切至。既联合国会议员通电声击，仍自腾书抵项城及其左右，趣退位。大略言：护国军志在申讨叛大义，求真共和。项城辞皇帝留总统，不得谓大义已申，共和已复；兵罢否，某固无能参与，假能参与者，方当力持不罢兵之议，一洒国民苟且薄弱之耻。义师而胜，某无纤毫干涉，若败，则虽身殉之甘也。且谓：项城脑筋为专制复古思想所弥布，年来凡百措施，务与世界大势相违。此而能自存，则历史公例、政理原则举不可信，否则非引咎退休，身且无自全之路。又规以引退时勿铤而走险，肆竭泽焚林之毒，留补救余地。

五年六月，项城自病死，兵幸得罢。黄陂以副总统依法继任，合肥段祺瑞起任内阁总理，南北无异议，独恢复旧国会颇持异同。先生自意与黄陂、合肥有夙谊，愿以居间人于北京政府，为彼此沟通，声言不身参政局；而行至北京见合肥，反复说旧国会当复及有利无害状，合肥意为可，而左右犹有相尼者。先生以合肥意电告军务院使再力争，谓必可得。既而旧国会竟得复。事已，返上海，旋归蕲水，治太夫人丧。

先是，三月十六日太夫人病歿天津医院，仅季弟毓龙视含殓。越二日扶榇南下，道上海回籍。先生方在上海遭政府狙伺，出租界

一步即蹈祸，不可测，闻间摧毁，欲冒死出迎榇，朋友皆力阻，重以后死之责，而先生亦自审非国事有豸，万万不得亲丧葬，则一意求时局解决，盖饮泪茹痛，衔家恤而从国难，凡两月馀，及是乃得为凭棺之哭，伤已。葬毕家居。

至八月，国会再开，起先生就议长职，往复敦迫，不得已于八月二十六日莅会。先生固坚信立宪政治，而制宪为国会艰巨之责。方其在上海，曾倡不党说，以谓壬癸之交，海内贤达尝欲毁党造党。比者帝祸作，士夫奔走号呼，声讨无二致，诚毁党机也。抑国家新造，政治利害多全国所共者，舍小异取大同，固无事分建旗帜；而官僚政治与民本政治若冰炭，国家既非用民本政治不济，而人材之郁此新思想者实乃不多，分朋而自弱，适开旧派势力使践政，暨国家新机，无宁不党而用友谊结合，犹乘舟然，惊涛骇浪中且图共济，待达彼岸而后分途犹未为晚。凡以为制宪计，虑至深远也。

及开会论战蜂起，若对严敌，帝祸时融喝相濡之情无复存者，内既以制宪龃龉，而外以对德议与内阁相持尤急，至六年五月，遂有公团围议院之侮。会合肥免总理职，所谓督军团且阻兵示形胜号兵谏，于时乃有欲求让求全者。先生谓：交让当自我发意，今人方以威取，复何交让之云。与淟涊苟留，不如自退。乃具书辞议长职，而别联名通电，矢言共和国体、立宪政体必永永保持之意。未几，安徽督军(?)张勋遂入京解散国会，嗣遂有复辟之变。

方国会解散时，西南以督军团所行破约法，宣告独立与中央绝，所指目以合肥为首。及复辟变兴，合肥奋袂自马厂誓师讨贼。先生在天津蹶然曰：“彼独立者为护法耳，复辟则民国且不保，何有于法。”遂发电声张勋罪，偕梁启超任公皆应合肥请，与谋讨贼。

合肥初起，固已被黄陂命再为总理，旬日收北京组织内阁，要先生及任公为阁员。先生念惟西南号护法，争共和，今北方讨

平张勋，复民国，宜可以相解，更始谋国家统一，故就内务总长职。

内阁之始建也，今总统河间冯公^①尚在南京，首发议开临时参议院、改组织法、召新国会。合肥意与河间同，其后竟成阁议、布明令，而先生实共副署。盖先生所惧民国几毁幸全，无国会则根本犹未固，旧国会既为军阀所致死抨掊必不与并存者。而复辟之役，军阀又新有功，兵气方盛，势不容投刺喉必吐之剂，激生他变，致国本再动摇，重天下糜烂；今惟当斩截苦痛，使国会自无而有，以存民国附蒂，再图其馀。如是旁皇审虑，复博咨苦谈，皆以为舍是无他道，乃决赞成阁议。

先生尝语人：冀假道以促新国会早成，为国家计久远，苟可消弭祸源，虽冒忌丛谤不惜，此事是也。顾西南不为解而糾固转急，先生所谓以平和运政治者，一未及措施。

阅四月，合肥内阁罢，先生及同志皆下野，于是颇觉所操持盖难合矣。然而志气不稍衰。尝曰：“使吾意想中之国会政府一日见诸实事，而国家犹无治效者，则吾乃真死心削迹矣。吾政制师外国，不知彼固亦旧而新、恶而善者，方其自旧之新、自恶之善，必有层累曲折致力之所，始逮今日。吾但取彼既新既美之制，涂附旧习恶政之上，以冀相入，其药不应病，宁足怪。而覩国者皆摭此遗彼，此良可恨。吾将亲察而求之，或有万一之获。”

遂以今七年三月廿四日往游日本，行之前为说以别同党，披漓肝鬲，十年来谋国论政之懃，指写注无宿留，乃今成长诀之讌矣，哀哉。

先生至日本居二月馀，日本与我有同出兵防德之议。先生去而游美洲，逾一月，戒行将归，至英属坎拿大之维多利亚，待船且发。

九月一日，汤之族侨其地者，宴先生于中华会馆，晚八时宴

^① 冯国璋，直隶河间（今河北）人。下同。

罢，宾主四十馀人相携步华街，忽有贼从群人中以手枪迎击，先生中两弹立仆地死。两弹一自口入，一自腹入。从先生者南海霍坚晕而苏，视先生已绝，而贼方突入求逸，立起合警士追之，贼知不可脱，乃自戕。其人曰王昌，粤产理发匠也。道远信不得详，据霍坚及我公使领事电报，今所知先生死状仅如此。

先生卒年四十五，意诚太翁年七十矣，今尚健在。太翁生子三：长即先生，次芗铭，次毓龙；女弟三，适蔡、适杨，适南。配夏夫人，后太夫人百有九日卒于日本。夫人贤而有识，自先生之致身政界，夫人力任家事，一不以纷先生虑。武昌初起义，太夫人、夫人携子女在城中，事成否未可知，而武汉被兵甚急，夫人之父自乡中来迎眷累，夫人谓太夫人及子女不当居此，若我则义惟从夫耳，今请以我儿女累太夫人徙全地，而太夫人以爱子委我，生死以之，竟独不行。及遭太夫人丧，夫人已病，哀毁羸疲，往来天津、上海经纪大事，病以是增剧，然犹强起赴日本护一子一女留学。子佩松，今肆业清华学校。女佩琳，适江陵胡瑞霖长子继襄先生。至日本，尝凭吊夫人故易箦处，哭甚痛，为诗悼之。见知者谓先生寻常无此儿女子泣，即夫人贤可知矣。

先生为人惇厚旷远，处骨肉故旧不规规末节，而至性流发迥非伪儒浮俗所望，慕士下贤，无间异同，虽仇敌有特长，犹嗟赏不去口。遇人坦夷无城府，不因险易改度。初避帝祸发天津，太夫人谓宜变姓名以避仇者。先生谓儿此行殊磊落，无所用伪名也。今兹美洲之行，人颇有引黄远庸事相戒，且劝即至彼勿游华街，先生皆不为意。盖内视无馁而又不虞人情险巇至是，且往尝数遭横逆不死，而竟以是快凶人意，使国家丧其良而莫之赎，哀哉。

先生于汉宋学家言皆能掩贯，治诗古文词尤深邃，已皆屏去不常谈，而专以国家政治为性命。其论政谓必以民本精神与国家政策相调和发挥，而后可措国巩固之域。故力诋官僚政治，而于偏至之民权论亦不为苟同，惧国家失统驭力，民权且无所附丽，

而众庶政治之过将成众愚政治，则国尤无幸也。其大归以统一固国基，以秩序求进步，虽更历万变，所挟持鼓吹无改，自信且益力，与人言未尝不及此。

于外国独通日本文字，凡著述涉国政民俗者，无问巨帙短书，旋购旋读，造次不释手，出门访客车茵上粲然皆是物也。长教育部时，尝发愤欲学英文，日划二小时治之，以中年不任记诵，未卒业，异时常引为恨。

又于陆军大学授国法学，恳恳如老儒，虽甚风雨不辍。学者服诵至今。盖在宫事填委中，他人所视为劳止小憩之须臾，而不解其志如此。

比游日、美，所至于政俗之原，一观辄能道其深际，虽留彼中甚久者诧所未闻。盖神明专锐之效矣。

先生平生行义，人所慕爱，非一二而足。以不自意猝死，未暇多著书，而随事论撰笔札在人间，复非旦夕绩缀所能备。今先生之丧且入国门，辄纂所知尤俊伟大端，以谂爱敬先生为国家哭先生者。若夫编第其详，掞扬其美而垂无穷，则有海内鸿笔渊识之贤之盛心公道焉，非简近所骤及已。中华民国七年九月廿日治丧同人谨述。

徐世昌年谱 卷下

贺培新 编

编者按：徐世昌年谱，本刊总69号已刊出卷上，本资料为其续编，今全文刊出，供研究者参考。整理者吴思鸥。

民国元年壬子（1912）五十八岁

是年改阳历。

二月十三日，临时大总统孙文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书，并荐袁世凯自代。十五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二月十八日，值阴历元旦，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北上迎袁总统赴南京就职。二十日参议院举黎元洪续任副总统。公五弟世纲自济南来。二十九日驻京第三镇在京兵变，哄肆焚劫，枪声彻夜。

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十三日袁总统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三十日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征祥，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唐绍仪兼。四月八日交通复任施肇基。）十五日访临时政府袁公，辞津浦铁路事，得允，自是稍得临池摊卷之暇。

四月一日，孙总统莅参议院行解职礼。二日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迁北京。

五月一日，参议院改选议长，吴景濂为正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

六月二十七日，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二十九日任陆征祥为国务总理。六月二十八日，偕世伯轩同至实录馆。按德宗实录开办时，世伯轩相国即为总裁。逮辛亥秋季甫修至光绪二十四、五年间，而武昌起义，旋布共和，馆员星散，尚有书八十余卷未完。壬子二月间京师稍靖，馆员在京者移书世伯轩，多方筹维，卒能续成全稿。始终其事者为副总裁宝瑞臣熙、郭春榆曾忻两侍郎，而总裁陈伯潜宝琛^①则后来增派者也。馆舍初在东华门内国史馆之北，自穆宗实录告成，馆舍即移为别用，光绪中会典馆政务处皆即其地。是时已移馆于头发胡同，为前翰林院编书处，公偕世君至馆者头发胡同馆舍也。三十日（应为五月二日）出京赴河南汲县省墓，乘火车夜抵彰德，宿养寿园^②。

七月二日（应为五月四日），抵卫辉，住四叔母宅。三日（应为五月五日）至卫河沿看建坊石料，至河园看新买菜圃，小憩树荫，遂至唐冈祖茔拜扫，命坎丁添土。复至六叔曾祖墓拜扫、添土。勘视为刘太夫人建坊地段工料。四日（应为五月六日）至乾隆庙东五叔父莹及顿芳店祖莹拜扫，叔父葬后初次来此，不胜悽恻。五日（应为五月七日）至辉县，居新葺之宅，见伯祖老姨娘、五叔母，周视宅基房舍。至后街小泉内侄宅，席三嫂甫逝，为之哭奠，见其全家。十数年未见，屋舍无恙，人事已非，恻然久之。六日（应为五月八日）至冀家厂察看庄房、竹园、田亩。时方种麦，庄外新改河道水流甚畅。庄之东北，水闸得势，看农家网鱼。久淹京尘，始得田园之乐，改名其地为水竹邨。午回城寓。七日（应为五月九日）过西关袁氏园，海棠、桂花、腊梅、木香皆数十年前物。至东刘店、郭雷村各庄房周览庄基地段，拟于此建一粗浅农业学校，教乡人子弟。又至小庄房看视，庄旁新开小荷池，随地出泉，有稻田少许。八日（应为五月十日）偕陈声山表

^① 陈宝琛，字伯潜，号弢庵、桔隐，福建闽县人。

^② 养寿园系袁世凯所建花园，位于彰德城北外的洹上村。

叔游百泉，看新修工程后回城。九日（应为五月十一日）复至水竹邨庄房看视。拟修竹园前楼屋，村外添修小桥，引水溉竹。午后回城，与小泉过天王殿看石刻东坡题布袋和尚碑，断为两截，碑阴有观音象，又有政和年写经幢。十日（应为五月十二日）为席宅点主，上祭。十二日（正式任命各省都督：湖北黎元洪，湖南谭延闿，福建孙道仁，浙江朱瑞，江西李烈钧，四川尹昌衡，陕西张凤翙，广东胡汉民，广西陆荣廷。其前已任命者：直隶冯国璋，奉天赵尔巽，吉林陈昭常，黑龙江宋小濂，江苏程德全，安徽柏文蔚，山东周自齐，河南张镇芳，山西阎锡山，甘肃赵惟熙，新疆杨增新，云南蔡锷，贵州唐继尧。）席三嫂出殡，往吊。出城十五里，至其茔地，于席二兄墓前展拜，墓木已拱，不胜怆恻。回城过玉虚观，见赵子昂书碑下半久剥蚀，曾属何芷亭覆之，今尚未办。十四日（应为五月十六日）何芷亭自彰德来，同游百泉，登啸台，访饿夫墓，看疏通甘泉源头及新修安乐窝，在清晖阁坐谈良久而归。十六日（应为五月十八日）偕数亲友暨辉县绅旧宴集白露园，游览竟日，好雨之后，山光水色甚快人意。晚归，朱渭春送家藏宋时族谱墨迹，卷首岳忠武题字仅一“宝”字及“题款”二字可识，后有程元凤、真西山、吕东莱、魏了翁、文文山、谢叠山诸贊跋，真希世之宝。十九日（应为五月二十一日）启行，雨后村树浓绿，已有收麦者。到卫辉，先至刘太夫人建坊地察看，又至唐冈先生墓拜扫，城外水大，绕道西阁门外坐船而渡。入城，住四叔母寓。二十日（应为五月二十二日）散步，看旧考院古桧，又至玉带河凭眺。饭后上火车行，二十一日（应为五月二十三日）抵京。二十二日（应为五月二十四日）访世伯轩、袁慰廷。二十三日出京至天津，住朱桂莘^①寓。二十五日（应为五月二十八日）赴山东，乘小轮舟渡黄河，看铁路工程。抵济南，住铁路分局。（二十六日以熊

① 朱启钤（1872—1962），字桂莘，贵州紫江县人。

希龄、王宠惠、蔡元培、宋教仁、施肇基五人与唐绍仪连带辞职，是日重任命五部总长：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至泰安，易山舆登岱，至红门小坐，过斗母宫、柏洞一带，古柏夹路，云步桥瀑布尤佳。五大夫松以下多松，伏虎岭、中天门以上陡峻，石甚奇，望南天门如在霄半，至顶则群峰罗列，俱在下方。至碧霞元君祠、东岳庙看唐代摩崖石刻，登太平顶看无字碑。山上平坦，庙院围以石栏。峰尖为东山绝顶，院有碑鐫“古登封台”四字。望丈人峰，四面诸峰环绕若拱。晚宿山顶，次日黎明看日出。同游者阮斗瞻忠枢、张少轩勋、朱桂莘启钤、田韫山中玉、朱紫樵庆澜诸人及德人黎诺。下山过迴马岭，游曝经峪，看水帘，至蓑衣亭。访普照寺，有六朝松偃盖半亩，别院一小松亦佳。入城谒岱庙，看汉柏唐槐。院东有古石幢，俗呼无字碑。道人出高宗赐玉圭，规式甚大。回车至兗州，宿少轩营。二十八日（应为五月三十一日）乘肩舆至曲阜瞻仰孔林，古柏夹道，殿后一枯桧，相传子贡手植。又墓旁庙三楹为子贡庐墓处，伯鱼、子思墓皆附葬。入城过颜子庙，有石坊勒“陋巷”二字。孔庙规制宏壮，古柏荫翳，碑碣林立。有举事官引导，随处瞻仰。旁院有孔居故井。衍圣公孔燕庭令贻约至其府留饭，瞻清高宗所赐古彝器十事及元明衣履，元世祖、明太祖画像，又明良遗像画册。晚回兗州。二十九日（应为六月一日）【乘】火车至峄县，察看中兴煤矿。折回北行，至邹县下车，瞻孟庙，有五经博士陪引。庙为宋时所建，槐柏荟蔚，院中有天震井。启圣后殿孟子石像，相传战国时刻，前殿石刻像则宋时仿造。旁院有汉碑二小方。周览毕，登车行至济南，仍宿铁路局。三十日（应为六月三日）乘胶济车至青岛，住弟世光宅。

八月三日（应为六月六日），游崂山极顶之柳树台，过九水上行，山景甚佳，山多松，有泉，山势幽秀，马路往来亦便。晚

回寓。时遗逸流寓者多，周玉山^①、张安圃、吴蔚若^②、李仲仙^③、季皋^④、吕镜宇、邹紫东、李柳溪、柳纯斋皆晤。又晤德人尉礼贤，通中学，能译《论语》、《孟子》。六日（应为六月九日）乘火车至济南。八日（应为六月十一日）抵京寓。十三日（应为六月十五日）八弟世襄、十弟世章留学英、比两国毕业，循西伯利亚铁路回国到京。二十四日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入北京。公夙以未涉外国为恨，至是拟游东瀛^⑤，一观其国政俗。

九月三日（应为七月五日）起行，至天津剪发。五日（应为七月八日），上日本天潮丸轮船，夜出大沽，船小风大，簸摇特甚，眩晕呕吐殊惫。七日（应为七月十日）至大连，住大和旅馆，腹痛，不思饮食，痔又大发，延日本医生诊治，未愈，乃乘火车赴营口，渡辽河，换车回天津。五弟世纲为诊疾，仍未愈，旋携眷至青岛养疴，东游中止。九日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二十二日国务总理陆征祥解职。二十五日任赵秉钧为国务总理。二十八日参议院议决十月十日国庆纪念。一月一日南京政府成立纪念。二月十二日南北共和纪念。

十月十七日起行，乘火车至济南，过天津。十九日抵京，晤世伯轩、袁慰廷诸人。二十六日乘火车至彰德。次日至卫辉，下车诣为刘太夫人建坊处，察看工程，诣唐冈祖莹，拜扫添土。入城住四叔母宅。二十八日至辉县查看新房工程。二十九日至水竹邨察看新修桥路楼屋，看修理竹园。三十日约王生为太夫人刻墓表，表为柯学士劭忞撰文，华阁丞世奎书丹，徐国子坊篆额。

十一月二日，至郭雷村察看筹建学堂地基及试验场地亩。午后至薄壁，宿关帝庙，即山西会馆。次日未明起行，至葛榛庄，

① 周馥（1837—1921），字玉山，安徽建德人。

② 吴郁生，字蔚若，江苏元和人。

③ 李经羲（1859—1925），字仲仙，一作仲轩，安徽合肥人，李鸿章之侄。

④ 李经迈，字季皋，李鸿章之子。

⑤ 东瀛，即日本。

换肩舆入山。至西寨山庄，佃户六家皆袁姓，买此山六年，初来游览。见四面峰峦环拥，此山诸峰俱秀，山前开田如旋螺，山之西崖有瀑布三叠，入于溪涧，最下泉流如壶注水，洵奇观也。泉当山半有紫石数盘，层叠皱皱，绿苔掩映，峭峰上立，亦人间仙境。由葛榛庄入此山口，石壁陡立，秋来紫翠斑斓，舆行其间，四面流览，豁人心目。山口一峰竦起如壁，当是薄壁之名所由起。是日半阴半晴，归途夕阳斜映山壁，丹翠尤丽。仍就镇宿。次日乘肩舆至龙峪寺，寺在兴云山下，新修整洁。寺前路桥亦新筑，并植花树。由寺西行登山，盘道宽敞，山势陡峻，道旁四亭分建，可供眺憩。山顶有石楼茅屋，略开田可耕。四山新种禡柏，青葱可爱，皆慰廷闲居时经营者。小憩山麓，至白云寺。寺前后多槲树，寺后有泉引笕周流寺内外供溉汲，泉旁种竹数亩。阅寺东宋碑，知寺为宋时建在白鹿山下，初名白茅寺，清纯庙南巡驻跸，书“白云自在”四字额，改名“白云”由此。五日回辉县，得诗多首。十二日出城，至水竹邨小坐，旋至八十亩村察看地亩，又周阅水竹邨前后，拟通水由竹园经过，于村前补树、开荷塘、培土种竹。复察看桥工，与诸亲友在小楼宴集而归，有诗。十四日出城至夏峰村谒孙征君祠墓，看雪亭遗址，有石碣，又观征君所遗琴杖。至高村察看地亩，问农事，哺归，乡人方收获菘芥、萝卜，蔓青也。十五日至刘店看地亩。十七日至卫辉建坊处阅工，诣祖莹视察，添土垫坟，后土阜拟明年添种树株。十八日启行回京，次日抵京寓。二十八日任黄兴督办汉粤川铁路。

十二月十一日，赴青岛，每日阅书、写字，间作画，为小女讲书，即在青岛寓度岁。

民国二年癸丑（1913）五十九岁

公居青岛，弟世光亦携眷岛居，两宅比连，仍同一家。

二月十八日，乘火车赴京，次日晚抵京寓。

四月七日，偕席夫人回青岛养疴，八日民国第一次国会在京开会于北京。二十六日参议院选举张继为正议长、王正廷副议长。二十八日众议院举汤化龙为议长。三十日众议院举陈国祥为副议长。

五月一日，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辞职，任段祺瑞暂行代理。二十日偕吴蔚若、于晦若、李柳溪、张弢楼，李季皋游崂山，过柳树台，至九水太和观午饭，复至修真庵，有二松甚古。行二十余里至华严庵宿，庵藏松竹中，多花木，皆百数十年物。昔人谓崂山无僧，是庵即衲子主之。夜看月、清话。翊晨行，过黄山青山二十余里至太清宫，竹树茂密，巖山滨海，松甚奇古，耐冬花树甚大，紫薇亦数百年古植，看木绣球及老榆，周览道宇。至海滨，有道士墓，明万历间争回此庙者也。仍回华严庵宿。晚步寺外竹树间，坐石上清谈。二十二日行土墼岭中德分界处，岭南德人租地，路坦易行，木亦葱茂，岭北则肇确荒翳。至柳树台憩。午饭后乘筭舆至板房，易车归寓。山中所见松之大者皆赭干，或即所谓赤松乎？公居岛时感小病，常诊脉服药，至六月乃愈。

七月三十一日，任熊希龄为国务总理。

（九月十一日，任各部总长：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司法梁启超，教育汪大燮，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工商张謇，交通周自齐，财政熊希龄兼，农林张謇兼。）

十月二日，偕夫人起行。四日抵京寓。次日晤袁总统、世伯轩。六日国会选举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当选。七日国会选举副总统，黎元洪当选。十日正式大总统、副总统就职。铨叙局函送大总统赠勋一位章，函复辞谢，徽章璧还。十四日偕席夫人行。次日抵卫辉，视太夫人节孝坊墓表工程，俱竣。至祖茔拜扫，复至青龙庵河源看果园蔬圃及新盖房屋。入城见四叔母，即住其宅。十六日至辉县寓，诣伯祖老姨娘谢太宜人灵前上祭行礼。十八日出城至水竹村。二十二日至小刘店、郭雷村、小庄察看地亩种植收获。次日察看水竹村、八十亩村地亩竹园。二十七日偕席夫人赴卫辉，

住马市街。以太夫人建坊，亲友有自远方来者。弟世光自青岛来会。二十八日偕弟世光及家人诣太夫人节孝坊前设祭行礼，文武官吏、绅商士民及远近亲友来贺者众。礼成，诣先茔祭扫，假吕祖阁款宾一日，约数百人。二十九日偕弟世光暨家人同至乾隆庙五叔父茔、顿芳店伯祖父母、二叔父、四叔父茔拜扫，复过河源村察看菜园。三十日回辉县寓。连日偕弟世光涉水竹村，游百泉，又约数友宴于白露园，至泉源西坡谒陶忠敏定惠墓。

十一月四日，稍感冒，腹泻。下阶倾跌，折脚筋，痛甚，目晕，少时即醒，心定如常。翌日痛少减，静养数日。十二日启行回京。十三日晚抵京寓，五弟世纲自天津来诊治，又发目疾。二十三日袁总统约同世伯轩至其府晤谈，力疾赴之。

十二月五日，治目疾见效。二十一日乘火车回青岛。二十四日抵岛寓，是后目疾渐愈，即在青岛度岁，课长女读书。

民国三年甲寅（1914）六十岁

一月二十六日，为阴历元旦，公在青岛祀先，家人贺节如常。晚赴德国提督麦维德宴，观军队演乐。二月十二日，国务总理熊希龄辞职，以孙宝琦兼代。十三日赴德国教士尉礼贤消寒雅集，观张安圃尚书所携书画。

三月三日，次孙生，命名延同，乳名肥儿，以生时合肥李季皋适来也。十六日游崂山蔚竹庵，同游者邹紫东尚书、吴蔚若、于晦若、李柳溪、李季皋四侍郎、陈少石布政与公凡七人。自是日起间复作画。十八日约法会议开会，选举孙毓筠为正议长，施愚为副议长，议员共五十七人。二十七日偕席夫人携两女启行，翌日抵京，袁总统约谈。次日世伯轩、徐梧生来久谈。

四月十二日，诣畿辅先哲祠春祭。自公抵京，袁大总统屡约谈、留饭。二十九日复约谈，泥公出任国务卿，撤销国务院制，设政事堂，公力辞。次日闻命令将布，亟约吴辟疆、閔生代草辞牍。

五月一日，宣布命令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吴向之廷燮、段芝泉洪瑞、孙慕韩宝琦迭将命敦劝，公仍具牍以进。晚即批：万勿推辞。世伯轩亦来久谈，劝公勉为负重。二日任命杨士琦为政事堂左丞，钱能训右丞。公仍入府申辞，袁总统披谈敦挚，公乃受命。四日至府治事。是日公府有茶会，约各国公使及其夫人，并约旧皇族王贝勒游览。治事毕，至政事堂公所，眷属亦迁居于此。自是按日入府，午回公所，以为常。二十六日参政院成立，特任黎元洪为参政院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并任命参政七十三人。二十九日端阳节，民固定为夏节。回五条胡同祀先，嗣是凡有家祭皆回寓行礼。

六月二日，入府办事后，再与公府财政会议。十二日代大总统见第二次考验暨审查免考县知事四百余人，演说。二十日参政院行开院礼，代大总统宣读颂词。

七月一日，至礼制馆开馆。十一日至礼制馆延见编纂各员。

八月四日，公府增外交会议，缘奥塞肇争，德俄开衅，欧洲多事，东亚与有关系也。六日公布局外中立条规，大总统邀公暨黎副总统元洪、孙外交总长宝琦密议应付方略，预定中立大计。十八日九弟世良自江北归，光弟暨眷属自济南来，住五条宅。二十三日日本对德宣战。

九月二日，日军在山东登陆。三日感腹泻，便血，诊治服药，至十四日始愈。

十月十日，国庆纪念日，同袁大总统至天安门城楼阅兵。二十三日借议院接见第三届考验县知事凡数百人。俄国人以油画法为公画像。三十一日为阴历九月十三日，公六十岁生日，大总统致送寿礼。先一日合家温寿，戚族远来者甚众，是日来客尤多。袁总统先送戏至宅，坚却之以去，复约是夕入府晚宴、观剧。

十一月六日，代大总统接见审查免试县知事二百余人。七日日军占领青岛。十八日公弟世光任督办濮阳黄河堵筑决口事。世

光以治河著称，此次濮工奇钜，东人待援迫切，故有是命，于十二月十四日赴濮阳工次。

（十二月）十七日会议教育事。二十六日晚宴同乡纪香骢、王晋卿诸人，商辑畿辅文献。二十九日至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宣告命令闭会。三十日代大总统见免考县知事数十人。

民国四年乙卯（1915）六十岁

一月一日，至公府贺岁。回公所，政事堂各局所人员来开茶会。二日入府接待各国公使及其夫人。三日陪宴参政院诸人。五日到考验甄拔留学生委员会。

二月十四日，阴历元旦，民国定为春节，客仍有来贺年者。十八日日本公使日置益谒见袁总统，提出要求条件二十一条。二十日公府宴蒙古王公。二十二日至公府看考留学生拆弥封。

三月三日，代大总统见县知事。十二日晚宴张馨庵^①、李敏修、张鸣岐、秦袖蘅诸人，商征求河南文献编辑儒林文苑传稿。十七日上丁，诣孔庙代大总统行礼。上丁，春祭也。十八日约法会议闭会，代大总统宣读颂词。毕，又至怀仁堂公宴。

四月三日，见新考取留学生百数十人。六日回本宅祀先。十四日公有目疾，袁总统约彰德专治眼科者来治。二十五日至畿辅先哲祠春祭。祭毕，至征求文献局。是局附设于祠，延同年王晋卿树枏主编辑，因恐史馆征书缺漏，特设此局蒐罗文献，应入儒林文苑各传者以为之助，所有经费，公独任之。

五月八日，公府会议日本交涉最后通牒答复文件。

六月十四日，购得张得天临苏鱼枕冠颂帖，潍县陈氏旧藏。十六日代大总统见第四届考验暨审核免考县知事一千余人，演说。十八日至礼制馆演乐。二十三日礼制馆会同外交、教育二部讨论

^① 张镇芳（1863—1933），字馨庵，河南项城县人。1914年2月调任参政院参政。

国乐。

七月二十三日，弟世光濮阳工竣回京，居十日，濮阳水大，出有险工，复赴工次。

八月十四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二十日代大总统见免考县知事五百余人。二十三日筹安会宣告成立。

九月一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院，代大总统到院宣读开院命令。十三日代大总统诣孔庙行秋祭礼。十八日端午桥所藏《东坡书髓》，十卷，其子继先送来，雨窗展玩甚适。时午桥女将嫁，因以银二千元赠作奁资，即酬帖价，由是以书髓名楼。

十月一日，头眩，未入府，袁总统来问疾馈药。四日头风益甚，夜不成寐，公府遣医诊视。公决欲引退，连日书牍往复，总统又屡遣左右丞慰留，辞志仍决。九日席夫人生日，未回本宅。十日袁总统遣人问视，又亲来问候，久谈。十五日筹安会改组宪政协进会。二十一日公生日，袁总统致送镀金寿星一座、银器九十六件。姜颖生筠送画册十二幅，又画扇三炳，作西园玩月图。公独喜颖生画，以为笔墨苍秀老健，海内画师一时无两也。二十三日具呈引疾辞职，必期得请而止。翌日，袁总统会公弟世光挽留，公仍婉辞。又派左右丞来商酌，乃属具呈请假。呈上，批给假一月，安心调理。二十六日任陆征祥暂代国务卿。二十八日交卸印钥等件，即回五条胡同宅。

十一月七日，遣九弟世良至白云观及盆儿胡同鄞县馆前祖茔拜扫。十日袁总统遣人问视，连日养息、看书、作字，间作诗，看王晋卿所撰畿辅儒林文苑传稿。十四日徐梧生来，为买高翰生藏书八十种。二十三日与五弟世纲谈拟建家祠诸事，检伯祖遗墨白折小楷、四书课文等交五弟装潢敬藏。又检路渔滨、访岩两公手札付五弟妇，弟妇渔滨孙女也。三十日检先世手迹装粘入册。

十二月四日，又检理先世墨迹书牍。十二日袁世凯下令承认

为皇帝。十七日梧生为购得黄县丁氏藏画多件，以文衡山南窗寄傲图为最。二十日袁总统命令推公同赵次珊尔巽、李仲山经羲、张季直謇为嵩山四友，时陆征祥已补实国务卿。公日记：人各有志，志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自筹安会成立，政象纷纭，故公慨乎言之也。三十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

民国五年丙辰（1916）六十二岁

一月二十八日，修家谱底稿，阅李恕谷遗著，录其精语。

三月四日，用儿子绪直名领鸣鹤、镜春两园，讲求种植，改名为淀北园。公有函致袁公劝其撤销帝制，中有“及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之语。二十一日袁公遣车来迓至公府久谈，留饭，以时局危迫，谆约出维大局，公坚辞。二十二日申令撤销承认帝位案，复任公为国务卿，再具呈辞。二十三日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袁总统复派钱右丞能训挽公以“危局迫促，非出而维持不可”。公乃允暂任，入府治事，至参政院宣告代行立法院开临时会议，自是按日至公府。

四月十三日，感冒甚重，自是困卧，痔发下血。袁总统遣人问视，继复连约至府中久谈。二十二日乃准辞职，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次日任命各部总长：陆军段祺瑞兼，外交陆征祥，内务王揖唐，财政孙宝琦，海军刘冠雄，司法章宗祥，教育张国淦，农商金邦平^①，交通曹汝霖，参谋王士珍。）二十三、四两日袁总统复约入府久谈。二十八日至先哲祠春祭行礼。

五月五日，杨纪青送来公祖父遗画九九消寒图，为赵莲友观察所作，有姚致堂诗雅题词九阙，陈容叔延益书于幅中。八日改称政事堂为国务院，仍以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取责任内阁制。十

^① 金邦平（1892—？）字伯平，安徽黟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1912年任中国银行筹办处总办、政事堂参议、农商部次长兼全国水利局副总裁。

九日至淀北园看视种植畜牧。

六月二日，公抄先大夫行略、先节孝太夫人行述及墓志墓表汇为一册，送清史馆备采。十日弟世光六十生日，设筵待客。先是袁总统疾甚，公于三日入视，六日未明闻其疾益甚，复往视，犹略言大局。日出归，旋闻袁总统薨逝，即往哭，其夫人、诸子俱出见，与段芝泉、王聘卿诸人议其身后事。七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八日袁总统移殡怀仁堂。行礼归后，黎总统来拜。十二日偕弟世光等入府致祭袁总统。十五日偕九弟世良至淀北园。归，入府与治丧诸人商酌各事。十八日至怀仁堂行礼。二十八日至怀仁堂送殡。二十九日黎总统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三十日任各部总长：外交唐绍仪，内务许世英，财政陈锦涛，海军程璧光，司法张耀曾，教育孙洪伊，农商张国淦，交通汪大燮，陆军段祺瑞兼。七月十一日改任孙洪伊长内务，范源濂长教育，许世英长交通。）

六月下旬，公时方修家谱，日亲勘订。时携眷至淀北园，园池红白荷花盛开，夏景殊胜。

七月十六日，赴天津看德租界新筑房屋。二十三日偕席夫人、诸女、长孙至彰德，住纺纱厂，为袁总统成主。翊日送葬，见其夫人、诸子，商作外圹。二十六日至卫辉，诣太夫人节孝坊，视所种树木，诣唐冈先茔拜扫，察视河园村蔬果园。入城住四叔母宅。次日行，过三灤，经潞王坟游眺。至辉县寓，偕眷拜见五叔母。又至席小泉宅，拜外舅姑神主。连日察看水竹村，游百泉，复至八十亩村、小刘店、郭雷村、小庄、卓水村各处阅地亩禾稼，体渐健，诗思亦清，往往梦中得句。月中得北京徐梧生讣，三十年文章道义之交，闻其怛化，怆恻不能自己。

又得吉林电，六弟世扬于八月九日病歿，年来在吉林治军，才望渐振，中道而殂，意尤伤之。十二日至铁狮街六弟设位前哭奠。二十七日緒直夫妇携肥孙到辉。

九月六日，携女至水竹邨迴澜桥察视农田，又至小营看莲花泉。八日至西关外八盘磨看农田水磨，过袁氏故居。九日偕小泉诸人游啸台，登清晖阁小集，皆乡居之适也。

十月二十八日，公生日，京津、卫辉各处来客甚多。三十日总统选举会补选副总统，冯国璋当选。

十一月九日，王筱陶来商刻公所临西楼帖。十日十弟世章偕黎总统所遣哈汉章等四人来迎公早日回京商榷国政。乃于十一日料理成行，留绪直夫妇辉寓。十二日偕家人至唐冈、顿芳店祖茔拜扫，又至乾隆庙五叔父坟前拜扫。诣中州文献征集处，访李敏修诸君。申刻登车，沿途统军将领皆来谒见。十四日抵京。次日黎总统来谈。时有府院之争，内务总长孙洪伊与院秘书长徐树铮相龃龉，势成骑虎，故黎总统迎公入京调和。二十日洪伊免职，树铮辞职照准。

十二月九日，偕九弟世良携女至淀北园。是日梧生子钟箴将其父遗命，留赠宋板《尚书》一部、阮云台字一幅，公为悽恻。十一日至宝应寺梧生灵前哭奠。

民国六年丁巳（1917）六十三岁

一月二十三日，为阴历元旦，公在京寓。

二月二十三日，副总统冯国璋入京调停黎段之争，黎段之争盖起于院府之冲突也。姚伯慎在汴为购得公外祖自定诗文词稿四本，较前刻本稍有出入，公得之甚喜，即后来重刻之《悦云山房集》也。

两月间恒往淀北园散步。

三月十日，国会投票表决与德国断绝国交。十三日政府组织临时国际政务评议会。十四日大总统布告对德国绝交。

四月四日，收回德租界。五日清明，公偕九弟世良至始祖墓前拜扫，又遣人至始祖母墓前拜扫。二十三日公十弟世章自日本

考察路政归国，并就任津浦铁路局局长兼浦信铁路督办。二十四日公九弟世良得一子，命名绪至。二十五日军事会议开会，一致主张对德宣战。（段祺瑞电召各省区督军来京开军事会议，计到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安徽省长倪嗣冲，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等。会议结果决定对德宣战，即世所称督军团会议也。）二十六日至天津，住五弟世纲宅。

五月一日，国务会议议决对德宣战案。三日偕五弟至修志局宴纂辑诸友。七日政府咨送对德宣战案至众议院。十九日众议院议决缓议对德宣战案，各省督军呈请大总统解散国会。二十三日大总统下令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职。二十六日公在津移居德租界新宅，次日眷属亦由京来。二十八日李经羲为国务总理。三十一日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辞职，改选吴景濂为议长。

六月一日，令安徽督军张勋来京。十二日任江朝宗暂行代理国务总理，解散参、众两院。二十四日国务总理李经羲就职。

（财政李经羲兼，陆军王士珍仍兼长参谋，海军萨镇冰，司法江庸^①，农商李盛铎^②，交通龙建章^③。）二十六日公至南开中学发文凭奖品。

七月一日，张勋拥清帝在京复辟，公闻之慨叹，曾两次函电张勋，劝其离军引退。（电云：“北京南河沿张少轩鉴：密。昨接号电，知执事于复辟之举降心悔祸，内疚神明，但事已至此，要不〔在〕急求解决之方，将上贻故主之隐忧，下为国家之首祸。现既辞卸责任，坐待调停，用抒忠告之言，并拟处分之法。执事

① 江庸（1887—1968），字翊云，又作逸云，福建长汀县人，1913—1916年9月任司法次长，后任修定法律馆总裁。

② 李盛铎（1859—1937），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县人，1912年后任总统府顾问、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

③ 龙建章（1872—？），字伯敘，广东顺德县人，为旧交通系主要人物之一。

仓卒发难，遽更国体，假托名义号召全国，断无倖成之理。迨各军齐集，畿辅震惊，执事固负一隅，进退失据，徒使幼主忧危，外人诘责，京师数百万生命财产皆有朝不保暮之势，是岂执事初心所及料哉！昌对于国家，对于皇室，素以竭力维持为本旨。即对于执事，十余年来同袍谊重，断不忍坐视执事危及国家，害贻清室，犯国家之不韪而不顾。且执事虽以复辟为本怀，其实此事之发生，亦只为二三企壬所强迫，此可为痛哭者也。现在事机日迫，为国家计，惟有迅复共和；为皇室计，惟有维持优待条件；为执事计，惟有速图脱卸，应即日将在京军队交由王聘卿督同江宇澄、吴镜潭^①一律解除武装，移驻城外。执事既不撑兵柄，自可不负责任。至于室家财产，已与段总理商明，亦决不为已甚，昌当力为保护。将来时事稍定，息影他方，云海苍茫，何处不可自遣。大英雄作事，磊落光明，既已铸成大错，便当及早回头，俾当局略迹原心，默留为保全之地，此昌之所以为执事者，略尽于斯，掬诚忠告，惟冀酌行。世昌。蒸。”又手书一函，遣吴笈孙世湘持晤勋面劝，函云：“少轩仁弟阁下：事已至此，兄所以为执事计者，蒸电已详言之，望弟有以善自计也。弟既效忠清室，万不应使有震惊宫廷、糜烂市廛之举。大丈夫作事委曲求全，所保者大，此心亦可照千古矣，望弟曲从。弟之室家，兄必竭力保护。言尽于斯，掷笔悲感，惟希台察，不具。兄昌顿首。”同时又有致世续电，略云：复辟一举，张少轩以卤莽灭裂行之，方事之初，早知无济，云云。二日大总统电请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务，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三日副总统冯国璋、前国务总理段祺瑞电布兴师讨贼。六日副总统冯国璋通告就代理大总统职。七日讨逆军败张军于廊坊。十二日讨逆军收复京师。十四日国务总理段祺瑞入京，到院视事。十五日正式组阁。（外交汪大燮，陆军

① 吴炳湘，字镜潭，安徽合肥人，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

段祺瑞兼，海军刘冠雄，内务汤化龙，财政梁启超，司法林长民^①，农商张国淦，交通曹汝霖。）十六日公赴京。二十六日回津寓。二十八日偕五弟世纲至栗枕叔曾祖宅送重修家谱稿校阅。三十日偕席夫人携幼稚入京。

八月一日，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入京。三日冯总统来谈。十四日大总统布告对奥宣战。十八日国防委员会成立。

九月一日，中元，遣人至始祖、始祖母、二世祖母墓前拜扫。九日为徐梧生书墓志成。自秋天津大水成灾，公捐振银一千二百元、棉衣裤四百套。

十月二十一日，购得山东丁氏所藏古铜器太师鼎、太保鼎、克鼎、克钟凡四件。

十一月十七日，冯总统约至府谈，留饭。二十二日国务总理段祺瑞免职，任汪大燮暂行兼代国务总理。三十日以王士珍署国务总理。

（十二月一日，任各部总长：外交陆征祥，内务钱能训，财政王克敏^②，海军刘冠雄，农商田文烈^③，交通曹汝霖。四日复任教育傅增湘^④。）四日跋宋李忠武公纲手卷。十八日派段祺瑞任督办参战事务。

是岁作诗特多，皆刊入《水竹村人集》中，集凡十二卷，为公六十一岁至六十四岁春季所作，戊午年刻成，柯学士劭忞有序。

民国七年戊午（1918）六十四岁

公在京寓，以祖庭遗墨改装成卷。

① 林长民（1879—1925），字宗孟，自号苜冬子，福建闽侯县人，1916年5月任法制局局长，是宪法研究同志会（研究系）的骨干分子。

② 王克敏（1876—1945），字叔鲁，浙江仁和县人，1917年7月任中国银行总裁。

③ 田文烈（1861—1924），字焕亭，湖北汉阳人，1912年任总统府军事顾问，1916年7月任河南省长。

④ 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四川江安县人，辛亥革命时任清政府代表团顾问，1914年8月任肃政使，约法会议议员。

二月^①十四日，柯凤孙代购唐墓志六朝残碣经幢耕织图石刻，共二百八十二件。十九日公携文、诜两姬、根女乘火车至彰德。二十日内务总长钱能训兼代国务总理。公至袁慰廷墓地察看工程，旋登车赴卫辉，诣刘太夫人建坊处看新种树木，诣祖茔展拜。入城见四叔母，还宿车上。次日至辉县寓，连与同来诸友遍览百泉诸胜，旋送之行。乡居写字、看书外，时校订家谱。二十七日得京津信，知弟世光病剧。

三月六日，赴津看视^②。次日下车即至其宅，见其语言无力，心甚忧之。以钱干臣宅距弟宅较近，即借居焉。日校订家谱并照料弟疾。九日视弟稍愈，遂于次日回京寓^③。

是月起常校书、选诗、校订家谱。谱成，析为上、中、下三巨册，名曰：“《续修天津徐氏家谱》”。先是光绪三十一年修谱一次，公手自厘定，稿经数易，阅八、九年始成，见公自跋。至是续修告竣，公识语谓目次改编，茔图亦加修正，并于命名派字思、嘉、世、绪、延五字下续订八字，曰：保、定、安、和、温、恭、宽、惠，以为云初列序之辨。二十三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二十九日任各部总长：外交陆征祥，内务钱能训，陆军段芝贵，海军刘冠雄，教育傅增湘，司法朱深，农商田文烈，交通曹汝霖，财政曹汝霖兼。）

八月十二日，北京新国会成立，冯代总统因任期届满，通电表示意见。二十日众议院选举正议长王揖唐，副议长刘恩格^①。二十一日为阴历中元，遣人至白云观、盆儿胡同两处祖茔拜扫。二十二日参议院选举正议长梁士诒，副议长朱启钤。

九月四日，参、众两院开联合会选举大总统，列席凡四百三十

① 据《韬养斋日记》所载应为四月。

② 据《韬养斋日记》所载，于五月四日起程赴津。

③ 据《韬养斋日记》所载，于六月六日回京。

④ 刘恩格（1881—？），字鲤门，辽宁辽阳县人，1917年11月任临时参议院议员，1918年成为安福俱乐部骨干分子。

六人，公以四百二十五票当选，当由国务院通电各省并通告各国。公于次日函电辞让，嗣两院、各省致复，咸吁公即肩重任，以维大局。公于十二日又发二次电辞让。十六日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恭送选举证书，贺者甚众，各国公使、外宾亦踵相来贺，公因于十九日接受当选证书。

十月十日，内务总长钱能训、大礼官黄开文率各员迎公进府行就任礼，与前代总统冯国璋交接迄，送其归第，复行宣誓礼。两院议长暨各议员咸集于是，议员官吏行庆贺礼。公有宣言通电全国，主张和平统一。继以各国公使、主教等谒贺。礼成，回寓。（通电文曰：“世昌不敏，从政数十年矣，忧患余生，备经世变。近年闭户养拙，不复与闻时政，而当国势纠纷、群情隔阂之际，犹将竭其忠告，思所以匡持之。盖平日忧国之抱，不异时贤，惟不愿以衰老之年再居政柄，耿耿此衷，当能共见。乃值改选总统之期，为国会一致推选，屡贡悃忱，固辞不获。念国人付托之重、责望之殷，已于本日依法就职。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光，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首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达则不得不诉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两者皆有困难。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趁时机，亦何至扰攘频年，重伤国脉。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闻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否则息争弭乱，徒托空言，或虞诈以相寻，至兵戎之再见，邦人既有苦兵之叹，友邦且生厌乱之心，推原事变，必有尸其咎者，此不能不先为全国告也。虽然此第解决一时之大局耳，非根本立国之图也。立于世界而成国，必有特殊之性质与其运用之机能。我国户口繁殖，而生计日即凋残；物产蕃滋，而工商仍

居幼稚，是必适用民生主义，悉力扩张实业，乃为目前根本之计。盖欲使国家之长治，必先使人人有以资产。而欲国家渐跻富强，以与列邦相提挈，尤必使全国实业日以发展。况地沃宜农，原料无虞不给，果能懋集财力，佐以外资，恩政普兴，工厂林立，课其优劣加以辅导，更以国力所及，振兴教育，使国人渐有国家之观念，与夫科学之知能，则利用厚生事半功倍，十年之后必有可观，此立国要计，凡百有司暨全国人民所应出全力以图之者。立国之主要既如上述，但揆诸目前之状，土匪滋扰，户口流亡，商业凋零，财源枯竭，匪惟骤难语此，抑且适得其反。是必先去其障碍，以严剿盗匪、慎选有司为入手之办法。然后调剂计政，振导金融，次第而整理之。障碍既去而后可为，此又必经之阶级，当先事筹措者也。内政之设施，尚可视国内之能力以为缓急之序，其最有重要关系而为世界所注目者，则为欧战后国际上之问题。自欧战发生以来，我国已成合纵之势，参战义务所在，唯力是视，讵可因循。而能备边防同时并举，兵力财力实有未敷，因应稍疏，动关大局，然此犹第就目前情势言之也。欧战已将结束，世界大势当有变迁，姑无论他人之对我何如，而当此漩涡，要当求所以自立之道。逆料兵争既终，商战方始，东西片壤殆必为企业者集目的之地。我则民业未振，内政不修，长此因仍，势成坐困，其为危险什百于今。故必有统制之实力，而后国家之权利乃能发展，国际之地位乃能保持，否则委蛇其间，一筹莫展，国基且殆，又安有外交之可言乎？此国家存亡之关键，我全国之官吏、商民不可不深长思也。至于民德堕落，国纪凌夷，风气所趋，匪伊朝夕。欲挽回而振励之，当自昌始。是必以安敬律己，以诚待人，以克俭克勤为立身之则，以去贪去伪为制事之方。凡有损于国、有害于民者，必竭力驱除之，能使社会稍息颓风，即为国家默培元气，而尤要在尊重法律，扶持道德，一切权利之见、意气之争，皆无所用其纷扰，赏罚必信，是非乃公。昌一日

在职，本此以为推行，硁硁之性，始终以之，冀以刷新国政，振拔末俗，凡我国民亟应共勉。昌之所以告国民者，此其大略也。盖今日之国家，譬彼久病之人，善医者湏视其正气之所在而调护之，庶几正气之亏由渐而复。假令培补未终，继以损伐，是自戕也，医者何预焉。爱国犹如爱身，昌敢以最诚挚亲爱之意申告于国民。”）准国务总理段祺瑞辞职，以钱能训暂代国务总理。十五日下令整饬吏治。十九日宴各国公使。二十四日下令重申尊重和平之意。（令曰：“欧战以来，兵祸至烈，影响政治，震动全球，而立国久远之图，究未可悉凭武力，故欲保障人类之幸福，必先维持国际之和平。美大总统有鉴于斯，迭次宣言，咸以尊重和平为主旨。吾国政府以逮士庶，莫不佩其悯世之诚，而大势所趋，即列邦亦多贊进行，以为世界和平之先导。吾国此次加入欧战对德奥宣战，原为维持人道，拥护公法，俾世界永保和平，苟一日未达此的，必当合国人全力襄助，协商诸邦，期收完全之效果。本大总统适于斯时谬膺众选，亟当详审世局，用定设施。夫以欧西战祸扰攘累年，所对敌者视若同仇，所争持者胥关公议，犹且佳兵为戒，倡议息争。况吾国二十余省同隶于统治之权，虽西南数省政见偶有异同，而休戚相关，奚能自外，本无南北之判，安有畛域之分？试数上年以来几经战伐，罹锋镝者孰非胞与，糜饷械者皆我脂膏，无补时艰，转伤国脉，则何不释小嫌而共匡大计，蠲私忿而同励公诚，俾国本系于苞桑，生民免于涂炭。平情衡虑。得失昭然，惟是中央必以公心对待国人，而诚意所施或难尽喻，长、岳前事可为殷鉴。故虞诈要当两泯，防范未可遽疏，苟其妨及秩序，仍当力图绥定。兹值列强偃武之初，正属吾国肇新之会，欲以民生主义与协商诸邦相提挈，尤必粹国人之心思才力，刷新文治，恢张实业，以应时势而赴时机。及兹黾勉干济，犹虑后时，岂容以是丹非素之微，贻破斧缺斨之痛。况兵事纠纷，四方耗斁，庶政搁滞，百业凋残，任举一端，已有不可终日

之势，即无国外关系，讵能长此持久？所望邦人君子戮力同心，幡然改图，共销兵革，先以养国家之元气，次以图政策之推行，民国前途庶几有豸。以言政策，莫要于促进民智、普兴民业，而二者皆当具有世界之眼光。我国文教早辟，而民智鄙塞，进步转晚，是宜旁采列邦之文化以灌输之。吾国物力素丰，而兴业之资本尤乏，是宜兼集中外资力以辅助之。以国家为根本，以世界为步趋，务使人民智识具及于大同社会，经济日臻于敏活，民智进则国权自振，民生厚则国力益充。夫如是乃可保文物之旧邦，乃可语共和之真谛。本大总统不惮哓音瘞口，以尊重和平之主旨告我国人，固渴望我东亚一隅与世界同其乐利。此时大局未定，保养为先，军民长官各有捍卫地方之责，仍应遵照前令力除匪患，用保公安。民瘼攸关，勿稍玩忽。惟兹有位，其共念之。”）先后派遣梁士诒、林绍斐、关冕钧分赴广西、香港疏通西南各省，进行和议。二十六日公府约各国公使参随各员及其夫人并中外名流开游园会。二十七日以对德奥宣战后经过情形咨提众议院同意。二十九日布告对德奥战事方殷，劝全国各界踊跃输将，以尽盟邦之义务。外蒙古郡王、又蒙古、西藏议员来见。

十一月二日，参、众两院追认对德宣战案。是日至公府宴参、众两院议员数百人，并约文武官及在京督军同宴。七日下整肃官箴令。九日迁居集灵囿旧国务院。十二日午刻电传德国已于昨日签字停战，协约各国告捷。英皇有电来贺。十五日召集各省督军（奉天督军张作霖，安徽督军倪嗣冲，直隶督军曹锟，吉林督军孟恩远，河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山西督军阎锡山，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绥远都统蔡成勋）及全体国务员、参谋总长、参战督办在京集灵囿四照堂会议，讨论：一、停战撤兵。二、应付外交。三、被兵各省善后。四、收束军队。五、整理财政诸问题。十六日令前方军队罢战退兵，并由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电劝南军撤退，派朱启钤为南北和议总代

表。二十二日广东军政府通令休战。二十四日下尊重法纪、崇尚道德令。二十八日举行战胜典礼，乘礼车至天安门阅军，至太和门下车，文武庶僚、各国公使迎迓。随阅军队，至太和殿行协约各国战胜庆贺礼，各国军队旗徽并来就列致贺，有宣词。各大埠中外商民暨实业、新闻各界同来茶会，学生、商民俱准参观，与会者二万余人。天气晴美，中外欢乐，礼成而散。派陆征祥为欧洲和议大使，是日启行。二十九日宴协约各国公使、外交官、使馆武官等数十人于居仁堂。三十日于怀仁堂开茶会，接见新闻、实业、交通各界人员。自是日起于延庆楼阅公牍，接见群僚、外宾，暇亦写字、看书，间复作画。

十二月三日，召集国务员、参战督办及在京督军开特别会议于怀仁堂。四日下严禁鸦片令。五日公以九弟世良病笃，偕十弟世章回宅看视。次日回宅，九弟已溘逝，抚之痛哭。世良早孤，赖公扶掖长成，猝尔疾殂，尤深痛悼，殡之于长椿寺。十八日全国和平联合会在京开会，外交调查委员会成立。二十日特任钱能训为国务总理。二十一日财政委员会成立。二十三日善后讨论委员会成立。二十四日设立修书处于西院。二十七日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呈递国书。

民国八年己未（1919）六十五岁

一月一日，文武庶僚暨各国顾问于怀仁堂谒贺，外蒙古派亲王入贺于延庆楼，各国驻使参随等员及法国主教于居仁堂谒贺。逊清代表润贝勒来贺，遣大礼官答谢如旧例。申令全国长官庶僚励精图治。三日明令以颜元李塨从祀文庙。五日下发展国民经济令。十一日在居仁堂宴各国公使，又于怀仁堂约各国公使、参随人等开茶会，观剧。是日改组内阁。（内务钱能训兼，外交陆征祥，陆军靳云鹏，海军刘冠雄，司法朱深，教育傅增湘，交通曹汝霖，财政龚心湛。）二十日政府成立外交委员会。二十一日

特委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充赴欧参与和会全权委员，参加会议于巴黎凡尔赛宫。（二十八日我国代表在巴黎和会提出关于山东问题之详细说帖。二月十二日我代表在巴黎和会发表中日各项密约。三月十四日、二十一日外交部续布中日各项密约。）

是月颁发《将吏法言》八卷于文武各官，《历代吏治举要》一册于省长、道尹、县知事各官，公皆有自制序。

二月一日，为阴历元旦，祀祖如前，文武庶僚咸来贺春。下选贤任能令。八日下保惠侨民、奖劝振兴实业令。十一日国会闭幕，到会致辞。二十日南北和议代表唐绍仪、朱启钤等在上海开和平统一会议。

三月二十七日，颜习斋、李恕谷两先生之后裔来见。公服膺颜李之学，尝刊行其丛书以饷后进，又自著《颜李师承记》及《颜李语要》二书以示学者。是年复于京师创立四存学会附设学校，其经费由公独任之，迄于晚年，成就颇众。

四月三日，植树节，至北海种树。又至西园约选诗社十数人宴集，即异日所刊行《晚晴簃诗汇》二百卷之发端也。自是公暇恒至晚晴簃商酌选政。二十日送九弟世良灵柩归葬卫辉。

五月十三日，上海南北和会代表辞职，和议停顿。

六月十一日，咨参众两院，辞总统职。十二日内阁全体辞职。十三日准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暂兼代国务总理。十日以来，全国和平联合会及各省经略使、巡阅使、督军、省长以次文武官员纷纷来电吁请勿萌退志，勉维大局。二十二日国务院电告总统取消辞意。二十八日起移静远堂阅公牍、见庶僚外宾。我国赴欧和会全权委员陆征祥等电告拒绝对德和约签字，巴黎和会决定是日下午三时在凡尔赛宫正式签立和约。

七月十一日，至万善殿前看庶务司所种秋稼。二十日下令裁

撤督办参战事务处，改设督办边防事务处。

八月十一日起移后乐堂治事。十二日改派王揖唐为南北会议总代表。是日并派梁士诒南下调和南北和会事。十七日携长女、长孙游淀北园。

九月十日，对奥和约签字。十五日下令宣告对德战事状态终止。二十四日龚心湛辞总理兼职，特任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

十月二日，寅刻诣孔庙秋祭，行礼。四日南北和议南方总代表唐绍仪辞职。

十一月二十二日，令准各经略使、巡阅使、督军、省长、总司令等呈请裁军、整税各办法，令准外蒙古呈请取消自治，归化中央。

十二月三日，内阁改组。（外交陆征祥，内务田文烈，财政李思浩，陆军靳云鹏兼，海军萨镇冰，司法朱深，交通曾毓隽，农商田文烈兼。）十七日由国务院电粤促开和议。二十九日下令褒扬前代大总统冯国璋。是月校印公外祖刘笠生先生《悦云山房集》成，公加跋，识其缘起。

是年冬，命金梁编文华、武英二殿陈列古物目录，并作《四库全书校勘记》以备影印，藉广流传。时叶恭绰^①方奉派赴欧协助巴黎和会代表，亦电称西国极重东方文化，公遂决意影印四库全书，并提国务会议每年补助二万法郎在巴黎大学内设立中国学院，俾外人就中研究此书，又拟于院内建筑四库图书馆，以备印就贮藏。

民国九年庚申（1920）六十六岁

一月一日，文武各官、逊清代表、各国公使、主教等谒贺如

① 叶恭绰（1881—1968），字玉虎，又作誉虎，广东省番禺县人，1912年后历任总统府财委员会委员、交通部次长、交通银行总经理等职，是北洋政府内旧交通系首领之一。

例，章嘉呼图克图亦与班列。翌日宴外宾于大礼堂。十日宴各公使于居仁堂，又于怀仁堂约各公使、外宾茶会，观剧。十八日至居仁堂与两院议员宴集，演说，亦于怀仁堂茶会。二十一日见年班蒙古王公喇嘛。

二月六日、十四日，分别令禁学生干政。二十日为阴历元旦，庶僚贺春如例。手拟卫辉建立家祠章程。二十七日至居仁堂，中西医会百数十人来谒，公为演说。二十八日在怀仁堂宴章嘉呼图克图及蒙古王公，观剧，又约文武官僚茶会。

三月六日，挪威国初设公使来见，在怀仁堂递呈国书。

四月五日，植树节，至南海种树，遣人至始祖、始祖母莹前拜扫。十四日由国务院通电各省促和。

五月七日，至怀仁堂，华语学校欧美各国教员生徒二百余来谒。十四日特任萨镇冰暂兼代理国务总理。二十六日国会通过对奥和约。是月法总理班乐卫来华，建议退还庚子赔款影印四库全书。公允影印后分赠法总统及巴黎之中国学院，并明令派朱启钤督办其事，派陈垣清查京师图书馆文津阁书之架函册页确数，以便计划影印。

六月六日，广东军政府陆荣廷^①、岑春煊等改派温宗尧为议和南方总代表。二十九日我国加入国际联盟。

七月二日，准国务总理、陆军总长靳云鹏辞职。十四日段祺瑞与曹锟、吴佩孚搆兵于近畿，世所谓直皖之战也。十九日令各军队停止进攻。葡萄牙公使符礼德呈递其国总统赠公最高宝星一座，于怀仁堂受之。

八月三日，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四日派李纯为南北和议全权总代表，下悔祸息争令。七日下巩固法权、尊重法治令。九日

^① 陆荣廷（1859—1928），字干卿，广西武鸣县人，1914年授将军府耀武上将军督理广西军务，1916年7月任广东督军及两广巡阅使，1918年任广东军政府总裁。

特任靳云鹏署国务总理。十一日改组内阁。（外交颜惠庆，内务张志潭，财政周自齐，陆军靳云鹏兼，海军萨镇冰，司法董康，教育范源濂，交通叶恭绰。）三十一日下令褒封外蒙萨札克汗王公喇嘛之有呼图克图名号者。

九月十一日，下振恤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旱灾并蠲缓钱粮令。二十六日下振抚直鲁豫晋陕等省灾情并责成各民政长官切实纠察督导令。旧历中秋节，是夕与晚晴簃诸君宴集，看月。

十月十日，国庆纪念日，免贺，惟府僚来谒。十一日林葆怿等宣布南北海军统一。十二日席夫人诞辰，先日温寿，俄国音乐家五人来奏乐晋祝。十七日下尊重公权、严格监督选举令。下尊重民意、积极筹办自治令。二十三日美国协和华语学校教员等三百余人来谒，为之演说。二十四日广东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等宣言取消自治，听命中央，早成统一。

十二月二十三日，买定天津葛沽东祖茔侧近草地二十九顷有零，价一万一千有奇。二十六日修定汲县祠堂祭祀章程。二十四日下力图统一、巩固国本令。二十九日下嘉惠岩疆令。三十日下奠定西陲令。

民国十年辛酉（1921）六十七岁

岁首典礼一如往年之式。

一月一日，下令组织地方行政会议，讨论推行自治。下令特拨官帑振恤被灾各省区并安辑流亡。

二月十日，公以家祠告成，厘定祭祀礼节。先是法国巴黎大学博士会赠公文学、法学两博士学位，因派朱启钤赴法代受。二十四日检理赠送物品。二十八日钱之于大礼堂，约法国公使柏卜及其参赞等人，又约在京文武官同与宴。朱氏此行系派为沟通东西文化之专使，前此未之有也。启钤到法至其大学代受学位，典

礼隆重。礼成，复历聘诸邦。自是巴黎大学附设中国学院，嗣推而及于欧美各国多至数十处，东方文化渐被欧美实自此始。二十六日下令为轸恤灾黎赈粮免税展限至本年三月底止。

四月五日，为植树节，至北海种树。二十三日为专使在法国大学代受学位举行典礼之期，公约法国公使柏卜暨国务员外交界诸人宴集于居仁堂。柏卜公使言巴黎大学视此种学位最重，本国学问家得此者仅有五人，其致赠于外邦者惟美洲威尔逊总统暨公二人而已。

五月十二日，约各国公使及其夫人暨中外文武官等看花游园，设茶会。十四日改组内阁，总理仍属靳云鹏。（外交颜惠庆，内务齐耀珊^①，财政李士伟^②，陆军蔡成勋^③，海军李鼎新，农商王迺斌^④，司法董康，教育范源濂，交通张志潭。）二十日中德协约签字。（此实民国成立以来最初之较平等之条约。）二十五日召集国务员文武长官、在京三巡阅使章嘉呼图克图、内外蒙旗各王公喇嘛等为宣布库伦及外蒙古各情形。

六月二十六日，派王宠惠为国际联合会全权代表。

七月十日，美总统倡议召集太平洋会议。二十四日偕席夫人携幼稚游淀北园，荷花盛开，野趣甚美。

八月十三日，美国政府正式邀请我国参列太平洋会议。十五日朱启钤专使归，自欧洲资到博士文凭、纪念章、衣帽及赠品多件，又英王所赠书籍、坐钟、挂镜等品。十六日我国答复美政府太平洋会议请书，表示赞同。（十八日外交部设立太平洋会议筹备处，以颜惠庆为处长。二十八日北京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成

① 齐耀珊（1865—？），字照岩，吉林伊通县人，1918年任浙江省长，1920年6月任山东省长。

② 李士伟（1877—1927），字伯芝，河北永年县人，1920年任中日实业公司总裁。

③ 蔡成勋（1891—1946），字虎臣，天津人，1920年被任为甘肃督军（未就）。

④ 王迺斌（1870—？），字恩甫，辽宁新民县人，1918年任总统府顾问，1920年任经界局副总裁。

立。）三十日赴欧专使顾维钧被举为国际联盟会行政会会长。

九月十七日，至延庆楼，美国资本家罗克斐勒第二偕其妻女来谒，盖来华创设协和医院者，因与在福昌门外摄电影，至怀仁堂茶会，中外士女到者数百人。二十日北京国民外交联合会成立。（我国国民对太平洋会议之希望绝大，欲将欧战期间日本掠夺中国之各权与强迫订结之不平等条约一举而解决之。当时专为研究此问题而设之团体计有：铁路协会、铁路问题研究会、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国民外交协会、国际研究社、国际联盟同志会、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太平洋问题讨论会、太平洋问题研究会、太平洋会议研究委员会等，又虑各团体意【见】纷歧，因组联席会议即国民外交联合会是也。其他大都市亦各组团体遥为声援。）

十月六日，特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充参与太平洋会议全权代表。（十二日全国商教联合会公推代表余日章、蒋梦麟等赴美宣传国民意见。）九日与晚晴簃诸人宴集，同观紫光阁所藏前明出警入跸两图，各为巨卷。双十节免贺。十五日新修快雪堂成，往阅视。二十五日至怀仁堂，司法总长带领亚洲律师协会中外二百余入谒，开茶会，演说。二十七日日本大将大岛义昌来谒，留其午宴。

十一月十一日，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成立于上海。十二日华盛顿会议开幕。（参与会议者计九国：美、英、法、意、日、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及中国。其讨论限制军备问题时由英、美、法、意、日五国行之，而讨论太平洋远东问题时则加入中、荷、比、葡四国。会议自是日开幕，至翌年二月六日闭会。）十六日我国在太平洋会议提出十大原则。二十三日提出关税自主案。

（十二月一日，中日鲁案交涉经英、美调停在华盛顿另组委员会谈判，英、美各派代表二人与议。）

十二月十八日，国务总理靳云鹏辞职，颜惠庆暂行代理。二

十四日特任梁士诒为国务总理。（外交颜惠庆，内务高凌蔚^①，财政张弧^②，陆军鲍贵卿^③，海军李鼎新，司法王宠惠，教育黄炎培，农商齐耀珊，交通叶恭绰。）二十五日梁士诒偕国务员入谒。

是年作画较多，检棠埙谱付印。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六十八岁

岁首在怀仁堂文武各官、逊清代表、各国公使参赞、主教、蒙古活佛、王公、喇嘛分班谒贺如礼。分日宴各使馆人员及蒙古王公、喇嘛等，茶会，观剧。十七日姜军统桂题病卒，往其宅哭奠，并训示其各部将。二十五日国务总理梁士诒请假照准，特任颜惠庆暂兼代国务总理。二十八日为阴历元旦，祀祖，文武官来贺如例。

二月四日，中日鲁案交涉解决，条约纪录在华盛顿签字。（其大略：收回胶澳租界由中国开为商埠，允外人自由居住，营合法之业。收回海关管辖，日人放弃德人原有在山东之优先权，公产属中德者无价收回，日本占领时所获得或建造者轻价收回。胶济支线之高徐及济顺路归国际资本团承借，烟潍路由中国自建，若用外资，亦由国际资本团承借。胶济路军队俟中国派警接防时即撤。青烟、青沪海线交还中国。青岛、济南之无线电台于撤兵日给价交还。淄川、坊子、金岭镇三矿交由中国政府特许公司承办。青岛盐场中国备价赎回。胶济路中国估价分年赎回。）六日九国远东公约在华会批准公表。（公约大略：尊重中国之主权与

① 高凌蔚（1869—1943），字泽畲，天津人，1920年后历任农商次长，内务、财政、交通总长等职。

② 张弧（1875—1937），字岱杉，浙江萧山县人，1918年7月任财政部次长，1920年任币制局总裁。

③ 鲍贵卿（1865—1934），字霆九，辽宁海城人，1917年任黑龙江督军，1919年7月任吉林督军，授将军府霆威将军衔。

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与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不得为自己利益在中国谋取一般优越权利。撤销各国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撤退在华外国军警。）华盛顿会议闭幕。二十六日法国大将霞飞来谒，宴之于居仁堂。二十八日复约霞飞大将、法国公使及馆员等茶会，观剧。

四月五日，植树节，至快雪堂种树，席夫人率全家在北海种树。七日至怀仁堂，各国基督教学生同盟来京开第十一次大会，在会者凡四十余国，合中国约九百余人，是日入谒，为之演说。八日颜惠庆辞兼代理国务总理职，以周自齐兼国务总理。九日法国主教林懋德等人见，呈递新任教皇亲笔书。二十六日曹锟、吴佩孚与张作霖构兵，世所谓直奉之战也。（时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下令双方军队接近地点一律撤退。（令曰：“近日直隶、奉天等处军队移调，遂致近畿一带人情惶惑，闾阎骚动，粮食腾踊，商民呼吁，情急词哀。迭据曹锟、张作霖等电呈声明移调军队情形，览之甚为怒然。国家养兵，所以卫民，非以扰民也。比岁以政局未能统一之故，庶政多有关失，民生久伤憔悴，力谋拯救之不遑，何忍断伤之不已，本大总统德薄能鲜，不能为国为民共谋福利，而区区蕲向和平之愿则历久不渝。该巡阅使等相从宣力有年，为国家柱石之寄，应知有所举动，民具尔瞻，大之为国家元气所关，小之亦地方治安所系。念民生之涂炭，矢报国之忠诚，自有正道可由，何待兵戎相见。特颁明令，着即各将近日移调军队凡两方接近地点一律撤退，对于国家要政仍可切实敷陈，以求至中至当之归，其各协恭匡济，奠定邦基，有厚望焉。”）公自任艰巨，深维齿衰多病，日怀退志，因欧战甫罢，内外大计均待定夺，不得不姑缓以维危局。又自莅任以来，力主和平统一，宣德通情，信使旁午，然屡议不成，而军人相争，动兴兵革，日甚一日，公实

痛心。况南则旧国会议员去粤另举总统，北则有主恢复约法，请黎总统复职以成统一者，公雅不欲以一身去留牵及大局，因于五月三十一日通电以示愿束身而退之旨。（电云：“鄙人忧患余生，忝膺国寄，原思竭尽智虑，力求和平，保全黎庶，统一国家。乃事变纷乘，朝夕迁易，百艰躬试，劫运难消，兢惕忧惶，衰颓益甚，茹荼集蓼，莫喻此衷。顷阅孙传芳^①勘电所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使亿众一心，悉除逆诈，免斯民涂炭之苦，跻国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强盛，鄙人虽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乐无穷，胜于今日十倍，况斡旋运数，挽救危亡，本系鄙人初志。鄙人力不能逮，群贤协谋以成其意，更属求之不得之举，一有合宜办法，即便束身而退，决无希恋，先布区区。”）

六月二日，公治事毕，约国务员周自齐等及孙宝琦、汪大燮、钱能训、顾维钧诸人宴集，宣布即日辞职赴天津之意，并下令因病不能行使职权宣告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职务，遂将印信移交国务院，即日偕十弟及两女乘车至天津，并发通电诏告国人。（电云：“频年以来，海内多故，鄙人外以愍民生之困顿，内惭于孚辑之无方，迭次通电宣言，久以退休为志，徒以国会未设，继任乏人，荏苒光阴，以至今日。兹以撄疾衰颓，不堪任兹艰钜，已于本日明令宣告辞职，依法由国务院代行职务。惟是此四年中身所经历、心所郁结者，不得不于将去之时一为倾吐之也。曩者丁巳一役（张勋复辟），国脉中断，冯前副总统代任元首，召集第二届国会，据法改选，以冯前代总统任期届满，国会乃以大任相属，鄙人乃以衰老无能，再三辞让，竟不获已，强起就职。时则海内崩析，生民涂炭，欧战将停，国交方亟，私心祷祝，首愿竭忠尽虑，企谋统一，以纾民困，次则合群策群力，以

^①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1920年8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1921年8月任陆军第二师师长。

谋政治外交之逐渐改良。是以莅任之初即揭橥此旨，首令南北同时罢战言和，复派遣全权代表开会议于上海，以毅力促进和平，乃磋商经时，尚鲜端绪。南则党见纷出，北则代表再更，益启纠纷，迄无效果，遂使神州中割之局沿袭累年，未[末]由统一，黎民疾首，征伐相寻，此则鄙人所为痛心者一也。以统一之无期，至衅隙之交构，于是乃有庚申六月之役（直皖之战）。其时譬解既尽，戢兵无方，畿辅陈师，至于旬日，闾阎震骇，功罪纷纭，而国家之威信，军旅之精英，亦既摧失过半矣，此则鄙人所为痛心者二也。二年以来，张皇补苴，略言安辑，乃以阁揆进退，辄起争持，排喻俱穷，重劳师旅，邦畿千里，羌为战墟，侘傺民生，重以剥伐，此则鄙人所为痛心者三也。鄙人德薄能鲜，诚信不孚，才不足以言统驭，智不足以言几先，驯至纲纪沦胥，生灵憔悴，每一念及，寝食难安。夫国家之不能就轨，乃至溃决，为祸者既已彰彰，返而察夫庶政之措施则亦寡所成就。教育为立国之根本，实业为救时之要图，就任之始，计划綦详，甚欲敦勉实行以裨大。四年之间，其谆于官吏者实不过所怀之毫末，乃以大局不宁、财政枯竭之故，互为牵掣，不但无以课功，而且日益窘困。至于地方自治，为共和国家要义，屡经督促而迄未奉行，凡此皆返躬自责而不敢稍自宽假者也。所差能为国家致希望者，则欧战以还世界大势变迁异乎昔时，巴黎、华盛顿两次会议，赖我国同心协力一致进行，举我国所希望之条件大都通过。日本悬案亦得解决，虽实施有待，而自奋有基，友邦之信用较深，国际之地位较胜，此皆国民督促之力与代表用命之功，非鄙人所敢引以为劳者。然而最初愿望惟此一端差称不负，又不敢引以为幸也。第念华盛顿会议既予我国以建设之机，实为我国人奋兴孟晋之会，其整理繁重，自非衰朽所克胜，当其闭会之后，即思引退以让贤者，而其时内阁之风潮未平，不得不暂为隐忍，勉事维持，今则局势稍定，更不容再缓须臾矣。国家者国民之公器也，

鄙人不过为国家服务之一人，比年以来，劳精疲神，茹辛忍辱，调护群材而不蒙相谅，遇事退让而犹以为争，不私一财、不私一人而疑为虚伪，既已艰苦之备尝，夫何权位之足恋？从兹隐处林泉，不复再问世事，而私衷所希冀诸端，吾知后来贤达必能振作有为，为国家建无疆之业以副国民喁喁之望也。掬诚布达，幸亮察之。）公到津住十弟意租界宅。（十一日黎元洪暂行大总统职权，以颜惠庆署国务总理。）

九月十日，迁居英租界二十号路新居。十五日席夫人由京携儿孙等来津。

十月二十八日，为姜翰卿将军书神道碑。

十一月一日，公生日，拜祝者甚众。三日卫辉、辉县人来述各处祠堂落成，公所筹天赉渠、苏门山农业学堂、试验场各事亦皆就绪，为之欣慰。自是看书、写字、作画、教诸女读书外，时复浏览名人书画，并赴严范孙诸人文宴之约。施肇基自美国归，来谒。赵湘帆衡自京来久谈，傅沅叔自京来谈印道藏事。新制大笔围径九寸，管长五尺余，能作六、七尺大字。

是岁公子绪直留京寓度岁。

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六十九岁

三月六日，瑞典国副领事柯洛夫斯来谒。去岁瑞典驻京公使称其君主向公索新制四库全书目录及影印文华殿文渊阁图册，今即交其寄往。十八日至十弟宅，送五叔母回辉县。二十五日王书衡式通自京来商选诗各事。

四月六日，偕十弟至其濠园一游。二十六日遣人至河南察看农田。新制二琴，各为命名制铭。

五月二十日，赴南开观新建大学，规模宏阔。严范孙同来，在校午餐，泛舟而归。

六月长夏，多看书、作字。京中寄来选诗稿本，公亲阅定。

(是月十三日，黎元洪出京赴津。十四日国务院宣告摄政。)

八月二十日，购定宋拓化度寺碑，有覃溪考订及诸家跋，何猿叟推为海内第一。后二日又购得宋黄山谷草书楞严经真迹，有元明各名家题跋，公甚喜之。是月日本地震、大火，东京、横滨被灾奇重，我国政府人民群起救济，公以银一万元由十弟面交其驻津总领事寄回助振。

十月二十二日，为阴历九月十三日，公生日，来祝者亲友外旧日属僚部将甚多。

十一月六日，日本少将佐藤一之助、总领事吉田茂等来谒。七日日本议员数人自其国来谒，皆以谢振灾也。（是月十日，曹锟就总统职，以高凌霨兼代国务总理。）

十二月十四日，瑞典国副领事送来其国王谢函。

是年，自课书画外，常教幼稚读书，批改诗文。

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七十岁

春，按日阅晚晴簃所选诗。

一月二十日，美人福开森来讨论古铜器拓本事。二十四日李季皋自上海来晤，铁宝臣亦来谈。

五月五日，五弟妇病逝，为适路氏二姑母之次女。偕席夫人往哭并为指示丧礼，越二日往致祭。

七月十日，长女绪明受聘冯氏，公同年祥符星岩中丞汝骙之少子名迪。

八月二十日，敬题外祖刘子元公小像，是像先由表侄余庆自汴送来，为重装付还。

九月十五日，法国人某承其国美术院之属来为公照像，将回国制玻璃像永悬于院中也。

十月十一日，公七十正寿，京外文武官僚暨门生故吏来者极众，公不受礼，仍设宴款之。十一月订印《归云楼砚谱》。（是

月三日，曹锟通告退职，由国务院摄行职务。二十四日段祺瑞任临时执政。）

十二月，由京寓迎祖宗神位来津寓，眷属俱来。

是岁看书、作字、作画日有常课，兼校阅诗选手自批订。（是月三十一日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入京，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逝世。）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七十一岁

公在津寓。京津两处藏书贺性存葆真为编书目，藏事核订付印，名曰《书髓楼书目》。

三月四日，次女绪根受聘许氏，江夏许蔼秋大令芳之子名彦，男女同庚。是月卫辉徐氏创建祠堂，公出资营构，地为十弟所买。因属诸弟各房轮流接管，诸弟谦，不敢受。为同年贺松坡刑部书墓表成，文为前数年所撰者。数十年不见老友朱古薇自上海来访。

五月，公创辟卫辉天赉渠成，自为文记其颠末，为门人曹润田之父书墓碑。

六月，为长孙延东定婚张氏，纳采如礼。

（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于广州。）

八月，德国人谋乐来谒。日本武官吉冈显作诸人来谒，求书。卫辉府城隍庙、唐冈吕祖阁道士请领道藏，盖公任总统时印行者，各颁赠一部。

十月三十日，公生日，以时艰不举觴，远近来祝者颇众。

十一月六日，公长女绪明适冯氏，亲婿冯迪亲迎奠雁，为女加笄，采舆于归如礼。中旬书天赉渠碑、钱千臣墓碑，先后成。

十二月，公三叔曾祖栗忱公以所藏中丞公从军图卷、又双款扇面十页归，公答以千金，俾资贍老。

是岁《晚晴簃诗汇》付刊。

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七十二岁

一月，傅沅叔来洽刻书事。

四月，日本画师渡边晨亩来谒。时中日书画家创为东方书画协会，北京、东京各设本部，其在中国者推公为会长，故日本画家来游者必谒公，每值书画展览会，公亦出所藏名迹及自作书画以为提倡。（是月十九日，段祺瑞通电下野。五月十三日，颜惠庆内阁复职，兼摄行总统职务。六月二十二日，颜辞职，海军总长杜锡圭^①兼代国务总理，嗣后迭以施肇基、蔡廷幹^②、顾维钧代国务总理。）

五月，得卫辉电信知四叔母久病逝世，商就五弟寓设位遥祭，并措款寄归，备受吊、营葬之用。十七日至五弟寓哭奠尽哀。二十五日日本伯爵内田康哉来谒，公二十年前旧识也。二十七日英人庄士敦偕其国新授加拿大总督威林顿夫妇来见。

（六月五日，国民政府以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师北伐。）

八月，《归云楼砚谱》拓成，次第装订。

九月，《畿辅先哲传》刊成，冯公度自京送样本来看。

十月十九日，公生日，不设觴，远方有来祝者，款接竟日。

十一月一日，许婿家行纳采礼。十日遣次女于归许氏。

十二月，为张鸣岐凤台书墓碑。岁杪检自书屏联分贻亲友。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七十三岁

二月，晚晴簃诗选成，分缀诗话，校毕节路氏三代诗稿，付印。

① 杜锡圭（1874—1933），字慎臣（承），福建闽候县人，1926年4月就任海军总长。

② 蔡廷幹（1861—1935），字耀堂，广东中山县人，1918年任盐务厅总稽查兼税务所会办，1924年任税务处督办，直至1927年1月去职。

三月，日本山本条太郎等四人来谒。英国总领事杰弥逊来谒。时为冯、许二甥讲陶诗及昭明文选。

四月，许甥、根女夫妇同赴瑞士留学，公加以训勉，自后寄来日记、诗文，随时批答。十六日为长孙延东行冠礼，先期演礼三日，至是日举行，延八十翁王晋卿布政为大宾，诸弟各家来执事观礼者甚众。礼成，率长孙拜祖宗，拜合家尊长，设长宴款客。（是月十八日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数月来选辑明清八家文抄付刻。

（六月十六日，顾维钧内阁总辞职。十八日张作霖就海陆军大元帅【职】于北京。）

十月，李季皋侍郎自上海来访。席夫人感疾，延梁医间日诊脉。八十二翁樊云门布政自北京来访。

十一月，日本美术院长正木直彦及诗家田边碧堂、画家渡边晨亩等六人来谒，以将开中日书画展览会也。

十二月，为次孙延同授室，二十七日行纳吉礼，三十一日迎娶，行婚礼。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七十四岁

是岁诗选将毕功，时复作画、作诗及题跋榜书，按日课孙，兼为冯甥改定诗文。席夫人疾未愈。

二月，外交部饬直隶交涉员送来秘鲁国大总统赠公宝光大勋章一座。先是公任总统曾赠以本国勋章，至是始答赠。

三月，为白云观写碑，为席夫人制寿材。

四月，得许甥瑞士书，知其考入工业大学，已入校。

六月，又得书，次女于月之十五日产一男，命名耆功，乳名瑞宝。是月朱庆澜乞公以自作书画助振，检画一幅、对联六十幅、条幅三十件付之。（是月二日，张作霖通电下野，政务交国务院摄理。八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入北京。十五日国民政府

对外宣言统一告成。二十日改直隶为河北省、北京为北平特别市。)

八月，为同年张珍五书墓志，《退耕堂政书》刻成。

九月，编定《清儒学案》目录，为福开森跋右军嘉兴帖墨迹。

十月二十一日，偕十弟在冯甥宅海曙楼登高，侄绪至、侄孙延功暨延东、延同两孙从，即席分韵命赋诗，并命延功、延同分作散骈文序。本月后延梁医宝鉴为席夫人用电气治疗。

十一月，为同年韩子桥书墓志。

十二月十四日，曾孙咳名定儿，命名保厘。

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七十五岁

一月，校定《晚晴簃诗汇》样本，酌定序文、凡例，审定《清儒学案概略》，辑近作诗为《归云楼集》，至是刻成。

三月，严范孙侍郎病逝，公四十余年摯契，为四诗挽之。

入春，逐日阅晚晴簃补选诗及《清儒学案》初稿。上已至冯甥宅分韵赋诗。

二弟世光自三月以来抱病，常往视之。至六月渐患失眠，又腹泻，气弱。

七月一日，闻病重，往视之，已弥留，戌初逝世。公日记老年兄弟忽尔永诀，悲痛无已，为料理附身各事。翌日照料入殓，行礼，为之痛哭。移柩停特别一区旧宅，告诫诸侄以居丧应守之礼。

八月三日，受吊。次日殡浙江义园。

九月六日，长女病歿医院。公日记称其孝敬娴顺，善体亲心，二十五年来不离膝下，一旦病逝，痛不可忍。受吊后移柩淀北园暂厝。

十二月，梁医为席夫人诊病，改用针法。

民国十九年庚午（1930）七十六岁

一月二日，以长女逝去百日，遣人至淀北园奠之。三十日为阴历元旦，公近年概屏贺客，祀祖如例。

二月后席夫人病渐沉重，至三月一日午刻逝世。夫人与公夙共患难，在翰林日费用皆由夫人节啬以供，内顾得以无忧。公又喜客，以学问相质者满座，每亲治酒食饷之，客皆稔知中馈贤。侍太夫人尤谨，饮食、服御或侍疾、扶持、抑搔从不假婢妪手。每祭祀皆亲炊餚以荐，迨贵持俭执勤如故。当公督东日，恐家人寢习惰惰，乃设修齐女学于官邸。及秉大政，念贫户日多，所以凋恤之者必力，夏施暑药，冬施衣粟，累年无间。又设贫民女工厂，振拔尤众。公生平不治生产，先后于辉县小治田庐，实夫人铢积寸累以成之，谋归耕，迄不果践。以是夫人之歿，公深痛之，赋庚午二月二日诗，又春寒七律九首，皆悼逝之作。又草事略，征求文字于夏润之孙桐为作家传，柯凤孙劭文作墓碑，王书衡式通作墓志。是月十五日受吊，中外吊客千人。次日殡于弢园别业。入夏，公时至殡舍看视。

六月，许婿、次女自瑞士归，同诣哭奠，值席夫人逝世百日，全家诸弟亲友俱至殡舍哭奠。二十一日弟世光逝世周年，公往祭之。一年间连遭凶丧，公怀滋戚，犹时与两婿讲学，间作书画自遣。

七月，送弟世光柩至北京，暂葬西山宝藏寺附近山冈。

九月，送许婿回瑞士留学。阅陈仲英、陈季祊两表叔诗文残稿，谋辑刊。

十月，自撰联语，随手书之，即录于册，积日得数千联，后辑刊为《竹窗撰楹语》。又摘集中句自书之为《拣珠集》，十弟取而影印之。是月按日续阅《清儒学案》稿本，多所订正。前英国公使克菜来中国游历，过津来访。二十二日为阴历九月朔日，席

夫人生忌，率家人至殡舍上祭，时室内起砖扩新成。

是岁邸中延贾君玉先生廷琳授一侄两孙读，岁暮归里，公至书房考校功课，为讲授力学作文之法。

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七十七岁

二月，为冯甥讲授文学。门人郭啸麓则瀛以同社文乞评定甲乙。

三月二十日，席夫人逝世周年，率家人往殡舍哭奠。

四月，寓园海棠盛开，约诸弟小集赋诗。园中四时种植灌溉等事皆亲自督课，岁以为常。

五月六日，为次孙延同定婚高阳李氏，于京寓行聘如礼。

六月二十日，为旧端阳节，率家人至席夫人殡舍致祭。

七月十日，弟世光歿二周年，率家人至三侄宅致祭。

数月以来日阅《清儒学案》稿本，凡有商榷，辄手为批答，函札往还无间。又作题画诗极多，异日尝汇刊为《归云楼题画诗》。

九月，为南中水灾，检历年所书石刻、木刻各帖助赈。（是月十八日日本占沈阳、延吉等处，辽、吉两省以次尽占。）中秋日祭席夫人殡舍。

十月，生忌，复率家人往祭。是月检历年所作书画多件助湖北赈灾。二十三日公生日，不举觞，来祝者众，接晤竟日不倦。

十二月中旬，评阅四存学校诸生课作，分别甲乙，批奖发还。

数月以来作题画诗、跋语、砚铭特多。

是岁起所作日记于节气、晴雨、寒燠、风云物候尤加详悉。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七十八岁

二月六日，阴历元旦，昧爽起，祀祖，率家人至席夫人殡舍行礼，至十弟宅为五叔母贺春，诣五叔父神位前行礼，又至五弟宅祖宗堂前行礼。贺客皆谢未见。自六日至十日晚皆祀祖行礼。

公家法奉自先世，岁时令节，祀先外高祖父母以下乃至叔祖父母、叔父母，生卒忌皆有祭，公年至八十，每祭日犹恪诚跪拜，虽老不怠，日记皆备载，兹从节，详记于是。自是月起作诗、题画、校诗、作跋语、写字、作画、写大字对联，日有常课。

三月十八日，为席夫人歿二周年，率家人至殡舍供饭。日记云时多扰攘，不克归葬，心甚忧之。十九日检平时所作书画助振。时许甥已自瑞士毕业归，公常与二甥谈经讲学，间论边疆舆地形势。审阅《清儒学案》外，编诗、校诗为常。

四月，料理园中花木，浇花分菊，引瓜种豆。是年海棠、樱桃皆盛开。

五月，朱桂辛携得明岐阳王李氏故物固原得胜图并洪武墨勒来同观。

六月二十八日，弟世光歿三周年，往奠。

八月十六日，为旧中元，率家【人】至席夫人殡舍供饭。贺性存自北平来谈编辑藏书目录事，携通州雷介庵学淇所著《竹书纪年义证》稿本，盖昔年南皮张文襄公访求而未得者，后为王晋卿得之，今以贫老愿归公，价四百元。公别抄副本，谋刊印行世。

十月，德国人何德福、美国人卜德父子来谒，乞书。十六日属朱铁林宝仁至北平料理次孙延同授室。二十六日遣次孙赴平，二十八日成礼。三十一日新夫妇自平归，行庙见礼。新妇出自耕读之家，尝从张小蓬之孙寿岩学画，公甚喜之。

十二月，安度新购书籍，阅四存学校课卷，评定甲乙，批奖发还，编次《清儒学案》目录。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1933）七十九岁

一月起常撰联语，日或数联。公所作诗先后编为《水竹村人集》十二卷、《归云楼集》十六卷、《归云楼题画诗》六卷、《海西草堂集》二十四卷、《海西草堂题画诗》六卷。嗣又由柯

学士劭恣仿精华录例甄选为二十七卷，名曰《水竹村人诗选》。前岁所记编诗、校诗者则《海西草堂集》也。二十六日阴历元旦，仍谢贺客。

自二月一日起校阅《学案》，间作诗画不辍。二十六日至席夫人殡舍供饭。二十七日寅时次曾孙生，命名保慈。

三月九日，法国副领事施尔满来谒。十九日冯甥赴平迁长女之柩归葬汴梁。

四月，连日品评端砚、字画，整理书籍。课园丁莳花锄药、浇灌葡萄。公所居园不及十亩，而分畦凿井，常躬自汲水习劳，四时种植咸备，略得农田水利之意，盖归耕不得，聊寄野情于此。

六月，旧端阳日率家人至席夫人殡舍供饭。

七月，按日阅定《清儒学案》稿本并审定例目。是月多评砚制铭，付镌。

八月三日，五叔母八旬正寿，挈家人往预祝。次晨复往行礼并与八弟、十弟久谈。

九月四日，旧中元，至席夫人殡舍供饭。十九日约铁宝臣及诸旧交小饮，出宋拓阁帖太清楼帖展观。是月以《竹窗楹语》付刊，所作或近取眼前，或放怀远古，或兴怀一室，或横览五洲，随意为之，纯是化境。

十月十九日，席夫人生忌，至殡舍供奠。二十七日赴铁宝臣酒楼登高之约。

十一月，阅四存学校课卷，评定批奖如例。赴张远伯志潭宴集，观所藏宋拓徽宗千文精本。

是年《清儒学案》将次成书，批阅稿本，书札往还，备殚心力。

民国二十三年甲戌（1934）八十岁

一月，检理旧藏端砚帖墨，展玩字画。

二月十四日，阴历元旦，拜席夫人殡舍。至十弟宅为五叔母贺春，至五弟宅祖宗堂前行礼，一如往岁。看书、写字外多撰联语。为人题唐太宗墨迹卷。

三月十六日，席夫人歿四周年，偕家人至殡舍供饭。清明再往供奠如例。延蒋吕梅熙字为外孙许福超、曾孙保厘启蒙，亲告以教导之法。料理种花灌园，十年以来次第布置，四时果木、蔬菜、花草、药物略备。

六月十六日，为旧端阳节，偕家人至席夫人殡舍供饭。夏润之有书论编定《学案》事，自作书答之。

八月，十弟为购得阮文达十石鼓砚。与十弟冒大雨应张伯苓^①之约同至南开大学周览，登楼远眺，雨景极佳。二十四日为旧中元，奠席夫人殡舍。四存学校李九华来，为指导学校各事。

十月，旧重阳节，曹润田诸君约中原酒楼登高。二十日为公八旬正寿，先期谢却序言文字及一切礼物，是日晨至十弟宅见五叔母，行礼。归后诸侄、亲友胪拜，申祝者亦数百人，开茶会，外宾来祝者多。是月厘定《清儒学案》凡例、序文各事，即以成书。

十一月十一日，展玩大令精楷离骚经。五弟世纲徙居北平甫旬日，于二十二日病逝，同堂兄弟又少一人，公为怆恻。

十二月，冬至至席夫人殡舍供饭，岁除亦然。

是岁刊印房师钱阁学《一松斋诗集》。以补辑《学案》事与曹理斋、沈羹梅往复函札商订最多。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八十一岁

春，看书、作书画外，时于室中廊下散步，偶成断句，即为联语。

三月后逐日阅定《清儒学案》稿本，以是书亟待观成也。八

^① 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时任天津南开大学校长。

日齐树楷自京来报告四存学校各事。三十一日起校阅四存学校课卷，历旬日乃竣。

五月四日，比国教院院长南文等来谒，午后为开茶会，中外来宾数十人。越日美国人福伯司来谒。

六月五日，旧端阳节，偕家人至席夫人殡舍供饭。

是夏引水种荷，深居简出，所与往还者铁宝臣、增寿臣外及门二三子而已。仍按日阅定《学案》。

八月十三日，旧中元，至席夫人殡舍供饭。

九月二十八日，席夫人生忌，复诣殡舍供奠。平寓资来历代诰轴，检敬藏。

十月十日，公生日，至十弟宅为五叔母行礼，亲友来祝者众，有自北平、河南来者，酬酢竟日。

秋来多看书、散步、作诗、题画，而《学案》待定者益繁。

十一月起按日检阅，日或数次。十七日看十弟新得八叔曾祖沅青公太常仙蝶图双卷。

冬寒晷短，每日看书不辍。

十二月十六日，日记谓年高之人以读书为至乐，且于养身、养心有益，盖公得力于此。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八十二岁

岁首看书、校书、写字、作画如常。李季皋自上海来，因约数客小集，话旧为乐。

二月二十四日，席夫人忌日，偕家人设奠殡舍。

三月起阅定《清儒学案》益勤，时作擘窠大字。

四月，检阅四存学校诸生课卷。检所藏砚石分别评择，自系以铭。五日至十弟宅看其新得宋谢文节桥亭卜卦砚，昔为周月东查俭堂所藏，海内至宝也。

入夏，时于园中散步，看浇花、种豆、引葡萄、栽藕。

五月，韩荣兴、邓荣光先后来商筹席夫人归葬事。公子绪直久病，又染时疫，月之十四日申时溘逝。老年丧子，悽惋伤怀。日记谓此子孩提时即多病，成童渐健，近十年来腿脚不良于行，茹素诵经，亦尚安适。不意感疫又兼身弱，忽然摧折，能不伤哉。亲友多来慰问者，择期受吊如礼，殡于浙江义园。

六月二十三日，旧端阳节，偕家人至席夫人殡舍供饭。二十八日自制杖铭。是日偕十弟、许婿、根女至席夫人殡舍看木材制櫬。

七月二十日，十弟约至其濠园小住，携陈姬同往下榻于长春书屋。次晨偕十弟诸人至第三公园看荷，即旧日柳墅行宫也。每日早晚与十弟同游甚乐，十日还宅。是月起仍按日阅《清儒学案》稿本。

八月三十一日，旧中元节，至席夫人殡舍设奠。时卜窆有期，预遣人至辉县营圹，工既竣及遣两孙奉席夫人灵榇附火车赴辉，公子绪直柩随行。公亲至殡舍照料起行，复偕十弟至车站看视，亲友来送者甚多，抵辉即停茔地丙舍。

九月二十五日，安葬席夫人于新茔，绪直柩附焉。是月以《海西草堂题画诗》付刻并镌砚杖铭。

十月二十三日，旧重阳【节】，同十弟至小花园小山登高、看菊。小园秋后自艺菘芥、芫菁供餐，颇得野趣。

十二月，日本人桥川时雄来谒，此人久居北京，方续纂《四库提要》。

是岁多作联语自遣。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八十三岁

一月五日，为太夫人忌日，日记谓自失萱荫已四十年，天长地久，无母可依，瞻望南天，松楸远隔，寸心悽怆，不能自己，盖所谓终身之慕也。新岁悉谢贺客，看书、写字、批阅《学案》按日无间。

三月一日起评阅四存学校诸生课卷，约两旬始毕。七日至十弟宅观所藏兰亭、圣教二序，皆北宋拓本，海内仅见。有人拟续修画史汇传，公就所知各画家为撰小传畀之。是月齐树楷自北平来详陈四存学校各事。延杨梦九课曾孙读。春日亲视移种花树、修浚荷池。

四月二十三日，十弟来评论河南新出土古瓶。是月起多作题画诗。《清儒学案》待成，曹理斋时有书商榷，公皆手答之。

公次女忽于五月三日以痧疹变症逝世，老年遭此，深用怆怀。家人强慰，十弟阻其临视，公亦勉自排遣，然自是寡欢。

七月，十弟奉五叔母至公宅暂居，越数日乃返。（是月七日，日本启衅于芦沟桥，全国抗战开始。）

十月五日，席夫人生忌，日记计其在生年亦八十，黯然神伤，命长孙等致祭。十六日公生日，概谢外客，对菊看书，家人团聚。

十一月，福开森来谒，时方杜门谢客，以福多年旧交，乃一见之。是月后整理旧箧书牍，评砚制铭。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八十四岁

一月，检得昔年所书殿试卷及会课诗赋，不见此作瀕五十年，如逢故人。傅沅叔来谈刻书事，是时《清儒学案》陆续付刊，将蒇事矣。新岁仍谢外客，作画自适，亦撰联语，作格言，以为养心之助。

三月三日，席夫人忌日，命长孙等供奠。改定《清儒学案》序文。

四月，郭啸麓以同社文乞评定，为加批发还。园中海棠今岁特盛，对花小饮。

五月后仍多看书、写字、作题画诗，时于室内或室外散步，盖动静相参之道也。

六月，检制铭各砚付刻。二十六日五叔母病逝，尊长仅存，念之悲怆，率家人前往照料。

七月后公体中不适，延冯医诊，然起居如常，时于荷池畔间行纳爽。

八月，延梁医诊。自画石谱六册装成，招十弟同观。十弟今年五十，因以畀之。

九月后写字、看书、作画仍有常课，间行散步亦如常。

十月，兼延陆医诊视。

十一月后乃专延梁医施用针治，精神见佳，而不时微有反复。自是虽复见效，而每患愈剧。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八十五岁

一月，改延萧医龙友，病势渐平。七日略能散步。月之下旬渐能看书、作画，而所患偶作，辄烦调治。

二月，看书，静卧，间于楼上散步，渐能作画、写对联、作题画诗，精神较胜。

三月十六日后兼延孙医针治。下旬夜眠不适，服萧医方剂见效。楼上散步如前，书画渐辍。

四月十四日，休复不适，复延萧医改方，兼由梁医施用针术。十六日朱桂辛来，犹于病榻见之。自是多静卧或坐小椅车间行。

五月中旬，精神益逊，日记至十九日即阴历四月朔日辍笔。是后体渐羸悴，以至绵惙。医谓膀胱瘤溃，遂于六月五日即阴历四月十八日申时薨。遗嘱不讣，归葬辉县，不修墓工，裹土树石，题曰：“水竹邨人之墓”。

胡嗣瑗致刘廷琛密函

吉迪 整理

说明：胡嗣瑗、刘廷琛均为民国初年著名的复辟派。胡字晴初，贵州人，光绪癸卯翰林，清末曾任湖北督署文案兼调查局总办、法政学堂总办。民国初年充冯国璋幕僚，1915年任金陵道尹，甚得冯之信任。刘字幼云，晚号潜楼，江西德化人，光绪甲午翰林，故胡称刘为前辈。清末曾任陕西学政、京师大学堂监督，时流寓青岛。张勋复辟时刘参与密谋策划，是当时复辟派的重要成员。

本函未署年月姓名，据笔迹与内容考定系胡嗣瑗写于1916年5月冯国璋召开南京会议期间。函中透露冯国璋迫袁退位，及其与复辟派的关系，与张勋在袁退位问题上的矛盾。胡等反袁其目的为复辟，促冯反袁以助成复辟形势，函中所透露北洋派内部，因袁世凯推行帝制，已呈现分裂的内幕，对研究民初的北洋军阀史很有参考价值。

函中多隐语，并涉及一些人和事，仅就编者所知，略加注释，以便读者。此件由北京王毓超先生供稿。

潜楼前辈大人阁下：别来旬日，前夕回沪与郇①兄晤谈一切正拟详修寸简，托郇寄陈，甘兄②来，接诵手书（公致瘦③函即照办），兹谨条答如下：

一、此次会议④，本因徐、蚌、宁⑤意见不一致，始变计。为此，

① 陈郇，字贻重，湖南湘潭人，复辟份子。

② 汪甘卿。

③ 胡思敬，字漱唐、瘦唐，号退庐居士，江西新昌人，光绪甲午翰林，清末任监察御史。民国后参与复辟活动，奔走于南京、徐州、兖州间，与刘廷琛等来往密切。

④ 指南京会议。

⑤ 时张勋驻徐州，倪嗣冲驻蚌埠，冯国璋驻南京。

宁以目前大患在袁不退，千迴百折，非办到退字诀不可。徐则以宁为此说，或系别有野心，以故坚持保袁，此外皆非所及。蚌无他路可走，更惟有袒徐以抗宁。下走微窥症结，当即促宁归入正文^①，既可倒袁，又免为人所劫。宁仍观望^②，几败于蚌、徐矣。

幸与赣、鲁、湘各代表设法疏通，始得将保袁主战诸人一律驳倒。刻仅通电南北，须独立各省派员加入会议，公决退袁办法。下走未列席，以两处极注目也。至此会议为小结束，徐、蚌见此会无可利用，遂掉头而去。此必另作计较，协以谋宁。而西南是否派员来会，亦尚未得切实回电。野王^③颇有进退维谷之势，侍因再以正文敦促，迄未明白见复。

一、清河^④始终用滑头手段，自己不肯到场，一切委之万、李^⑤，挟私武断，幸皆无效，已如上述。瘦公彭行未定，盖前途近日雅不欲与吾党接近。所欲言者，均已迭次函达，似亦不必汲汲前往也。

一、此次与野王密谈，皆剗切破其迷梦。初似乃婿^⑥及二三政客不免多方煽诱，以致与上次所言渐推渐远。经此迎头痛击，意兴似亦勃然。法律解决、再开国会诸迂见，均已不再纠缠矣。但其锋芒渐钝，究不能必其终有为耳。奈何！奈何！

① 胡嗣瑗时正在冯国璋幕。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载：1915年梁在上海发往云南蔡锷电报，多由胡代为转发。梁派人游说冯反袁，“必与胡先行接洽，以为进言之预备”。“彼等反对项城全属自动，且恐吾人或不反对，而使彼等失其助力”。

② 辛亥革命后，清遗老遗少长期以来总企图利用冯国璋搞复辟，冯亦与其往来应酬。1915年袁世凯推行帝制，冯持反对态度，受袁怀疑。此时复辟派大肆拉冯，冯亦为所动。1916年4月24日胡嗣瑗曾有函致冯国璋谓：“前在宁披沥愚衷，谬陈大计，承公毅然决议，促即往联徐州，郭汾阳、李西北再造王室之功，将于公复见之”。从此函中可看出冯对复辟所持态度。但由于以后时局变化，冯谋树立自己的势力，遂对复辟改变态度。

③ 以汉代冯野王隐指冯国璋。

④ 指张勋。

⑤ 万绳栻，张勋的参谋长。李庆璋，徐州道尹。二人为张勋的亲信。

⑥ 陈之骥，曾任第八师师长，参加二次革命南京独立。

一、饴山^①来信亦颇愤激。近日以清河一意倚万，他人均无从置喙。饴讯“有屏处忧愤无可告语”云云，其状可想。瘦公暂不赴徐，意在议决退袁，使张无路可走，或仍待晤对之日，刻当留宁候之。我公坚持一说，自当服膺勿失也。

一、奉天赵中军^②，此次意态颇异，前所云云，据云北张全视南张^③为行止。南张既主保袁，北张当然不能自出主意等语。侍因就保袁后北张万难相容，东邻万难承认，种种利害，反复开譬，渠意乃始不能无动，但仍须到徐探南张意向，旋奉再与北张密决之。先行来岛^④一层，遽难办到。侍即谆嘱念慈^⑤伴之回徐坚托饴山，阎某居间，切实拉拢，断不可轻放，俟彼处接洽来讯后，再当飞布以闻。

一、清颂所谈，甘卿已面详始末，当与瘦合力图之。

一、商设机关一节，自不可少。鄙意此事总以质实真切为主，不在铺排场面。我公与清颂或不斥其妄否？盼与郇详酌之。

一、一山采金^⑥之事，何日启行？此节与天水一边尽可并行不背，接洽如有眉目，即盼飞示。

函所不尽，统托郇代陈。手复。敬颂大安。侍名心即。

① 王宝田字饴山，复辟分子。

② 指奉天出席南京会议代表赵锡福，张作霖副官处长，故称中军。

③ 北张指张作霖，南张指张勋。

④ 指青岛，时为复辟分子聚集地之一。

⑤ 张念慈，张勋的幕僚。

⑥ 章艮字一山，复辟分子。金指金梁，章与金同为光绪甲辰进士，金时任奉天政务厅长。“采金”之意系指与奉天出席南京会议代表“赵中军”接洽无头绪，拟派章艮赴奉天找金梁连系。

庚子赔款的“退还”和使用

黄 延 复

说明：本文根据下列资料编撰而成：《中国教育年鉴》（1934、1948年版）、历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年会报告》、《各国庚款条件之研究》（财政部讨论会密件稿本，1937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经过情形》（中华教育改进社丛刊之二，1925年版）、清华大学校史有关资料，以及其他零散资料。所用资料，经过反复核对大都翔实可靠；但又不是简单抄录，因而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和冗长，可作为有关专题如近代中外关系史、近代教育发展史、近代留学史等研究的参考资料。

一 概 述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英、美、德、法、意、奥、日、俄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迫使清政府于翌年9月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共十二款，其中第六款规定中国须向十四国（除参加联军的八国外，尚有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等所谓“受害国”）“赔偿”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本息总数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抵押。

这笔“赔款”对当时的中国的财政，是一次真正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尚不到九千万两）“赔款”单以海关税、常关税、盐税做抵押是不够的，于是清政府一方面减缩军

饷、官俸，一方面命令全国各省加税分担，每年增税总额达一千八百四十万两^①。全国除东北三省因是满清故乡不担负此种增税外，各省按人口分配如下表所示：

省 份	原 认 数 (万两)	实 解 数 (万两)	省 份	原 认 数 (万两)	实 解 数 (万两)
直隶	80		浙江	140	
江苏	250		江西	140	
安徽	100		湖北	120	
山东	90		湖南	70	
山西	90		四川	210	
河南	60		广东	200	
陕西	60		广西	30	
甘肃	30		云南	30	
新疆	40		贵州	20	
福建	80				

1909年，美国首先开“退款”之先例，即把其自认为多索之款“退还”给中国。1917年，中国对德、奥两国宣战，这两国的“赔款”份额即告取消。1924年，苏联政府自动宣布放弃应得份额，并议定待清偿所担保之各种优先债务后，应完全拨作提倡中国教育之用款。1917年，美国又决定第二次退款，将全部未得之六百余万元（连同利息共一千二百余万美元），再次“退还”中国，并指定完全用于提倡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接着英、法、比、荷以及其他原侵华国家亦相继与我国订立协定，“退还”应付赔款，设立专门机构管理使用。综观各国“退款”之用于文化教育领域者大致可分下列数项：1、设置学校，2、设置研究所，3、遣派留学生，4、补助国内各教育学校，5、补助国内各教育文化学术团体及研究事业，6、设置研究补助金，7、编译世界名著，8、邀约外国学者来华讲演，9、交换出版物，10、举办或

① 1905年，清政府又命令各省追加税额总数为一千零八十万两（此数字转引自孙毓棠《庚款的史实》一文，载《新清华》，1950年12月16日）。

补助其他有关教育文化之事业。

以下分别记述各国“退款”之经过及其使用情况。

二 美国的“退款”和使用

(一) 第一次“退款”

1904年底，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庚子赔款的某个细节往见美国国务卿海约翰 (John Hay)，谈话中海约翰有“庚子赔款原属过多”之语，梁据此一面向美国政府交涉，要求把“过多”部分核减退给中国，一面上书清廷，奏议一旦美国退还此款，请将此款用以“兴学育才”(附件1)。经过约三年的交涉，美国国务卿鲁特 (Root) 于1908年12月31日通知中国公使梁诚，美国政府决定从1909年1月1日起开始退款，按照前此草拟之《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附件2) 和《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附件3) 等文件规定：自退款的第一年(1909年)起，中国政府在最初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果到第四年派足两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要派五十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在所派留学生中，规定百分之八十学农、机、矿、物理、化学、铁路、银行等，其余百分之二十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双方还商定，在派遣学生的同时，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在北京设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 (Training School) (后来这所学校于1911年4月29日在清华园开学，定名“清华学校”，即现今清华大学的前身)。约容纳学生三百名，“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课程，到美国入学可无杆格。”《大纲》中还规定，肄业馆所取学生拟分第一格(二十岁以下)和第二格(十五岁以下)，两者均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第一格学生来源是“除由外务部、学部在京招考外，并分咨各省提学使在各该省报考，录取合格学生，不拘额数，咨送外务部复试，选取实在合格

者，送入肄业馆学习或数月或一年，再行由馆甄别”。第二格学生的来源是：“凡二十二行省民籍满、蒙、汉、旗人及内外蒙古、西藏等处，参照省分大小、赔款多寡，以及有无赔款斟酌衰益，定为额数，由学部行知各省提学使各按单开定额，选取送京入肄业馆学习，或数月或一年，再行由馆甄别。”关于各省选送学生的名额，江苏、浙江两省曾合词呈学部：“庚子赔款既由各省分认，则选派学生之名额自应以多寡为差”；“江、浙两省，风气开通较早，……目前偏僻各省或尚无合格之学生，亦不妨由他省之合格较多者借补其额……”。（以上引自《江苏、浙江两省教育总会合词呈学部请明定选派学生赴美章程》）后来，学部参考了江浙两省的意见，定出以每十二万九千五百两摊一名学生的原则，规定各省应选送学生的名额是：直隶四名，江苏十三名，安徽五名，山东四名，山西四名，河南三名，陕西三名，甘肃一名，新疆二名，福建四名，浙江七名，江西七名，湖北六名，湖南三名，四川十一名，广东十名，广西一名，云南十名，贵州一名。各省均有余额，凑起来共可派十名学生，留作“东三省及藩部留学数额”。

按照《辛丑条约》，美国所得赔款按每两关银折0.742美金计算，合美金24,440,778.81元，连同利息28,910,773.34元，总共为5,3351,552.15元；但按照美国政府自己核算，扣除“应赔”部分，应退回本金10,785,286.12^①元，连同利息共退还之总数约为2,792万余美元。从1909年起，分年逐月按详表（附件4）分三十二年退完。美国政府决定退款前，曾有过多次辩论，而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经过情形》（附件4）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汉文部博晨光教授的谈话》两文记载得最为详尽（附件5）。但所谓“退款”，并不是真的从美国国库里拿出若干钱来退给中国，相反，美国国库每年仍需从中国索取巨额“赔款”，只不过

① 在美国“应得”之赔款13,655,492.69元中，包括200万元之“备有未经查出应偿之款之用”，后用去一部分，余额亦在第一次退款中退回。

比“退款”前的数额要少一些。而中国政府仍需按年按月按原赔数分开两张支票，一张入美国国库，另一张作为“退款”转交中国外交部，用以“兴学育才”。如此而已。

退款初期，美国“退款”平均每年约70万美元，由清廷外务部经管，主要用于留美学务和清华学堂（校）的办学经费。用于清华学堂本身的每年约需60万银元，用于留美学务的经费，每年约40万美元，没有用完的“退款”，积存起来作为清华基金，由外交部直接掌管。

清华学校和留美学务的经费，原并没有固定的数额，它是随学生人数的增长与学校规模的发展而定。后来，为了控制与监督清华经费的使用，在1917年，由美国公使和外交部总长、次长三人组成“清华基本金委员会”（后改称“清华学校及游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其下又设董事会，来核定与审查清华的经费。当时曾规定，清华经费每月以29,000美元为定额，留美学务处经费每月以30,000美元为定额。清华学校的工程、购置等费，凡支出200元以上的，都要先经董事会核定，才能动支。如有特殊情况需动用基金，也只能“借用”，并要逐年计息偿还。清华学校和留美学务每年的预决算，须经董事会审核通过后，报外交部核准，清华基金的存放生息，以及购置与保管清华财产的办法，都要先经董事会筹划，报外交部核准办理。

1921年以后，由于学校规模的扩大和留美生人数增多，同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生活费用上涨，留美学生用费增加，清华学校和留美学务开支因而大大增加，往往出现较大赤字。校方自1923年以后，开始采取措施，紧缩开支，如减少留美女生和专科生名额，逐渐停招中等科、高等科等旧制学生，以节省经费，使清华经费主要用于改办大学的需要。同时，还借用了一部分基金（1921—1926年间借款共约100万元），以弥补不足。虽然如此，按照原定的退款办法，自1932年起，美国每年退款额将增加

到138万余美元，比以前的每年退款增加将近一倍，暂时的亏欠，到那时即可补偿。因此，暂时的财政困难，并没有影响当时清华维持较高水平的开支。1926年，许多大、中学校因为经费不足，被迫关门或停课的时候，清华仍然支出了76万余元，顺利地执行自己的改办大学计划，学校规模仍不断得到发展。

（二）第二次“退款”

到1918年1月止，美国实际收得的赔款本息已达12,413,499元，差不多已达到其自认之“应付”赔款之数。但按退款协约规定，中国仍欠美国6,137,552元。还在1917年，中、美两国中即有人倡议美国应将此余存部分再次退还中国。1921年间，美国参议员洛志再提此议，不过当时因种种原因未曾实现。1924年春，美国众议院又有人提出同项议案，经外交委员会调查，3月31日起，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开会，就此进行了充分辩论（附件5），并详见《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经过情形》一书。5月21日，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继续退还庚款的议案，并表示此款当用以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1924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致我国驻美公使原函（译文）如下：

“兹谨检奉1924年5月21日国会通过之议案一份，此案授权大总统退还1917年10月1日起应付之庚子赔款于中国，由大总统认为适当之时期与情形中，依国会在该案并言内所表示之意旨，发展中国之教育与文化事业。”

中国政府当即表示赞同。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北京政府派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濂、黄炎培、顾维钧、周诒春、施肇基、丁文江（以上华籍）、孟禄、杜威、贝克、贝诺德、顾林（以上美籍）十五人组成董事会，制定章程共十条（附件6）。

章程第二条规定该会设立之目的为：

- 甲：接受根据1924年6月14日美国国务总理致中国驻美公使照会所退还之款项。
- 乙：酌量存储该款于一银行或数银行，并得酌用其他生利方法。
- 丙：酌量保留该款之一部分作为基金，以其收入充本会的事业之用。
- 丁：使用该款于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事业。
- 戊：接受其他用于教育文化之款项，本会在原赠与条件内，对于此等款项有支配之全权，与原退还款项相同。

章程第三条规定，该会设董事十五人，中国籍十人，美国籍五人，董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在董事会闭幕期内执行职务。并设有财政委员会，掌管基金及代管款项之存放及投资。另设干事处，由董事会票选干事长一人，负责执行日常事务。章程规定第一届董事由中国政府委派，其后每遇缺出，由本会选举补充，选出后应立即呈报中国政府。章程还规定，董事第一任期，由该会第三届时以抽签决定，内三人再连任一年，三人二年，三人三年，三人四年，三人五年，以后董事均五年一任。章程第九条规定该会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二人，秘书一人，会计二人，内一人为华人，其他一人在赔款支付期内应为美国人，均由董事互选出之。章程还规定按年举行董事会常会及年会各一次，常会讨论工作计划，年会举行选举及通过次年预算。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于1924年9月13日，1925年6月举行第一次年会，决意设置固定基金一项，其数目应使连当时已积有之款数及此后每年增加之数，至二十年后，足以收入年约五万美金之子息。在1926年2月的年会上，确定颜惠庆为董事长，张伯苓、孟禄为副董事长，范源濂为干事长，周诒春为名誉秘书，贝诺德为名誉会计，黄炎培、顾维钧、顾临为执行委员。之后，该会按年举行董事会常会及年会各一次。常会讨论工作计划，年会

举行选举及通过次年预算。从1926——1948年止，共举行年会十九次。从1928年起，蔡元培、司徒雷登、胡适、丁文江、韦罗贝（美籍）、翁文灏、汪兆铭、李煜瀛、伍朝枢、任鸿隽、孙科、赵元任等都曾先后替补为董事会成员。1948届的董事会成员为蒋梦麟、翁文灏、周诒春、李铭、孙科、胡适、施肇基、蒋廷黻、傅斯年、任鸿隽（以上华籍）、顾临（Roger S. Greene）、赫契生（C. B. Hutchisen）、司徒雷登（R. Deighton Stuart）、布拉第（Donald M. Brodie）、瑞德（G. J. S. Reed）（以上美籍）。其中，蒋梦麟任董事长，翁文灏、顾临任副董事长，周诒春任名誉秘书，李铭、布拉第任名誉会计，翁文灏、孙科、蒋廷黻、蒋梦麟、周诒春、任鸿隽为执行委员，周诒春、顾临、任鸿隽、李铭、布拉第为财政委员，任鸿隽为干事长。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该会）自成立时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大陆上自行解散为止，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1、代管清华大学基金。

1929年7月，教育部与该会签订了《保管清华大学基金办法》和《代管清华大学每月退还庚款办法》。这两个办法规定：基金的所有权属于清华大学，教育部对基金有支配权，清华经费预算得先由教育部核准后，方由该会发放，该会则为清华大学基金的永久保管者；基金的使用由该会财务委员会全权办理，但是，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及评议会得随时调查基金及其经理、存放之实况，并得随时建议于该会请其酌采。在当时制定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务进行计划大纲》和《国立清华大学规程》中，还载明清华大学的基金无论何时都不得动用，基金的利息也只有到退款终了的一年（1940年）以后，才能拨作为学校经费。1929年8月初，原清华大学基金保管委员会将全部基金及经常金向该会移交。当时移交的基金（不包括经常金）的总数按帐面值为银元6,177,621.61

元，该会详价总值为5,899,735.05元（附件8）。以后历年美国的“退款”，除拨付清华经费与留美学务经费外，余额也都储作基金，历年积累截至1936年6月底止，清华基金本息总数已达1600余万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十一次报告》，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稿》P.14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府当局以各种理由试图以挪用、借款等方式动用清华基金，都被清华当局拒绝。1932年，国民党政府曾停付美国庚款一年，相应的“退款”当然也随着停止。但过去的退款一经储为基金，几经交涉，才由财政部借垫了100万元作为维持费，因而大大地影响了当年的学校扩充计划。1933年，该会恢复按“计划大纲”每月拨付清华经费10万元，每年120万元，清华大学的发展继续得到保证，除支付教学与行政各项经费外，还能有相当数目用于图书、仪器的购置和校舍的建筑。因此这一时期清华大学这几方面的校事都得到很大的扩充。

抗战伊始，清华大学经费仍由该会拨付，（“西南联大”经费由三校实得政府所拨经费按比例均摊），但由于抗战期间中国海关收入绝大多数为敌伪当局扣留，所以政府当局又从1940年1月起将庚款债务（为关税担保者）一律停付。清华经费只以过去基金所得利息中做少量的拨充或由财政部拨垫。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冻结各国资金，“庚款”基金利息部分亦行停拨，清华经费只靠借贷维持。

清华庚款基金原分两部分储存，大部分通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存于国内银行，其利息即按规定数量拨付清华经费，其余则仍作基金积存；小部分美金款额存入美国银行，备清华留学生监督处支付留学生及清华从美国聘请教师、购买设备、图书等用途。到“七七”事变时止，基金会存在国内银行的数额约为在美数额的两三倍。但抗日战争期间，“庚款”基本上是全部停付的，已存在国内银行者，受通货膨胀影响，经若干次折损，

到抗战胜利时已所值无几。而战前存在美国的那部分，虽然数额不多，但由于在美董事们善于经营，投资顺利，基金利息未用者再加入本金，如此连年积累，至抗战胜利时数量已相当可观。大陆解放后，在美资金照常营运，使用则极少，基金数积累益巨。

关于在美基金的支用手续，有关章程规定，只有中国的教育部长与清华校长共同签署，且须提出相当计划，董事会方可拨发利息（本金是永远不能动用的）。

南京政府逃亡台湾后，确曾不断想以种种借口企图掠取这笔款项。眼见此款濒临脱离清华、大权旁落的危境，就在这关键时刻，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抵美（他曾对人说，他解放前夕出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为清华保护好这笔基金”）。曾做过多年秘书的赵赓飏先生回忆说：“其时政府（按：指台湾当局）财政困难，外汇存底不多，大家觉得清华基金很是一笔了不起的数字，各方面都想利用或沾润，因此梅校长感受的压力很大。……四十三年（按：1954年）春天，有几位列军籍的校友，曾当面向梅校长提出质询性的要求，梅校长事后告诉笔者，对那次谈话【印象】极为恶劣。……”（赵赓飏：《协助清华在台复校琐忆》，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六期）。

事实证明，梅贻琦先生一经抵美，即把这笔基金的使用和保管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作了许多有益于民族教育和文化科学的事。最初的“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后来的新竹清华大学，都是用此款创办和发展起来的。

至于此基金在大陆上的一点残额，解放伊始的清华大学代理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先生曾给军管会写过这样一封信：“清华基金向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保管，自昆明复员后，商准动用基金利息五十万美元，作为补充书籍仪器之用，嗣后又收入利息十万余元，另有罗氏基金会补助款已领五千美元，连年购置及留美学生休假教授支用，约已用去四十余万。此款存在纽约华美协

进社及银行，由原任校长梅贻琦先生亲自经管签字支付。梅先生离校后，助理梅先生经管此事之秘书李天璞亦于战事发生前辞职，经查收支总帐未获，确切余款数目不详，款亦均在美国，无从查考支用。”（见清华大学档案）

从1950年起，梅贻琦先生在美国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驻美机构——华美协进社的常务董事，继续经管此款。1951年，他组织清华大学在美学人研究，并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学术书刊。在此期间，他还乘有人回国之便，带信给北京母校，有意用清华基金资助图书仪器，因当时环境不适，带信人未便交出原信，后遗失。但解放初期，清华大学确曾连续收到过从美国寄来的来源不明的期刊。1955年，梅贻琦由美抵台，开始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能科学研究所”，此研究所逐渐发展为现在的新竹清华大学。1960年，梅贻琦患病住院，病床下一直放置一个手提包，1962年5月梅贻琦逝世，此提包由秘书封存，后约集有关人员会同启封，原来就是关于清华基金使用、收支的全部帐目。经与会者议决，这笔帐目交担任“华美协进社”工作的孟治先生继续经管。中美建交后，以前任校长刘达为首的清华大学代表团访美时，曾专门查询过这事，但因“庚款”约期已过，此事“纯属民间问题，美国政府不便过问”，因而也未查出究竟。

代管清华基金，只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附加业务，而其主要业务乃是经管由美国“第二次退款”兴办的诸项业务。

美国的第二次“退款”，本利合计为12,545, 438.67美元，自1917年10月1日计算，分二十三年又三个月“退”完，每月计退44,995.73美元，每年共退539,588.76美元。

第二次“退款”之分配使用办法，经该会第一次年会议决：“美国所退还之赔款，委托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者，应用于：（1）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通于中国情形之应用，其道在增进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实验与表证，及科学教学法之训

练。(2)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当时通过分配款项原则六条，至1926年2月，又增分配款项之补充原则六条。可归纳如下：

a、补助“已有成绩及实效已著之现有机关或事业”（即不著重于新设之机构）。

b、重点补助全国、全民性的机关或事业。

c、分配对象，公立与私立一视同仁。

d、分配款项应规定期限，到期继续与否，视情况而定。

e、所谓教育事业以下列各项为范围：①科学研究，包括物理、化学、生理、地学、天文气象学；②科学应用，包括农、工、医；③科学教育，包括科学教学、教育科学之研究等。

f、文化事业，暂以图书馆为限，但其他影响于全国之教育文化事业亦在考虑之列。

g、补助期限暂定三年为限，在补助期如无相当成绩，可随时停止补助。

h、凡请求拨款以作基金者概不照允。该会所办之教育文化事业，分自办事业、合办事业及补助事业三种。

2、自办事业。包括以下七种：

(1) 设置科学教席。自1926年至1930年间，曾在沈阳、北京、南京、武昌、成都、广州等地之国立大学，每一处设立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及教育心理学的教学讲座，由该会担负教授薪金及若干设备之费用。南京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广州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北京之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成都之成都大学及成都高等师范、沈阳之东北大学、武昌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都曾享受过这种补助。设置科学教席之办法规定：a、学科范围为物理、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及教育心理学。b、担任教席之资格须对本学科有精深之研究并对中等学校本学科师资之训练有特殊兴趣者。c、科学教席之任务以培养本学科

教师为主。先后担任此项教席者有：张淮、曾昭抡、陈焜、张贻侗、曹任远、林兆棕、庄长恭、王星拱（以上化学）。查谦、吴有训、柳金田、朱物华、黄巽、文元模、魏嗣鑑、丁绪宝、潘祖武（以上物理学）。陈桢、蔡堡、黎国昌、费鸿年、雍克昌、周太立、刘崇乐、何定杰（以上动物学）。艾伟、汪敬熙、张耀翔、邱大年、李璜、刘绍禹、姬振铎（以上教育学）。许骥、陈焕镛、李顺卿、罗世嶷、汤佩松、叶雅谷（以上植物学）等。

（2）设置科学研究教授席。其主要任务是“施行及指导科学研究”。先后担任此种研究教授者有庄长恭（化学）、陈焕镛（植物）、翁文灏（地质）、葛利普（A. W. Grabau, 古生物）、李济（考古）、秉志（动物）、胡先骕（植物）等。

（3）设置科学研究补助金。目的是“提倡科学研究”。这项业务自1928年起创办，分国内、国外（中国人在国外之研究）、甲种、乙种数类。一般甲种每年金额为3000—4000元，乙种每年1000—2000元。截至1945年止，（抗战期间曾一度停顿）共核发国内研究补助金获得者三百二十七人次，国外四百零八人次（实际人数共四百十五人，因多数研究员为连续两年获得补助金者）。研究之问题以天文气象及地理、数理化、生物三类为限。林可胜、赵石民、翁文灏、秉志、颜任光、葛利普、任鸿隽、窦威廉、钱崇澍、胡经甫等都曾担任过此项补助金审查委员会委员。

（4）社会调查所。1926年2月，该会接收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少数捐款，设置社会调查部，其后改称社会调查所。建筑、经常事业各费皆由该会担任，陶孟和曾充该所主任。研究工作兼及经济、统计部门，发表调查报告多篇，1934年合并于中央研究院之社会研究所。仍由该会补助。

（5）设科学顾问委员会——编辑委员会。1927年3月（后经同年6月第三次年会议决），该会决定为配合训练中学师资计划，设立科学教学顾问委员会，从事科学教本之编纂，分数学、物理、

化学、地学、生物五组。聘秦汾、姜立夫（数学）、颜任光、饶毓泰（物理）、王琎、张准（化学）、李四光、竺可桢（地学）胡经甫、胡先骕（生物）为委员，先后由王琎及秦汾、张准为正副委员长。至1930年7月第六次年会，鉴于选译世界名著之重要，议决将该会改组，另设编辑委员会，而以编辑科学教本为其业务之一部分。编译委员会分文史与自然科学两组，由胡适及张准为正副委员长。嗣聘王琎、竺可桢、赵元任、姜立夫、丁文江、陈源、胡先骕、丁燮林、闻一多、陈寅恪、傅斯年、梁实秋等十三人为委员。编译高中及大学之教科书及参考书，共曾出书六七十种。1924年因经费支绌而结束。

（6）“华美协进社”。1926年春，该会为沟通中美文化事业起见，创办该社于纽约。抗战时该社工作扩展甚速，曾由《时代》杂志社之鲁斯在纽约赠送社址一所，并自行组织董事会，该会仅酌予经济协助。

（7）土壤调查。该会曾于1930年委托国民党政府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举办此事，历年调查范围曾遍及内地与边区，制就土壤图表多种。1946年起改由经济部接办，该会仅处于协助地位。

3. 合办事业总共有两项。

（1）静生生物调查所。

该所原由“尚志学会”于1928年捐拨基金国币十五万元，委托设立，其意在发展中国之生物科学，以纪念该会董事及第一任董事长范静生先生。历年经常事业花费则皆由该会负担。截至战时物价开始上涨时为止，所拨款项共约一百万元（北平文津街所址建筑费尚不在内）。该所调查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出版之专刊报告与国外交换，颇著声誉，战时迁往昆明，并在滇西等地调查，所获标本甚多。战争结束后，仍返北平旧址恢复工作，所内分动物、植物两部，1948年度所长为胡先骕。

（2）国立北平图书馆。

该会1926年2月第一次年会即决定筹办“北京图书馆”，初定建筑设备费一百万元，分四年支出。聘梁启超、李四光分别任正、副馆长，暂在北海公园内赁屋筹办。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曾有京师图书馆，经议定与该会图书馆合组。1929年7月重订合组办法。8月，由教育部聘任蔡元培、袁同礼为正副馆长，设立委员会，聘马叙伦、陈垣、刘复、周诒春、傅斯年、任鸿隽、孙洪芬等七人为委员，原有中海、北海两馆，即由委员会接收。该会除补助建筑、经常费外，并担任其历年经常费及购书费前后共130余万元。战时内迁，在昆明及重庆沙坪坝设立办事处，将运至内地及在交通极度困难中所收购之图书公开阅览，有助于内迁之学校甚大。战后复员回北平，经常费自1934年起由国库支付，仍由该会拨购书费用。

4. 补助事业：

该会历年选择成绩优良之大学研究机关、文化学术团体及其他机构酌予补助款项，以充添置图书仪器或其他事业费用。战前每年接受该会补助之机关平均约三十四个单位，抗战发生后，逐年减少，战后仅对经费十分拮据之私立机关，尚勉予援助。到1945年为止，历年补助大学二百三十三所次，研究机关一百三十九所次，文化学术团体一百零九所次，其他三十八所次，共拨出“国币”24,250,893.65元，美金362,795.63元。先后接受该会补助的机关有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中华职业教育社、大同、南开、岭南、复旦、武昌、中华、金陵等大学，文化图书科、故宫博物院、工业实习社、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营造学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等。

以上是美国第二次“退款”以及由此而组织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概略情形。关于这两次退款的一般情况，1924

年7月2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曾有一《呈报美国庚款退还经过情形文》。（附件9）

附件1至附件9目录

附件1：《驻美公使梁诚致外务部函》（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到，关于美国还银办法未允现商请减收由）

清华大学档案：《本校及游学经费门第一类》

附件2：《会奏收还美国赔款 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摺（专门司）》
《学部奏咨辑要（下）》
宣统元年（己酉）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3：《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

《学部奏咨辑要（下）》
宣统元年（己酉）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4：《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审查报告》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经过情形》
1925年1月商务印书馆版

附件5：《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汉文部博晨光教授的谈话》（附分年
分月退款明细表）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经过情形》
1925年1月商务印书馆版

附件6：《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章程（1924年9月）》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p.1568, 1948年版

附件7：《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史系表》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P. 88, 1934年版

附件8：《清华大学基金保管委员会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移
交之清华大学基金总表》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报告》p.28, 1930年12月版
附件9: 《前北京政府外交部呈报美国庚款退还经情形过文》
(1924年7月24日)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P. 94, 1934年5月版

三 其他各国的“退款”和使用

在美国先后两次“退款”和其他国际因素的影响下，又经中国和各有关国有关人员的积极争取，英、日、苏、法、荷、比、意等国也先后宣布“退款”或采取类似“退款”的行动。其中荷兰的“退款”方式类似美国，即除指定用途外，无其他条件；英、日两国只是声明将余款作为“对华事业”之用，但仍不放弃主权；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政府宣布放弃沙俄时代一切掠夺性的条约，其性质与其他各国理应有所不同，但实际上仍有其附加条件（由双方订立协定加以控制）；法国是先订立《协定》，规定好条件，然后“退款”；比、意两国则是先采取由指定银行把“应付款”一次付清（即所谓垫付），再由中国逐面向该垫款银行偿还，由于垫付时用的是纸币，偿付时则折合成金币，所以中国可以从这两者之间的差额中得益。

应该指出，对于中国来说，所有获得“庚款”的国家，他们得的原是不义之财，带有十足的掠夺性质，因而任何带有附加条件的所谓“退款”（包括美、荷两国的所谓“善意”退款在内），通通带有对我国国格的侮辱和再侵略（文化的或经济的）性质，其中尤以日本表现得最为露骨。

但是，各国在“退款”的时机、方式、条件和在“退款”过程中的表现确又各不相同，特别是某些国家的友善人士确曾表现

了真诚友善的愿望和行动；而这些款项“退还”以后，对我国当时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也确实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现在按各国宣布“退款”的先后，分别概述如下（日本的情况特殊，故放在最后）。

（一）英国

1922年12月，英国政府发表宣言称：“中国应（向英国）付未到期之庚款，即将退还中国”。做为“有益于两国教育文化事业之用”。从这时起，英国即将按期所付之“庚款”不再交其财政部收账，而是作为专款储存，准备退还。后因英国国会改选，内阁变动，因而搁置了一段时间。至1925年6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中国赔款案》，决定履行其1922年之宣言。但英国政府考虑对这笔款项的用途及管理“有事先研究之必要”，故于《退款案》通过后，立即成立一“諮詢委员会”，由英国政府指派英籍委员八人、华籍委员三人组成之。再由諮詢委员会组派一调查团来华接洽并作调查。此调查团由英籍团员三人、华籍团员三人组成。^① 调查团于1926年1—2月间赴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等处实地调查，征询舆论，然后向諮詢委员会作出“办法报告”，经諮詢委员会赞同，作为建议向英国外交部提出，并为后来中英两国换文的主要内容。

1930年9月，两国政府正式换文，中国政府同意将退还之庚款尽数照諮詢委员会调查团之意见处理，并进一步提出：“中国政府以为第一步宜以该项‘庚款’大部作为基金，……而由中国政府设立，关于设立基金最有利之计划，莫如将该项庚款……整理及建筑中国铁路并投诸其他生产事业。”而以此基金

^① 英籍三人为威灵顿子爵（The Viscount Willingdon，任团长）、安特孙女士 Dame AdeLaide Anderson，苏德赫教授（prof. W. E. Sothill），华籍三人为胡适、丁文江、王景春。

借拨所生之利息，用于教育文化事业。1930年9月22日，英国驻华公使兰溥森复照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称：“查英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将来利用庚款余额之提案，至为钦佩赞同”。

1931年4月，中国政府根据两国换文规定设置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15人，华籍10人，英籍5人，董事任期一般为三年，但是为保证工作的连续性，第一任董事之任期以抽签决定，三分之一为一年，三分之一为二年，三分之一为三年。期满连选得连任。董事长一人，由中国政府指定，下设副董事长一人，秘书董事一人，会计董事一人，由董事互选。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中国籍者为朱家骅、王家桢、宋子良、陈其采、李书华、叶公绰、程振钧、曾鎔甫、曾养甫、颜德庆；英籍者为贺耐（William W. Hornell）、马歇尔（Rober Calder-Marshall）、康德黎（Kennet Cantlie）、端纳（W. H. Donald）、卜隆（N. S. Brown）。朱家骅任董事长，贺耐为副董事长。设事务所于南京。1932年秋，在南京山西路78号事务所建会，设总干事一人，秘书处及会计处各一，各设主任干事一人，干事及办事员若干人，分担各项事务。1943年《中英平等新约》成立之后，该会呈准行政院改名为“中英文教基金会董事会”。1937年11月，行政院颁布该会新组织规程，要点如下：

1. 该会隶属行政院，掌理中英文教基金管理事宜；
2. 该会依照1930年两国换文，有管理和分配英国退还庚款之职权；
3. 该会董事为名誉职，但开会时得酌发旅费。

1931年首届董事会成立以后，历届董事都曾有所变动。至1948年，应届董事及其分工情况如下：朱家骅（董事长）马歇尔（副董事长），杭立武（秘书长）、曾鎔甫（会计董事）、叶公绰、李书华、陈其采、李四光、刘瑞恒、曾养甫、宋子良、盖士尔（W. C. Cassels）、艾浦森（W. Empson）、王国棟（Goron

King)、罗士培 (P.M.Roxby)。

又根据1930年换文：“如以该款在国外购买需要材料，包括桥梁、机车、车辆、钢轨及其他设备器具时，当向英国定购之。”为此，双方同意在伦敦设立“购料委员会”，此委员会设代表六人，以中国在伦敦之外交代表为主席，另除中国铁道部派人为当然委员外，其他四人为英籍，“由英国外交部长以殷实而有商业经验之人开一名单，推荐于董事会，由中国政府与董事会商议后随时派充之”。^①

英国退还“庚款”总数，自1922年12月英政府宣言退款起，至1945年12月止，计本金6,935,319镑9先令，利息4,251,228镑4先令。本息合计为11,186,547镑13先令。1948年，国民党政府曾将已收未收庚款各年总额列成如下表式：（见83页）

如前所述，自1922年12月英国政府宣言退还“庚款”，此后逐月由中国政府解去之“庚款”，英国政府收到后即另行存储，不再划入其国库。至1931年4月，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正式成立时止，共已储存3,504,122英镑7先令7便士。按两国换文规定，此积存分配由隶属该会之伦敦购料委员会保管。至于1931年4月以后，逐月到期之庚款，先由中国政府解付与英国政府，再由英国政府按换文规定退还之，由驻华英使馆以一半交董事会，一半交伦敦购料委员会。交与董事会者由董事会随即向中央银行换成中币作为国内到期部分基金；交与购料委员会者，由该委员会并入前述之积存部分，作为国外部分之基金，专备各部会借充在英购料（非购料不能动用），购料完竣后，即折合中币转入国内部分，各部会随借随还，还后再借，以借款息金作为文化教育事业之用。

^① 该委员会于1931年5月在伦敦成立，一直延续到1948年。1948届委员会成员是：郑天锡（委员长）、王景春（交通部代表）、栗佛瀋男爵（The Rt.Hon Lord Riverdale）、威季武德（R.Wedgward）、麦克伊文（G.A.Mac-Ewen）、金乃斯（A.B.Guinness）。

年 份	全 年 数			每 月 数		
	镑	先 令	便 士	镑	先 令	便 士
1922	34,427	6	7	34,427	6	7
1923	413,127	15	4	34,427	6	3
1924	"	"	"	"	"	"
1925	"	"	"	"	"	"
1926	"	"	"	"	"	"
1927	"	"	"	"	"	"
1928	"	"	"	"	"	"
1929	"	"	"	"	"	"
1930	"	"	"	"	"	"
1931	"	"	"	"	"	"
1932	596,481	5	9	49,706	15	6
1933	"	"	"	"	"	"
1934	"	"	"	"	"	"
1935	"	"	"	"	"	"
1936	"	"	"	"	"	"
1937	"	"	"	"	"	"
1938	"	"	"	"	"	"
1939	"	"	"	"	"	"
1940	"	"	"	"	"	"
1941	413,127	15	4	34,427	6	3
1942	"	"	"	"	"	"
1943	"	"	"	"	"	"
1944	"	"	"	"	"	"
1945	"	"	"	"	"	"
合 计	11,186,547	13	—	—	—	—

注：截至1938年底止，共收英款7,369,000余镑，自1939年起，“庚款”停付，收入即告中断。

关于英国“庚款”借充办理生产建设事业，其支配办法由中国政府规定，以三分之二借充建筑及整理铁路之用，三分之一借

充建设水利电器及基本工业之用。①借款利息亦规定以周年五厘计算，息金用途亦曾定有支配标准，呈准行政院备案，分下列五类：

- 一. 建筑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馆及保存固有文化史迹。
- 二. 补助高等教育研究机关建筑、设备、讲座等费（特别注重农、工、医、理四科）。
- 三. 设置留学学额及补助国外教育事业。
- 四. 设置专门著作及中小学职业学校教科书奖励金。
- 五. 建设模范小学、农工职业学校、助产学校及兴办农村教育。董事会每年收到之利息，除提拨自身经常费及教育文化准备金各百分之十外，其余悉数按下列比例分配于上述五类事业：一类25%，二类35%，三类15%，四类1%，五类24%。

据国民党政府1948年统计，从1931年董事会成立起至1944年6月30日止，其国外、国内基金陆续借与各部会办理生产事业之单位及数目如下表所示：（见85页）

到1948年底止，董事会所存之英款，除国外部分在伦敦尚余约20万镑因各部、会未经购料尚未动用外，其余国内、国外部分业已全数拨借。据统计，其借充整理与建筑铁路者，有胶济、平汉、津浦、陇海、北宁、沪宁、沪杭甬、浙赣、宁赣、粤汉、湘桂、叙昆、滇缅以及南京轮渡、戚墅堰机厂、株州机厂等；办理水利者有：导淮工程计划、张福河疏浚工程、广东金东金西基围修理工程以及黄河堵口工程等；办理电力、电讯、航运者有：建设委员会南京电厂、戚墅堰电厂及交通部建筑国际无线电台，整理各处有线无线电报电话设备，建筑九省长途电话网、西南、西北长途电话无线电话网及国营招商局购买四海轮等。

该会历年息金收入，均陆续按照息金支配标准办理补助教育

① 此三分之一之分配为：导淮事业得40%，广东治河得20%，其余40%由电器事业、黄河水利、基本工业各得三分之一。

国外部分				国内部分			
借款单位	借款数目(英镑)	先令	便士	借款单位	借款数目(银元)		
交通部	3,825,931	13	4	交通部	30,453,209.94		
浙赣铁路局	210,298	17	2	导淮委员会	4,342,391.58		
导淮委员会	221,227	14	1	珠江水利局	600,000.00		
珠江水利局	5,000	—	—	建设委员会	835,000.00		
建设委员会	247,941	3	4	经济部	928,796.39		
经济部(代交通部)	268,900	—	—	黄河水利委员会	200,000.00		
黄河水利委员会(“”)	122,544	12	5	珠江水利局及黄河水利委员会	4,530,000.00		
导淮委员会(“”)	576,146	4	0	(代交通部)			
淮河水利局及黄河水利委员会(代国营招商局)	349,638	9	1				
同上(代交通部)	163,916	18	6				
共 计	5,991,545	11	11	共 计	41,889,379.81		

文化事业,抗战以前及抗战期间各支配四次,总数为1,900万余元。各类概略情况如下:

一类:关于保存文化史迹古物者,曾补助寿县考察团等十余起;关于博物馆及图书馆者,曾补助“中央博物院”及“中央图书馆”之建筑。

二类:关于补助高等教育及研究机关者,大约分为建筑、设备、讲座三项。抗战前国内专科以上学校,无论国立、省立、私立多受过该会补助;研究机关方面,国内主要院所,亦均曾受其补助。

三类:关于考送留英公费生,先后办过九次,计193人。第一届9人:钱清廉、顾学勤、李祁、林兆耆、石声汉、王葆仁、戴克光、吴大任、周传儒;

第二届26人:陈永龄、董振林、夏坚白、王之卓、周宗莲、张有龄、童大埙、柯元恒、林致平、陈宗惠、邵象华、丘玉池、

吴在东、何琴莲、丁骕、鍾道铭、周鸿经、唐培经、俞大綱、林超、袁寿椿、朱应铣、李国鼎、钱临照、杨人楩、伍启元。

第三届24人：钱宝钧、张承洪、苏元复、王祖舜、王德荣、张创、杨仁杰、张文治、余瑞瑛、张文裕、谢明山、彭蜀麟、李华宗、柯召、吴仲贤、徐绍斌、章文才、杨曾威、程裕祺、施正信、张毅、钱钟书、朱延丰、朱宝贤；

第四届20人：赖宝勤、王绳祖、楼邦彦、李浩培、罗凤超、黎名郇、许宝驥、张宗燧、周长宁、翁文波、吴征铠、任美锷、李旭旦、朱任葆、王自新、俞调梅、李登科、辛一心、胡启勋、黄克维；

第五届25人：李佩林、张天开、戴文赛、马仕俊、谭桢谋、鲍觉民、叶和才、沈其盖、汤逸人、王栋、唐世凤、胡祥璧、王兆华、顾兆勋、张维、黄玉珊、周家仁、陈彬、张昌绍、徐毓枏、袁家华、卢家钖、许娘光、程振粤、徐钟济；

第六届20人：张万久、王大珩、彭桓武、黄用诹、徐近之、铁明、储钟瑞、张民觉、朱树屏、宁棍、赵国华、史家宜、夏震寰、璩定一、卢焕章、王应睐、王承绪、谢志耘、陈仲秀、王显湘；

第七届24人：郭永怀、钱伟长、傅承义、汪盛年、林慰桢、张龙翔、沈昭文、林家翘、段学复、曹隆、李春芬、罗开富、谢安祜、朱承基、姚玉林、张禄经、易见龙、宋杰、曹飞、张孟休、欧阳子祥、蕲文翰、陈春沂、韩德培；

第八届28人：黄昆、梅镇岳、程京、闵嗣鹤、赵佩芝、刘培德、李文雄、王培生、张阿舟、杨琳、张沛霖、杨诗兴、姚钟秀、朱晓屏、朱宣人、熊文愈、刘建康、李昌甫、朱既明、苏德隆、王正宪、陈舜礼、黎禄生、程镇球、杨敬年、刘家骥、徐春霖、曹日昌；

第九届17人：王佐良、白纯瑜、戴传曾、李天庆、汤宗舜、

陈志浪、陈季光、钱宗堃、邹承鲁、稽汝远、周孝达、张沅昌、陈安磐、周则巽、连孟雄、杨南生、支德瑜。

四类：关于奖励中小学教科书及专门著作，该会曾征求民众教育读本，小学乐歌及中小学史地教科书数次；

五类：关于补助中小学、职业学校及农村教育者，该会曾补助湘、鄂、皖、赣、闽五省特种教育，南北各省义务教育，十四省助产教育，以及农、工、职业学校等。

抗日战争期间，为适应当时需要，除照原订息金支配标准办理外，曾另订下列三项：

（1）保存文物。订有下列三方面内容：①抗日战争初起时，北平故宫博物院有很多古文物存放于南京库，因时间仓卒，未及搬运，到南京将沦陷时，交通工具奇缺，该会乃自告奋勇派人协助抢运，并垫付一切包装运费，共运出一万余箱。②居延汉简与敦煌石经均为国家至宝，因受战争影响，辗转迁播，有很大朽损危险，该会出资整理，影印，并将汉简全部八大箱运往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③抗战以来，沦陷区内公私古籍珍本类多数散佚。该会与中央图书馆合作，并特拨专款向各方搜购，先后购得珍本古籍一万五千余部，共三万余册。

（2）补助研究人员。抗战伊始，华北各大学教授因学校停办而至生活困难，各处科学人员亦多因机关紧缩而被疏散。至于大学新毕业生，更感就业困难。该会为适应当时需要，在内地各大学设置讲座四十余席，延聘北方一部分教授。一面提拨专款，设研究补助金，补助科学工作人员及大学新毕业而志愿继续科学的研究之青年，仍能安心从事学术工作。先后接受此项补助者有四百多人。

（3）自办事业。战争发生后，该会曾创办若干研究及教育机关，表列如下：

名 称	成立时间	所 址	负 责 人	工 作 内 容
中国地理研究所	1939年12月	重庆北碚	黄国璋(所长) 1945年辞职，由李承三代理，1946年由林超继任	分人生地理、自然地理、大地测量及海洋学四组
中国蚕丝研究所	1939年	贵州遵义	蔡 葆 (所长)	分细胞与遗传、生理，病虫害及饲料四部
中国美术学院	1942年10月	重庆沙坪坝	徐悲鸿 (院长)	暂设研究、陈列两部分
甘肃科学教育馆	1939年1月	甘肃兰州	梅贻宝(馆长) 1941年辞职由袁翰青继任	制造科学仪器及标本，举办教师讲习班，编印通俗科学期刊及教育小丛书，对蒙藏同胞巡回施教等
湟川中学	1938年	青海西宁	王文俊 (校长)	
河西中学	1938年	甘肃酒泉	吴亮夫(校长)， 后为张索。	
黔江中学	1938年	贵州安顺	曹刍(校长) 后为陈达夫	
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与教育部合办)	1940年	?	郭任远 (所长)	

说明：(1)以上各事业后因息金收减，物价上涨，经费困难，三校一馆移交教育部接办，三所一院则与教育部合办。

②该会为提倡海洋学之研究，曾在中国地理研究所附设海洋学组。抗战胜利后筹备扩充设所，由唐世凤负责筹备，至1948年已筹备就绪，因全国解放而中止。

（二）俄国——苏联

庚子赔款，俄国所占比重最大，本金总额为（白银）1303,71,120两，合俄币184,084,021.44卢布，按每0.72两折中国银币一元计，共合一亿八千余万元。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中国宣布参加协约国，并对德宣战。英、美、法、葡等国一致同意将庚子赔款展缓五年，并免予加算利息。中国政府即以此五年中应付之款项，移抵公债基金。俄国因东方各开支有赖此款维持，故只允将赔款金额的百分之十缓付五年，中国政府将其拨充十一年公债及教育库券各种本息基金。第一次大战结束时，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而且正在进行革命战争，中苏国交一时中断，其余应付部分亦已停付，中国政府将此停付部分拨充三、四、五及七年长期公债还本基金。1924年5月，中苏谈判恢复国交，订立“大纲协定”，其第十一条规定，苏联政府允予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并附声明书云：“大中华民国政府及大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对于大纲协定第十一条共同了解如下：①苏联政府放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于该项赔款所担保之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之用；②设立一特别委员会，管理并分配上述款项。该委员会议决事项，以全体一致行之；③该款于随时收入时，应即存储于上述特别委员会所指定之银行。……”可见苏联之所谓“抛弃”庚款，并不是无条件的。所以历史上称这项“退还”为“声明抛弃仍由协定控制”。这个协定由双方全权代表（中方为外交总长顾维钧，苏方为驻华大使加拉罕）签字。但当时俄款余数

经北京政府抵押殆尽，至是年11月始成立“俄国庚款委员会”，其成员是：中方委员二人，先后由蔡元培、徐谦、李煜瀛（代理）、顾兆熊（代理）、汤尔和、张嘉森、余文灿（代理）、查良钊（代理）、朱有济、林修竹充任；俄方委员一人，先后由伊法尔、裴盖满（代理）、皮尔瓦尼克充任。

退款后之管理情况：依据《声明书》第一款，对于赔款之缓付部分应于1930年、停付部分应于1937年先后完成担保之责任，此后方能充作教育经费（但自1924年起，每年除抵还债款外，仍有少数之款项拨作了教育事业之用，详见附表）。最初几年，（到1934年止），受此款项补助之教育事业，计有北京政府时期的“国立北京九校”及前北京师范等校，并曾自拨一部分款项作为当时北京地方教育经费。至1927年，北京政府与苏联绝交，此款暂由财政部支配，按月支援36万元作为平津高等教育经费，仍记在“俄款”项下。国民党政府统一全国后，全国统一收支，而“俄国庚款委员会”亦不再恢复，其管理支配工作，即无形中止。

据1948年国民党政府核算，从1924—1940年，先后实得苏联放弃之款额如下：

缓付部分：1924—1930年除抵债外，可得余额3,762,248元
(银元)

1931—1940年共得43,710,890元(银元)

应付部分：1924—1937年，除抵债外余款24,225,442元
(银元)

1938—1940年共得款25,666,617元(银元)

总计实得款：97,365,197元(银元)

1934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曾将俄款“缓付”和“停付”后抵债和盈亏情况作了详表公布，附引如下：

俄国赔款缓付部分指拨公债本息数目表

年 份	应付赔款数 (元)	指拨公债类别	本息合计 (元)	盈亏数(元)
1924	3,123,464	十一年公债本息 2,600,000元 使领库券利息 342,000元 教育库券利息 40,000元	2,982,000	+ 141,464
1925	3,123,464	十一年公债本息 2,440,000元 使领库券利息 400,000元 教育库券利息 80,000元	2,920,000	+ 203,464
1926	3,123,464	十一年公债本息 2,280,000元 使领库券利息 400,000元 教育库券利息 80,000元	2,760,000	+ 363,464
1927	3,123,464	十一年公债本息 2,120,000元 使领库券利息 400,000元 教育库券利息 80,000元	2,600,000	+ 523,464
1928	3,123,464	使领库券本息 2,360,000元 教育库券利息 80,000元	2,440,000	+ 683,464

续表

1929	3,123,464	使领库券本息	2,280,000	+ 843,464
		2,200,000元		
1930	3,123,464	教育库券利息	2,120,000	+ 1,003,464
		80,000元		
共 计	21,864,248	使领库券本息	18,102,000	+ 3,762,248
		1,040,000元		
		教育库券本息		
		1,080,000元		
		十一年公债本息		
		9,440,000元		
		使领库券本息		
		7,142,000元		
		教育库券本息		
		1,520,000元		

俄国赔款停付部分指拨公债本息数目表

年份	应付赔款数 (元)	指款公债类别(元)	本息合计 (元)	盈亏数 (元)
1924	5,925,636	三年债本： 6,584,500		
		四年债本： 1,307,075	7,891,575	- 1,965,939
1925	"	三年债本： 2,863,715	2,863,715	+ 3,601,921
1926	"	五年债本： 6,252,530	6,252,530	- 326,894
1927	"	" "	"	"
1928	"	" "		
		七年长期债本 4,500,000	10,752,530	- 4,826,894
1929	"	" "	4,500,000	+ 1,425,636
1930	"	" "	"	"
1931	"	" "	"	"
1932	8,555,539	" "	"	+ 4,055,539
1933	"	" "	"	"
1934	"	" "	"	"
1935	"	" "	"	"
1936	"	" "	"	"
1937	"	" "	"	"

续 表

共 计	98,738,322	三年债本： 9,448,215 四年债本： 1,307,075 五年债本： 18,757,590 七年长期债本： 45,000,000	74,512,880	+ 24,225,442
--------	------------	--	------------	--------------

(三) 法 国

1920年，李煜瀛等联合国内教育及农工商各界，组织“退款兴学请愿团”，在请愿书上签名的达四万三千余人，于是派专人赴法，法国政府遂有将庚款余额全部退还中国之意。经过一段酝酿时期，1922年5月9日及27日，中法两国政府换文，商定将法国部分庚子赔款余额充作复兴中法实业银行及办理中法间教育事业之用。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纸币与现金交换发生差异（法郎尤甚），法国要求将法国赔款改按美金交付，中方不允，双方发生争执。“退款”一事遂告推延，直到1925年才达成协议。1925年4月12日，两国签定的《中法协定》要点如下：

1. 法国政府承认将法国部分庚子赔款余额退还中国政府，作为中法两国有益事业之用，法国政府承认上项退还赔款，得自1924年12月1日起算。

2. 中国政府承认将上项退还之赔款余额，全数按金价折合美金，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12月31日止，逐年垫借与中法实业银行（中法合办），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债之担保，此项公债分23年还清。

3. 中法实业银行所发之五厘美金债券用途分配如下：

①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有之该行无息债券。（换回后，由该行全数一次交与中国政府作为偿还前项垫款之担保。）

②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数目每年至少20万美金，但最高不超过24万美金。

③代付中国政府应缴中法实业银行之股本余额。

④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的各项债务。

《中法协定》签订后，由中国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商定成立一“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并拟定该会《组织大纲》，其要点如下：

①委员会的职权是：根据《中法协定》管理中法间教育事业基金。

②委员会由中法各派一代表团成立，两代表团各有一权。

③中国代表团由外交部代表一人，财政部代表一人，教育部代表一人，国立北京大学代表一人，国立东南大学代表一人，国立广东大学代表一人，中法大学代表一人共七人组成，^①并主推一人为主席；法代表团由法国驻华公使或其代表为主席组成员。

④会所设于北京。

《组织大纲》确定后，即于1925年4月28日召开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址设在北京西交民巷71号，同一天，中国代表团也宣告成立。^②到1948年止，该委员会共举行会议28次，中国代表团共举行会议44次。

法国退还庚款的数额，总计为391,581,529法郎零5生丁，按美金一元折合法币5法郎又1826分计，共折合美金75,556,964

① 1937年2月，由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批准了一个新《章程》，规定中国代表团由行政院代表1人，庚款机关联席会议代表1人，外交部代表1人，财政部代表1人，教育部代表1人，经济部代表1人，中央大学代表1人，中山大学代表1人，北京大学代表1人，中法大学代表1人共10人组成。

② 1925年度中国代表团成员待查。1934年度中国代表团成员是李煜瀛、沈尹默、易培基、刘锡昌（兼秘书），萧瑜（兼驻会秘书及中国代表团干事）、萧文熙；法国代表团成员是魏尔登（驻华法国公使，为法国代表团当然委员），巴尔、韩德成（兼秘书）；1948年度中国代表团成员是李书华（兼主席，教育部代表）、翁文灏（行政院代表）、郑白峰（外交部代表）、李锐（财政部代表）、谭熙鸿（经济部代表）、胡焕庸（国立中央大学代表）、邹鲁（国立中山大学代表）、蒋梦麟（国立北京大学代表）、李麟玉（中法大学代表）。

元又457分。将此款项发行五厘美金公债票877,878张（每张票面金额为50美金），合计票面美金43,893,900元，连利息共计75,324,433美元零8美分，尚余232,531美元377美分，加以历年利息，于1930年由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凑足265,000美元，借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

前项五厘美金公债票877,878张，分配用途如下：

1. 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有之无利债券者642,985张；
2. 另行储存，以备将来应用者（因有一部分远东债权人不接受，尚待解决）3813张；
3. 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者（即自1926年起，每年美金20万元；自1930年起，每年增加美金5万元之来源）63,250张；
4. 代中国政府偿还中法实业银行股本余额者（其敷余之数政府加入中法工商银行股本20,000股，该行即中法实业银行之管理公司所改之名称）37,378张；
5. 作为中国政府偿还中法实业银行之部分债务130,452张。

经办教育文化事业概况：

1925年4月的《中法协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

“查中法实业银行经法国政府同意，并得中国政府认可，得将发行之五厘债券……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之用，其执行条件，应每年在北京由法国政府代表与中国教育部代表商定之。中法实业银行因有借款关系，为替代利息起见，愿提出五厘美金债票若干，充中法间教育事业之用，其数为每年至少美金20万元实数，该行并应设法于实行协定应付各款外，使此项数目能达到美金24万元之实数为度”。

中法实业银行停业后，曾由中法两国政府商定，将所换之无息债券，于1930年3月由教育部函请该行代表全数一次交与该会妥为保管，充作办理中法间有益事业之用，其总数为票面法币45600万法郎。除1930年4月15日解决一部分（计票面18020万法

郎)外,尚存票面计27580万法郎,由银行制成276张票面证书,随后以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名义,存入中法工商银行,代为保管。

1930年,中法工商银行总经理兼中法实业银行代表嘉雷(G·Carrere)来华,由该会与嘉雷换文解决无利债券,票面18020万法郎。其换文条件除将依照协定每年应付20万美金增至25万美金外,还确定应向该会交付的款项如下:

甲:由中法实业银行立时交付该会者:①现款美金265,000元(此款即前而所说分配使用五厘美金公债所余美金232,531.377,加以历年利息,于1930年由该会凑足美金265,000元借与财政部;由财政部付给年息六厘);②1928年短期公债票面中币100万元(此项债券于1935年全数还本变成现金后,仍由该会购买其他债券,债券利息收入每年列入该会预算应用);③五厘美金公债2,000张,此项公债票陆续有抽签还本者,该会亦购买同样公债,其利息收入每年亦列入该会,预算应用。

乙:由中法实业银行分期于每年7月15日交付法郎:

1930—1931,每年200万,计200万

1932—1935,每年100万,计400万

1936—1940,每年350万,计1750万

1941—1947,每年100万,计700万

总计3050万

此外,中法实业银行还认可,将该行可以支配之资产之全部直接权,以正式抵押之形式让与该会。

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就是根据以上文件规定所经管之款项办理教育文化事业,计有下列各项:

一、办理或补助学校及其他文化事业:在法国者有巴黎中国学院、里昂中法学院,资送留法学生等。在国内则有办理中法大学及中法中学,以及补助国立上海中法工学院、上海震旦大学、

天津海军医学校、天津法国高等商业学校、天津工商学校、天津孔德学校、上海徐家汇天文台、镭学研究所、药物研究所、广东杜美医院、云南中法医院、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等机关。此外还将设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拟定交换出版计划，循序进行。并编辑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丛书。

二、与其他机关合办之重要文化事业：

1. 补助故宫博物院建筑保险库。
2. 补助北京图书馆购买法国书籍，并与巴黎图书馆交换馆员。
3. 补助教育部国语统一会编纂大辞典。
4. 会同建设委员会派遣专员赴法考察实业。
5. 补助教育部义教、特教费。
6. 补助中央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等校设备费。
7. 补助中山大学校舍建筑费。
8. 与空军军官学校合办无线电通讯人员训练班。

三、学术交流：

1. 该会设有讲座及研究讲座。
2. 招待法国学者伯希和 (Pelliot) 拉洛 (Lalay)、法叶 (Fayet)、赫贝尔 (Herbert) 等来华讲学。
3. 与清华大学合聘哈达玛 (Hadamart) 教授来华讲授数学。

抗战以后，日寇全面入侵。从1939年起庚款停付，该会每年应收之美金25万元因告中断。财政部所借美金之利息，自1940年7月起亦一并停付。但中法实业银行应拨该会年120万法郎仍照旧拨付，因此该会在法国所办之教育文化事业，如里昂中法学院、巴黎中国学院及留学生之救济费用，一直维持到1948年。从1940年起，曾以应收未收之美金年款，请财政部担保向联总处前后借款五次。

(四) 比利时

比利时之“退还”庚款，也有受美国第一次“退款”的影响的一面，但其根源还可追溯到所谓“中比教育运动”。1912—1913年间，李煜瀛等人联合法国一些人士创办“留法俭学会”，先后介绍学生百余人赴法留学，其中亦有许多人留比。后来，蔡元培、李煜瀛及法人欧乐（Aular）等创办华法教育会，又介绍150多人留比（多人晓露槐工业大学），因而中比邦交也随之“增睦”。1918年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大学教授王兼善倡议“联合同志促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为我国兴办教育事业之用”。同时拟出具体计划书，请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作发起人，并请当时在欧洲考察的梁启超、叶恭绰、李煜瀛等赞助（当时江苏教育界亦联合各处学界发起战后教育调查会，推举代表赴欧分向英、意、法、比等国要求退款兴办教育；西南地方当局亦委托李煜瀛、张继等赴欧调查教育，商洽退款，尤其致力于法比二国）。1919年李煜瀛返国，要求退款一事由北京大学所派之通讯员继续进行。后来张继亦由法赴比，与比利时政、学各界接洽，当时晓露槐工业大学主张与中国合组中比大学，校长耶洛表示愿请比政府补助经费和“退还”赔款。1920年，萧瑜与耶洛商定合组“中比大学”，同时即在附近勘定地点，以备建筑学生宿舍。于是中比大学之名确立，而“组织纲要”亦大体确定。萧瑜回国分别向教育部、北京大学及中法大学北京办事处报告经过，教育总长范源濂也答应竭力助成。当年冬即由广东省署捐汇12万法郎作为设备之用。1921年，又由湖南、河北两省教育会发起全国学界联合“请愿友邦退款办学”签名运动，签名者达四万三千人。1922年冬，由萧瑜代表赴法比两国接洽。萧12月抵布鲁塞尔，除走说比利时政、学、新闻各界要人外，并往见其教育部长乐甫、外交部长查斯巴及殖民总长富兰克，得到比国舆论的同情。中国驻比公使王景歧亦向各方

竭力商洽。法国“退款”以后，中国政府正式向比政府提出要求，终于在1925年9月5日达成协议。

按照《辛丑条约》，比利时原从庚子赔款里分得关平银8,484,354两，按每两折法金3法郎又750生丁计，共得法金31,618,293法郎275生丁，加入预算利息，总数达69,447,061法郎又148生丁，规定40年（至1940年底）还清。从1901年起，中国政府已逐年按月还至1917年11月。1917年12月，比利时与各协约国取一致办法，允从该日起将庚款缓付五年，但对缓付部分将来之补付，比政府则提出与他国不同的办法，即从1922年12月起中国政府须将缓付部分和应付部分一起照付，即双倍地加重中国的负担。但是自1922年12月起，中国政府所付之款，比利时政府亦拒绝接受，原因也是由于战后货币比值发生巨大变化。比政府要求以金币付款，而中国政府坚持用纸币付款，从而发生分歧。一直拖延至1925年8月，中国所付之款均储压在海关。1925年“中法退款办法”达成后，中比两国几经磋商，终于达成《退款协定》，中国政府承认将1925年9月1日起至1940年12月底止之比国“庚款”余数本金（共29,053,611法郎又15生丁），按照1905年所采用之电汇方法由华比银行一次垫出（用纸币）交付比国政府，再由中国政府从1925年9月1日起，用美金（折纸币）偿付华比银行。这样由于金币和纸币差值悬殊，中国政府只须几年便可把华比银行垫款还清，其余部分便可作为“退款”由专设之“中比庚款委员会”支配处理。

中比《退款协定》大致内容如下：

1. 比国政府承认，庚子赔款余额得自1925年9月1日起算，其储存在海关之三十三个月双份，一俟华比银行将本协定第二款第二项内所云之付款交与比国政府时，悉数交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应饬知税务处知照总税务司。自1917年12月1日起至1925年8月31日止，所有停付之款，应与自1925年9月1日起至1933年5月31日止所有到期之款，由海关同时按照1901年四厘金债比国赔款债

票之付款表付给。

2. 中国政府向比国政府承认，将应付比国部分庚子赔款余额以电汇方法计算，并加以汇兑或有之盈余，一并折合美金，按照从前办法，每月交与华比银行。中国政府商得比国政府同意，将庚子赔款余额29,053,611法郎15生丁，按照1905年所用之电汇方法计算，一次付清。此项付款由华比银行一次交与比国政府。其解决垫款方式，由中国政府与该行另订之合同抄稿，所有自1925年9月1日起总税务司按月交付华比银行之美金款项，先用于偿还此项垫款之总额。

3. 华比银行垫款全部偿清后，其总税务司按月所付之款，悉交中比委员会充作中比教育慈善公共实业以及公益工程之用，其材料应在比国订购。

4. 按照本协定第一款第二项，所有由总税务司交付华比银行之款项，应立美金总债券一张。①

华比银行垫款付清后，1927年12月8日，中比又订立了所谓“第二次协定”，并成立“中比庚款委员会”。第二次协定的大致内容是：将1927年5月份之余款连同1927年6月——1928年3月共10个月之应付之款，听中国政府提回应用，并应于此款内留出美金10万元，用以遣回及周济需要之比利时人。自1928年4月1日起至1940年12月31日止，按月所收之关款即作为发行美金债券②之担保。

中比《第二次协定》主要条款如下：

按照1925年9月5日中比协定，暨该协定附件，前由华比银行交与中国政府之垫款，本利现已全部归清。现中比两国政府复协定所余庚款之支配方法，即依照1925年9月5日协定内附列之条件，将已付及应付之美金连同1927年5月份所余之美金23,

① 此总债券总数为5,605,991,42美元，而分债券开列本息总数则为美金9,044,402.68。

② 此美金债券之详细数目及情况见文后之附表。

541.56元，仍由关海总税务司自1927年6月至1940年12月按月交付华比银行。

第一条：自1928年4月至1940年12月，按照全部债券规定，由海关按月缴付之款应支配如下：

① 该款中以40%拨与陇海路，专充向比购买材料之用。唯须经交通部核准，并按照1912年9月24日该路借款合同办理。

② 该款中以35%拨与陇海路以外中国国有铁路，遵交通总长之命，专充向比国购买材料之用。

③ 该款中以25%交由依照1925年9月5日协定组织之中比委员会支配，为中比教育慈善之用。

第二条：为便于支配及使用全部债券所规定之153次双份及单份按月缴付之款，其用途经第一条载明者，现拟按照附列还本付息表，将该款发行美金债券，即以此款作抵，并照第一条所定分配办法于最短日期内支配之。

第三条：所有1927年5月份之余款，暨随后由海关按十次应缴华比银行之款，现在即可听由中国政府之支配。在此款内以美金15万元充外交部支配，其余之款充作双方有利之行政费。

第四条：中国政府应令税务处转知总税务司，将按第三条垫付中国政府之款，自1941年2月1日起至11月1日止，展长10个月，每月由海关拨付华比银行美金58,023.60元，以偿还垫借之款。此项用拨之款，仍照第一条所规定之比例及用途，由中比庚款委员会与承受拨款者之间酌配之。

“中比委员会”之章程要点为：

1. 中比委员会之设立，系根据1925年9月15日协约，经1927年12月8日协约所改订及补充，其目的在支配拨给中比学术及慈善事业之款项。

2. 委员会会址设在上海。

3. 委员会由中比两代表团组成，每一代表团之人数最多六人。

4. 大会时每代表团无论人数多寡，仅有一票之投票权，所有决议案应经两代表团一致同意。

5. 每代表团内应选举正、副委员长各一人。

6. 委员会开幕第一次大会之主席，由中国代表团之委员长担任。

委员会成立时，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是：褚民谊（中方委员长）、曾宗鉴、黎照寰、朱世全、蔡鸿、孔力行（以上正委员）沈鹏飞（原为余文灿）、蒋履福、陈铁珊、陈达三、金宝善、叶景莘。

比方代表团成员是：郎培尔（Lambert，委员长）、魏极德（Wygerde，副委员长）、爱勒斯（Hers）、胡培尔（Hubert），以上正委员；培那尔（Benart）、密斯德（de Meester）、拉风德（Lafontaine）、德兰素（Devleeschouwer）、加贝尔（Capelle-Henryde Faveau）以上副委员。

如上所述，在比利时“退款”中，归“中比庚款委员会”直接支配者仅占四分之一，即美金债票125万元。其支配原则是：用于中比教育事业60%，其中：

- a. 用于中比学术交换占5/60；
- b. 用于中国学生留比经费占20/60；
- c. 用于中比间教育事业占35/60。

其余40%用于中比间卫生慈善事业，其分配方法是：

a. 择已办之教育事业有成绩及年代久远者，给予一次之补助费，享受此种补助者有北平中国大学、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等；

b. 择已办之教育事业，指定存款逐年补助。享受此种补助者有中比友谊会、北京中比大学联合会、上海镭锭学院及60名留

比之学生等。

c. 拥有慈善性质事业暂予垫借，日后由主管机关偿还。如垫发京汉铁路及临城煤矿比籍人员欠薪并资遣回国等。

比利时“退还”之庚款，为数不多，经一次支配以后，即已所余无几。蔡元培、李煜瀛、吴敬恒等曾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请照国民党中央规定庚款保息原则，将铁道部用去比国退还之庚款设作教育文化基金，以五厘付息，获批准以后，即逐年以此款分配，直至抗日战争发生时为止。

附 1：中比庚款委员会补助留比学生暂行章程（要点）

1. 1929—1930、1930—1931、1931—1932、1932—1933、1933—1934，以上年限内补助学生名额定64名，其中全费44名、半费20名，每名每年全费比币15,000法郎，半费每年7,500法郎（自7月1日起至次年6月30日止为一学年）。
2. 各高等学校学额之分配，依照该校之建筑、名誉、设备，以及最近五年内中国学生在该校肄业之数目而定。
3. 如学生遇有疾病、伤亡或遭意外或自负债，委员会不负责任。

缘委员会除担负学费比币15,000法郎或7,500法郎外，不负其他责任。

附 2：美金债券表（总债券为美金5,605,991.42元加入利息后之分债券总数为9,044,402.68元），表见104页。

华比银行垫款偿清后，1927年5月份尚余23,541.56美元，此后中国政府按月所付之比国赔款，即为比国“退还”之款，其数据1927年财政讨论会估算，总数约为美金7,819,600余元，每年所得数目大约为：

1926年（6—12月）	330,000.00（美元）
1928—1931年	每年660,000.00（美元）
1932年	810,000.00（美元）
1933年	620,000.00（美元）

1934—1940年

每年480,000.00 (美元)

分债券 号 数	年 份	每 年 美 金 数	每 月 美 金 数
1	1925	222,677.80	55,669.45(双份4个月)
2	1926	668,033.40	55,669.45(双份12个月)
3	1927	668,033.40	55,669.45(双份12个月)
4	1928	668,033.40	55,669.45(双份12个月)
5	1929	668,033.40	55,669.45(双份12个月)
6	1930	668,033.40	55,669.45(双份12个月)
7	1931	668,033.40	55,669.45(双份12个月)
8	1932	816,276.00	27,834.72(单份11个月) 40,188.28(单份12个月)
9	1933	621,432.96	27,834.72(单份5个月) 40,188.28(单份12个月)
10	1934	482,259.36	40,188.28(单份12个月)
11	1935	482,259.36	40,188.28(单份12个月)
12	1936	482,259.36	40,188.28(单份12个月)
13	1937	482,259.36	40,188.28(单份12个月)
14	1938	482,259.36	40,188.28(单份12个月)
15	1939	482,259.36	40,188.28(单份12个月)
16	1940	482,259.36	40,188.28(单份12个月)

(五) 意大利

意大利之“退款”方式，大致与比利时相同，即采用所谓“换算余额”的办法。

意国所得原赔款总数为关平银26,617,005两，折合99,813,768.75法郎，加入预算利息，共合217,868,647.923法郎。从1927年12月起，意大利与协约国采取共同步骤，允将赔款缓付五年。后经双方协议，自1926年1月起，将关款按月偿还华意银行垫款后，由总税务司将按月所付之款交与“中意委员会”，以作中意慈善教育或慈善公益工程之用。于1925年10月1日成立协定，其条

件大致如下：

一、将庚款余额按照1905年所采用之电汇方法计算一次付清，计91,146,704法郎50生丁，此项付款由华意银行一次付与意政府。

二、中国政府应令税务处饬知总税务司，将中国应付意国部分庚款余额按照电汇方法计算，并加以汇兑或有之盈余，一并折合美金，按月付与华意银行，以偿还其垫款。

三、华意银行垫款全部清偿后，所有总税务司按照第二款每月付与华意银行之款，悉交中意委员会，充作中意教育慈善公共实业及公益工程之用。其材料应在意国订购。该委员会之组织及支配款项之方式，由两国政府共同决定之。

四、意国政府承认将业已存储及将来存储海关1925年12月31日止之三十七个月款项，悉数交与中国政府支配。

五、按照本协定第二款所有由总税务司交付华意银行之款项，应立美金总债券一张。关于第三款所交中意委员会之款项，另于同日换文规定，以半数先行充作公益工程之用，如中国国有沪杭甬铁路之曹娥江铁桥工程及其他中国国有铁路之铁桥工程。其次充作导淮工程、海州商埠及改良北京市政之用。至实行上项工程之需用材料，应由中政府在意国用投标法向条件最优之意商订购。为实行上项公益工程，在工程期间内，中国政府当延用中意工程师各居半数。又，第四款内1922年12月1日起算之庚子赔款，改自1926年1月1日起算，亦另于同日换文中规定。

根据1925年10月1日《中意协定》，同日，中国政府与华意银行订立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本合同于1925年10月1日订于北京。一方面中国财政总长李思浩代表中国政府，另一方面由银行经理戴景福代表华意银行。

2. 华意银行俟按照《中意协定》所立之总债券交到该行时，承允为中国政府垫付意政府法币91,146,704法郎50生丁，此款即

系允垫中政府法币100,261,374法郎95生丁之实数，由华意银行以百分之九十交款。

3. 华意银行交付意国政府款项之日，即在帐上将法币100,261,374法郎95生丁记入中国政府欠款。

4. 垫款利息每年九厘，每年6月30日及12月31日结算一次。

5. 垫款偿还按照《中意协定》第三款办理。自1925年10月1日起，总税务司每月以美金交付华意银行之款，由该行商准财政部或其代表换成法币法郎。上项交付之款，专充偿付垫款之用。至本金、利息完全偿清为止，所有兑换之数，自兑换之日起，至迟5日后即在华意银行帐上记入中国政府存款。

6. 垫款全部偿还后，华意银行即将本合同第二款内所载之债券交与中意协定所组织之中意委员会。

7. 本合同双方签字盖印。

8. 本合同繕成三份，以一份存中国政府，一份存华意银行，一份存驻京意国公使馆备案。

中国政府签发之总债券，计美金17,587,061.42，存放于华意银行，至中国政府与华意银行合同所载之垫款完全偿清为止。（详见107页表）随后即将本债券存放于按照1925年10月1日协定所成立之中意委员会。华意银行仍照1927年12月1日以前办法，于每年收到中国海关付款时，当付收据一纸。每届年终，交付中国政府分债券一张，以尽中国政府之责任。

1928年4月27日，组成了“中意庚款委员会”并制定了该会章程，其中有关教育者略如下列：

第十二条：委员会拨给款项，将来采用下列办法之一。

甲，捐助办法：

1. 一次补助。

2. 按年津贴（但此项津贴至迟以至委员会解散之时为止。）

3. 指拨存款。

中国政府所立之美金债券表

(总债券为17,587,061.42)

分债券号	年 份	美 金 数	每 月 美 金
1	1926	1,047,874.02	87,322.83
2	1927	"	"
3	1928	"	"
4	1929	"	"
5	1930	"	"
6	1931	"	"
7	1932	1,512,939.31	126,078.27
8	1933	"	"
9	1934	"	"
10	1935	"	"
11	1936	"	"
12	1937	"	"
13	1938	"	"
14	1939	"	"
15	1940	"	"
16	1941	1,135,196.85	87,322.83(13个月)
17	1942	1,047,874.02	87,322.83
18	1943	"	"
19	1944	"	"
20	1945	"	"
21	1946	"	"
22	1947	"	"
23	1948	"	"

本息共计28,374,012.90

乙，股票担保借款或购置股票。

丙，抵押办法。

第十三条：委员会为切实用于拨款目的起见，应调取一切事务报告或保证。

第十四条：委员会得斟酌情形，规定认为适当之监视或稽察

条例。

第十五条：凡承受指拨款项者，委员会得酌量检查其规章制度及常年报告。

第十六条：委员会议决定支配之款项，应由两国代表团主席委员或代理主席共同签字。

第十七条：委员会应将进行会务议决案件及所拨款项呈报两国政府。

第一届委员会人选如下：

委员长：李煜瀛。

委员：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王宠惠、蒋梦麟、魏道明。

秘书：刘锡昌。

(六) 荷 兰

荷兰因未参加“协约国”，故1917年协约国缓付庚款后，荷兰赔款仍照常偿付。1925年10月，荷兰公使欧登科面致节略于中国外交部，内称愿将庚款余额全数退还拨充筹划治理黄河水道之用，如中国政府同意，荷兰政府可派高等工程师一人来华，并设监察委员会。中国政府复函致谢，并函请内务、财政部及全国水利局等派员协商。协商时水利局提议将此款作为测量黄河之用，但拟出之计划书表明，每年应需测量经费27万余元。经主管部复核，认为黄河测量经费至少需400万元，而荷兰赔款总数仅有140万元，而且需延至1940年方能付清，颇难适应，遂未成定议。后延至1930年6月，中国又提议用此款开辟中国东方和北方两个大港之议，亦未实现。1933年4月，始由两国互相照会，决定将荷兰自1926年1月1日起应得之“庚款”，全部交还中国，指定用于水利事业及补助文化机关。

荷兰“庚款”原数额为关平银782,100两，折合荷币1,404,

651,600佛乐林，加入预算利息1,661,353.689，共3,066,005佛乐林又289仙。从1926年1月1日起，应退还之数为1,451,838佛乐林又16仙。

关于荷款用途，两国换文中曾有详细规定，其有关条目如下：

（1）该交还之款，应以65%用于中国水利事业，其余35%则照5、6、7等节之规定，供作文化用途。

（5）关于文化用途之35%，应即由1926年1月1日以来所积存、现归荷兰政府保管之款项，拨出40万盾作为文化基金。此项基金应交由中国派驻海牙之外交代表及荷兰阿斯得达姆皇家科学院文学院院长，与历顿大学校长所组织之董事会保管处理之。

（6）为增进中荷文化关系起见，文化基金所得之利息之53%，每年应交于中国中央研究院，由中央研究院以该年息13/53作为该院事业补助费。又以该年息40/53作为派遣中国学者及学生留学荷兰之经费，此项比例必要时经中央研究院之申请，可由文化基金董事会变更之，其留学学额之核准，应由中央研究院商同驻华荷兰公使决定之。又，该文化基金所得年息之其余47%，每年赠与荷兰历顿大学之汉学研究院，由汉学研究院将该款用以增进中荷两国间文化关系。汉学研究院及中央研究院，每年应将上年所收款项核算缮具报告于文化基金董事会。

（7）在本金40万盾、年息53%与47%折合之数目分别确定以前，所有关于处理文化基金之用费，须由年息项下扣除之。在荷兰政府已垫各款扣除数，应拨归文化基金项下，一俟该文化基金因此增加后，中国中央研究院及荷兰历顿大学汉学研究院所应分得之年息部分，亦应照上节所规定之比例增加。

（七）日 本

日本庚子赔款原得本息总额为关平银34,793,100两，按一两

关平银折日元1.407元，再加入预计利息，共合日金106,854,177圆8钱2分。自1917年12月1日起，日本与各协约国采取一致态度，允将“庚款”缓付5年。到1922年11月30日期满时，所欠“庚款”余额共为72,121,578圆5钱，扣除1917年内每月预付之利息，实际应付之余额为72,108,766圆。1923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将庚款余额及解决山东悬案所得之库券及赔偿金一并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见1927年《财政讨论会报告》）。经日本政府于1923年3月30日以法令公布，其所动用之款，包括下列各项：

1. 庚款余额本息72,108,776圆。
2. 青岛财产六厘库券5,300,000圆。
3. 胶济铁路六厘库券14,500,000圆。
4. 山东矿山公司补偿金（无息）2,326,135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款项是“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而非退还。以后日本就在所谓“对华文化事业”的名义下，大搞其对华文化侵略。

略举数端如下：

1924年2月9日，中国驻日公使王宝荣与日本对华文化事务局长出渊腾次订立《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协定》规定：“日本政府在庚款项下拨出经费若干，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

（一）“对华文化事业”之内容：

1. 日本方面举办对华文化事业时，应将中国方面有识阶级之代表的意见十分尊重。

2. 庚子赔款项下资金，主要用于中国人所办之文化事业，至于对日本在山东所已设之学校、病院及其他现时日本各团体在华经营之文化事业，其补助专就关系山东项下之资金支出之。

3. 在北京地方设立图书馆及人文科学研究所。
4. 在上海地方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
5. 办理前两项事业应支经费随后另定之。

6. 将来庚子赔款项下资金有盈余时，应再举办下开各事业：

- a, 就适当地点设立博物馆。
- b, 在济南地方设立医科大学，以病院附属之。
- c, 在广东地方设立医学校及附属病院。

7. 对于第三项至第六项所开各事业，设评议会，以中日两国人组织之。其员数各评议会约二十名，中日两方各十名，由两方协商，另选中国人一名为会长。

8. 北京图书馆及研究所之用地，由中国政府免费拨给。

9. 救恤费之名义，应从速改为慈善费或其他名称。

（二）设留日庚款补助费生名额：

其在日本国内方面之对华文化事业，即为设置庚款补助费生名额，共三百二十名，除十名由中国教育部在国立大学教授中直接选派外，其余名额均在留日各大学及专门学校学生中选补，由中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商得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同意办理。

1924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庚款补助留日学生学费分配办法》，就学额分配、学费额、赴日后依次就读之学校等均作了极详细的规定。其中规定了20名留日学额，按各行省众议院议员名额及担负赔款全额之比例为标准，分省定额如下：河北省23名，江苏省27名，四川省24名，浙江省22名，江西省21名，山东省18名，河南省17名，广东省21名，山西省15名，湖南省14名，安徽省15名，湖北省16名，福建省13名，云南省10名，陕西省11名，广西省9名，甘肃省7名，贵州省6名，新疆省9名，辽宁省6名，吉林省4名，黑龙江省4名。

1927年5月，北京政府又颁布《解释补助费分配办法条文疑义》（内容略）。

《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签订后，即遭到我国各界有识之士的反对。“我国人士，慨然于此项不对等协定内容危险性之重大，

颇反对前北京政府之所为，故虽有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及其上海分委员会之组织，亦未能有若何之进展。”1928年以后，国民党外交、教育两部建议废止前项协定，呈准国民党政府，由外交部与日本一面交涉文化协定之废止，一面依据欧美各国退还“庚款”前例，请将此后庚款退还中国。此案历久未决，而“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内我中国方面委员已由教育部宣布一致退出该会。此外，关于“庚款”补助留学名额施行以后，亦产生许多流弊。1929年7月，教育部明令停止序补，饬由留日学生监督处通知日本，在废止《文化协定》案未解决前，“庚款缺出，暂停序补。”同时通令全国，嗣后如有私人或团体赴日参观，不得请受日本文化事业部之“庚款”补助。

1937年7月7日，日本大举侵华，中日处于敌对国状态，“庚子赔款”亦随之取消。

（八）余　　言

抗日战争发生后，关税收入锐减，乃于1939年1月起商请各国，将关税担保之外债赔款停付。关于“庚款”部分，所欠数额分列如下：

美国：计欠本息8,457,845.110美元

英国：计欠本息3,855,082.696镑

法国：计欠本息27,590,227.581美元

比利时：计欠本息1,544,754.765美元

荷兰：计欠本息220,687佛乐林

西班牙：计欠本息729,723.426法郎

葡萄牙：计欠本息5,938镑412先令

瑞士及挪威：计欠本息1,480镑464先令

各国“退还”庚子赔款概况总表

国别	美 国	荷 兰	法
“退还”方式	除口头定用途外,无其他条件	与美国大致相同	订立协定后“退还”
应退数目 (本息合计)	第一次: 28,922,519.35美元 第二次: 12,545,438.67美元	1,451,642.334 (荷金佛乐林)	75,324,443.08 美 元
起止年月	第一次:1909—1940 第二次:1923—1945 1923年起	1926—1940	1925—1947
每年平均数 (本息合计)	第一次约: 900,000美元 第二次约: 530,000美元 1923年起	96,000美元	3,270,000美元
原订条件 用 途	第一次:清华学校及留美学生经费 第二次:发展教育文化科学事业	65%用于水利 35%用于文化	开始主要用于复兴中法实业银行,有小部分用于教育和慈善事业,中法实业银行停业后主要用于教育慈善事业
管理	第一次:由中美双方组织专门委员会支配与保管 第二次:由中美双方组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	由荷政府派高等工程师来华,并组织监察委员会	由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支配与管理
履行情况	中美双方均按原条件执行,1939年1月起停付,尚欠本息 8,457,845.110	1939年1月停付后,尚欠本息 220,687佛乐林	1939年1月停付后尚欠本息27,590,227.581 美元

续表 1

国别	俄—苏	英 国	比 利 时
“退还”方式	声明“放弃”，但仍订协定控制。	变更用途	换算金额
应退数目 (本息合计)	97,365,197 折合中币	11,186,549.329 英 镑	7,819,600余 美 元
起止年月	1924.6—1940.12	1922.12—1945.12	1927.7—1940.12
每年平均数 (本息合计)	各年情况复杂不宜平均详见前文及附表。	1923年起约 480,000英镑	1928年起约 600,000美元
原订条件	除清偿担保优先各债外，全用于中国教育。	1.基金基本上用来建设、整理中国铁路、桥梁和水利之用。 2.所需材料须从英国购买。 3.基金借拨利息用于教育文化事业。	中比教育、慈善、公共实业、公共工程。 (中国政府声明愿以40%用于黄河铁桥)。材料须在比购买。
履行情况	中苏合组特别委员会一致决议施行。	组织“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 (1943—1948)	中比庚款委员会
		1939年1月停付后尚欠本息 3,855,082.696镑	1939年1月停付后尚欠本息1,544,754.765 美元

续表2

国别	意大利	日本	总结
“退还”方式	同比利时	变更用途后，又订协定	
应退数目 (本息合计)	约23,740,000 美元	72,108,776 日元	各国退款总数 约折中币 608,279,528.12元
起止年月	1930.5—1948.12		
每年平均数 (本息合计)	约1,240,000美元		
原订条件	用 途 中意教育、慈善、公共 实业、公共工程（但中 国政府声明愿以半数充 工程如 <u>曹娥江铁桥</u> 之 类）材料须由意订购。 中意委员会	对华文化事业 组织“中日委员 会”管理资金举办 一切	教育约用59%， 36,254万元 工程约用5.1% 3,101万元 慈善约用1.5% 946万元 公共实业约用1.2% 787万元 中法实业银行复业 约用23%，14.144万元 其他约用9.2% 5,593万元

郭松龄事件

〔澳〕 加文·麦柯马克著 毕万闻 译

编者按：本文译自澳大利亚人加文·麦柯马克所著《张作霖在东北》一书，原为该书之一章。此章前面记述张作霖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势力伸延至直隶、山东、江苏等地的情况，奉系内部新旧两派势力的消长，以及新派中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与杨宇霆、姜登选之间的竞争与矛盾，张学良与郭松龄的关系等等。本文即是这一章的后半部分，系记述一九二五年郭松龄反奉战争。文中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等有关原始文电，较为详细的论证了日本陆军支持张作霖，干涉郭松龄的军事行动，最后终于导致了郭军彻底失败的前后经过，为了解这一事件的真相，提供了很多第一手资料线索，特刊出供参考。原文中小标题今略去。此书中译本将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

郭松龄反叛的背景比较广阔。其中有关反叛前夕的形势，必须了解的是奉系与中国其他重要势力的关系。张作霖势力向南扩张到长江一带，自然激起强烈的反抗和愤恨，这就促使张作霖的竞争者们逐渐团结起来去反对他，张的敌手和同盟之间的区别也就模糊起来。到1925年8月29日，支撑北京政府的国民军与奉系的同盟分裂为两大集团：国民军集团，名义上在冯玉祥领导下，控制西北部和西部，包括绥远、察哈尔、甘肃、河南和山西省及特别行政区；张作霖集团则控制东北和华东，包括东三省本部以及山东、直隶、热河、江苏和安徽^①。两大集团辖区的交界线经

① 《中国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177—178页的脚注。

常成为双方争吵的潜源，而以争夺对北京及其郊区的统治权最为明目张胆。除了北方这两大集团之间的竞争之外，奉系在东南方还面临着一个大对手——孙传芳，他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仅存的代表人物，他直接统治着浙江并间接控制着福建。于是，争夺的焦点就在于控制大城市上海。因为控制了这类城市就会获得威望和税源。仅就上海说来，控制它还意味着控制了一个重要的兵工厂，也就获得了武器。

1925年10月，离国民党的北伐只有八个月了。这次北伐企图在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肃清军阀，统一国家。国民党的军事决策者们明白，华北和东北的张作霖、西北的冯玉祥、长江一带的孙传芳是对抗北伐的主要势力，而这三个大军阀的武力均势在那时最为脆弱。三者中的每一方都象疑忌敌人一样地疑忌自己的同盟者，并且，都在寻求消除其他两方合谋反对自己的可能性。1925年期间，张作霖和冯玉祥之间的全面开战的预言不断出现。实际上，当年3月间，张作霖本人也做出过这样的许诺^①。5月，张作霖向京师地区派出了军队，而在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仍然驻守在那里。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是，当时正值五卅事件的紧张时期，冯方不愿进一步刺激列强，就做了战略撤退。于是，战争避免了^②。

二

1925年秋天，企图在长江一带立足的奉军与浙江的孙传芳之

① 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1925年3月21日致国务卿报告，《美国对外关系》（英文，华盛顿版）1925年，第1卷，第600页。张作霖召见英美领事，“明确表示，第一，他决心赶走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第二，他与吴佩孚保持着极好的关系；第三，战争即将开始”。

② 《中国政治史（1840—1928）》（英文），第485页；《中国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178页；《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编，第205页。

间争夺上海的斗争，首先激化为战争。军阀只是朦胧地领悟到五卅运动期间新生的政治力量。显然，1925年10月，他们为控制上海而突然爆发的斗争，与仅仅在几个月以前曾经震撼这个城市的那些重大争端几乎完全无关。

10月11日，孙开始调动军队，严重威胁驻守上海的奉军，仅在三天之后，其警备司令邢士廉就下令奉军撤退。15日，孙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这支军队是由浙、闽、皖、苏、赣五省组成的。同时，孙下令向奉军阵地作一次五只叉式的进攻。孙是按照与冯玉祥国民军共同拟定的计划行动的^①。这个计划似乎是：开始从南方进行攻击，把奉军吸引到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于是，岳维峻部国民军开始从西面进攻奉军；当更多奉军已从东北派出的时候，冯玉祥将向天津进攻，意在切断奉军的通讯和供应线，用这种办法，正如《中国年鉴》所说的，“以期诱使全部奉军分布在脆弱的漫长的战线上，便于将其零零碎碎地加以歼灭。”^②

然而，事情没有如此发展。奉军对东南地区的利害关系采取了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不加抵抗地放弃了苏皖两省的大部分地区，撤到苏北的徐州。该城地处鲁、皖、豫边界，是个重要的铁路枢纽站。在张宗昌的指挥下，奉军在这里重新进行了部署。显然，奉军轻易地就被赶走了。这就鼓励了它的敌人，导致包括有远在四川、贵州军阀参加的一个更广泛的反奉联盟的形成。10月21日，吴佩孚从隐退中出头露面，在汉口^③就任讨伐退却奉军的联军总司令。尽管有协调行动的反奉协议，但无论是在这个新组成的联盟之内，还是在这个联盟与国民军之间，几乎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实际合作。对给予吴佩孚重新出山的机会，冯玉祥颇感勉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没有理由认为吴会轻易地宽恕和忘记1924年自己的背叛）。

① 《中国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180页。

② 《中国年鉴》英文，1929年，第1023页。

③ 原文为徐州，疑为汉口之误。

因此，国民军逗留不动，观望形势。孙传芳也对吴佩孚仍存疑虑，实际上否决了派军经河南到徐州去助攻奉军阵地的当初计划^①。

面对两条战线作战的威胁，奉系首领聚集在一起讨论怎样更好地应付局势。在这次会议上，那些持强硬路线者认为，一旦两条路线作战，当时控制的许多南方阵地是守不住的，全部奉军不得不拉回到天津地区；而且，可以预料，东三省基地本身也会受到威胁。因此，这表明：最好还是放弃那些最为暴露的阵地，特别是靠近京汉铁路线的地方；把军队集结到京师地区，首先力争把国民军赶回去，随后继续对付孙传芳和吴佩孚。那些持温和路线者则故意贬低东南地区的利益，甚至赞成施惠于孙传芳，把奉军从山东撤出；在京汉线，主张向冯玉祥的要求让步。他们认为在共同支持段祺瑞内阁、关税会议和国民大会召开的过程中，应当尽力与吴佩孚和冯玉祥合作^②。奉系文官派首领王永江，似乎一直是支持后一种意见的主要人物^③。无论如何，张宗昌的山东部队与在姜登选率领下从南方撤退下来的部队一起，奋力守卫在徐州一线；而张学良则率领大批援军开到长城以南的滦州，与李景林的直隶部队和朝金的热河部队一道，对抗京师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国民军部队。11月初，在山海关和天津之间，张学良统辖的部队有七万人；此外，有两个师和七个骑兵旅（约有五万人）正向热河进军；另有一支预备部队四万人，驻扎在长城外边不远的锦州^④。这些调动有效地制止了冯玉祥与孙传芳、吴佩孚以及长江同盟进一步积极合作的打算。在段祺瑞的倡导下，国民军与奉天的和平代表于11月初会谈了几次，试图为修复旧盟而消解他们之间的主要障碍：国民军要求奉军从其占领着的京汉线阵地上撤走，天津港向国民军开放。直到11月7日，即徐州落入孙传芳手

① 《吴佩孚生平中所昭示的近代中国黩武主义（1916—1928年）》，第293页。

② 《民国十四年度奉天派人关小史》，第25页。

③ 满铁哈尔滨事务所1925年11月21日的报告，《现代史资料》，第33卷，第147页。

④ 《中国年鉴》，1926年，第1025页。

中之前，在这些问题上，奉方仍拒不认步。徐州是奉军在江苏省的最后一个阵地，奉军从徐州撤退，促使他们重新观察形势。段祺瑞一旦全面战争在京畿地区爆发，他将辞职的威胁，外国列强对这样一场战争一旦爆发的反应又令人捉摸不清，这都为缓和的劝导增添了更多的说服力。于是，11月12日，奉方同意了国民军上述两点要求，签定了一项协议。

在北方，奉方与冯的国民军的天津协议只不过是个极为短暂的插曲。对冯玉祥说来，这是为了结束接触以便赢得时间，利用郭松龄作为他的特洛伊木马，设计一个从奉系内部消灭张作霖政权的密谋。天津协议签定后，形势明显地缓和了。因此，11月20日张学良被召回奉天，与其父会商。他的代理人郭松龄接替了奉军主力部队第三军团的指挥权。这个军团由六个师（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十和第十二）、两个炮兵旅（第一和第二）和五个工兵营组成。在东北军队里，它的强大不仅由于它的数量（约七万人），而且由于它囊括了训练和装备最好的部队。尤其是以冯玉祥的国民军为后援，为了一个目标战斗，就可能成为最强大的军队^①。郭松龄依照如下条件与冯玉祥达成了协议后，决定反叛张作霖：

- 一、郭发表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
- 二、在郭采取行动强迫张下野的过程中，如果郭遭到以天津为军事基地的李景林从后面的攻击，冯应派兵助郭。
- 三、如果李景林保持中立，事后当任命他为热河督统。
- 四、直隶省和全部京汉铁路线应为冯的势力范围。
- 五、东三省完全由郭松龄控制^②

三

看起来，冯是于11月20日，郭是于20日或24日在这个协定上

① 《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编，第209—210页。

② 布施胜治：《冯玉祥与中国国民革命》（日文），东京1929年版，第122—124页。

签字的。但是，早在11月12日磋商天津协议时，双方可能在原则上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①。第二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次问答会上，冯玉祥叙述了郭松龄提出的另外五条附加条件，冯说他当时也赞同这五条：（1）推翻军阀。军阀是国家的祸害，人民的灾难。（2）建立一个进步的政府。（3）实现平民政治。（4）实行义务教育。（5）保护劳工^②。然而，关于这些条款，现在还没见到其他记载。冯在那种场合，因受到他的东道主苏联的观念影响，而构想出这些条款来，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由于与冯达成了谅解，郭松龄于11月22日召集受其指挥的军官们举行会议，郭阐明了他对张作霖和杨宇霆不满的理由，拿出了他要求张辞职的通电。郭着重指责张任凭日本势力控制张本人和控制张所占有的全部领土。长期以来，一个强邻以东三省部分地区为基地，用铁路、机械、教育和行政手段，强加给东三省种种桎梏。东三省已经受不住了。因此不要很久，东三省就可能沦为这个强邻的一部分。可张作霖被一大群（约二十八个）顾问包围着，还不采取措施对付他们。再则，货币是经济的根基，可是在东三省，外币充斥，而本国货币只不过是废纸而已^③。于是郭松龄敦请张作霖辞职，把权力移交给他的儿子张学良。张学良在奉系内部是郭的当然保护人。但是，几乎不存在这种移交权力的可能性，这不过是以张学良的名义彻底反叛的一种更谨慎的遁词而已。

一开始，郭的军事行动就很不顺利，他不得不把至少三个师长（第十二师的裴春生、第五师的赵恩臻和第十师的齐恩铭）连同姜登选拘禁起来。姜是正在后撤的安徽督办，还有二十八名级别较低的军官也拒不支持郭。与杨宇霆一样，姜也是奉军内部主要敌对派别的首领，他似乎对郭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被枪杀了。

① 《冯玉祥与中国国民革命》，第122—124页。亦见中国驻屯军（天津）总司令致参谋本部次长，1925年11月2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16186，第1卷，第154页。

② 外务省档案16186，第1卷，第150—151页。

③ 《民国十四年度奉天派入关小史》，（日文）第47—48页。

其余的被拘禁者被押送到由李景林占据着的天津。因此，出现了李景林是整个军事行动共谋犯的有力推测^①。的确，除非郭松龄确信李景林的支持，郭是绝不会用这种方式向李表露自己的意图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支持，郭与京津之间的联系可以迅即就被切断，他的唯一可能的供应线就会受到威胁^②。为了发动一次迅速的突袭，逮捕并罢黜张作霖，使之难于防守，11月23日夜，郭向奉天城密派了二千军队，这支军队在山海关遭到阻截，被缴械了。郭松龄的第一个计划失败了^③。因此，他除了公开向奉天进军之外，别无抉择了。于是，他把他的军队编为四个军，并改称国民军第四军，以显示与冯玉祥军队的一致性。他开始向奉天进军^④。

11月25日，冯玉祥、李景林都发表通电，要求张作霖辞职。两天后，冯正式宣告参加对张作战^⑤。然而，国民军的卷入比郭所期望的要少：其第二军和第三军从河南和山西开向山东，去攻击由张宗昌指挥的奉军，但几乎没有什进展，从11月末起，实际上都在失败中撤退了。其第一军的部队，在12月3日以前，一直待命不动，到12月3日，也只是向张作霖所占地盘中最弱小的分区——即朝畿的热河进军^⑥。

如果说国民军的支持是令人失望的冷淡，那么李景林打算与张作霖共命运的消息，则是一个严重的挫折。在郭松龄的军队开到长城外面因而也就离开李的地盘之前，李并没有宣布这一点。

① 《民国十四年度奉天派人关小史》，第47—48页，吉田，日本外务省档案16186，第1卷，第1216—1219页；《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编，第213页。

② 《中国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183页（“显然易见，张作霖的战败将伴随着冯玉祥势力在北部中国的扩张，而这种扩张最为明显的地区就是直隶省”。参见《中国年鉴》，1926年第1026页。

③ 《民国十四年奉天派人关小史》，第48页。

④ 《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编，第209—210页。

⑤ 《中国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182页。

⑥ 《中国年鉴》，1926年，第1026页。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国民军的主力将被李景林和张宗昌之直鲁联军的共同对抗所牵制，因而暂时也就不能给郭以更大的支持^①。看来，李景林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担心其在奉天城的母亲之安全大概是其中之一^②。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冯玉祥完全不信任他。由于张作霖把李景林管辖区里的京汉铁路沿线的直隶地盘让给了冯玉祥，冯与张签定了天津和约。李景林虽然对此不满，但是他明白，冯玉祥背叛行为的记录使他几乎没有理由期望与之保持长久谐调的合作。特别是在冯玉祥已经表明了要把其管辖权扩大到天津港的欲望之后。尽管如此，李还是签署了11月25日要求张作霖辞职的电报。稍后，他解释说，他不得不这样做，只是在郭松龄的军队开出他的地盘并直接与张作霖的那些军队交战之时，他才开始有行动自由。到那时，他把郭松龄托交给他禁闭的那些军官全部释放了^③。

尽管遭到了这些打击，在最初几周，郭松龄的军事行动还是迅速地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由张作霖的“老”伙伴指挥的那些奉军，没有哪支军队哪怕是打胜过一次战斗。他们接连不断地撤向山海关以东二百英里的连山。12月5日，张作相、汲金纯和张

① 至少在开初，李景林对支持那一方是摇摆不定的。他11月25日的电报是当天与郭松龄磋商之后在天津发表的。但甚至在那时，他对自己与国民军联盟也是有所保留的，因为他认为国民军是一支赤色军队（中国驻屯军天津总司令致参谋次长，1925年11月2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16186，第1卷，第148页）。为了使张宗昌同意共同采取中立的立场，他似乎已经做了很大努力。当这种努力失败的时候，他打电报给在奉天的王永江，解释说他一直为“神经病”所苦，不能处理他的事务，他所采取的行动，实在是别无他法，不得已而为之的（驻天津总领事有田，11月28日，同前，第179页；野村致松冈洋右，11月30日，同前，第246页）。12月2日，他公开表示他继续忠于张作霖（《中国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182页）。

② 李至少拍了一封电报给吉田茂，催请他注意保护李在奉天的母亲（野村致松冈洋右，1925年12月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16186，第1卷，第306页）。

③ 野村致松冈洋右，1925年12月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16186，第1卷，第249页。

九卿的联合部队在这里遭到了严重的失败^①。当连山战线崩溃的报告传到奉天城时，张作霖制订了逃往日本管辖的安全的南满铁路“附属地”的计划^②。1925年12月5日以后的几天，张作霖处于命运的最低点。他一时坠入了“半疯癫状态”^③。

正如别的报告所判断的那样，如果他充分意识到他正依靠着的那些“忠诚”伙伴们的慌乱、无能及其变节思想，他大概一下子就会彻底绝望——不是逃跑就得自杀^④。在连山，张作相的军队溃散了，逃跑了。郭松龄的炮兵一开炮，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抛弃了自己的武器^⑤。1925年张作相阵地之崩溃所带来的打击，与1922年那次相似。当他们远远地退回吉林的时候，使剩下的东北军明显地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张作相向张作霖解释说，他从吉林省长那里收到了一份关于某种阴谋的报告，估计是支持吉林独立的人策划的。因此，他必须立即回去^⑥。事实上，似乎更为可能的是，由于张作霖看来必定要被推翻，张作相与吉林省的其他当权者们自己正在认真考虑宣布独立的主张，或者努力争取与郭松龄达成某种谅解。这位吉林省长一贯反对东北军队卷入关内战争，并且，或许被认为对郭松龄的要求怀有某种同情^⑦。再者，当连山失败的消息传到哈尔滨的时候，当时担任管辖整个中东铁路地带的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焕相，于午夜召集中东铁路督办

① 《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编，第213页。这三人分别指挥第15、第9和第13师。

② 关东军参谋部：《关于张郭战争中对中国军队的诸种观察和此次战争之诸问题》，1926年，第2—3页；亦见江口圭一：《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日文），京都大学人文学报第17号（1962年11月），第76页。

③ 《反奉纷争事件战局》，1926年2月草拟的外务省报告，标有“供议会使用”字样，日本外务省档案16186，第2卷，第1100页。

④ 王永江与吉田茂的谈话，见吉田的报告，1925年12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16186，第1卷，第378页。

⑤ 野村致松冈洋右，1925年12月8日，外务省档案16186，第1卷，第462页。

⑥ 野村致松冈洋右，外务省档案16186，第464页。

⑦ 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的报告，1926年1月15日，外务省档案16146，第10236页。

和滨江（哈尔滨及其郊区）道尹到他的住所开会，提议在这场张郭战争中暂时宣布中立，然后再转而效忠于郭松龄。道尹蔡运升勉强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第二天，进而召开了哈尔滨要人们的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张焕相宣布，由于张作霖势必被推翻，应该派一个代表团到奉天去欢迎郭松龄。会议勉强同意了这个意见。张焕相还向全国（而不是向张作霖）发了一个通电，笼统地宣称他赞同郭松龄的新兴力量进入奉天^①。后来，据从郭松龄总司令部缴获来的文件透露，张焕相与郭之间存在着秘密的接触^②。

阚朝玺也与郭松龄建立了秘密接触^③。处在阚那种情形下，在整个动乱期间，一个主要目的似乎是保卫当年的鸦片利益和收货。从11月26或27日起，阚带着价值大约二千万元的鸦片开始慢条斯理地从热河撤退。这些鸦片是作为赋税勒索来的。同时，阚派他的参谋长邱天培，对郭表示某种和解。直到郭的军事行动最后失败前夕，邱仍然与郭在一起。

阚朝玺军中每一个人，包括小到军阶最低的士兵，据说都携带着鸦片，“完全是一支鸦片军”。因此，在这次战争中，它的主要兴趣是如何避免鸦片受到什么损失，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④。由于郭的抵抗于12月24日瓦解，实际上，阚打起反叛张作霖本人之旗的时间是短暂的。他被吴俊升劝止了，他的反叛之举也就静静地被遗忘了^⑤。这次战争之后，他有点不敢在奉天抛头

① 外务省档案16146，第10236页；亦见日本驻长春总领事1925年12月17日的报告，同前，16186，第2卷，第290—291页。

② 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1月7—8日；驻哈尔滨总领事（天野），1926年2月1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第10159页，第10324页。

③ 吉田，1926年1月16日，外务省档案1614，第10183页。

④ 关东军参谋部：《关于郭战争中……诸问题》，转引自《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第76页。

⑤ 船桥丰三郎：《入关后的奉天派》（日文），满铁庶务部调查课，第40期小册子，1928年1月15日大连版，第9—11页。

露面，因而声称他打算出国深造^①。然而，由于吴俊升的说情，不久，他又复职了。吴是阚朝玺、张作霖两人的亲戚^②。

人们认为，在奉系里，这些人是张作霖最亲密的“老”伙伴。但在此时，他们对张却犹豫动摇、背叛出卖或漠不关心。在结束这些记叙时，吴俊升很不情愿地从黑龙江派出军队一事，也值得一提。显然，他原计划12月3日出发去前线，但他拖延到5日。此时，他得到了连山战役的消息，又撤消了这个计划。12月6日，他召开了军事会议，认真地考虑了宣布中立的问题^③。但是，一直到后来他决定派兵参加对郭松龄的最后决战，他也没有宣布。

四

张作霖军队的溃散是如何停止，其士气是如何提高和恢复，以至于他们能在十二月末突然转败为胜了呢？显然，一个因素是：与张作霖的兵力相比较，郭松龄兵力的表面力量胜过其真实力量，郭的军队没有应付长期作战的装备，更不必说冬季作战了。郭没有努力向士兵反复灌输为了一个目标而奋力作战的信念。十二月初，当李景林转而反对郭松龄的时候。郭军来自后方的供给或援助的希望完全破灭了。据说，这时郭军的食品，只能

① 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1926年1月20日报告，阚声称于1月12日辞职，外务省档案16146，第10193页。

② 吉田茂，1926年2月23日，外务省档案16146，第10352页。《中国政治史（1840—1928）》（英文），第490页，对此也作了记叙，但是，说“热河军事首领率军赶往奉天援救”则不对。

③ 关东军参谋长致陆军次官，1925年12月9日本外务省档案PVM12（这个长达5册的系列文件也编入了外务省档案，其系列号为16185）。吴说，已收到来自满洲里的报告，苏军正沿中苏边界集结，可能以一次佯攻来牵制尽可能多的张作霖军队，借此援助冯郭联盟以反对张。吴的境况因此多少有点复杂化了。12月24日（有误，可能是4日——译者），即在吴南下援张的计划撤消之前，中东铁路局局长伊万诺夫拜访了吴，因此，苏联可能已经借此施加了压力。参阅帕特曼·韦尔：《消失了的帝国》（英文），伦敦1926年版，第308页，那里有详细的记述。

再维持四天，现金仅有四十万元，而且没有御寒的装备^①。十二月二日或三日，天气变得特别坏，下了约一英尺深的大雪，同连山战役以前比较，气温下降了二十度。郭的军队仍着夏装，许多人冻伤了。

据报告，另有六千人在连山投降了。当郭军进一步接近奉天城的时候，有更多人不是逃离（他们的家就在附近）就是投降了。十二月七日前后，夺占了锦州。然后，郭军因掠夺该城而停了下来。这样，与郭松龄的含糊的许诺相反，郭军的实践表明，它仍然是一支相沿成习的军阀武装，几乎没有提供取代张作霖统治的任何革命前景^②。

郭松龄失败的第二个、但却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在这次战争中，张作霖得到了日本强而有力的、也许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支持。形形色色的日本机构和代表，已往与张作霖的合作，我们已经叙述过了。这其中，至少表现了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在东三省当地的日本机构和代表，无论是民事的还是军事的，都比其在东京的本国当权者更加充分地支持张作霖；第二，必须坚定不移地服从外务省和币原外相的保留条件，即不允许中国的内乱搅乱日本严重关切的地区的秩序。这实际上就是不准张作霖的敌人存有靠攻打奉天城来推翻张作霖的希望，除非他们准备也与日本军队较量。因此，“绝对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例行声明，仅仅意味着干涉只是在保卫神圣的日本利益之时才是绝对必须的。以镇压威胁张的“骚乱”（它们也必定威胁日本的利益）作为最后手段，实施保卫张作霖的诺言，是与对待张作霖力图扩张领土或征服整个中国的含混态度结合在一块的。一方面，对他热心积极，因为

① 有田致野村，1925年12月2日（报告与王永江的谈话），外务省档案16 186，第1卷第251页；亦见关东军参谋长致陆军次官，1925年12月12日，同上，第2卷，第655页。

② 关东军参谋部《关于张郭战争……诸问题》文中，比比皆是，载《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第77页。

他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恢复主权热和与之相伴随的“动乱”的一道壁垒。但另一方面，又对他颇为担心，因为他卷入长城以南的内战带来了把这种动乱扩展到东北的风险。并且东北耗费金钱支持这样一场战争，对日本的投资也是有害的。

恰恰是在对张作霖的这种一般倾向之下，郭松龄突然起来反对张作霖的消息在日本人中一下子传开了。显然，这是非常出乎意料的事。在日本，郭松龄并非不为人所知，因为他出席在日本北部仙台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是他转而反对张作霖之前仅仅三周的事。在那里会见过他的那些人，似乎对他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郭对在那种场合某些谈话的误解，大概影响了他的决定。陆军大臣宇垣在与郭谈话后，在其日记中透露，他发觉郭是“中国人中的奇才——军人的典型化身。”^①当郭听到奉军在孙传芳的压迫下从东南方撤退的消息时，他决定中断在日本的逗留，立即回国。在一个半小时的对话过程中，宇垣乘机向他提出了一个劝告。显然，希望郭回到中国时能将此劝告转达给张作霖。宇垣表示，杨宇霆从江苏撤退的教训就是奉系势力的扩张搞得过分了。在目前，张应该积蓄力量以待异日；也许甚至应当考虑从直隶撤退。他明确表示，他与张作霖并非总是愉快的。他说，张不要采取不顾全国形势的鲁莽而愚蠢的行动。^②郭则表示，他为在日本所看到的情形所感动，希望将来再到日本学习军事科学。^③他一定抱有日本会对他的反张的军事行动作出同情反应的希望，尤其是他举事的几个目的已被日本这位陆军大臣说出来之后。然而，郭没有考虑两件事：所有在中国当地与张作霖有密切往来的日本机关的亲张力量以及它们所能够发挥的影响；当人们一旦得知他与冯玉祥结盟的时候，东北对布尔什维克或苏维埃思想侵入

① 《宇垣日记》，第44页，1925年初。

② 《宇垣日记》，第44页，1925年初。

③ 樱井忠温：《白川大将》（日文），东京1933年版，第485—486页。

的恐惧就会变成某种反郭的非常强大的力量。

当郭举事的消息在奉天城传开之时，关东军在全东北的驻军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打击力量。要知道，关东军所属部队包括两种，一种是那些驻扎在关东洲租借地内的部队，不受条约的限制，另一种是负责护卫南满铁路的“铁路守备队”，其数量受到限制。^①不管怎样，虽然日本依照条约有理由要求驻扎一支由大约一万五千名“铁路守备队员”组成的军队，但在华盛顿会议后被削减了，实际兵员常常低于这个数字。1925年11月下旬，大概总共不超过七千八百名^②。但这个数字又进一步削减了，因为东京参谋本部于11月16日决定，随着张冯和约的签定，华北紧张形势的缓和，使两年前入伍的二千二百四十名士兵的服役期没有必要再延长了。因此，他们于十九日，即离郭松龄举事还不到一周的时候，开始离开，只留下五千五百六十名日本军队来保护除了关东洲租借地以外遍布东北的日本利益^③。

惊悉情况的突然变化，关东军司令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致电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请示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不准郭军前进到辽河左岸是否是中央当局的政策。”^④参谋本部的答复没有提到以辽

① 关于关东军的由来，见岛田俊彦《关东军》（日文），东京1965年版，第39—40页。

关于“铁路守备队”问题，见C·沃尔特·扬《在南满铁路地带内的日本管辖权》（巴尔的摩1931年英文版），第十章第261及其后诸页。日本坚主每公里铁路有权派驻15个由他们指挥的守备队员，这个数字是在朴次茅斯条约中规定的，通过这个条约，俄国把对南满铁路的管辖权让渡给了日本。日本这个可疑的法定要求是由沃尔特·扬处理的。依照这个条约，由日本掌管的干线包括大连到长春（704公里）和安东到奉天城（260公里）两条，这就意味着准其驻扎一支有14,460名守备队员的军队。参见顾维钧《致李顿调查团备忘录》（英文），第1卷，第195—217页，文件7，《关于南满铁路“守备队”的备忘录》。

② 外务省：《驻扎在满洲包括租借地关东洲的全部兵力》，这是郭松龄事件期间军队编制及其调动的一页摘要，1925年12月28日草拟的。外务省档案161861，第921页。

③ 外务省档案，161861，第921页；亦见《人文学报》（京大）第17号，江口圭一，《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第77页。

④ 《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第78页。

河为代表的任何防线，而是要求暂时继续遵循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但却建议采取种种措施，包括派遣援军在内（倘若动乱扩展并损及南满铁路地带日本利益的话），似乎都是适宜的。第二天，关东军开始向奉天城集结^①（但还没有派遣援军）；同时，派遣中校浦澄江往访郭松龄，窥测郭的意图。^②浦不是奉政府之命，而主要是作为白川义则个人代表而去的。在郭与浦的两小时会谈中，郭用自己所以举事的理由和目的试图说服浦，进而通过浦去说服白川。而郭的说服终于失败，这是注定了的。

郭首先列举了他所以采取行动的七个笼统理由。冯张之战最终可能导致世界战争；他担心日俄卷入；彻底反对武力统一政策；响应人民要求和平的感情；战争对各省经济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军队风纪败坏；以及总的“战略考虑”。^③他还要浦注意他十一月二十五日拍发给列强驻北京大使的电文：保证继续尊重已经签定的条约，保护战区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要求列强严守中立。浦澄江的回答是简短的，只限于三点。第一，郭既然声称拥护和平，为什么现在首先发动这次军事行动？特别是由于张作霖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刚刚签定的妥协条约，无论如何，已经对此作了限制；第二，据报告郭军攻占海阳镇和秦皇岛时曾进行焚掠，有鉴于此，一旦郭军前进到长城以北，郭军期望关东军作何反应？第三，由于郭与张氏父子过去像一家人一样，杨宇霆也已经离开奉天城了，而且张学良一听说这次举事，就来到了秦皇岛，不能努力作出一种和平解决吗？确实，杨宇霆一听到郭的要求，

① 江阳师第39旅第2营，外加一个工兵连和来自关东军的110名增援警察，佐佐木到一：《一个军人的自传》（日文），东京1967年版，第172页。

② 《一个军人的自传》，第172页。

③ 浦澄江对这些对话的看法载于关东军参谋部《郭松龄与浦参谋会谈要旨》中。会谈最先于11月27日在昌黎举行，其后，则于12月10日、11日在锦州举行。这些出自防卫厅战史室《机密大事日志》，1926年第6卷的完整文件，被稻叶正夫复制在《张郭战争资料》之中了。载《军事史学》，第4册第1篇第14期（1963年8月1日），第76—88页。

就逃到旅顺港去了，因为人们认为杨与郭之间的敌对，是郭不满的主要原因。这里，浦觉得建议杨永久退隐可能成为解决郭与二张之间争执的开端。然而，郭并未回答这个建议。他坚持说，他只是在张作霖下令向国民军进攻，破坏了天津协定之后，他才采取行动的。因此这与他拥护和平并无矛盾。他还争辩说，他本无意进攻奉天城，只不过是把部队“撤回”那里而已。但如果他们遭到攻击，他们将被迫迎战。

对这些重要问题的回答，浦澄江很不满意。他虽然承认天津协定是脆弱的。但是，他对郭说：“实际上是你打破了这层薄冰，这不也是不容置辩的事实吗？”对于郭说自己仅仅是“撤回”他的部队，并无攻击意图的话，浦澄江则认为那纯属虚伪。浦澄江警告说，一旦“南满”地区成为战场，“关东军定会采取适当措施”。他断定郭“完全缺乏诚意”。浦澄江回到旅顺上报给白川义则的意见如下：

- 1、郭松龄无疑决心除掉张作霖。
- 2、没有和平解决的希望。
- 3、郭将来很可能以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作为他的政纲。
- 4、郭周围大半是国民党政治家。
- 5、郭与冯玉祥确实有接触。
- 6、郭周围的那些人中，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之间目前还没有十分融洽。
- 7、即使在郭军的高层军官中，也有人对此次举事感到不快。
- 8、家眷在奉天省城的那些军官们，普遍有种忧虑不安之感。
- 9、在普通士兵中，也有人觉得此次举事是不道德的，结局也是个疑问。”

白川接受了这些否定的判断，并使之成为关东军后来的行动基础。从浦澄江的报告推断，郭所发动的运动很可能把东三省变成一块武装冲突的地区，并且郭还着手把苏联势力引进这个地

区。因此，关东军司令开始制定维护铁路附属地（并进而在必要的地方，如奉天省城和其他要地）和平的计划^①。同时，白川一定是因为东京还不知局势是如何严重，^②所以他派浦澄江去直接报告浦的看法。在去东京的路上，浦澄江在下关从新闻报导中得知，由于威胁到在那个地区的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日本声明“我军司令部”将不允许交战中的任何一方进入日本的势力范围。由于暗示当时现场的兵力难以执行此项已经决定的政策，就使浦澄江此行的真正目的一目了然了^③。

其他的声音迅敏地加入了这个要求采取更加强硬措施以保卫日本利益的合唱。张作霖的顾问松井七夫少将于11月30日致电外务次官说：“郭是一个纯粹的极端分子。如果他进入奉天城，他将立即声明废除所有条约，而日本所谓的特殊权利将化为乌有……。张或冯管辖东三省是否有区别的辩论就不再有实际意义了。”^④12月1日，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致电外务省：“为了维护我们在满洲的地位，并且打破使我们势力的发展处于停顿的目前局势，我确信如果我们现在援助陷入困境的张作霖，使他轻而易举地东山再起，对我们将并非无益。”^⑤由于这个建议当时没有受到注意，吉田对沿着这种方向发展的局势极为忧虑。12月5日，就在连山战役前夕，他建议日本应当对交战双方进行调停，这种调停的条件应当是此方奉军投降而张作霖无条件下野，彼方郭松龄则同意保护现存的日本利益。^⑥币原答复说，只有在应交战双方之请，并且

① 关东军参谋部：《大政十四年中国时局详报》，载《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第79页。

② 从东京对他早些时候的请示的答复判断。参见前文。

③ 《大阪每日新闻》，1925年12月2日。

④ 吉田致币原，1925年12月5日（下午二点二十分）；日本外务省档案161861，第176—178页。

⑤ 币原致吉田，1925年12月7日，转引自《对革命的反应：1924—1927年日本对华的态度和政策》（英文），第225页。

⑥ 《对革命的反应：1924—1927年日本对华的态度和政策》，第225页。

与不干涉政策相符的情况下，日本才能出任调停^①。这时，内山领事被派去与郭会谈。但是，由于铁路交通中断，他竟没有与郭联系上。^②这次努力失败之后，他没有再去尝试，其主要原因是那时张军的处境发生了变化，作战意志加强了，张当然对这样的调停不再感兴趣了。吉田的这个调停建议，必然被看作是一次铤而走险的最后努力，以便挽回局势，而在这种局势中，张作霖看来肯定要被击败。当时张作霖做好准备正要逃跑，而吉田对打倒郭松龄已经绝望，正急于至少对郭松龄施加某种影响，以便抵销他与冯以及通过冯与莫斯科的联系。

南满铁路公司也像吉田一样担心。该公司的社长和理事发出了相似的呼吁。十二月二日，社长安广伴一郎致电币原：

“恐怕郭松龄将军的反叛……在东三省能够成功，那么，按照他以及他的同类的口号——取消不平等条约——东三省就会失落并被排他的赤色运动所独占，就会发展成为一个没有满铁和关东厅的自主区。”

他请求日本政府进行有形的和无形的干预，尽力避免出现这种结局^③。满铁理事松冈洋右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由于这个地区对日本的重要性，而在原则上又不应当干涉东三省当局自主地行使权力，但是，“哪里有要推翻对我们有利者而换上一个对我们不利者的行动，我们都应该加以阻止”；过去十多年该地区秩序的维护，使欧美在整个中国只能在那这里轻易地投资，他认为，显然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的势力强大。但是，他继续说道：“一般地说，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张作霖政权凭借其亲自打下的根基或者凭借对这种根基的巧妙运用，维护了东三省的和平。而且，除了次要的或抽象的问题以外，众所周知，张作霖近些年来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我们的机构。”松冈着重强调了共产主义侵占东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161861，第46页。

② 《币原外交备忘录》（日文），第63页。

③ 日本外务省档案161861，第1卷，第267页。

三省的危险。他还特别提到在原敬内阁时期已经作出决定把张作霖作为这个地区的实际掌权者予以支持。他认为，如果现在改变这个政策，那将是在“背后捅他一刀。”^①

尽管松冈没有直接提到，但进一步考虑就是：如果张作霖被打败，日本商业利益将遭到的巨大财政损失，而南满铁路公司在东三省的经济利害当然比任何日本其他机构都大得多。得不到满铁财产的精确数字和欠它的（以地方货币单位奉票所表示的）债款总额，但这些数字一定都很大。有一种估计，说它们约有六千万元，但这基本上是不准确的^②。然而，那时确实广泛存在着一种忧虑，担心张作霖的垮台也就意味着奉票的废弃^③。奉票的价格常常是张的命运的气压表。12月5日战役失败之后，奉票出现了灾难性大跌，它与日本金票的兑换率，在这次叛乱之前，大约一百六十至一百七十元合日本金票一百元，而这次战役结束前夕，则跌到二百三十至二百四十元合一百元。^④郭的声明又进一步加剧了奉票的恐慌，他的声明说，进入奉天城后，在“重新整理”奉票之前，他将停止使用奉票的交易；采取这一措施，将意味着奉票不是严重贬值就是加以废弃，以利于使用一种全新的货币。^⑤

南满铁路公司不能容忍指向它自身利润的威胁。用纯粹的经济术语来说，实质上，这些利润比那些，比如说比张作霖的政

① 松冈致币原，外务省档案161861，第146—156页。这份文件没标日期，但从上下文和外务省文件的排列顺序看，大概是在1925年12月初前后。

② 《中国每周评论》（英文），1926年1月2日，第35卷，第5期，第121页，报导一个上海故事，讲到如果张作霖的纸币作废，满铁就得损失奉票6000万元。

③ 《奉天票与东三省的金融》（日文），第156页；《满铁调查时报》（日文），1926年1月，第29页。

④ 据朝鲜银行总裁1926年1月8日致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外务省档案16186，第2卷，第1159页。

⑤ 郭致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的信，1925年12月2日。引自《奉天票与东三省的金融》，第154页。为了平息由此声明所引起的恐惧，郭派其外交发言人殷汝耕到大连解释说，由于张作霖政权滥发无准备的纸币，发行一种新货币是必要的。但这种新纸币将以“现行的价格比率”收换奉票，并将商借外国贷款作为发行新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准备资金。同上，第155页。

府，意义更为重大；这一点，决不可忘记。1925年底，奉省税收总计只有大约三千四百万元，而南满铁路公司1925年仅铁路营运的利润收入就达五千八百六十万日元。①

1925年全年的平均兑换比价是一百六十八元奉票合一百元日本金票，这就等于说，奉省税收总额还不到满铁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以数字表示，奉票则三千四百万元比九千八百四十万元，日元则是两千万元比五千八百六十万元②。

因此，关东军、高级领事官员、满铁，附带还有关东厅③以及日本驻东北的各个机关④，都异口同声地强调日本阻止郭获胜的重要性，因而日本必须援助张作霖以免他被战败。在东京仔细研讨对郭造成的危机采取什么政策的过程中，这些意见，由于是来自现场官员的意见，受到了非同一般的重视，因而不得不对整个日本外交政策，特别是整个对华政策的紧迫性予以更大的注意。如前文所述，陆军大臣宇垣，在会见郭之后，这次反叛爆发之前，对郭表现了颇大的热情，他对张的统治方式也很厌恶。可是，在12月初，当他开始考虑这次危机如何影响了日本的利益时，他的个人感情就被抛到一边了。在他的日记中，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深思熟虑，值得摘引一段：“自去年秋天起，不

① 《满洲：关于其资源、工业、贸易、铁路和移民的调查统计报告》，载《太平洋问题》（英文），第408页。

② 参阅原书第282页注②兑换比价表。满铁利润总额（概数，单位百万日元）1923年为26.7，1924年为29，1925年为34。《太平洋问题》，第408页；佐田弘治郎：《奉天省的财政》（日文），第一卷，第21—22页，第454页；满铁调查资料，第74篇；《奉天票与东三省的金融》，第234页。

③ 12月8日，关东厅指示其东京办事处采取步骤，要求派遣军队来对付日益恶化的局势。外务省档案16186，第1卷，第301页。张作霖的顾问町野，还说到儿玉秀雄对鼓励杨宇霆（他一听说郭举事就逃到了旅顺）和张学良（他在请求会见郭以便讨论郭的要求被拒之后，也来到旅顺看望儿玉）返回奉天准备与郭作战，是起了部分作用的。见《会津志魂风云录》（日文）。

④ 《对革命的反应：1924—1927年日本对华的态度和政策》，第205页；《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第76、82页；吉田致币原，1925年12月6日，外务省档案161861，第337页。

只是我个人，就连大多数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感情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土匪式性格，他总是寻找机会来扩大其名望和财产，为了这样做，不择手段，甚至背信弃义，这使我在感情上对他怀有的某种恶感加深了。但现在我拿不准的仅仅是如果他遭到某种挫折，是否对日本有利。一般地说，特别是在外交方面，如果张作霖作为满洲的统治者被推翻，并代之以郭或冯，那并不会造成什么细微的差别。”

宇垣觉得无论如何，在“南满”确定的日本权益已经达到了张作霖的继任者也不能破坏的程度；日本的计划是将来伸进“北满”，这就必须保住张作霖不被推翻。他写道：“不管怎样，张作霖遍布北满的权势不是一朝一夕就获得的，而是多年努力的结果。无论谁取代他，即便进入了奉天城，要把其势力伸展到北满，必然要花至少几年的时间。可我们现在就要扩展到北满——凭借张作霖的权势，稳步地伸进。如果张作霖垮台了，我们将失去这种便利。再则，吉林和黑龙江的首领们，对新的奉天中心，自然地处于一种对抗的地位，进而变成竞争对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会象现在的冯玉祥一样，为了自身的生存而依靠赤俄，利用它也为它所利用。因此很显然，赤俄势力的渗透与冯玉祥第二、第三的出现，将阻止我们的发展。由此可见，张作霖的彻底毁灭和倒台，对我国的满蒙政策是不利的。我认为，张作霖的存在并掌握着北满权力（纵使应当对现在这种过大的权力加以缩减），对我们的满洲政策，尤其是对我们的北满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张作霖的援助，应当达到不顾总体损害，比如说不顾招致全中国愤恨的地步。在援张的措施中，除了会招致这种全面愤恨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简言之，我确信，为了【日本】帝国，花大力气维持张【政权】的生存，同时避免招致全面的损害，是明智的。”^①

① 《宇垣日记》，第46—47页。

因此，两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共产主义的威胁和日本努力实现对“满洲”北部的更强大的经济渗透；此时，关于这种渗透正与张作霖的行政机构进行着各种级别的交涉。由于上述两个理由，张作霖政权之存在，为日本所必需。但是，采取确保它继续存在的措施，则不得不小心谨慎，因为对张的积极和可见的援助反而会多少损害日本的整个对华政策。在同样的倾向中，宇垣在连山战役前夕的内阁会议上强调的要点是“积极地援助张将是非常危险的。”^①作为这种极端谨慎态度的反映，陆军省次官在连山战役之前发给关东军参谋长的指示大大低于请求。派遣援军的问题，除了作为以后一种可能的选择之外，拒绝加以考虑；建议采取步骤把郭松龄作为野心勃勃的攻击者加以抛弃；张作霖的顾问应当对张施加压力使他“忍耐而慎重，为了东三省人民的安宁和边界的长久安全而保存实力。”^②由于张作霖正面对着近乎无望的战斗，失败和垮台或许接踵而至，这样的指示颇具一种奇特的空想韵味。当人们了解到，就是这个设在东京的参谋本部，不久前决定“始终不顾环境如何”，保持这个地区的和平是“日本帝国的绝对需要”^③的时候，这种印象就更深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拒绝在这个阶段支持引人注目的干涉，外务大臣与此相配合，于十二月四日在内阁会议上强调，由于日本在北京以及在长江地区有巨大的利益，日本的政策决断必须审视整个中国的形势，在目前的争执中绝对中立是唯一可行的做法^④。

① 《币原外交备忘录》，第63页。

② 陆军省次官致关东军参谋长和中国驻屯军总司令，1925年11月30日；以及陆军省次官致关东军参谋长，1925年12月3日。转引自《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第80—81页。

③ 参谋本部：《鉴于目前中国局势我们的政策考虑》，1924年12月。转引自《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第79页。

④ 日本外务省档案161861，第132—141页；《币原外交备忘录》，第63页。内阁决定的这条方针，于第二天传达给了北京的芳泽和奉天的吉田，外务省档案161861，第161页。

可是，连山战役之后，局势立即变得更加紧迫。吉田自奉天拍电重申派遣军的要求，“因为奉军失败”了。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关东军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军队集结”，在奉天省城和南满铁路沿线其他要地集结了所有可用的兵力；还在距离铁路附属地外缘一公里的要道上布置了普通军队，并在距离四公里的地方进行巡逻。吉田还一再地为南满铁路应招募临时军队。①

12月7日，外务大臣、首相和陆军大臣在东京磋商，终于由东京授权采取了第一个积极行动②。第二天，内阁会议批准了这一措施：由关东军司令向张、郭发出警告，在他们双方可能作战的地区，必须尊重日本的权益。同时，强调严格的“不干涉内政”的日本政策。这份警告继续说道：“然而决不能忘记，满洲既有几十万从事和平事业的日本国民，又有巨额的日本投资。因此一旦战争或动乱的局势发展到铁路附属地以内或其附近地区，考虑到损害或严重威胁日本这些重大权益，日本军队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以履行其职责。我并不怀疑争战的双方军队将会对我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给予应有的注意，但是，我觉得有责任声明：上述这种紧急情况一旦出现，可能为情况所需，将不得不采取这种措施。”③

币原似乎已经考虑了这样一个警告——必须在那时维护日本的利益，并与他的“不干涉”路线始终分毫不差——不偏不倚地将这种警告递交给两军的司令。但军方显然没有完全同意这种警告，无论是在发出这个警告过程中，还是在贯彻这条已指明的路线的过程中，军方对中立精神都是不大注意的。12月7日，东京参谋本部向关东军司令部下达了绝密电令，要它做好从朝鲜得到援

① 外务省档案161861，《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第82—83页。

② 《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第83页。

③ 外务省档案161861，第200页。

军的准备，第二天，又下令久留米师做好派出军队的准备。而关东军司令则致电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重申他的意见：为实现日本的目标，必须显示武力，但现有的军队不够，因此，他需要援军。与此同时，他还增加了集结在奉天城的军队，并把指挥全“满洲”日军的师司令部移到这里^①。当郭松龄穿过奉天省南部地区继续进军的时候，关于日本这些加强防卫措施的报导使郭最为忧虑不安，怎样才能推翻以奉天省城为基地的张作霖，又能避免触发日本军队进行军事干涉所造成的动乱呢？

12月10日，浦中校到锦州向郭松龄递交了警告书。在与浦进行的几次会谈里，当郭试图搞清可能猛然发动的那种干涉的确实举动时，他找到了令人忧虑不安的充分根据^②。郭完全允诺保护日本利益并坚决否认与共产主义有任何关联，试图以此尽力说服浦，但浦不为所动。会谈的难题是郭试图要浦讲明“铁路附属地以内或其附近地区”所指的明确界线。郭质问道，在实施过程中，哪里许可作战哪里不许可，日本的防卫区从哪儿开始到哪儿为止？他还特别问到了张作霖军队当时扎营地新民附近巨流河的位置。但他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浦只是回答说，郭的军队对东三省的这个地点是熟悉的，人们应当知道，那个地区有日本的权益。郭坚持询问日本防卫周界的范围，并提醒白川注意条约条款所明确认可的这种权力。因此，会议的气氛显然变得很冷淡。

浦说：“我希望您知道，我们帝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对付你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的充分准备。”^③浦的这个声明使关东军的立场再清楚不过了。

① 《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第84页。

② 《张郭战争资料》，载有浦关于这些会谈的记录。

③ 《张郭战争资料》，据福尔克纳（其论文第229页）说，郭还被告知，关东军不赞成在奉天省城或其附近发生战斗，“那里离日本的守备区太近，不许在那里作战”。

张作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日本的警告，这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的。因为这个警告显而易见地给了他这位当权者以好处。而郭则不然，他显然不得不搅乱和平以便从张手中夺取政权。郭的难对付而又好发脾气的态度，使白川更加反对他了^①。郭的一支大约二千人的前卫队与其主力部队岔开，向南即向位于辽河入海口处的营口前进。12月12日，在营口的对岸扎了营。这时，白川进行干预，以防他们占领营口，这就对郭（在他与浦的争论里所提出）的质问，作了回答^②。驻守营口的张作霖部队，人数很少（大约三百五十人），实际上已经逃跑了，给郭军留下了个没有设防的空城^③，郭军的一些士兵已经过了河；这时，当地的日军指挥官奉白川之命，进入营口，禁阻郭军过河。这个禁令是在12月13日下午四点半钟递交给郭军代表的。此令有三个要点：郭军不准进入营口；撤退到距南满铁路线三十公里以外；不准过辽河^④。日本援军进驻营口以加强此令，而郭军则退出了。于是，郭的营口进军路线因日本的干涉而告吹。此时的形势正如帕特曼·韦尔所描述的那样：“这支造反军队因此受到了限制，只能沿着建在砌道上的一条中国铁路前进，而这条铁路在广阔的沙质的荒原上穿过。军队在那里找不到食物和躲避风雪的地方。并且知道，即便他们此举成功也是无用的，因为攻占目标奉天省城在日军的密集防线背后，被封锁了。”^⑤郭的两路进攻奉天的战略被迫放弃了。他的军队在沟帮子再次会合起来，准备向辽河大北边的新民作一

① 白川注意到张作霖乐不得地接受了这个警告，而郭则把这份文件扔到一边，显示了他对日本立场的鄙视。《对革命的反应：1924—1927年日本对华的态度和政策》，第229页。

② 《币原外交备忘录》，第63页；《关东军》，第45页；《奉天二十年史》，第662—663页。

③ 《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第84页。

④ 《奉天二十年史》，第662页；《币原外交备忘录》，第63页；《满铁调查月报》，1926年1月第7—10页。

⑤ 《消灭了的帝国》，第270页。

次冲击，张作霖正在那里修筑阵地。

这些措施是白川主动采取的。但他第二天所收到的宇垣指示，对此作了相当的修改。宇垣赞同这样一个总的原则：不仅搅乱铁路附属地和平的直接战争行为，就是对此有威胁的军事活动也应当加以禁止。但关于这个地带的范围，宇垣将白川所规定的三十公里（大约一天的行军路程）缩减为二十华里（约合十二公里^①大致炮弹的射程）仍从铁路的一侧算起^②。币原给在奉天的吉田的单独指示，特意指明郭军不准进入营口的禁令被撤消了。因为只要没有与该警告的条件相抵触的行动，一方军队出现或通过南满铁路防卫区，是可以容忍的^③。然而，当白川于12月15日向两军递交这个警告时，他不仅没有提到不再禁止越过辽河或进入营口这件事，反而从辽阳调派一个补充连以增援营口的防卫，借此给人以他最初的命令仍然有效的强烈印象，只是把圈人的距离作了修改^④。郭只能提出微弱的抗议，再次要求日本提出这些举动的条约根据^⑤。可见，在营口事件里，在下令阻止似乎已经势不可当的郭军进军的过程中，关东军的主动权和自主权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而日本在东北的其他行政分支机关，对关东军的行动则视而不见——吉田不公布币原对修改了的指示的解释，就是一个证明。

第二个较重大的干涉行动是在币原、宇垣和内阁意见大体一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币原外交备忘录》，第63页。

③ 《币原外交备忘录》，第63页。

④ 《币原外交备忘录》，第64页；《关东军》，第45页。在外务省这期间的文件中还有一份日人防卫系统的图表，清楚地标明，不仅铁路每侧12公里以内地带禁止军事行动，甚至禁止武装的军队进入铁路沿线14个主要城市（包括营口在内），及其周围12公里以内地区。这也表明白川的解释与宇垣的指示不符。外务省档案，16181，第368页。

⑤ 《张郭战争资料》，第88页，12月18日郭答复白川的全文，见外务省档案16181，第723页。

致的情况下决定的。那个决定就是于12月15日批准派遣援军以加强日本在该地区的防卫。所有在现场的军官、官员以及私人机关曾一再请求采取这一措施，已如前述。接近12月中旬，这种吁请的节奏加快了，其内容也逐渐更直接地集中在郭所代表赤色威胁上。驻北京使馆武官松井石根少将蓄意利用这种恐惧，在一次记者访问中说道：“显然，张将军的倒台可能意味着中国将迅速走向布尔什维克。”^①关东军参谋长同样把这个问题硬是放进12月12日的一份急电中了。讲到东三省，他写道：“总之，他（张）已经竭力防止他们走向共产主义，并依照日本的利益采取了措施。如果郭松龄取代他，如果黑龙江和吉林确实独立了，毫无疑问，赤俄的魔爪将直接伸进这个地区。特别是一想到在张作霖倒台后，张以及他手下的军官和军队将如何动作，令人一阵发抖。而且，大混乱给经济界所造成的损害也是难以估量的。”^②日本本土的公众叫嚷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来保卫日本利益也是作出12月15日决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背后因素^③。可以把这个决定看作以前那些措施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不可能期望对交战双方的警告会有多大效果，除非以一次武力炫耀作为后盾。没有这种援军，关东军参谋长争辩说：“（我们的）军队可能会被全部杀死。”^④这个论据虽然明显地荒唐可笑，却给避免冒犯日本的两军中的郭军这一方

① 《东京日日新闻》，1925年12月12日，转引自《对革命的反应：1924—1927年日本对华的态度和政策》，第228页。一份关于松井于12月12日在外务省的辩论的报告，见外务省档案16186，第1卷，第626页。

② 关东军参谋长致陆军省次官，1925年12月12日，外务省档案16186，第1卷，第655页。请派援军这一最后的要求是关东厅和关东军二者于12月15日早晨提出的，当天，内阁决议批准了这一请求，见《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第85页。

③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对革命的反应：1924—1927年日本对华的态度和政策》，特别是第231页及其以后诸页。

④ 转引自《对革命的反应：1924—1927年日本对华的态度和政策》，第223页。

加上了强而有力的推断，叫人也无话可说。币原抵制这样的决定，直到营口事件为止。由于这个事件，他逐渐认可了需要派遣援军的主张^①，12月15日上午内阁批准后，紧接着就派出了大约两千五百人的军队。其中，大部出自久留米师。最初，是大约三千五百人，预计于12月21日前后到达^②；但有一千人出自朝鲜部队。他们几乎能速即到达现场，因此，当主力援军到达时他们再出发。从常规上说，他们是替换部队，替补那些在11月中旬到期的士兵。币原最先做了这样的解释，而否认这些军队派遣等于对不干涉政策的背离。尽管如此，此举还是对张的明明白白的援助。此举的前后联系是重要的，它是紧随关东军在营口的引人注目的同伙行动以及名义上是针对双方、实际上只是针对一方而发出的收敛武力的警告之后迅速即作出的。

然而，尽管这个拯救张之事业的决定性措施是由东京授权采取的，军事当局仍然小心翼翼地两方下注，以便万无一失。参谋本部派遣国民党问题的专家佐佐木到一中校尽力去与郭松龄接触。佐佐木说，他之所以被派出，是考虑到郭将要攻取奉天城；在那种情况下，他在郭军中出现，对“由于郭军进入奉天城而提出的调节与日军的关系”一事，是必要的。显然，忧惧犹存。换言之，尽管所有挽救张的那些措施都已经采取了，但张之防卫还有可能崩溃。在那种情况下，在郭的军营中的佐佐木，将被证明

① 1926年1月，币原在日本第51届国会所作的外交政策讲演中强调说，考虑到营口事件以后派遣援军的需要，他的态度变化了，那时，情况“明朗化”了，可使用的军队是那样的少，以致它们“将难以履行其职责”（江口圭一文，第86页）。由于币原本人这种完善而合理的解释，福尔克纳缺乏根据的推断（其文第234—236页），说鉴于直到内阁决议的前一天，币原一贯反对派出这样的援军，那么，在这次内阁会议上，当作出这个决议时，他还在与宇垣进行争辩就未免多余了。宇垣在其日记第48—49页中，曾严肃地提到外务省直到这一天才不反对派遣援军。

② 币原致吉田，1925年12月15日（晚9时半），外务省档案161861，第434—437页。

是日本施加影响的一个有用的媒介。12月19日，佐佐木离开东京，22日到达奉天城。当他向关东军特务机关要活动客车以便去郭占区时，他被告知，对“企图支持叛乱的行为”，不予帮助。而在他绕远道去他的目的地的途中，战争结束了。他的故事充其量也不过暗示东京的参谋本部与关东军司令部之间缺乏高度的谐调一致而已^①。

五

在日本发出第一次警告前夕，张作霖陷于极度绝望之中，正为随时逃往日占区做准备；这次警告之后，他立即有了信心，并决心在辽河一战中孤注一掷。这次战役，两周以后才开始。但其地点，却在12月8日傍晚就选定了^②。虽然没有证据，但这个位置重要的地点的选择，可能出自张的日本顾问的建议。因为这个辽河战场，在新民附近的巨流河，到日本利益主要集中线南满铁路很方便，又使郭的阵地移得不能再远了，以便张能够下令破坏郭军前面的京奉路，使郭之进军大为缓慢，从而为张作霖赢得了组织和集中自己军队的宝贵时间。当预期郭缺乏补给、金钱和冬装的问题加剧之时，张却正准备在离奉天城只有三十英里的地方迎战，而他的军队吃、穿和供应都好，还发足了军饷。许多行动表明，日本正在强化其务使郭军失败的承诺：亲自发出警告；在浦中校与郭会谈后，关于日本对郭不满的报导；关东军部队的调

① 《一个军人自传》，第123—124页。

② 野村致松冈，1925年12月8日（下午10点半；他报告说，是王永江泄露给他的计划），外务省档案16186，第467页；关于张之信心的恢复，还可参阅镰田致松冈，1925年12月9日，同上，第465页，以及船津致外务次官，1925年12月15日。转引自池井优：《前驻奉天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在其留驻中国和满洲期间自现场发给外务省次官出渊的报告》，载《法学研究》，第36卷第7期（1963年7月），第82页。

动；在张军各种部队里，日本军官充当顾问，积极参战；甚至提供了由荒木五郎指挥的由十四名日本预备兵操纵的一支十五英吋重炮队^①。以营口干涉和第二次警告为顶点的所有这些举动，不仅恢复了张的信心，并使他部下的将军们开始调动他们的军队到指定的辽河阵地^②。日军集结奉天城和其他要冲，也使张作霖把这些地方的守军减少到了绝对的最低限度。

六

郭的东北国民军在一次短暂的战斗后，攻占了新民。于是，12月21日，这次战争的决死战役开始了。头两天，命运均衡交替，结局仍然是个疑问。23日早晨，当郭军第一次受猛烈而准确的炮火压制而使前进受阻的时候，其后面突然遭到黑龙江骑兵一支大部队的袭击。原来，这支骑兵已在夜间偷偷地包抄了郭军。^③有一种记载说，这支骑兵是由日本军官永中校率领，而那支吉林炮兵部队则由林弥少校指挥；前者在黑龙江给吴俊升、后者在吉

① 《全满居留民联合会议议长原口自奉天的报告》，1925年12月16日，外务省档案161681，第555—558页。荒木以“黄慕”将军这样的中国名字，入张军当顾问。吉田说这个部队是12月16日私下招募的，日本当局没有责任。吉田致长春总领事天羽，1926年1月16日，外务省档案16186，第2卷，第1092—1093页。但军事史家稻叶正夫说这支部队的供应是关东军司令白川将军安排的（《土肥原贤二秘录》，第168页）。

② 据关东军报告，吴俊升和张作相因此受了很强的影响，关东军参谋部1926年报告，转引自《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第86页。关于张作相，还可参阅长春领事栗原致外务大臣，1925年12月11日，外务省档案16186，第1卷，第579页，以及驻吉林领事川越，1925年12月12日，同上，第606页。

③ 关于这次战役一份详细报告，初刊于大连日文报纸《辽东新报》上，收载于《奉天二十年史》（日文），第765—770页；给国会准备的并标有1926年2月的一份外务省报告，收于（日文）外务省档案16186，第二卷，第1100—1102页。

林给张作霖相当“顾问”。^①这次惊人的骑兵突袭，致使郭军迅即溃败，郭军的许多高级军官投降了，有几个到日本驻新民领事馆寻求避难，只有一支小部队仍然保留着国民军的称号，逃跑了。后来与冯玉祥联结到一块了。^②郭本人，带着他的妻子，试图化名逃走，藏到离新民大约十二英里的苏家屯，一个农家菜窖的萝卜堆里，被地方部队司令部捕获并枪决了^③。在圣诞节那天，郭氏夫妇被暴尸于奉天城的市场上。李景林在天津附近拖住了国民军，防止了郭的同盟者国民军对郭的援助，李的抵抗坚持到12月24日，到这时，援助已经过迟了。李最后逃到山东，在那里，他与张宗昌建立了一个联合军司令部。到1926年初，张宗昌是在长城以内，由张作霖提名任命的唯一保有省级统治权的人。

- ^①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顾录续集》（日文），第2卷，第952页；《会津士魂风云录》，第169页。町野本人似乎也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他声称在这次危机中十一天没合眼，还说当抓到郭之后，他进行了有力的争辩，使他立即处死的意见得到了支持。其论据是尽管开初张作霖和杨宇霆两人都反对，最后还是同意了他的意见（同上，第166、170页）。
- ^② 即郭的参谋长魏益三所率的部队。魏是郭军中继续战斗的唯一的司令官。见《民国十四年度奉天派人关小史》（日文），第58页。
- ^③ 《满铁调查时报》，1926年1月，第32页；亦见外务省1926年2月报告，外务省档案16186，第2卷，第1102页。

法科六日记

蔡公椿

说明：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学生继5月4日集会游行并痛惩卖国贼以后，又从6月3日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得到全国民众广泛的响应，中国工人阶级也从此开始以政治罢工的形式登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舞台。

6月3、4两日，北京各校共出动了几千名学生上街宣传，清华学生也组织了以“救国十人团”为主要形式的宣传队，奔赴城内开展反帝爱国的讲演，宣传抵制日货、功用国货等活动。北洋政府于本月3、4两日内就逮捕、拘禁了一千多人，拘留所为之暴满；又把北京大学法科、理科的部分校舍也用来作拘人之用。清华同学3日进城一百余人，被拘捕四十至五十人；第二天进城人数增至一百六十余人，被拘近百人。第三天几乎倾校出动，并携带洗漱用具，准备“有去无回，斗争到底”。终于迫使反动当局先后于5日撤走看押学生之军警，8日释放了全部被拘学生。本日记主人蔡公椿，当时是清华1922级的学生，他于3日被拘，禁于北大法科，六天中详细记录了拘留期间的生活和斗争情况，真实、生动、感人，是现存这方面不多见的史料。该文原刊于《清华学报》5卷1期上，但该期印好后，因故未能发行，因而该文亦很少为人所知。现据仅存的残本，抄录并稍加整理刊出，以供参考。

黄延复

6月2日晚9时，代表团^①召集全体同学开大会于礼堂，

① 代表团，指“清华学生代表团”。五四运动以前，清华尚无学生会组织。五四运动第二天，高、中两科科长召集校中各会社领袖组织了代表清华学生的团体。即此。

报告并通过种种案件。其最可注意者为：“北京中等以上诸学校学生，准于翌日（6月3日）上午10时在京中各处继续讲演。”自5月19日罢课以来，演讲被禁，除义勇军^①操练与贩卖国货外，似无所事事。进城演讲之言一出，不觉精神大振。代表团以本校僻处西郊，交通不便，如进城演讲之消息一洩，恐西直门军警将以第二次“闭门羹”相待，于是义勇军军长下令特别戒严。校中各电话及各出口，均由义勇军军士轮流看守，余与刘君守卫本校大门。时当夜半，万籁俱寂，所噪于耳鼓者，惟门外小河流水声，与远处校警聚聚声相鸣和而已。换班后就寝，钟已三下矣。

6月3日 6时即兴。洗漱毕，即往食堂前，阅校中日刊（《周刊》号外）及《进城演讲员一览表》。是日演讲员出发者，凡十二队，每队八人、十人不等，俱全身制服。七时餐毕，各队均按时出发。余队共八人（周良相、刘崇乐、宗植心、鼓开煦、许继廉、汤佩松、赵恩翠及余），于7时20分骑驴循铁路赴西直门。8时半，余等自西直门步行赴骡马市大街（本队演讲地点）演讲，听者约五百人，多劳动者。八人依次演讲，将一周，即有二十余警察前来干涉。队中一面与之接谈，一面继续讲演。孰意彼等竟以武力驱逐听讲者。队中与之严重交涉，而余等遂被请入警察署。是时七、八学生，被十数巡警前拥后护，其煽动路人耳目可想而知。到署时，则黄君慈祥等八人已先在。当此烈日，汗流如沈，蒙署中惠以开水，甚感胜情。余等签名毕，或鹄立簷下，或斜坐阶上，或与警察接谈。约二十分钟，署长接见黄君全队。余等后到，故未入。时有一便衣村老往来躑躅，似留心余等之言语者，众怪之，周君良相问渠以署长姓名者，谢以“昨日入署尚不知”。众嗤之曰：“焉有署中警察不知署长姓名者。”谢以“店铺中人”。周君笑曰：“若莫非侦探欤？”谢以“署警朋友”。众哗然逐之。惟临去时尚敦敦以清华为问。黄君等八人在内约四十分钟，出述

① 义勇军，“五四”时期清华学生的群众组织之一。

署长言语大概：（一）署长朗诵总统禁止演讲命令、警备司令戒严命令；（二）京中民气已振，民心已起，勿劳学生诸君继续演讲；（三）如诸君必欲演讲者，则须于二十四小时以前递呈警察厅批准，并邀二家以上店铺作保。述毕，时已逾午，随出署入饭馆。余等七时早餐，骑驴数十里，步行数十里，演讲及被留数小时，至是已众腹雷鸣，故就餐时狼吞虎嚥，顷刻而尽，未暇顾及菜蔬之优劣也。一时半餐毕，复向骡马市进发。盖余等非达到目的不止也。孰意不数武，而又有四、五警察尾余等而行矣。远望骡马市一带，军警林立，行人拥挤，抵骡马市，稍一停顿，则路人纷纷向余等而趋，盖欲有所闻见也。军警大舞长枪，路人复纷纷背余等而遁，有趋趄未遽退者，则向以怒目，其不饱以枪柄者几希。余等乃离骡马市，登湖广桥，警察路人随焉。沿途军警无数，更有马队八九成群，巡行马路中。余等乃分全队为二，东西而趋，而尾余等之警察、路人，亦自分为二。余等既无地可以停留演讲，乃沿途大呼“中国人用中国货”等等，而途中军警亦呐喊以阻。至是余等复合为一，过湖广桥，将抵香厂，“中国雄立宇宙间”之声四起，迫视之，则皆吾清华同学也。彼时路人云集，军警棋布，交通隔绝，间不容发，诸同学乃分道而驰。余队行至新世界，仍继续演讲，刚发言，警察遽拥余等入署。在署休息将二十分钟，署员始声明派警察护送余等返校。余等谢以清华僻处西郊，道途靡迩，未敢劳警察先生大驾。出署复抵新世界，而演讲死灰犹未烬，即有二十余荷枪警察，一二佩刀警员，三四骑士，拥余等而去。余等问以将何往，俱答以“到彼自知”。乃由一警员在前领路，诸荷枪警察四旁拥护，另有三四骑殿后，路经第一舞台，遇潘文焕、林桂生二先生，先生等立即下车询问，余等仅以“被拘”二字告之。至前门，复遇同学多人。途中观者甚众，间有鼓掌者。余等则以脱帽礼答之。至大学法科（旧“译学馆”地址），四围军帐密布，大门由军警把守之。入门签名毕，即

行搜索，片纸寸铁不留。余心爱小刀一把（亡友徐君曰哲所赠）亦被搜去。检查毕，即由军警送余等入大礼堂。礼堂四周皆荷枪军警，堂内则皆赤手空拳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也。堂内掌声四起，表示欢迎，余等亦皆脱帽答之。入礼堂，即由陈君永杰全队八人，握手相问，余等远来，倦〔饥〕不择食，渴不择杯，未十分钟忽掌声复起，急视之，陈君念宗全队十人望礼堂而来也。余等急趋前握手，趣之坐，飨之开水，谈未数语，周君兹绪全队九人亦到，余等款之如前。此后掌声时起时歇。日将暮，欢声大起，则四五军人送一小学生来也。此君肄业山东中学，年方十五，单独演讲被拘，可佩可敬。众闻其来也，莫不以先覩荊州为快。初，警察厅迫被拘同学签姓名、籍贯、年岁、校名、亲属在京住址等等于簿上，以众否认，乃不签亲属住址。签名人数百七十六人，清华同学居三十四焉。各学校举有临时代表一二人。藉以维持秩序及交涉种种事项。清华临时代表为陈君念宗与周君良相。陈君主外，周君主内。旋由周君通电校中，嘱送铺盖食物。又经各代表严重交涉，警厅始以粗饭相待，人多饭少，佐以粗饼。就食时，大礼堂食堂一带，军警夹道，树枪而立，食堂四隅亦皆有军警踪迹。出发时警官领路，学生随之。二人成偶，秩序不紊。警厅设军帐于堂之左方，门口则由军警把守，坐立不下三十人。余等一出一人，必有一二军警跟随，噫，亦可笑矣！夜将半，各据堂内长椅就寝。时大雨新霁，寒风透入窗棂，快入〔如〕尖刀，单衣作战，静候被颳，而被颳卒不至。小同学皆不堪久待，早入甜睡乡矣。余体虽健，然以连日失眠，惧受风寒，乃与一二同学作长夜之谈。而不知东方之既白也。

6月4日 早七时，整理座位毕，多以冷水洗脸、漱口，此冷水乃经各代表与警官交涉而来者。然人多水少，于是“不要脸”之声浪四起。“不要脸”者，不洗脸之谓也。8时列队入食堂，途中布置一如昨日。早餐有大馒头与粥，馒头粗大，粥稀，佐以

黄豆咸菜。餐竟，复回礼堂。有时某君患病，警察乃着人护送回校。9、10时顷，礼堂四周军警顿少，颇为以怪。忽远闻人声嘈杂，皆以为第二次被拘学生也。试询之军警，俱以不知对。一时许，复列队入食堂，途中军警不若前次之多矣。路经诸教室，则人头攒动，皆北京学生也。而着黄色制服者，一望而知为清华同学也。途中未便交谈，惟脱帽示意而已。出食堂时，程君树仁、陈君继善从旁加入，片谈之际，悉校中代表团因昨日十二队进城，返校者仅八队，查点人数，即计三四十人被拘。随即通电全国，晚接京中来电，悉全体俱住法科，于是以汽车满载被氈食物，运至法科大门，军警不放入，因复退回。本早召集全体大会于体育馆，议决本日进城演讲员十二队，每队十人，全身除穿制服外，稍带糇粮衣服。如全军覆没，翌日（6月5日）另有百二十人继之。又本日之十二队已陆续被拘于法、理两科云云。是夜余与同学彭君、领得薄被一，乃合二长凳，作睡乡游矣。

6月5日 早餐毕，移椅搬凳，留一隙地，供户内游戏之用。初，各代表以百数十人溷集一礼堂，起居坐卧不得出雷池一步，对于卫生上殊多妨碍。经许多交涉，警厅始付学生以附近走动及户内游戏自由权。至是余等始大快。然以地方褊小，不足供大众游玩，乃于礼堂附近草创一棒球场，以手巾一方实布其中，外扎小绳略成球状，复寻枯干一根，诸器具粗备，乃组织甲、乙二队，角逐于棒球场上矣。时各代表有临时贩卖部与体育部之组织，饮食运动稍觉便利。午餐后，警厅竟付学生以自由行动全权，各处同学始可握手矣。余随与一二同学参观法科第二教室，居是室者皆清华同学也。乔君万选为领袖，黑板上写有维持秩序、注重清洁章程数则。3时许，有法人某君（大学教授）以中文演说，言语极有次序。忽大门外秩序大乱，人声掌声如怒马奔腾，如急雨澎湃，登楼一望，河之东路人、学生千百成群，河之西荷枪军警亦荷枪而待，俨然如临大敌。河上小桥为军警塞满，

盖连日学生被拘不下千人，未被拘学生痛痒相关，前来探视，军警未放入。人多语杂，遂起冲突。赤手空拳之学生颇受损伤。后由各校代表入视，并宣布在外学生决心，诸代表未尽去，全科军警忽然撤退。无何，门外军警亦全体拔营，各校代表随开紧急会议，决定政府不派员谢罪，学生不出法科一步。同时理科学生取一致行动。军警既撤，恐匪徒乘机捣乱，于是各代表议决，由各校同学担任守卫，陈君永杰被推为守卫总司令，设司令部，组织守卫队，清华同学居多数焉。守卫队各处梭巡，不分昼夜，大门口检查独严，守卫队亦较多，夜间往来以口号相问答。余于守卫一节，盖已数度刘郎矣。

6月6日 昨夜守卫未就寝，今日精神尚佳。军警既退，外人慰劳者络绎不绝。赵副校长及其夫人、李斋务长、及校医赵士北夫人，特远地前来慰问。赵校医携有药品多件，遂设临时医院于第二教室。各校学生就医者颇多，孟君继懋自校中来此，谈及日昨本校同学百二十人，各带糇粮、衣服、被氈，全身制服，搭十时半火车进城，抵西直门，城门已为军警塞满，全体不得入，交涉无效，乃分队向德胜门而去，复不得入，因折回。晚接京中电，知军警撤退。本早代表团派代表多人慰问，带有食物、铺盖、书籍、游艺品诸件。自是余等不患寂寞矣。晚，教育部派部员四人前来慰问、调查，并劝导，未得要领即去。自军警退后，各机关、各团体、及个人送来食物甚多，于是几忘却日来狂犴之苦矣。惟沐浴不便，汗气薰薰，令人难堪耳。

6月7日 连日学生会各代表上书总统，求见教育次长，并往来法、理两科，磋商出科手续，其结果即如被拘学生代表所议决，政府不派人谢罪，被拘学生决不出法、理科一步。迟至本日午后二时，教育部派秦、章二司长，国务院派国务参议曾彝进，前来法科大礼堂与大众道歉。代表发言时，各校学生按位而坐，不出一辞。代表出后，某君提议易主席，开全体大会，非法也。

于是高等师范全体退席，清华继之，会因散。晚，清华全体开会讨论，亦无甚着落。夜间，各代表议决，于翌日（6月8日）由各校同学欢迎各该校被拘同学回校，同时联合会代表极力赞成，满城风雨将告晴霁矣。

6月8日 早起忙甚，八时，大众在第二教室前空地齐集，理科被拘同学亦先期来此。各地同学乃按地列队，三呼“中华民国万岁”而出。清华代表八人，同被拘全体，列队独抵前门车站。到站时鼓乐冲天，国旗、校旗及欢迎被捕同学旗，触目皆是。义勇军约二百人，全身制服，植〔持〕枪分两行而立，另有同学数人，乘自行车往来维持秩序，至是全体合而为一，军乐队在前，被拘同学次之，义勇军又次之，其他诸同学殿后，折而向西直门车站。路经总统府，全体脱帽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北京学界万岁”、“清华学校万岁”！三呼毕，复整队而西，一时许抵西直门车站，略事午餐，五时许乘车直抵清华园。抵校门，则校中教职员、校役以及附近村民，皆候立欢迎矣。于是欢声齐起，炮火冲天。晚，全体会食于大礼堂前草地。夜八时开大会，附有电影、音乐、茶点，洵快事也。是为记。

（原载《清华学报》第5卷第1期，1919年12月。）

伪满洲国皇帝的直隶机构

郑谭毅 张晓光 丁晓华

编者按：伪满洲国是1932年3月1日由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组成的傀儡政权。本篇根据伪国务院总务厅下属之弘报处编辑出版的内部资料，将其中伪满皇帝直隶机构的作用、职权范围和《帝位继承法》，这部分鲜为人知的史料，整理刊出，对我们了解和研究东北沦陷时期的殖民地历史，颇有参考价值。

皇帝的直隶机关

一、宫内府

伪满洲国的“宫内府”就是旧时所谓的“皇宫”。由于伪满洲国在当时是日本帝国下的一个小小属庸，而在日本的东京已经有一座天皇所居住的皇宫，所以自然也就不能允许长春再出现一个皇宫。于是便沿用了日本“宫内省”的名称，把伪满的皇宫叫做“宫内府”。

宫内府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宫内府”，系职员办公的地方，另一部分则是溥仪个人居住的地方，称为“内廷”。

宫内府直属于皇帝，掌管国务以外的帝室事务。宫内府长官称宫内大臣，奉皇帝指令负责管理宫内府的一切事务，有关帝室命令的实施和其他主管事务。宫内府均可发布宫内府令和制定其他章程。宫内府大臣拥有制定、修改或撤消帝室命令的单独上奏权，但有国务院的重大事项必须与国务总理大臣共同协商。

宫内府下设总务处、内务处、近侍处、掌礼处、警卫处、侍卫处等。各处分别设有处长、秘书长、礼官、侍臣、理事官、属官、技正、技士、翻译官、药剂官。奏事官、事务官、侍卫官、警卫官、警卫士、乐士、消防士等人员，在宫内府大臣和各处处长的监督下，分别负责帝室事务。

总务处——分综理、文书二个科。主要负责：（一）诏书、勅书、帝室令等其他原本的收藏；（二）官印的管理及文书的收发保管；（三）职员的任免、赏罚；（四）巡幸；（五）进献；（六）慈善；（七）赐与赏赉；（八）主管他处以外的事务。

内务处——分需用、会计、营缮三个科。主要负责：（一）会计；（二）营缮；（三）财产管理；（四）物品的购买及保存；（五）马车的使用。

近侍处——设承应、典守二个科。其掌管事项：（一）坛庙及寝陵；（二）侧近；（三）医疗；（四）缮修。

掌礼处——设典礼、交际二个科。掌管事项有：（一）祭祀典礼；（二）谒见及餐宴；（三）接待外宾；（四）音乐。

侍卫处——主要负责：（一）近侧侍卫；（二）巡幸及典礼时侍卫官随行。

皇宫近卫处——设总务、警卫、保安三个科主要负责：（一）警卫；（二）警察、消防及卫生。

另外，宫内府还设有帝室会计审查局，负责帝室会计的审查事务。（一）帝室经费的豫算和决算；（二）土地建筑物的经营管理情况；（三）物品的出纳计算；（四）帝室财产的出纳计算和决算；（五）按法律规定所上交给帝室会计审查的文件。首任宫内大臣是沈瑞麟。

二、尚 书 府

是皇帝的辅助机关，收藏御玺、国玺以及诏书、勅书和其它

文书等的事务机关。尚书府大臣的职责是看守皇帝的“御玺”和盖印，所有皇帝的诏书、叙勋证书、任命状以及伪满政府所颁行的一切重要法令、章程、规则都需盖用皇帝御玺，由尚书府大臣监视用印。所盖之印，每月月终列表统计，奏报皇帝。

尚书府设有掌管事务的秘书长一人，秘书官二人，其中日系一人、满系一人、办事员二人、雇员一人、差役二人。尚书府大臣负责领导监督所属部职员，并有权对他们进行任免赏罚，交宫内府大臣处理。首任尚书府大臣是郭宗熙。

三、参议府

参议府是皇帝的最高咨询机关。由于立法院当时是一个虚设机构，所以一直由参议府代理立法院的工作，实质上是立法代行机构。它的职权范围有：国务院会议所议决的事项：（一）法律；（二）帝室令；（三）勅令；（四）预算以及预算外国库所负担的契约；（五）与各国交涉签署的条约和帝室名义发表的对外宣言；（六）有关其它的重要国务等。以上均应皇帝咨询，上奏意见。参议府下设秘书局，受议长之命管理常务。

参议府是由若干参议组成的合议机关。议长和副议长各一名，从参议中产生，由皇帝直接任命。议长在受理咨询事件时，需召开参议府会议，进行审议。参议府会议要按照会议规程进行。参议府的决议，根据表决的结果，由秘书长起草，议长审阅后上奏皇帝，并将其复印件送交国务总理大臣。参议府会议的议事，按议长的指令，除秘书局长发表外，一律不能外传。

如果有法律案和预算案出现异议时，皇帝可根据上奏的情况要求再次审议。假如仍未改变，皇帝可向参议府咨询进行裁决，有关重要国务参议府可向皇帝上奏意见书。皇帝要发紧急勅令时，需经参议府决定。

参议府在国政上所起的作用是重大的，它将随着立法院的成

立，其重要性将愈加体现出来。首任参议府议长是张景惠。

四、立 法 院

以立法为其主要职责的国家机关，即立法机关，其主要立法权归属皇帝。组织法第五条明确规定：“皇帝按立法院之翼赞行立法权。”立法院除翼赞权以外，还有两种权限：一是预算翼赞。二是凡法律案及预算案须经立法院翼赞。有关一般国务，立法院有建议权和请愿受理权。

立法院是按照皇帝的旨意，每年召集会议常会。规定会期一个月，立法院翼赞预算案时，在会计年度之前召开的，定期一个月。在必要的时候皇帝可召开临时会议。

立法院的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议员参加，方能召开。议决方法是以出席议员超过半数来决定议事。当赞成和反对的人数相同时，由议长决定。

立法院以公开为原则，根据国务院和立法院的决议，可召开秘书会、国务总理大臣和各部大臣出席的立法院会议，并有发言权，但不参加表决。立法院议员在院内的言论及其表决在院外不负责任。它与日本其它议会相同，用此种办法排除外界干扰，以期充分发挥立法的职能。

立法院的组织按法律另行制定。因法律尚未发布，所以立法院没有成立。设立法院秘书厅作为负责立法院的行政事务机关。由于这是一个暂时代理机构，所以，一旦制定有关立法院的组织法律，此机构乃随之变更。立法院秘书厅设秘书长，暂时掌管立法院成立之前的各种事宜。首任立法院院长是赵欣伯。因制定满洲国宪法，于1933年东渡日本进行调查研究。1934年辞职，立法院院长长期空位。

五、侍从武官处

是宫内府外的一个独立的近侧机关。由于侍从武官处是以保

护皇帝的人身安全为职责的，所以皇帝对这一机构的人选相当重视，以最亲信者充任。首任侍从武官长是张海鹏。

侍从武官长一般由陆军上将或中将任职。侍从武官长之下，设侍从武官五人。这五人的级别都较高，按规定拥有少将或中校以上军衔的陆军军官四名和校级以上海军军官一名。

侍从武官的职责是：（一）负责军事上奏和传达命令，陪同皇帝阅兵或观看军事演习。（二）皇帝举行典礼时，如“特派式”、“亲任式”、“建国节”、“万寿节”接见外国使节等，侍从武官要在皇帝的左右两侧站班。皇帝溥仪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到“建国神庙”去参拜，这时侍从武官也随行伺候。

（三）溥仪出访日本或到外地“巡幸”，侍从武官都要随行，日夜守保在皇帝左右。（四）每年年终，侍从武官都要代表皇帝，携带慰问品和慰问金，到日本侵略军驻地和伪满洲国军队，以及伪警察驻地进行慰问，向兵士宣读皇帝的“圣旨”。依照惯例，被遣武官必须按照行程计划，偕随行官一名。随行官一般由武官处内军需、文书等充任。

六、军事咨议院

由于伪满洲国军队的不断扩充，军事事宜不断增加，所以，1939年1月公布武官令的同时，设置了军事咨议院。该院是重要军务和解答皇帝咨询的机关。

军事咨议院由议长、咨议官、干事长以及干事组成。议长是由咨议官中德高望重、或除治安部大臣以外的上将或中将任职。

七、祭祀府

1940年7月15日设立。在日本天皇纪二千六百年之际，皇帝溥仪再度访日。回国后，为了表示对日本天皇的孝忠，在满洲国也要奉祀天孙天照大神，于是在伪帝宫院内修建了建国神庙，

设立了祭祀府。

祭祀府是直隶于皇帝的祭祀执行机关。主要负责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的祭祀，以及建筑物等的管理事务。

祭祀府分设总务、祭务二个处。总务处主要负责：（一）机密；（二）宝物的管理；（三）神庙事务的联络调整；（四）祭祀府职员的升降赏罚；（五）官印的保管；（六）文书的收发及编辑保管；（七）会计及用度；（八）建筑物及境内地的管理；（九）警卫；（十）资料的收集及刊物的发行；（十一）其他庶务。

祭祀处负责：（一）祭祀；（二）斋戒；（三）宿卫；（四）考证；（五）仪式及音乐。

祭祀府首任总裁是桥本虎之助。

八、帝室大典委员会

本委员会是由宫内府大臣、尚书府大臣，宫内府次长、参议府参议二名、各部大臣二名、最高法院院长和总务长官组成。宫内府大臣任委员长。

帝室大典委员会主要负责帝室大典的制定。委员会根据宫内府大臣的奏请，设干事长一名、干事六名，处理委员会的记录文书翻译以及一般庶务。

九、帝位继承法

满洲帝国的帝位按照1937年3月1日制定的帝位继承法规定：“（一）康德皇帝的男系子孙拥有永世继承权。（二）即帝位传于帝长子。（三）帝长子不在时，传于帝长孙。（四）帝长子和帝长孙均不在时，传于帝次子及其孙子，以此类推。（五）帝嫡出和庶出子孙皆不在时，由皇帝的兄弟及其子孙继承。（六）帝子孙和帝兄弟及子孙皆不在时，由帝伯、叔父及子孙继承。（七）

皇帝的男系亲属皆不在时，可由皇帝的最亲近者或其子孙继承皇位。（八）帝兄弟在相应条件范围内，要求嫡先庶后、长先幼后。

（九）当皇帝的精神或身体患有不治重疾、或发生重大事故时，向参议府咨询按上述各条的顺序进行传位。（十）继承皇位的顺序按总的实系进行。附则：本法依1937年3月1日公布之日开始实施。”

愤世吟咏

现世英雄向共和，	都城忽尔起干戈。
邦基未固愈摇动，	国体频更几度过。
独重强权公理昧，	偏趋势利小人多。
翻云覆雨安能久，	后日争端又如何。
一意孤行不畏他，	乘机变计恃乌合。
沉沉帝梦旬日醒，	滚滚宫迷八旗多。
纵火窝巢身已遁，	逃生使馆恥如何。
无谋有勇终失败，	六载威名付江河。
复辟同谋复同心，	深更聚议调援兵。
龙旗挂满燕都市，	虎将投诚旧日君。
暮楚朝秦为得意，	争先恐后谢天恩。
嗣闻炸弹声一轰，	变脸无情战张勋。

引自民国《时餘笔记》

梅贻琦日记选

黄延复 整理

说明：本篇摘发的是已故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日记。时间为1945年9月——1946年10月。

近代著名教育家梅先生的日记，是我国近代教育史的重要资料。本篇所记，不但反映了日本投降后我国面临的政治和教育形势，同时还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诸如“一二·一”革命学生运动，李公朴、闻一多的惨遭暗杀，以及西南联合大学结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分别复员北上时的许多人物动态。所记虽多属日事随记，但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从这些日记里，人们还可看到当年这位辛勤的教育家为治理和发展我国战时和战后高等教育所付出的心血。

这里顺便提一下梅先生日记的总情况。梅先生一生坚持记日记，除极特殊的情况外很少间断。经数十年的积累，其数量和内容相当可观。据现在所知，梅先生这些日记的下落大体上有三种情况：1948年末他离校以后所写的日记，分别被收藏于美国和台湾两地，似乎都还完整，读者日后当会有机会读到；关于他离校以前几十年的日记，当年南下时他并未带走片纸只字，所遗文物、书籍曾由家属分存于亲友家中。经多方搜集，到目前为止，只寻到日记四册，都是抗战期间（1941—1946）所记。本篇就是根据家属所藏的原本摘编的。在摘编过程中，除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外，还对某些日常生活琐事的记载做了少量的删节。日记是一个人生平、思想、道德和情趣的最真实、最可靠的写照，从全面研究出发，有时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只言片语，也会给人以重要的线索或启示。所以日后有机会出版梅先生的全部日记时，这些被删节的部分当然应该全部补入。

黄延复 1987年秋于北京清华园。

1945年

9月10日 上午11点赴巫家坝机场，待至12点半，始悉飞机迟到。返家午饭休息。1点再往，适接傅孟真^①航快信。赵、沈二君送余行。2点1刻起飞，同座为萨少铭，闻潘宜之自杀事颇惨。4点半降落九龙坡机场，天阴似已落雨者。搭萨车至两^口支路投住中央图书馆，与郑毅生^②同屋。晚饭与郑及邵心恒、李晓宇在爵禄饭店小酌，惜酒甚劣。饭后返寓，细雨淋漓，道途滑泞。因衣箱未取来，勉强就寝。

9月11日 仍阴雨。午前与毅生至中研院晤本栋^③、恩成^④及萨太太，留午饭。饭后至求精中学访经农^⑤未遇。至教部，适开筹备会议，被邀参加。晤朱、朱、杭三长及任、段、傅、臧诸君、赵司长太侔、贺师俊、黄品今、顾荫亭诸司长。在部中晚饭。饭后至重庆村21号，孟邻^⑥未在，与蒋太太及陈石珍谈至9点余返寓。

9月13日 午前恩成来谈清华设建筑系问题。中午与毅生访孟真略谈北平接收后两校合作等问题。午饭有傅太太、本栋、恩成在座，饭后晤王仲楫、吴化予二君（为中研院赴京、沪接收者），二君初不肯往，余亦加入劝驾。与毅生访沈兼士，渠似急欲去平者。在尹默^⑦处看写字，承赠书小条，至足纪念也。夕又至中研

① 即傅斯年，时为北大及联大历史系教授，10月起继蒋梦麟任联大常委会委员。

② 即郑天挺，北大及联大历史系教授，时任联大总务长。

③ 即萨本栋，清华物理系教授，时任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④ 即梁思成，建筑学家，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建筑系教授兼系主任。

⑤ 即朱经农，教育家，抗战前任湖南省教育厅长，曾为“长沙临大”筹备委员之一。抗战期间在重庆主持求精中学。

⑥ 即蒋梦麟，时为北京大学校长兼联大常委，但长期在重庆政府任职。1945年10月辞北大校长职，联大常委职亦随之解除。

⑦ 即沈尹默。

院，与本栋谈，听其对于中研院办法之主张，极以为是，盖亦即十年前余曾向丁在君^①建议大旨相合矣。至朱寓，主人皆未在，食汤面，又坐至9时归寓。

9月16日 今日更晴热。中午蒋太太约至家便饭，晤程沧波、沈肃文。2时半与郑赴联大校友会茶会，待颇久，到者约五、六十人，为报告联大近状及将来计划，并致鼎勉之意，而到会者似只注意个人学籍问题。4点余出，分段步行、乘洋车，5点余到求精。经农约往沙坪坝兼送文曼返附中。伯苓^②师又便血卧床二日矣。留晚饭，饭后与仲述^③至墨洞处饮咖啡闲谈，9点归。

9月17日 晴热有加。午前与毅生至附近“第一泉”洗澡，尚清静，搓背捏脚捶腿等全套，二人共费二千二百余元，其太贵乎！

下午三点余赴教育部筹备会议，晚饭后偕正之^④至寓稍谈。子坚^⑤新自昆明来，暂宿馆中。

9月18日 仍晴热。上午九点余经农来邀往戴家巷参加教会学校战后设计委员会，会在陈会督住宅。到者尚有Cuessey、Finn及Winfield共六人，计划中有将来教会大学应使非教徒学生对于教徒学生勿越过2:1比例一点，私意以为不甚妥当。中午周^⑥、朱^⑦、翁^⑧三部长宴司徒校长^⑨。晤廷黻^⑩、孟真、孟邻诸君。中午小睡后在寓看书未出门，晚饭令馆役买汤面，食后开暖偕某君

① 即丁文江。

② 即张伯苓，时为南开校长兼联大常委，但长在重庆政府任职。

③ 即张彭春，张伯苓之弟。清华1910届学生，曾任清华教务长。

④ 即吴有训。清华及联大物理系教授，曾兼清华理学院代院长和联大物理学院院长。1945年10月起任中央大学校长。

⑤ 即黄钰生。南开大学教授。时任联大师院院长。

⑥ 即周诒春。农林卫生部长。曾任清华学校校长。

⑦ 即朱家骅。教育部长。

⑧ 即翁文灏。经济部长。曾任清华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代理校长。

⑨ 即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

⑩ 即蒋廷黻。曾任清华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来，拟约往某家小饮，辞未往。

9月20日 上午9点，“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开会，朱部长外，有翁、戴、陈、李（石曾）演说及黄季陆代表会员答词，午饭后预备会议，余被推任副议长。晚王酌清请客，稍坐后至朱家小酌赏月。

9月21日 晴热。上下午开第一组审查会，上午余任主席，下午主席为经农，会后至朱处晚饭，藉舒一日间之劳顿也。

9月22日 晴甚热。上午审查会余又被推为主席，讨论中等学校复员案，与昨日讨论专科以上学校复员案同样，只通过原则，办法未讨论。下午开大会，朱部长主席。

9月23日 阴闷热。中午至李子坝中基会^①与该会董事午饭，任、蒋二位太太外，晤周^②、翁^③、蒋^④、蒋^⑤、傅^⑥、孙^⑦及叔永^⑧、伯遵^⑨。饭后回寓小睡。晚7点赴英使馆便饭、电影之约，英大使因事未在场，晤Roxby教授及其夫人，及新闻处之Smith先生。影片描述英人战时生活情况，无特佳处。10点半散归，天边闪电颇重。睡时有暴雨，一霹雳似甚近。

9月24日 晴仍甚热。上下午开大会，上午主席为议长，下午为余代。

9月25日 晴甚热。上、下午大会。

晚8点，蒋主席在军委大礼堂台宴，余被排座在主人之左，得与谈话。饭罢主席致词，大旨为：1、迁移应在明年课业结束之后；2、西北西南各校除少数外，宜留设原处；3、战后建设宜农工并重。周鲠生致答词，注重大学自由研究之重要，措词颇好。

9月26日 晴热。上午大会结束，下午四点闭幕式，议长致词外，有戴、翁演说。臧启芳代表致答词，无甚警语。晚7点，

① 即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② 周诒春。③翁文灏。④蒋梦麟。⑤蒋廷黻。⑥傅斯年。⑦孙洪芬或孙科。⑧任鸿隽；⑨林伯遵。

戴、宋、翁三院长在中央党部礼堂请客，去时主人竟皆未到，留十余分钟出。7点半赴中英科学合作馆Roxby饭约，晤Rankin小姐及Cates先生等，饭后闲话。10点与迪之^①为C以车送归。

9月27日 晴热。上午9点半偕经农至戴家巷开会。午后与Finn、Cressey、Winfield在冠生园便餐，饭后续开会。经农因事他往，有陈文渊会督加入。4点余散，乘公共汽车往求精，甚热甚倦。晚7点张文伯在青年团请客，饭颇好。饭后演战时影片，有日本投降（代表在芷江）等节目。10点余散时已有阵雨方停，仍淅沥未止。抵寓后雨势复大矣。

9月28日 阴湿闷热。中午卢冀忱（逮曾）与其夫人刘宗怡女士请客，座中有郑、陈、傅、及狄君武陶，酒尚不差。晚6点段书诒与何联奎在训练处，客中尚有周鲠生、王抚五、席半辞出，又与郑、陈至储汇大楼汪一鹤之约，酒肴皆颇好。

9月29日 阴小雨。上午客来仍多，中午在蒋宅便饭。饭后至朱宅，适杨志恩自昆明抵渝。下午雨止仍热。晚赴新村二号光旦^②昆仲之约，郑、陈外有叔玉^③及英国男女某某三人。饭后落大雨一阵。

9月30日 一夜连雨，午前始晴。天未明郑、陈赴机场，衣履尽湿。9点复归来，则竟未成行。子坚于11点始由沙坪坝来，否则将被遗失矣。10点余林伯遵来促过北岸小聚，乃与邀同寄梅^④、通夫^⑤过江，幸雨已止，泥涂仍甚难行，以滑竿至其香国寺寓所，晤吴任之先生，寄梅在圣约翰时之业师也。又晤文华之沈校长，饭时食鱼三种之多，皆林家自养者。4点余过江还，至朱宅晚饭。

① 即熊庆来，时为云南大学校长，曾任清华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及代理理学院院长。

② 即潘光旦，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兼教务长，时为联大代理教务长。

③ 即萧蘧。清华及联大经济系教授。

④ 即周诒春。

⑤ 即陈达。曾任联大社会系主任。1943年8月辞。

10月1日 雨湿。一日颇凉。郑、陈、黄清早赴机场。中午至组织部陈立夫、余井塘二部长之约，饭后回寓小睡未成。八弟原约于下午在金汤街晤聚，因天雨道滑卒未往。晚7点Drummmond以车来约与光旦及Wilma Fairbank^①至国民外交协会晚饭。原为会晤Horace Jayne (Vice Director of N.Y. Metropolitan museum)，彼因事未至。饭后又与D至美大使馆访之，饮酒闲谈至12点始散。D已有醉意。

10月8日 阴凉。上午十时至美大使馆访Fairbank太太，吊其新遭父丧，兼打听留美学生搭船赴美能否设法使早日成行。又在Robertson先生室谈半时许，中午在国民外交协会请何芸樵^②主席、朱经农、蒋廷黻、何孟吾，（翁、周末到）及光旦、任敢^③商谈在长沙办清华中学问题，依诸君所表示似宜再加考虑。西菜太多，为任敢所订，忘于事前询过矣。饭后至中研院访施汝为，并晤其夫人及令弟，晤守和^④稍谈。

10月6日 阴凉。上午赶将清华院系充实草案写出，11点半携赴部与部长商谈，彼未言可否，但谓将来须作全盘合理的调整。谈次彼一再谈及光旦，余允相机但告必可勿虑也。又与立武谈接收平中农工医三校事，彼意欲使清华接农校，而谓北大殊欲舍医而取农，尚须与孟真商量。在一小馆自食，竟费1400元。午后在朱处。

10月8日 中午至晓岚处小酌，其居正在丁家湾十号对门。下午4点40分登车起行。途中幸无意外耽搁。6点半到上清寺，与诸人别，回图馆。飞机票教部仅来通知未代购票，则明日不能行矣。

① 美籍学者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的太太。

② 即何键。

③ 即傅任敢，教育家。战前曾任清华校长室秘书。抗战期间一直在重庆主办“重庆清华中学”。

④ 即袁同礼，北京图书馆馆长。

10月9日 晴热。午前仍多客来，王抚五来稍坐。11点往中研院应杭立武之约会谈伦敦教育会议之关于组织方案问题，到者十余人，罗、程、李诸君皆在焉。另有Fairbank太太、Roxby、Blofeld、Hawkins、萨、傅、任、吴等。中午至中美文化协会与寄梅午饭，藉与新由沪来之叶良辅君稍谈。饭后至朱处未他往，待家具运来久不至。

10月10日 晴热。国庆日街市颇热闹，报上结婚者特多。午前将出门有电话来，谓主席约于官邸午饭。12点至孟真处约同前往。到后始知更无他客。饭前后谈及者为教育复员问题及共党问题。将二时辞出，至朱处，告飞机【票】已购得，明早返昆矣。

10月11日 晴。早5点到机场，7点1刻始起飞，7点55分降于泸州机场，停20分再飞，10点1刻到巫家坝。遇某君以其汽车送归寓。昆明天气虽晴明，然较重庆凉多矣。中午叶、沈约周明衡等便饭，午前晤冯柳漪、周枚荪，午后勉仲^①来，又之恭^②、正宣^③先后来。夕小睡，起时觉颇凉，着毛衣、驼绒夹袍犹不甚暖。晚指示工役糊窗，清理琐事。12点睡。

10月12日 晴。上午11点到校办公，过去一月联大方面系托周枚荪^④代理，渠初未允，后经常委会同人敦促始就者。下午三点医药服务委员会议决补助四十人，共一百七十万。此为末次会。夕至才盛巷访枚荪久谈，兼晤端升^⑤及其夫人。久病初愈尚甚弱也。

10月13日 晴。中午由校至云大合请物理学会诸君午饭。下午3点半联大校务会议，为报告重庆开会及接洽各事。夕庾晋候来访，晚饭后觉甚疲倦，但摩索许久，睡时仍为12点。

① 即查良钊。联大师院主任导师兼公民训练系教授和联大训导长。

② 即任之恭。联大物理系和电机系合聘教授。

③ 即毕正宣，联大事务组主任。

④ 即周炳琳。北大及联大经济系教授。

⑤ 即钱端升。政治学家，清华及联大政治系教授。

10月14日 晴。上午11时清华评议会，会后聚餐，共十一人。杨今甫^①昨日返昆，午前未至因开会未得见。下午小睡后赴庾约至新村三合居40号，后往东月楼食烧鸭，又接郁文^②及杉^③、芬^④同去，食时饮罗丝钉酒甚烈，又连饮过猛，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以后应力戒少饮。

10月15日 晴。上午在校见师院专修科代表十余人，为说明不能并归文理各系之原因。午饭由逵羽^⑤代约美军官 Maj. Gen. Heyanberges (10 A.F.)，Brig. Gen. King (C.C.C.)，Col. Whisenand (10 A.F.)，Col. Honard (A.S.C) 便饭，并约岱孙^⑥、弗斋^⑦作陪。夕访今甫谈一时许。

10月16日 晴。上午遣赵世昌持片往省府候李代主席（宗黄宇伯英），缘昨日拟往访，先以电话约，嗣得秘书处第四科函谓：“奉主席谕请台席于16日上午9时……”，遂决暂不往矣。晚黄琪翔夫妇约在王振宇家（复兴新村88号）饭聚，系为Gen. Aurand饯行者。中餐三桌，座间晤 Col. Law, Col. Hibbert 等，饭后跳舞至11点归。

10月17日 夕小雨。下午三点至南开办事处参加南开41周年茶会。查主席，余被邀讲话十余分。继有序经^⑧报告。食汤面后归。联大常委会决聘弗斋代总务长。晚饭时已落雨，甚冷。约今甫来餐叙，惜到颇迟，未得多饮，酒则甚好，绍志^⑨年前保留

① 即杨振声。历任青岛大学校长、长沙临大秘书主任、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等职。

② 即韩咏华。梅贻琦夫人。

③ 即梅祖杉。梅贻琦之第三女。

④ 即梅祖芬。梅贻琦之第四女。

⑤ 即樊际昌。联大师院教育系教授。时为“战地服务团”负责人之一。

⑥ 即陈岱孙。清华及联大经济系教授，兼任清华法学院院长、联大经济系主任及联大法商学院代理院长。

⑦ 即沈履。清华秘书长及联大代理总务长。

⑧ 即陈序经。联大初期任“联大”法商学院院长。1941年8月赴渝，由陈岱孙代。

⑨ 即金绍志。“联大”事务员，梅的朋友。

之佳酿也。

10月18日 阴冷夕晴。下午3点半清华教授会，到约六十人，为报告上月重庆开会要点及联大将来、本校复员各问题。占约一小时，以后无大讨论。……晚6点半省政府、省党部与省参议会在省府大礼堂请客，为欢送杜^①而欢迎关^②者。中餐六桌，非复当日之堂皇矣。8点余席终散归。

10月22日 阴冷。晚上10点孟真偕枚荪来访，系昨来昆者，谈约时许始别去。晚与郁文、权妹^③赴李希尧夫妇饭约，系为钱蒋太太，座中有黄子衡太太、缪太太、张邦珍校长、龚仲钧，皆昆明旧友也。余携去好绍酒数斤，客人似颇知欣赏。归时有小雨。

10月26日 阴雨终日。上午未至联大办公，在家写呈部关于米代金文稿。下午审核夏间联合招考用费帐据，为分析后算清两校应摊数目，至黄昏后始弄清。晚邱清泉夫妇饭约，与俊如^④夫妇同往。席三桌，多为第五军将校。席间为惩治盗匪问题，关雨东有枭首及暴尸之主张，余等力劝之。

10月27日 阴。下午4时约联大教授会各位茶叙，藉以欢迎傅孟真到校。傅有演词，述及迁移困难及可能之时间为春夏间。晚6时李主席为欢宴S.O.S.将校之约，与孟真同往。孟真席次为执事者列在下级，余以为不当，即向李指出，后孟又以字条向李抗议，李则一再道歉。客散时坚留谈话，乃与傅、熊又留半小时，李提出省府建设五年计划，谓将聘校中专家协同设计。约9点散归。

10月28日 晴。上午十时半清华服务社委员会讨论结束事项，会后聚餐，为谢诸君努力，饮酒约廿杯。散后大睡，至6点

① 即杜聿明。

② 即关麟征。杜关二人先后任昆明警备司令。

③ 即韩权华。梅夫人之妹，卫立煌夫人。

④ 即卫立煌。

始起。盖数日来恒二点始睡，藉以补足之也。晚赴章矛尘^①之约，同座为傅、杨、樊、钱、周、汤，皆北大同人。食螃蟹，为汉口带来者，馀菜亦颇精美。食后谈及时局及学校将来问题，颇兴奋，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10月31日 晴。下午在常委会之前约孟真来谈关于两校复员问题。7点前会散，赴段克昌（晓峰）饭约，因其请帖未书“夫人”，故余自往。

11月1日 下午阴，有小雨。早7点起，8点余以车往才盛巷接孟真往拓东体育场贺关雨东就警备总司令职。未待礼成先归。10点在东会堂举行“联大八周年纪念会”，余与孟真致词，11点半散，步归甚感疲倦。饭后睡一时许，3点3刻与郁文往图书馆招待来宾及校友茶会，共到约三四百人，茶点后余致欢迎词，然后请李代主席（伯英）讲话，5点半散。在家晚饭，不欲更出门矣。（校中学生有营火、聚餐，未往）

11月4日 阴，下午有雨。午前干洗旧衣数件，午饭后Dr. F. L. Wattendorf偕美国政府科学考察团7人(prof. Fritz Zwicky, W. H. Pickering, Col. D. R. Lovelace等)，早间始由印来昆，今夜即起行赴沪转日本者。来谈颇久，复邀庄前鼎、赵忠尧陪至校内参观；晚约诸君在冠生园便饭，菜颇好，诸客均甚满意。惟客人坚欲付饭帐，其盛情可感，但究非主人所能接受耳。归后雨势又复加大，丝棉袍已上身，犹不觉太暖也。

11月5日 阴雨，下午停。上午未往联大，来客颇多。下午

① 即章廷谦，时任“联大”常委会秘书。

② 通译华敦德。曾任清华大学航空讲座教授。美籍航空实验专家。

在寓批阅公事。晚 6 点余应一多、家驷^①昆仲及叔伟^②、辰伯^③饭约于昆南宿舍潘家，他客只孟真、今甫，……饭后谈政局及校局问题颇久，至 12 点始散。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子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谷新旧，今日之所谓名左，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11月26日 夜 2 点半起，3 点半偕陈^④、施^⑤、毕^⑥出发，本栋夫妇起来送行，自卫处借得吉普车，司机为梅副官（黄梅人），途中云阴无雨。经歌乐山、蓝家桥，至 5 点一刻始达白市驿机场。中航公司无人照应，亦无候机处所，待至 6 点天明，渐落雨，将 8 点始得登机（C46），共上 42 人，分坐行李上，又待甚久，9 点一刻始起飞。11 点三刻到汉口机场加油，因太晚，决明早飞平，在一旅馆觅屋两间，食汤面一碗，然后出至街上江边散步，略看炸后情状。夕落雨一阵。晚在春生饭店晚饭，食鱼虾，不甚新鲜。饭后因街上无灯，即回旅馆。11 点半各上床，未久即入睡矣。

11月27日 晴。早 5 点起，9 点乘洋车至中航公司，6 点半乘卡车至机场，8 点一刻起飞，天气晴朗，甚平稳。12 点，在颐和园南之新机场降落。重到北平快慰可知。在机场又待一时许，公司始有人来。大家取行李分乘木炭卡车三辆进城，在骑河楼遇福田^⑦，引往中央饭店（现为 WASC 招待所），得房二间，分住

① 即闻一多和闻家驷。

② 即曾昭抡。时为联大化学系教授。

③ 即吴晗。时为联大历史系教授。

④ 即陈岱孙。

⑤ 施嘉炀。

⑥ 毕正宣。以上三人随梅校长先期北上赴平视察校园并做清华复员准备工作。后组成以陈岱孙为首的“校产保管委员会”。

⑦ 即陈福田。曾长期担任清华外文系主任。

焉。稍息进咖啡点心后，出访张子高，适于中途遇见。又至前毛家湾晤陈雪屏等稍谈，随至全聚德食烧鸭，福田携好Whisky一瓶，不觉瓶之罄矣。叔存^①亦在座，其精神颇好，甚慰。8点余返寓，与诸人略谈接收情形。10点余睡。

11月28日 雪。7点余起床。窗外一片银白，可喜可爱。早点后9点出城至清华园，下车在工字厅稍坐。日152兵站病院院长公冈率其他院长二人来见，表示暂容留住之意。随至各处查看一过，房舍外观仍旧，内部损毁甚重，至器物书仪之损失则一时尚难详查也。12点余返城内在东兴楼（帅府园）约郑、陈、张、邓、陈、陈、施、毕诸君便饭，藉谈。下午4时余往韩宅晤诵裳夫人及李、傅二夫妇。晚福田在东来顺约食涮羊肉，座有张伯谨、孙锡三、孙瑞芹、关、孟、凌、杨、萨、俞、陈、施、毕诸君。饭后至关家闲谈，10点返寓。

11月29日 晴。上午与福田、岱孙拜访熊、张两市长未遇，行营李主任未在，见王参谋长，为萧一山秘书长留片；11战区司令部见吕文珍参谋长、蒯女士；教育局与英千里局长谈一刻许。午饭在翠花楼便食颇好。饭后至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东昌胡同）访沈兼士，谈半小时。

12月1日 晴。上午六弟与宝仁、锡纯来看，范濂卿来。……午饭王裕泽君（明之令弟）约在东兴楼晤徐惠甫、李（邮局长）等。下午4点清华同学会欢迎会。

12月4日 晴。午饭郑、陈饭约在毛家湾5号，即蒋家。先于上午往北大理学院及祖家街工学院参观。饭后参观医学院。晚饭孙锡三（晋方）约，酒肴皆佳。饭后张伯谨至寓谈青年团职员舞弊事。

12月5日 晴。午饭至烂漫胡同六弟处小聚，锡纯、宝仁夫

① 即邓以蛰。清华哲学系教授。

妇、祖慧夫妇皆在。下午访雪屏久谈。4点在翠明庄约陈、陈、张、邓、施、毕开第一次保管委员会议。

12月6日 晴。午前访沈兼士托复部电：“待机即返”。访袁守和。……晚饭何其巩、傅佩青约在同和居，到客不多，晤侯司令、唐嗣尧、萧一山，饭后萧约在其家谈时许，下午又接部电促归。

12月7日 晴冷。……下午4点余兼士、雪屏、毅生同时来谈补习班教员问题甚久。晚饭至韩宅为韩、李、傅、邝四家之约，客则守和与余，饭后谈甚久始散。

12月8日 晴。午前子高来谈。至新开路冯诊所为关太太送款。午饭行营李主任之约，座中有许孝炎、潘公璧、萧、王、王捷三处长，董少良、王光圻。席半辞出与萧、许又至故宫博物院应袁守和、张廷济之约，座中有吕、张伯谨、Maj Meslin (?)、何海秋。下午至东皇城根9号访王叔铭，久待始得见，允为定机赴渝。又访严季约于第五补给区部，因赴津未遇。晚沈兼士饭约在撷英，菜不甚佳。托沈再电告部，10日返渝。

12月11日 晴。早六点起，10点起行赴南苑机场，陈、陈、毕送余行，7点半到机场，手续颇简便，无需购票，行李卅余公斤未加限制，喜过望矣。8点半起飞，(C47)同机有黄宇人等三人，货箱八九个，盖载重不及其常量五分之一也。机师为夏荣庆(Philip Hsia)甚和气。1点半(渝时)降九龙坡，承航会职员派车送至上清寺，即仍住中研院宿舍。……【饭后】与济之^①、本栋、辑斋^②谈。未久，正之亦来谈，五点至教部托订赴昆飞机，与骝先部长谈半时许，晤任东伯，即将返筑奔其父丧者。返中研院晤思成夫妇，徽因甚瘦弱，但精神犹甚足。7点与正之、本栋、辑斋、济之、思成赴朱部长饭约，骝公似甚紧

① 即李济。曾任清华国学院讲师，时为中央研究院考古所主任。

② 即许维遹。联大中文系副教授。

张，余告倘本周末不能安全复课，则与其经政府解散，毋宁自请停办耳。9点归后又谈甚久，始睡。

12月12日 晴。早7点余起，……11点返中研院。至教部取飞机票，再与部长晤谈。后至卫公馆午饭，张溥泉夫妇及二女卢佐夫妇皆在座。饭后2点半至机场，周司长鸿经来送行。5点公司人通知登一货机，盖本日下午将无客机赴昆，故将余特送入货机，为得早到昆耳。承机师招待在机室加座，得不感孤苦亦不觉冷。8点到昆，搭公司车至才盛巷，晤孟真、今甫、枚荪、廉澄，以汤面一碗作晚餐，且食且谈，乃详知半月以来之经过。12点后始返寓，家人惊起开门，略话北平情形，1点半睡。

12月13日 晴。（前二日曾落雨。昨晚始晴）早7点起，8点以后约端升、企孙^①来谈。芝生^②、茀斋、鸣岐^③先后来。10点至才盛巷与孟真、经农晤谈。经农方自卢主席处归，述及重庆密电告卢，有15以后如不复课即准备举动之语。……饭后至商务酒店访霍揆彰总司令。又在李文初令兄室稍坐。下午4点与查、沈至云大医院慰问受伤未痊之学生四人。至叔玉家稍坐。拜访卢主席于其青莲街公馆，谈半时许，承以车送至张西林处，张所约朱次长外皆为联大同人，似有为李宗黄说项之意。饭后9点余出，与潘、冯、查访缪云台，知其明日将赴渝者，谈至11点归寓。

12月14日 晴。上午9点约常委会诸君谈话，商定布告17日复课，并于明日召学生会各代表训话。中午在才盛巷与孟真宴朱、霍及龚、王、萧、熊等共两桌。下午5点约一多来谈一时许。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晚饭邱清泉军长之约，座中有卢、霍、李、仇文亚、熊、史、朱秘书长等（经农后到，孟真先去）。

① 即叶企孙。清华物理系教授兼理学院院长。

② 即冯友兰。清华及联大哲学教授兼清华文学院院长。

③ 即赵凤喈。清华及联大政治系教授。

邱意似为罢课问题谈商，但座中很少谈及，因实不便多谈也。9点余散，未得他往。12时睡。

12月15日 晴。上午9点与常委会全体召集学生代表在办事处谈话，先由余说明学校规定17日上课之原由，及届时不上课之后果之严重；继由孟真、芝生、光旦、序经、枚荪发言，大旨皆于劝告之外指出此举关系学校前途之重大。11点余等先出，令诸生自行慎重考虑。中午与傅、查、冯、潘至机场送朱次长返渝，2点始起飞。后至厚德福午饭，饭后至才盛巷今甫处饮茶闲话。夕归寓未再出门。

12月16日 晴。上午10点学生代表八人来送一书面答复，谓昨晚代表大会议决“在条件未圆满解决前不能复课”，接受该函后未与多谈。至新校巡视情形甚乱，至图馆向死者四人^①祭后即出。中午约常委会诸君餐叙。下午未出门，约端升、奚若来谈。晚饭约同人十余人餐叙，饭后4点光旦偕一多来，一多告学生方面可有转机，甚喜，即走书告孟真。

12月17日 阴雨。上午10点孟真来，同往新校舍察看，竟无上课者。中午常委会聚餐，下午三点约教授会诸君茶话，报告最近数日经过及本人（与傅）感觉无望，不能不退避贤路之意。4点余先退出，诸君随改开教授会，议决请缓辞，并于明日上午由各系主任联合召集学生代表劝告，并听取意见。下午分系由各教授向本系学生劝告，如无效将总辞职。晚饭与傅、周在家便食，时已9点，会方散也。

12月18日 阴无雨。上午未出门。中午赴霍总司令在第一招待所饭约，卢主席在座。下午小睡、弄花，颇觉清闲矣。夕各系诸君有来报告谈话情形者，似无大把握。晚饭后至联华招待所访仇文亚未遇。至才盛巷。周鸿经又自渝来，与傅、扬、周、姚、

^① 即在“一二·一”运动中牺牲之四烈士：于再（南菁中学教员）、张华昌（原名荀极中，昆华工校学生）、李鲁连、潘琰（女，后二人皆为联大师院学生）。

毛、郑诸君谈将来处理办法甚久。11点归。

12月19日 晴。下午2点召常委会与各系主任会谈昨日劝告结果。3点余教授会，系闻据廿余人提议召集者，余与傅仍被请出席，并请余仍任主席。先考虑提议之事由，为昨晚学生代表开会提出条件请予考虑，但因无正式报告，至究如何说法亦难断定，会中遂未予考虑。讨论甚久后，决即以书面劝告诸生，并推代表（冯、周、赵）访卢、霍，请对于取消禁止自由开会之前令。在寓晚饭后文告拟就，即付印贴出。随访卢，允即作声明，访霍未遇。

12月20日 晴。上午未出门，闻今早上课情形颇不整齐，但未有阻挠情事。下午3时再开教授会，先由上课各教授报告各班情形，适学生自治会来呈函，附修改条件，会中因函中说法不妥，且条件经修改之后更多枝节，请余召学生代表面告之，并嘱其务遵教授会劝告，早日复课；再对于自愿上课之同学不得拦阻或压制。晚6点半赴卢主席饭约，晤第二军军长凌云。归寓后9点半，查、潘、沈偕学生理事王瑞源、王世堂来，将教授会意思面告后再加规劝，如自治会不能负责，应自承认，否则倘有事故发生，该代表理事等则不能辞其咎。二生答辞仍甚闪烁。明日情恐仍不可乐观也。

12月21日 晴。上午8点至新校，继侗、枚荪诸君特来巡视各班上课秩序，似不如昨日之安静。学生张贴颇乱，有涉及师长个人者，傅、查等为撕去。孟真午饭后去，定明日召集教授会，发表向学生会代表（二王）谈话内容及附件，以免误传。

12月22日 晴。上午有数教授来报告，上课情形仍未大好转。下午3点教授会，学生会又有函，报告“罢联会”对于复课条件再加修改，其意似欲得早日结束者。闻未到会，派寿民^①暂

① 即刘崇𬭎。清华及联大历史系教授，曾兼二校历史系主任。

代。孟真颇示焦躁，盖已决于明日返渝，校事不欲过问矣。会散后留周、冯、赵晚饭，草“谈话”之二。饭后又随周、赵访傅，劝其稍缓返渝，未得谅解。以后只好仍自支撑耳。

12月23日 晴。上午10点余至才盛巷稍坐，送孟真至机场，待到一点始知改明日飞渝，与傅、杨、周、赵、汤、查至厚德福食涮羊肉。下午小睡，起后光旦来告，教授会声明文告登报未洽妥。赶赴才盛巷与周、杨商量后急函卢请设法登出。晚饭在payne家，同座有龙荪^①、奚若、Spouse、Winter^②谈颇久。十点半归，得卢信谓宜先有上课声明始好登其他文件。与熊、朱打电话，学生已拟有启事，可同时登出，但朱谓天晚恐不及办矣。

12月24日 晴。上课情形大致仍如前二天，午前杨、冯、戴、许等来商定将教授会改于26日召集。随与芝生至工院，适教授廿余人已有辞职意，当即劝慰稍耐至后天再看。晤魏菊峰（毓贤），新自美归国者。下午4点约新闻界十余人茶叙，略及登报事，诸人表示为难，即广告亦似不欲照登。晚饭为熊迪之约，座中有卢、霍、王子政、仇文亚；饭后9点为朱景瑄约至省府与新闻界诸君再商谈，初仍表示困难，最后由钱沧硕提议以谈话方式发表，允与同人考虑。11点归。周枚荪下午有辞职信颇坚决，急作复恳留。三点始睡。

12月25日 阴甚冷，天明时有雪，9点半已尽融化矣。10点余约冯、冯、汤、朱、潘、查、沈、赵（杨、周、赵因送信迟到未来）共商“谈话”文稿，于下午油印送去。午饭留魏菊峰、施太太等共饮，亦以小庆佳节耳。下午小睡后接枚荪信，谓暂可不辞矣。夕至才盛巷闲坐，留晚饭。9点余偕汤^③、贺^④归，二君亦往劝枚荪者。李宗黄昨赴渝。

① 即金岳霖。清华大学哲学系及“联大”哲学心理学系教授。

② 通译温德。清华及联大外文系教授。

③ 即汤用彤。北大及联大哲学系教授兼联大哲学心理学系主任。

④ 即贺麟。北大及联大哲学系教授。

12月26日 晴。早见报《谈话》悉照原文登出，“罢联会”亦有即日复课之启事。校中学生已大部上课，工院全体上课，师院专修科则未全上课。下午3时教授会大家似认满意，但对数日来自行上课为学生会剥夺权利者请当局警告立予纠正，并劝告学生之间相互容忍。

12月27日 晴。上午全体学生上课矣。昨与朱部长及傅孟真各一信。上午王炳南、陈久征来。

12月28日 晴。上午复卢、霍询学生上课情形信。下午5时余访端升久谈，留晚饭，11点始归。端升亦认【为】一多17日在会中之言词已有使校中当局不能忽视者，惟屡言“正之主张”，乃告吾殊不觉其有何主张。不过正之爱清华之切，言语间或不无过甚之词耳。在钱处饮咖啡二杯，似太浓，上床久不成寐，或以此乎。

12月31日 晴。上午仍未到联大，审阅关于校产损失报部文卷。下午联大常委会。晚饭食炮牛肉，加邀今甫、寿民、仲明、沈同、福堂，聊作除夕小聚。9点余散去。

1946年

1月1日 晴和。上午有多客来拜年。下午3点在办事处约联大及三校教职员及眷属举行新年茶叙，到者老幼约二百人，因天气晴和均在院中茶话。将5点，日色西沉渐渐散去。有十余位至寓中飨以好酒，聊以点缀年景耳。晚6点至吴泽霖处晚饭，客为樊、鲍、华、沈、戴之外复代约今甫同往。饭后分批赴广播电台听京戏，大部为票扮演，《二进宫》颇好，《小放牛》无甚精彩，《群英会》之周瑜火气太重，孔明又嫌太呆板，鲁肃尚好，蒋干则太似小丑矣。又加《华容道》一段，然无甚可取。12点半至蔡文侯家稍坐始归寓。

1月2日 晴。中午至战地服务团樊、吴饭约，再晤霍嵩山总司令。下午3点中英文化协会在工业协会开会，请Joseph Needham博士^①讲“原子能”，尼君春闻将回国矣。晚陈荫生饭约，五年旧居，经主人大加改造，几不复认识矣。座中龚仲钧外皆校中同事，主人酒量颇好。饭后龚话多矣。

1月3日 阴冷。下午3点清华教授会，为大家报告北平情形及清华园接收经过及现状，历时一点一刻，后又茶话，至五点散。晚约李润章夫人、张奚若夫人、刘淑清夫人、杨石先夫人、徐行敏夫人、戴士明夫妇、马佩伦、马启勋便饭，菜系自做尚好，仍嫌稍多耳。

1月4日 晴。晚饭后至今甫处闲话，商定于7日往凤鸣村小住。

1月10日 半阴。早8点余起，早点后照相数张，10点后与诸人握手登车归去，王厂长等另乘一卡车随后，恐吾等车又出毛病也。12点一刻到桃源村，为从文^②夫妇留午饭，饭后邀沈太太同车进城至【昆中】北院看房子。3点余到家，沈太太等稍坐别去。小睡。晚约周之再处长（军政部管理处）、黄处长（军部第七会计分处）及樊、吴、查、沈等便饭，为译训班借拨物品事也。饭后与嘉炀、福田等谈平校问题颇久，福田将于明年再去北平。

1月11日 晴。中午周子竞^③为蔡子民先生生忌约午饭，同座为熊、叶、殷、陈席山^④，均科学家也。下午三点访卢主席于省政府。晚约王源璋及五三厂二位及路春舫、卢焕文、杨、章在厚德福便饭。

① 通译李约瑟。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

② 即沈从文。时为“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教授。

③ 即周仁。著名机械工程学家，清华1910届学生。

④ 即陈桢，清华及“联大”生物系教授。

1月12日 晴。中午黃宪儒、陈复光、吴少默、张天放（木棉公司）请客，晤甘介侯、叶、金、李、刘等。联大于今日期考完毕，自复课以后迄未到校办公，因学生举动仍多“自由”，管制既多不生效，则不欲目睹，恐或不能默视也。

1月13日 晴冷。上午华罗庚来谈军政部派赴美国研究事。晚饭约竟有四起：先至赵世昌家应赵全之约；稍坐再至马约翰家牟作云夫妇之约，入座半时许别出，但饮酒已三玻杯矣；周先庚在榕园之约未去；最后至工院施家，座中有今甫、逵羽、泽霖及仉女士，然已不能多饮矣。饭后闲谈颇久，10点余归。

1月14日 晴。联大放寒假三天。午前朱丽东秘书长来，催询安葬事。

1月16日 阴。中午今甫约在厚德福，晤Farbark太太、张太太、龙荪、端升、光旦夫妇。（奚若因病未到）晚赴刘淑清太太饭约于大厂村，客皆熟人。饭后听张太太讲论吴雨僧^①，今甫在旁搭腔，极有趣。散时已11点矣。下午5点联大常委会，讨论安葬事，金主以不理理之。下午3点访Fairbank太太于美领馆，谈考送留美研究美国历史文化等问题。

1月17日 晴。午前10点余卢主席偕赵康节来，为安葬事，约查、潘共谈至1点始去。彼等之着急殊为不智，但似不能使之明了，奈何！午饭后高警寒来。小睡。晚间未出门，11点朱来电话，谓明日公团致祭之举可缓期举行。

1月22日 晴。下午刀承钺土司来拜，率其族人四五人，刀青年似颇有上进之志，谈吐亦很谦和，坐约半时辞去。晚，请漠西土司数人餐叙，并约勉仲、光旦、泽霖、印堂、茀斋及学生段荣昌陪坐：

蒋家俊（汉人） 猛板土司司官

① 原吴宓，清华及联大外文系教授。

石炳麟	澜沧土司司官
刀承钺	干崖土司司官
多根培	遮放土司代办
多永清	陇川土司代表（未到）

1月23日 晴。下午5点联大常委会，对于工院学生自治会理事取消上月17日起、自动上课之学生会籍及膳团权利之举（至今仍未自行纠正），决予惩罚。其常务理事王世堂等三人各记大过一次、小过二次。另布告凡学生自治会决议事项不得再与学校规令抵触。饭后请芝生草拟布告二稿，至11点始散。胡觉、叶光甫饭约未得去。

1月24日 晴。下午三点清华校务会议。5点约集院长、系主任等商谈图书仪器损失报部及请求添补经费等问题。7点聚餐两桌。

1月25日 晴暖。晚6点余至白英夫妇家，有客廿余人，白等日内将赴渝作美行计划。7点余至财政厅华秀升之约，同座有陈纳德、霍嵩山、晏玉琮、吴泽霖、朱健飞、张某及 Willard。

1月26日 晴暖。上午9点借战地服务团车往飞机场看鸿翔部队表演跳伞技术，有祝宗权为联大学生表演单人自六千呎延期张伞颇好。12点回寓。下午睡二小时，晚未出门。

1月27日 晴暖。上午11点半始起，洪深来未得见。下午收拾花草。在阳台上看书颇和暖有春意。夕，华罗庚来谈俄科学会邀于三四月往游事。晚贪看小说，至5点看完始入睡。

1月30日 晴暖。下午3点约汤、叶、钱、施来商量推荐教授特别研究补助金受款人（82人，每人5万元）名单。5点常委会。7点会后约杨西孟、伍启元同便饭，藉谈渝中消息。

1月31日 阴。下午3点清华聘委会，仅讨论六七件。5点评议会，一多、奚若未到。7点宴[晏]司令以车来接至其寓所晚饭。陈纳德今日未飞去，座中并有霍总司令及吴泽霖。10点余归。

2月2日 阴冷。昨晚有小雨。中午始起，洗梳未毕，已有客来拜年者，饭后又五六起，一日未出门。自昨晚城内外鞭炮声甚多，下午有鸿翔部队之龙灯、高跷等会。人民过年之热闹，盖情不能自己也。

2月3日 半晴。上午来客仍甚多。下午稍整草地，赶催理工各系编造UNRRA^①调查报告。

2月5日 半阴。早起颇感疲倦。下午4点清华聘委会通过新聘教授十余人。晚饭赴杜聿明夫人之约，酒菜及同座皆无意味，但主人盛意至可感也。归后整理各系组报告，甚麻烦，至4点始睡，工作犹未完，然已不能再支持矣。

2月6日 晴有风。晚，风甚大。早10点起，朱秘书长来述及昨今两日学生六人往省府请修坟及抚恤各费，及朱与卢主席答复大旨。熊迪之来坐颇久，意似为预备占用训练班房舍事。下午5点联大常委会，枚荪、序经皆新自重庆归来，又约霍重衡来共商迁校筹备事宜。饭后由枚荪草又代电致教部，为李免职及生活费问题。

2月7日 晴。为编造向UNRRA驻平调查员Krivor报告学校损失及将来需要(农工医)忙作一日，但因打字人手缺乏，须二日后方能寄出矣。

2月8日 晴。日间仍督促抄打报告，明日可寄出。晚约云大医院杜棻(医学院长)、赵明德(医院长)夫妇、刘明智及他医师四人(范秉哲未到)、谭世杰(善后总署驻昆主任)、陈王善继及茀斋，以谢诸君医药帮忙之意。

2月10日 晴。一日未出门，赶办呈部文稿，关于复校后院系计划、经费预算等问题，殊难假手于人也。下午清除草地工作约二时，略当运动耳。晚为联大请白雨生司令夫妇、晏玉

① 即“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琮司令夫妇及芝生夫妇、重衡、泽霖，藉便商谈运输问题。

2月12日 下午晴仍冷。近来晚睡更迟，早起总在10时左右，身体亦觉不适，胃口不佳，是缘起居不正常，以后当力戒之。中午约农研所教授六位及企孙会谈农院筹备事项，并午饭。晚约缪云台夫妇、杨耿光夫妇、朱健飞夫妇及光旦夫妇便饭，藉商印刷机售与经委会事。

2月13日 晴。下午3点联大常委会。5点校务会议，教授代表到者只三人，尚有三人因赴平须于下次递补者。

2月14日 晴。因准备明日赴渝，更觉忙迫。幸晚饭后要件均已草毕，待明早交人抄出携去，然收拾零事又至2点始睡。

2月15日 晴。早9点起，收拾行李。将10点世昌来，谓机位已订妥，须10点半即去，赶即准备，11点到机场，等约半小时即上机，因机师未来又等约半时，12点10分起飞，一路颇平静，但因连日睡眠太少，又胃中尚未复原，稍觉不适。2点半到珊瑚坝，同机遇费福泰，承照顾在机场稍用饭，搭其车至上清寺，仍借宿于中研院，因思成夫人于下午飞往昆明，适有一屋空出可住也。9点余归寓，罗庚、孟真及萨太太来谈，孟真坐至11点半始去。

2月17日 晴。上午至孟真【处】坐，晤林超君。午饭刘金旭约在重庆牛奶场西餐颇清爽，在彼遇洪绅及某君（成渝铁路局长）。下午4点访骝先部长于其私寓，因胃病尚未起床，坐谈约三刻，颇关心于清华复校设备等问题，而对于张、闻、潘等之举动谓殊于清华不利，实善意之警告也。后至求精晚饭。

2月22日 晴暖。早8点起屋中即来数人，吴正之、陈剑翛、何义均皆为照顾学生游行者。9点半游行队伍至上清寺，在道旁立观约三刻始全过去，约有三万余人。至求精，文华将午始自机场归，始知飞机因雾重待至1点余始起飞。饭后回寓小睡。天夕与济之至宽仁医院访吴文藻家留晚饭。

2月26日 晴热。上午在朱寓未出门。午后2点出理发，适见南区学生游行至上清寺，至中研院宿舍晤李方桂谈半时许。至教部翻芝生来密电，谓昆明学生将于27日罢课，催余速归。晚7点赴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饭约于国民外交协会，为介绍李继任者C.M.G.Bolton，客共二桌，翁、杭、傅、吴、竺外，有Reishe Coats (英使馆) 等。席未终杭拉吾出谈，促吾即返昆。吾虽觉或非严重，而又感在渝任务未完，但只好决计归去，此责他人亦难负也。急至朱寓稍留，即返中研院。晚小雨又转冷矣。

2月27日 晴。清晨五点起，因昨夜落雨天气转冷。6点教部派车来送赴机场，有孙专员国瑞偕行，7点半登机，十余分后起飞，9点1刻入滇境，丛山纵横，空气混沌，云块稀疏，飞来急速，盖已在风暴中矣。机身上下左右颠簸特甚，男女座客十之八九皆作呕吐。余因注视窗外，颇虑风力太大或生意外，遂未顾及其他，而亦未觉晕吐。11点始降巫家坝，适遇胡蕴山、张西林将往渝赴二中全会者。在候机室晤林云陔部长。与张左丞等久谈。为胡觉邀至合作社用点心。1点半张、胡等上机去，搭张车返寓。下午风大，且落雨一阵，天夕颇凉。下午5点常委会，为略述在渝接洽情形，饭后谈至11点始散。

2月28日 晴有风。早起觉伤风加重矣，午前请王大夫来诊视，幸无烧，惟头重口干，鼻涕甚多，服药之外尤须休息。午后查、沈来谈，适学生有代表来为请取消工院学生三理事记过事，久缠不去。旋潘、冯亦来，遂请四君告代表等，如学生将以前自由上课之同学处罚事件完全撤消，则常委会可重考虑记过问题，否则难予理会。该代表等又报告，明日学生将罢课作为要求，当严予告诫，倘如此行动，尤属不合，学校更难予同情。

3月2日 晴有风。咳嗽稍好，鼻涕仍多。午后起床批阅公事。晚约冯、雷、冯、姚、罗、闻、唐、刘、潘、汤、朱（闻未来）便饭，商刻纪念碑事。余酒食未多进，陪座而已。10点

客散。

3月3日 晴有风。昨晚睡不佳，午前沈刚如来，请其处方调理脾胃。吴蕴珍遗柩于校中安葬未得参加。下午至户外散步，稍整理花草。天夕勉仲来，未久留即去。于《学生报》见奚若谈话一段，其主观实太强，而于批评同人之处，尤为欠妥。其肝气近来似更盛矣。

3月4日 晴热。仍有风。本年风季似较前数年特厉，旬日以来每早9点以后便有风，时或有阵雨，至晚饭前后始平息。最近数日，风势尤猛，闻飞机近来每有停开者，盖高空风力尤大。上周由渝飞回即觉摇荡异乎寻常也。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缝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嚥下灰土不知多少。邻家儿童甚多患眼疾、喉痛者，实以此季天干而风特大，病菌流传，又较风沙难于防除矣。今日联大及昆市他校学生罢课一日，以表示对于李案处置之不满，此举诚非全无理由，然亦只能听之，更望勿生其他事端耳。戴坚师长（荣誉第二师）自越来昆，承赠在越受降时日指挥官缴呈军刀一柄。下午许桂馨来谈，神颇不定，盖名利之念太重也。晚为杭立武及傅孟真各作一信，至三时始睡。

3月6日 晴热有风。伤风稍好，仍未出门。下午三时清华校务会议，五时联大常委会，为整饬校中秩序，清理杂乱揭贴，讨论颇久。晚作致浦逖生信^①。

3月7日 晴热风。下午赵康节来送省府公函，关于死难四人家属抚恤及葬费等问题者。晚作二信致陈岱孙及朱经农。

3月8日 晴风颇大。上午刘觉民来谈颇久，彼于昆虫学研究与训练实甚努力，若干之精神可羡也。今日作三信，致梁思

^① 即浦薛凤，清华及“联大”政治学系教授，1942年曾兼“联大”政治系主任。

成、陈雪屏与任叔永。睡时又二点矣。

3月9日 晴热风。下午赵康节再来。各校当局会商丧葬医药抚恤支配问题，总数仍在六千万，实太费矣。今日作二英文信，与王景春（英国）及叶良才（上海）。

8月11日 晴热风大。日来咳嗽渐好，惟眼觉不适，恐系睡时太迟之故。下午接八弟信，知宝弟留美诊病情形。祖培来，留午饭。下午再整理花草，甚感兴趣，惜对于园艺无多研究，以后有暇当更致力。从事教育逾卅年，近来颇感失望。他日倘能如愿，吾其为老圃矣。夕，缪祥烈（因伤割去一股者）之父来访，坐甚久始辞去。

3月13日 晴热风。下午5点联大常委会讨论及学生为17日安葬事铺张宣传情形，俨然演戏赛会矣。又议决告诫学生不得诋毁谩骂，此不得为言论自由也。邵仲和来，新调金城经理者。

3月14日 晴热风。下午2点学生复举行公祭，闻到者殊不多。晚英美广播谓俄军在伊兰不但未后撤，反更前进。国际情势已甚严重矣。昨中央社有俄军撤出沈阳之讯，而实退驻于长春，此不过一时缓和之态，将来如何演变，正未可知也。

3月16日 晴热风。一日间勉仲来三次，告学生明日出殡准备情形。端升似亦奔走，力使勿于明日更生枝节也。

3月17日 晴有云，风稍小。午前11点出门往武成路福照街口伫立三刻许，学生殡队久不至，后始知已改道由大西门经青云路进城矣。街上观众甚多，似无成群可有冲突者。立观至12点半回家午饭，饭后小睡。夕闻殡队已返校，安葬幸无他故。继侗来谈，留晚饭。饭后勉仲来，共谈颇久始散。午前发与山信。

3月18日 晴热风。午前学生上课如常，为之稍慰。

3月19日 晴热风。为教部令开报现有教职员学生工役及员工眷属人及公私物吨数。晚约北大、南开会同商谈，到者北大有汤、江；南开有邱、冯；清华则继侗与余。所谈最要之点为休假

与请假者之开列，与请保留新聘（教授副教授）名额之问题。

3月20日 晴热风。下午五时联大常委会（4点清华校务会议），适冯、潘已自保山归来，黄子坚又新自平经渝返昆，茀斋有信由子坚携来，尚无关于迁运之好消息，通过为告诫学生严守壁报管理规则，令训导处切实执行之议案。

3月22日 晴热风。一日赶办报部人数吨数事，该管职员头脑不清，所编造表单不敢为据，不得不亲自查对，然费时甚多，无可如何耳。下午又接茀斋信，部中要更详细之概算者，又须费时费力督促赶办，晚三点始睡。

3月23日 有云风仍大。雪屏昨来昆，晚约便饭与常委会诸君会谈，谈及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学生今夏结业后之安置问题，意见颇多，终须看教部意向，听其决定耳。

3月24日 下午有阵雨，晚仍有雨。下午三点余北平研院、中法大学、“世界社”等七团体在商务酒店为欢迎李石曾茶会，到客约百人，排座讲话甚呆板，五点余散。李润章夫人来家便饭。

3月25日 阴，时有小雨。月余以来风沙之苦，今后或可止息矣。院中近植花种当享此雨更得滋长矣。昨日王明之赴渝，携去报部代电及概算书。下午又接沈二信，部中核定复员费有北大十三亿、清华十亿之说，使人不解，恐沈^①去已太迟，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矣。下午复沈一信。晚丁龙堦夫妇在商务酒店约饭，晤徐颂九，为行总派来办滇西救济者。

3月26日 阴雨转凉。下午3点半清华校务会议，商讨复员之最近各问题，只叶、施到会，冯、潘皆因他事未到。晚请客，葛酉泉夫妇（未到）、徐颂九、丁龙堦夫妇、范秉哲夫妇、霍秉权夫妇及吴泽霖。席未终郁文觉不适先离席，盖因闻近日飞机有失事者，遂惦念彬彬等自印赴沪之安全尔。昨、今两日因气候之故，英美广播皆不易收听，殊为闷闷。

① 沈履。

3月27日 阴，晚有雨。下午约联大及清华教授茶会，请子坚、雪屏报告平津情况，及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情形，盖该班学生夏间安插问题都与三校之复员问题有关也。6点联大常委会，事项不多。7点与光旦赴徐颂九在中央银行饭约，盖宴当地党政军及新闻各界者，共五桌，8点即散归矣。

3月28日 半晴有阵雨。下午三点半清华教授会，关于迁移问题昨日已报告者未重述，另将清华复校各问题报告后，征求大家关于补习班学生分发问题之意见。要点为：编级试验，人数勿太多，勿使总数超过二千之限。6点余赴教厅王子政饭约，饭后与徐述先等谈师院将来问题及云南对于学术研究发展计划。10点散归。

4月2日 晴。下午约李筱韩^①来谈，拟约其于复校后任秘书长职务，渠表示愿考虑，待日内再晤谈。昨晚与茀斋信未发。

4月3日 晴，下午有阵雨。午前企孙、光旦、端升先后来谈。下午5点联大校务会议，讨论时间多注重迁运问题。今日得部令规定以701,940,000元为迁运费，但其支用办法尚待核示耳。会后便饭以后，查、鲍来谈米帐问题颇久始去。

4月4日 晴有阵雨。午前约泽霖来谈教务长问题，嘱予考虑。下午3点半葛酉泉^②来谈路局车运问题，尚待与白雨生商量合作办法始能说定。5点清华评议会规定10月10日开学，21日上课，10月1日学生起始报到。饭后再与筱韩谈，彼恐体力不胜未敢担承，须待再商量。晚作与陈寅恪夫人信，下午发与茀斋信。

4月5日 晴。下午3时约集三校代表（各二人）商讨联合招考问题，5点清华聘委会，7点便饭。中午约查、章二家吃面（祖彬生日）。

4月6日 晴。午前庄前鼎来谈对于研究所改组问题仍未了

① 李辑祥。清华及“联大”机械系教授。

② 即葛守信。西南运输局局长，在三校复员中颇多尽力。

解。下午接葛局长来信，开列车票货运价格及办法，急函茀斋，嘱向萧庆云商优待减价及向教部请增加迁运费。

4月7日 晴。午前李储文来，谓将赴平，请介绍与平保委会。路祖焘来，报告关于会计数事。中午约刘、章二夫人及小姐们六人便饭，下午收拾草地工作二小时颇疲倦。夕，霍秉权自渝归，谈交通情况，夏间北返似无望。明午先约清华评议会同人一谈，看意向如何，再提联大商决。晚饭后佩松来，亦方自渝归者，谈及部方对办农院似无不可之表示。

4月8日 晴。午前锡予来，出示孟真信，关于迁校延期之意见。中午约清华评议会诸君及重衡集议，大家鉴于交通问题之困难，皆赞成联大继续一学期至9月以后再移动，待与他校讨论后再说。但此中麻烦问题亦尚不少耳。夕，王子政夫妇来谈校庆日集会办法。晚蔡文侯夫妇饭约在电台寓所，同座皆清华同人，吴、戴、刘氏昆仲、印堂夫妇、胡彦仁。饮食甚欢，十点归。晚座间兰花盛开，香气颇觉袭人。……

4月9日 晴。上午柳漪来。亦谈迁运问题者。午间继侗、企孙来。下午通夫、世光、龙荪、刘康甫先后来谈，赵康节来告蒋主席已去筑，或有来昆可能，则又使人担心矣。

4月10日 晴。上午理发，价八百，似较年前已大减，仍给一千又觉太阔绰矣。下午5点联大常委会与三校代表联席会议议决：因交通困难，夏间（6月至9月）继续课业完成一学期，以后再迁移。定下星期五召集教授会说明。

4月11日 晴。上午子坚来谈，如联大继续三月经费支配办法，拟作提议待写就请子坚携渝与教部及孟真商酌。晚至光旦家晚饭，有子坚夫妇、贡予夫妇、序经、觉民、泽霖、世光等。

4月12日 晴。上午泽霖来谈，渠明日将离昆，觉民与同去，乃约继侗替代总务长。下午3点联大（清华）教授会，先由余报告，后发言者八九人，多不赞成夏间开课者，其动机殊不同，说话

亦多无大意味；但彼等欲早走之心情则了然也。5点3刻会将散，忽有学生约二百人来请愿，将其书面意见为报告后，即宣布散会。乃该生等不肯散，欲请余讲话，再三要求坚不允，至7点1刻始散去。约周、汤、叶、赵至家晚饭，饭后吴、鲍、戴来，袁来。

4月13日 晴。下午4点与芝生、勉仲约梁漱溟茶叙，并得汤锡予、王维诚、钱学熙、陈序经、黄子坚、冯柳漪、章矛尘等聚谈。梁曾于月前往延安，谓系为与毛、朱等说明，将来渠将放弃实际政治活动而从事于理论之主张。梁以为现时英美式民主之趋势（指多党竞争）将不能久，以后必须有一综合组织适合于中国社会文化者代起，方能奠定建国基础。

4月14日 晴。下午昆明联大校友会有“话别”会，余因恶其12月强梁改组之举动，故未往。晚，勉仲来告开会情形，更为失望。会中由闻一多开漫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

4月15日 晴热。午前马约翰来，谈及昨日校友会情形，极为气愤。下午接茀斋两信，患病数日似已痊愈。论及交通困难，不若夏间开课事，实甚合理。奈此间师生不能以理喻何。晚约华秀升、王子政、邵仲和、刘谷孙、陶贞元、及汤、潘、施、赵、戴便饭，藉谈学校纪念日集会事宜。定于28日（星期日）假裕滇纱厂举行游艺聚餐会，推定华、王、陶、汤、赵、戴为筹备员。

4月16日 晴热甚干燥。午前仲和陪陈树人君（电信局长）来谈颇久始去。下午3点清华聘委会，5点余散。关于旧教授续聘事故未提出，冀于数日后或有变化，免却一难题耳。今晚为阴历3月15日，月初起，圆明可爱，但不久为云遮去，恐日内可有雨来矣。

4月17日 上午晴，下午云渐集，晚有雨。午饭时子坚自渝

来电话，甚清晰。下午3时联大校务会议，再讨论夏间开课问题，但无形中大家皆认可以作罢矣。关于迁校经费及教职员学生应发费数目商讨甚久始定：教职员每大口25万，学生15万。晚9点半始散。睡时闻雨声。

4月18日 阴雨颇冷，室中生火。……晚饭后勉仲来告朱部长有信约任师院院长，其意颇犹豫，须俟数日再好商定。晚座室中觉甚冷，岂天气果如此，抑体力更不胜耶。

4月19日 雨停渐晴。上午美领馆Mr. Roser副领事来谈，美国务院下年拟给25【名】中国大学毕业生赴美研究(fellowship)事，清华得荐送两名。下午3点约重衡、继侗商量编造迁校经费概算。晚饭后始完工，总数竟达二十亿。物价之高、交通之难于此可见。尚不知教部究能拨给多少。

4月20日 晴。上午9点赴云南大学贺其24周年及熊校长到校九周年，庆祝会殊太长，讲话人太多而欠严肃。午后将概算呈部，另与傅、沈一信，请向部说明至少须给十五亿，否则实无办法。夕，鲁师曾（高等法院院长）来谈。晚未出门，信与傅任敢。

4月21日 晴。午前李继侗来谈联大帐项清理问题，汤佩松来谈农院组织案。午饭约佩松与陆近仁小酌，有螃蟹二只（序经送来）佐酒，虽不大且不甚肥，但已属难得之物矣。晚赴省训团陶鎔主任饭约于商务酒店，座客皆党政军及新闻界首长四十余人，8点余散。便道至才盛巷访周枚荪未遇乃归。与彬彤彦一信。

4月23日 阴无雨。上午10时在联大图书馆前召集学生训话（下午4时在工学院），说明本校仍决于5月初结束后起始迁移，三校于10月10日在平津开学，今夏招生办法及员生旅费规定情形。晚为刘太太约与佩松看电影Chopin's一曲难忘述其身世，归后与佩松小饮闲谈。张太太来，勉仲来出示致朱复函。

4月24日 晴。午前米客甚多，熊迪之偕张君、Mr. Roser、黄子卿、冯柳漪先后来。下午3点常委会。7点赴工业协会为中

英文化协会年会聚餐，到时已将食完。新举会长为Mr. Coghill及赵公望，9点归。接茀斋一信，密告朱由来及傅、沈向朱解说情形。

4月26日 晴。下午3点约集清华各研究所主任商谈下月结束有关事项。……茀斋自渝归。

4月28日 半阴，午前有阵雨。下午3点往裕滇纱厂，清华校友假此处集会以纪念学校三十五周年，开会由王子政主席，余作简单报告后，有燕召亭、冯柳漪、熊迪之、华秀升先后致词，以后拍照。聚餐时仍由各班敬酒，幸酒杯不大，未有醉意。饭后有相声、大鼓及纱厂同人演戏二出，《教子》与《汾河湾》尚勉强可听。10点散归。

4月30日 晴。夕赴省参议会休会餐叙，至则宾主已有散去者。勉强终席。出至缪云台家，遇李一平，再与缪家吃饭半顿，饭后在廊前闲话，李出示李宗黄“对昆明学潮之声明”。10点归。

5月1日 晴。早报上未见李之声明登出，便可不理矣。下午4点联大常委会，再规定关于发旅费之问题二点，并商定4日结业典礼之会序。

5月2日 晴燥热。下午5点半省政府饭约，谓系欢迎张溥泉夫妇来昆并欢送余夫妇北返者。主人为张、华、陇(?)、王、朱；客为张及余等共三人。……

5月4日 午前有雨。上午9点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余报告后请三校代表汤、叶、蔡相继致词，来宾请马伯安、严變成、熊迪之，最后由冯芝生读纪念碑文。会后至后山为纪念碑揭幕，然后在图馆前拍照，时已有小雨。拍照方毕雨势忽大，在办公室坐约半时，待雨稍小始出。此或为到此室之最后一次矣。晚6点余赴北大同人饭约，清华被邀者七人（施未到），南开仅冯一人，宾主共三桌，同桌有宋士及李士彤，颇能饮，似为特向余劝饮者。席终皆有醉意矣。10点归家即睡。

5月5日 阴，下午有大雨。午前夏益荣（夏晋麟之子，习医）由萨本栋介绍来谈。中午黄宪儒在巡津街42号请客，为辛酉级毕业25年联欢。有孟宪民、黄子卿、闻一多、潘光旦、李继侗，罗努生^①适来昆亦加入。谈笑甚欢畅，4点余始归。

5月6日 晴。午前请金、温、潘、汤、张口试愿申请美国国务院奖学金者英语。

5月8日 晴。……下午3点清华评议会，决定送李赋宁、王浩为美国国务院研究奖金候选人。晚饭霍嵩山总司令之约未得赴，与郁文赴龙纯武夫妇饭约，同座为光旦夫妇、芝生夫妇、范秉哲夫妇等。

5月9日 晴燥热。……下午6点余赴黄斐章（毓成）饭约两桌，皆滇界耆宿，晤刘晓岚君，为冀东人，久客滇省者，护国之役曾与蔡松坡将军出川南，今则无复当年英气矣。庾晋侯亦在座，又为强饮升酒一大杯，而继而起者又四五起，既不可却，又不欲示弱，于是又三四杯矣，尚无醉意。饭后又谈有顷，欲至隔壁访朱丽东秘书长，未遇乃归。归后则觉甚倦，即裹衣入睡矣。

5月10日 晴热，有云无雨。早9点起，身及面部又现红热，昨日之酒气犹未消也。张溥泉夫妇来，因招待所水太坏不欲再往，乃留张太太于寓中，张先生往张西林处。下午3点联大教授会审查本届及前二届应征作译员及从军学生毕业成绩，其未能决定者交由审委会，至迟于5月终作最后审查报告常委会决定之。6点赴滇越铁路滇段管理处林凤岐、段纬二君饭约，稍坐后，7点返办事处，教授会聚餐共十桌，参加者八、九十人，颇欢畅。饭后又约王遵明、萧涤非、章、沈、姚诸君至家小饮，潘、查、黄旋亦来谈，饮至11点余始散。工作至3点始睡。

5月15日 晴。下午3时清华教授会审查毕业生成绩并选举评议员。5点半联大常委会。7点半在家约杨小姐、杨起、王元

① 即罗隆基。

璋、章矛尘夫妇、沈从文夫人便饭，饭后又送与绍酒十余斤，携归凤鸣村以飨书堂等。

5月19日 晴。早4点3刻始为世昌唤起，室外因夜雨尚湿，但天有晴意。将6点赴机场，天已大明，实仅系正时5点也。郁文与世昌来送。7点起飞，机中大部为医具，另有血库职员眷属八、九人。余坐近司机舱口，二十分后忽见驾驶员颇忙乱，继见飞机方向似偏南飞者，高度亦渐下落；约半时后又见机转向东北行，始闻副驾驶员言，前因一发动机发生毛病停止，故即回转欲回降昆明，后复开动，故又东飞，然其间颇为担心也。以后注意机声颇正常，遂亦安心矣。12点到汉口机场，加油后12点40再起飞，天晴无风甚平静，3点15降龙华机场。适罗北辰来为接其夫人者，其夫人未来，邀余至其家，出机场后游龙华寺，登塔（七级）一望，游人似颇多，盖沪上连日阴雨，今得骤晴，多欲至郊外游也。……晚饭后至愚园路606弄114毛家，彬彬固不知余将来沪，一见惊喜之极，与其家人会见。

5月24日 早有雨，午晴。早5点半起，6点半北辰送至北车站，7点开行，车中对号入座，尚整齐。但头等票价为18,800元，亦殊可观矣。沿途情况似与九年前无大差异。1点45分到下关，浦逖生与许复士来接。……先至浦处与二君谈分配农具问题，3点余至东门街21—1号朱寓。

5月25日 晴。上午因部中开会未去，下午三点余随经农至部中，部长约于4点会晤者，竟未至。与周纶阁司长、杭司长稍谈。5点与经农往国际联欢社，参加翁、周、金招待美国医界Greegg (Rockefeller Foundation)^①, Burwell (Harvard Dean of Medical School)^②, Louker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S)茶会，又与立武至美大使馆 Faibank 夫妇茶会，晤

① 通译罗氏基金会。

② 哈佛医学院院长。

③ 北京协会医学院。

Ludden 夫妇、Adler Smythe、陶孟和、孙洪芬、李振翮夫妇等。晚，朱部长在部饭约，主客为美国三医师外有刘月如、金宝善、陈景唐、王家辑、浦逖生及杭、朱。

5月26日 晴热。午前与经农至江苏路47号访周寄梅兼晤虞谨庸。下午2点余逖生借与廷黻汽车合经农之车乃全家出游陵园，在中山陵前一望未登临，至烈士纪念堂，孩辈抢登纪念塔，余、经农在草地上休息，后至灵光〔谷〕寺饮茶，又至谭墓，其风景曲折幽静，实胜于中山陵也。五点余返城内，途中蒋车似发生毛病，遂未他往。晚饭后访孟邻于其颐和路19号寓所，闲谈至11点半归。在床上看“*The life of the Heart*”，述George Sand 身世者，至1点始睡。

5月27日 晴热。……4点余至教部，待5点余得见部长，开口便提清华数教授问题，嘱想办法。北平工院学生之要求部决不理。……

6月2日 晴热。午前有寄来邀朱家大小至郊外野餐，作与八弟等一信。好久未通消息也。中午至国际联欢社，在京清华同学集会，到者一百二三十人，颇整齐，并有联大十余人参加，罗志希亦到。饭后逖生主席，余为报告校事约一时之久，后罗演说，因须赶赴车站，遂先辞出。车中遇汪典存夫人及杨秀鹤女士。3点50车开，10点50始到北站，一樵以车来接，至顾家又进稀饭及W.酒二三杯，1点始睡。

6月7日 晴甚热。中午至教部朱部长饭约，座中有竺、茅、吴、臧、罗（宗洛）、赵（太侔）诸校长及周纶阁、黄如今两司长。饭时朱提及改订大学组织法及简化课程等问题。余提二问：1、大学可否不设训导长？2、青年团可否不在校内设分团？朱对（2）表示须与团部商量。2点半散后至中央图书馆太侔处稍坐，慰堂外出未晤。下午张昌华偕顾一泉夫人及泽霖来，稍坐后张、顾去，吴留久谈。7点樊车来，与吴搭往五台山永庆里6号卫家，

适寿堃新由平飞沪，今午来京，晤谈尤快。饭前俊如引往看其果园，果树几尽砍去，惟敌人留有住房一所，颇坚实可留用。饭时主人出White Horse 一瓶，分饮将尽矣。10点余【回】朱寓，夜间甚闷热，盖被总觉有汗，再住数日，不知更加若干度也。

6月9日 半阴仍热。昨夜有雨，湿气较重。中午联大同学百余人人在励志社聚餐，邀余到会为报告校况。浦夫妇、鲍夫妇、樊逵羽在座。

6月12日 阴、晚雨颇大。上午写信致陈福田。中午至逃生处饭，饭后同往慈悲社俞家访陈寅恪，坐三刻许，至中大访正之稍谈，又至中研院访本栋谈颇久，6点返。……

6月14日 昨夜大雨，至中午暂停，颇凉，晚又雨。午前雨大未出门，为子坚与常委诸君作信，告此间关于运输等消息数事。下午接彤信，谓定16日结婚，惜不能赶去矣。3点与经农至教部，与翟毅夫谈。对于主席手谕关于清华复校后如何整顿学风、恢复学术研究风气二点，余谓应实现二事：1、生活安定；2、研究设备充实，然后学术风气自必恢复。因即在昆明困难状况下，研究仍为大多数所努力也。由部发与任之恭电，请往见Dellinger 商 Ionospher sta. 事，6点余至永庆里卫家，晚饭后待雨稍停，10点余归。

6月15日 阴雨颇凉。午前钱伯辛来，一樵来谈其下月赴美任务，关于国防科学如航空、无线电、原子物理，希为清华取得美方协助，以促进研究功效。李国干来交祝新民殉职事略。下午4点……至蒋家稍坐，偕蒋太太至Gen. Wiant处拜访，兼询星期一飞平消息。

6月17日 晴热。早7点半起，9点至蒋家稍坐。随与蒋太太往南城外飞机场，至时则魏亚特将军等已在场。10点1刻起飞，50分到龙华机场，因陈长桐夫妇早间未赶上搭机，故魏特再来接。11点20分再起飞，空中甚平静。此机为四发动机之Dakota，

飞行最速380 mi/n。由沪至平约700 mi，飞速平均为200，故须3时半到平。下午2点半左右渐下降，在城上绕行时得见全城景物。3点下机，福田、岱孙、正宣、唐悦良（市府）、石某（行营）等均在场久候矣。偕福田等至城内，仍住中央饭店招待所，洗澡休息，子高、明之来晤。6点半与正宣至藤线胡同接六妹至全聚德晚饭，约客两桌：魏将军、Capt. MacMulan mr. Lamb、Mr. Boyes（在平领事）、蒋太太、长桐夫妇、福田、岱孙、子高、明之、正宣、叔存、陈雪屏、郑毅生、本铁。饮啤酒、绍酒颇多，外客皆甚满意。10点余散后，随陈、郑至其寓，入室就座竟即睡去。12点余醒来，孟真等尚在陪伴，甚歉愧。又谈一时许始回寓。

6月18日 半阴热。早8点起后冯淮西^①、陈省身来谈。9点半偕六妹等出，先至骑河楼稍停，然后至清华园视察各部房舍情形及修理进行状况，巡行共三时许。午饭在丙所由二陈作东，长桐夫妇亦来，6点始进城。7点半赴行营李主任饭约，座间有魏将军等四人，萧一山秘书长、王参谋长、甘副参、石某。9点半散出，约W等同赴北京饭店福田与胡征详之约，晤Col. Elin，顿忆一二年前在昆明欢聚。谈饮至12点半始散。与二陈闲话至三点余始睡。

6月19日 晴有风仍热。早起后大公报记者徐盈来访。六弟来。今甫偕华炽来，将午六弟别去。至市府为张伯谨副市长留片，谢其昨午饭约未赴者。至骑河楼约同子高、正宣（岱孙因有他约，，福田因背架不能久坐）往韩宅食面。……

6月20日 晴热。早7点起，早饭收拾毕，八点赴六国饭店接蒋太太同赴南苑机场。庸孙夫妇稍迟亦到，8点45登机起飞，在平市上空盘旋二周，清华园、颐和园历历在目。盖魏将军故使如此，以便吾等观览，甚可感也。约9点折向南飞，天气平静，

① 即冯景兰，清华地学系教授。

速度较来时增加，平均为250，高度约七八千呎之间，11点35竟已降落大校场，既速且稳，乘客均极满意，尤当感谢主人。庸孙夫妇搭原机回上海，余偕蒋太太及蒯女士进城，因等行政院汽车，至12点半始到东门街。

6月21日 晴热，较平中似尚凉爽些。早9点余随经农至教部，先晤骝先部长，所谈仍注重于人事问题。继与毅夫、师俊商加拨修建费事，贺允先拨四亿。拟往中央研究院，因电话不通未往，因畏热恐空劳往返也。中午随经农归。午后小睡一时许，草呈部文稿，待明日即抄递。晚饭与有骞、文华、文光打B。有骞与余搭伙，惜其不甚谙习，颇难合作洽当。10点半始散，时室外颇有风，不知夜间竟能落雨否。

6月22日 晴热，有风，但湿气颇重。上午李默涵及他生来求介绍谋事，钱伯辛电话问飞机行期，告以数日内尚不能离京。11点至教部呈部请加拨修建费文，烦文曼抄好即交毅夫请速办。下午再至教部被邀参加教授研究补助金委员会议。四点偕叔永、伯遵至江苏路周校长处饮咖啡，后为虞谨庸夫妇留晚饭，晤钱天鹤夫人，徐君夫妇等。假葡萄酒甚坏，勉饮二三杯。饭后偕叔永返寓与经农久谈始去。11点余睡。

6月24日 晴甚热，室内为90°F，户外恐过100度矣。早9点赴中研院，因经农已先出门，雇洋车行，烈日下四十分钟始到。与孟真谈，知其昨日见主席谈及校事，力为解说，似可以无大问题。中研院适开院务会议，未久留。往教部，雇车500元，而由东门街至北极阁为1500元，其贵不下昆明矣，午饭后尤闷热，黄仲良来谈其汉口古物尚得余烬余土堆中掘出一部分，其泥像佛头十余经烧后竟成陶质，亦可幸也。与七妹电话，知韩德章一家已到京，在途行十余日，宜昌、汉口因交涉各停数日，到京已疲惫不堪矣。

6月25日 晴闷热，夕大雨一阵，但雨后尤湿热。上午未出

门，托钱伯辛订妥飞机，星期日往汉口。发信：汉口祖彤与安思礼；重庆余又荪并托其预订星期四、五往昆明飞机。午饭时汗湿内衣，饭后小睡，小浴。3时半雇车赴中研院候朱部长同往委员长官邸，5时到军校官舍，在外客厅坐数分钟后，有他客出，始被让入内室。主席着蓝长衫，颇安闲，谈话约半时，首告以数日前往北平查看校舍情形，问：复校计划如何？答：现正赶修各部，暂定双十节开学。问：师生能赶到否？答：希望大部分届时能到平。问：下年校中办法如何？答：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随即提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朱乃提及关于东北事件百余人宣言之事为证。朱又谓曾商量过关于教授长及院系主任人选之更动，总使主要负责者为稳健分子。至此余乃谓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对方似颇领首。余继谓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洩火气更大。主人点首曰，生活问题实甚重要。朱因乘机提教员待遇及经费应增高问题。余问：主席看北方局面是否可无问题？答：吾们不能说一定，，或者不致有大问题。言时笑容可掬，其或笑余之憨，余亦故为此问也。承款以糕点杏仁露。朱又报告关于某省厅长事。辞出时承送至门口，似特客气矣。后以朱车至中央大学，正之适外出，与吴太太闲谈。6点余正之归，略告谒谈经过。以正之车至永庆里卫家，七妹将于明日赴沪者，饭后闲谈，9点返朱宅，与经农谈话至11点返室，觉甚闷热，上床半裸，未久竟入睡乡矣。

6月9日 晴热。上午十点余至教部与周纶阁略谈，晤 Mrs.

Fairbank，知三校所荐美政府研究奖金候选人六人皆中选矣。至慈悲社俞家看寅恪稍坐。至永庆里，日下步行一刻许，觉甚热，与七妹谈20分，乘其指挥车至蒋家。蒋所约客为周象贤、蒯女士、顾一泉夫妇、毓瑞、逵羽夫妇。……下午钱伯辛来，机票已购妥，代送行李过磅。文衡发烧至102度，不知病原如何。夕作信：重庆清中洪宝林，上海杨秀鹤，上海罗北辰。晚未出门。9点俊如来坐颇久。……

6月30日 晴热。上午八点伯辛以车来接赴明故宫机场，10点始起飞，空中甚平静，将至汉口前半时，地上水泽遍布，盖江水已呈泛滥之象矣。12点在武昌机场降落，在炎日下耽搁约二时；验行李、挤卡车、换卡车、上下驳船，2时许始到汉口码头。因畏卡车拥挤即雇洋车往协和医院，初不料距离如此之远，经德日法租界过火车站，约行一时一刻始到，车价一千五百元，当地人以为甚便宜，衣裤尽湿矣。彤彤见面实盼余来久矣。稍坐又偕Bill等至中航公司订星期三赴渝机票。……中午在机场遇伍启元及其夫人、小孩，系由渝赴京者。

7月3日 半阴似不太热。早6点余起，彤、Bill来看。7点半早点后，赴中航公司买票、过磅，待甚久，搭卡车至码头，在德租界以下二三里，又待一时许小驳轮始到，客卅余人，又挤上船。过江后沿堤步行里许，因道上泥水太多不能前进，待有卡车来再挤上，至机场在一席棚内休息，遇周鲠生与叶雅格，系往南京者，同饮咖啡，待至将一点始各分上机，计自到公司至上机共费5个半小时矣。飞机于1点起飞，机上座客共八人，途中有小风云略颠动。4点半（渝时3：30pm）在九龙坡降落，搭公司卡车至两路口，雇洋车至中研院，与余又荪君稍谈，即留院暂住，稍息后与余至中四路61号看望同人及多家眷属，住该处者竟有六七十人之多，与锡予、子卿、仲明等稍谈。归寓洗澡后，锡予约至国民外交协会晚饭，有芝生、子卿、冯君培、余又荪同

座。饭后思成偕徽音来谈颇久，10点余别去。宿于办公室旁一存物室，与物理所□君同房，睡时尚不太热，燃蚊烟香于榻旁，因未有蚊帐也。

7月4日 半阴，夜半大雨。早起后，□君邀至重庆牛奶场食面包牛奶。10点余偕余君至空军第六路司令部拜访□副司令，出该部大门时遇教部韩帮办庆澜。午约思成夫妇及其子女及龙荪在一川馆便饭，用七千余元；实不费也。饭后至珊瑚坝中航公司过磅检查行李。……天夕芝生来谈，洗凉水澡觉稍不适。7点至国民外交协会，系约宴空军官员，教部韩、陈（景阳）二君，及姚处长忠华、行政院某君（陈光文参事因病未到），陪客为两校汤、冯等十余人，西餐食时乏味，恐腹中已不适。9点余散。11点将睡腹泻一次，夜半大风雨，醒来觉颇凉，又泻一次。

7月5日 早在渝阴雨，下午昆明阴无雨。5点起天尚阴黑，大雨未停，又腹泻一次。6点雨暂停，雇车往中航公司，将至雨复来，立一茶馆前约一时许，始得登卡车往九龙坡机场。途中雨淋后背，衣裤大半湿透矣。到机场后幸雨暂停，稍进咖啡茶，极不适口。又待至9点1刻，始登机起飞。12点到昆明机场，世昌来接，急入汽车，坐定便觉不支矣。光旦同车送余归，未能多谈。到家即解衣上床，始觉微烧。下午高至39度余。请张大夫来诊，并取血备检查。下午同人数位来，未多谈。

7月12日 晴。今日起始视事，中午清华校务会议，光旦迟来，始悉李公朴昨晚在学院坡被暗杀消息。下午李圣章来稍坐。

7月15日 晴。日间批阅两校公事繁忙。夕5点余潘太太忽跑入告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惊愕不知所谓。盖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后再出现，而一多近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竟实现；而察其当时之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急寻世昌使往闻家照料，请勉仲往警备司令部，要其注意

其他同人之安全。晚因前约宴中央及中航二公司职员光徐诸君，但已无心欢畅矣。散后查、沈来寓，发急电报告教部，并与法院、警部及警察局公函。一点余始睡。

7月16日 阴。昨晚12点Roser偕二美军以吉普车接光旦夫妇往美领馆暂避，今早大致尚安定，惟各家尚甚感恐慌耳。午前10点偕郁文往云大医院看闻夫人及立鹤伤势，肺部曾受三枪、今早已停止出血、腿部中二枪，一大腿骨已断、枪弹尚在内，但此子体格甚好、或能出险。医院中闲人甚多、盖李公朴遗体于今午火化，故来看热闹者特多也。中午访霍总司令未遇留片。下午接警备司令部复函谓已悬赏缉凶，关于同人安全问题提议最好大家聚居一处以便保护。下午4点约黄、查、贺、雷、沈组闻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6点余往美领馆晤光旦、奚若，并与Roser稍谈，闻彼处已住有十七八人，但除光旦夫妇，孝通一家，及奚若外，其他则不知皆为谁何也。

7月17日 晴。令世昌购米面糖茶火腿黑大头各若干及毛巾二打，于下午送与Roser^①。下午5点联大常委会，开会前全体往云大医院视一多入殓，仅着蓝衫，盘坐于铁龛内备明午火化者，其面目尚静定，盖已为殓者整理过矣。

7月18日 晴。中午一多遗体于云大操场火化，系由佛教会僧徒办理，观众不甚多，秩序尚好。下午子坚、勉仲来商为一多举行追悼会及修衣冠冢事。2点余刘参谋长来谈时许始去。

7月20日 阴。中午子坚、勉仲约联大同人二桌，商谈师院计划并示请帮忙之意。下午约5点McG.来，始知光旦等已于昨晚离领馆，光旦住于赵家，遂同去一谈。适Roser及孝通已先至，为诸人住居问题商讨颇久。7点余至教厅为约宴监试委员三桌，但地方、灯光以及酒菜皆乏味。8点余席散即归。途中落

① 闻一多遭杀后，为了避免更多的人遭暗算，一些联大进步教授曾暂避于美国驻昆明领事馆。这里所购物品即为这些同志日常需用。Roser为美领馆副领事。

雨。

7月21日 阴，早有雨。早9点乘洋车往昆华中学照顾留美考试，此为第一日，分工试场约共二百七十人，厅中职员来照料者不下廿人，但似皆无甚经验耳。……下午3点归家，始知车夫罗文安于途中为四暴徒勒逼关于办事处住人情形之消息。5点光旦与Roser来，再商迁避计划。R似无接回领馆之表示。R去后，又谈颇久，乃决送至缪家暂居，以汽车同往，适云台未在家，与缪太太稍谈，余先别出，至柳坝路春舫、王源璋夫妇处小聚。晚饭后未久坐即归。归未久，McG.来，始知光旦曾于晚间往领事馆为门者所拒不纳，则不知又往何处，乃遣世昌陪往寻觅，半时后有电话来，告光旦已到领馆，盖为孝通诸人催去者。似非必要，而为诸君设想，似亦非最好做法也。晚宪警在房舍附近似有增加。

7月23日 晴。下午刘英士来访，系昨日自京来代表朱部长慰问闻氏家属并致送丧仪五十万，余为代办。冷欣来访。

7月24日 晴。午前邓飞黄来访，亦新到昆就省党部主任委员者，闻唐瑛亦于昨日来，闻、李之案不久可以大白乎？下午3时校中举行闻君追悼会于昆北院南教室，由余主祭。祭文及闻之生平为罗膺中^①作，由雷伯伦^②报告，后由黄子坚及张口演讲，到者约二百余，大半为同人及家属。秩序甚好，门外宪警颇多，不得不防意外耳。会散又至校内衣冠墓一看，布置未以为合适，但亦不欲多出主意也。晚有吴某订婚，闻排场甚奢华，而亦请人证婚，终托故未往。郁文去，或须代吾盖章耳。

7月25日 晴有阵雨。上午10点联大常委会，中午先赴兴文银行曾市长等饭约，共六桌，后又至商务酒店扶轮社之约，时彼等已饭罢，为述联大结束、三校复校重要问题约廿分。归家稍息。下午五时又至海棠春为赵西陆（太侔令郎）与高震坤证婚。

① 即罗膺。“联大”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② 即雷海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饭后8点余归。

7月26日 晴有阵雨。上午10点三校联合迁运委员会由贺自昭、孙铁仙、霍重衡、沈茀斋、黄子坚、冯柳漪合组，开首次会议，推霍为主席。中午约同参加工作之职员聚餐，共二桌。饭后小睡。下午6时至凤翥街高、赵二家谢宴，7点余出，又至工学院李筱韩夫妇饭约，未终席又先辞出，至寓Sprouse与McG.已先到，谈关于闻李案各点及潘、费、张等安全问题。S.似亦欲再与警备部商谈办法，俾诸君得早日迁出领馆。10点半始去。

7月27日 晴。午前钟督学芷修自渝飞来，留与同人聚餐。

7月28日 阴雨。上午刘英士来谈颇久。下午潘、费归来住办事处内院赵家。晚与英士及潘、费、赵在赵家便饭，商谈赴京问题。

7月29日 阴雨。午前Sprouse偕Melby来，看望潘、费者。中午卢主席饭约，晤顾总司令墨三、李肖白、美领馆Sprouse、McG. Rosen及其新夫人，Melby、Lt. Col. Hayne及黄秘书，外有朱丽东、王子政作陪。下午5时顾总司令来访，谈颇久。关于国共军事形势，国军近颇占优势。6时余至达理巷黄子衡饭约，后又至教育厅王、徐饭约。9点余归，因在黄处与缪安成等饮升酒稍多，即上床入睡矣。

7月30日 阴晴有雨。午前偕勉仲至金碧别墅拜访顾总司令及冷副参谋长欣，稍坐即归。下午4时顾在省府大客厅约各界茶叙，到者约百余人，主人有演词，多为安慰“三迤父老”及闻李案而发。继之以卢、霍、邓、龚，言词多无大意味。余觉不能不说，乃以数语表示，要求早日使此案破获而将凶犯尽法惩办，及向各位对闻之死表示慰问者及军警当局为同人安全多所布置者，表示谢意而已。散后至云南服务社理发。后偕勉仲至教厅应教部钟、刘、姜三君之约，席间何衍璿饮酒之勇，使人觉饮之欣赏意味全无矣。9点余归，赶作信与朱、蒋，托刘携去。

7月31日 阴晴有雨。清早6点潘及费夫妇偕刘赴机场飞渝转京。上午10时联大常委会，此为最后一次矣。饭后清理文卷，修整西红柿枝苗，遂未午睡。晚8点省府请客，客顾、唐、张镇、冷之外，均是昨日茶会诸人。饭后演美国影片“Battle of China。”11点秀升以车送归。

8月1日 阴。中午缪云台在家请客：顾、唐、张、冷、卢、张、张、胡、金，菜酒（Old Gin）均甚好，饭后留连半日未归。晚8点中央地方各机关公宴顾等，食时且演滇、平剧，惜皆不佳。11点始散。

8月6日 晴热。中午省市参议会及滇籍参政员在兴文银行请客六桌，饭后主人三位代表演词颇长，赵公望词中有对于学界尊重有限度一语，不知其意何居。饭后与勉仲访奚若，知其将于后日飞沪也。下午方喜稍可清闲，又为徐行敏家约去，系徐太太寿宴，座客皆商贾，殊无味。10点吴君以吉普车送归。

8月9日 阴有雨。上午梁漱溟偕周新民^①来谈关于闻家善后问题。晚袁仲虎夫妇在文化巷2号请客，座中晤何绍周夫妇、裴辟藩夫人、龙团长（宪兵十三团）等。饭后大雨一阵，十点余归。

8月10日 晴。上午八时迁委会开会，讨论与裕和实业公司商订承运第二批物品问题，会后便饭。晚作与岱孙长信。

8月13日 晴。8点偕勉仲赴顾、卢饭约于青莲街卢寓，晤梁、周。闻顾言后日将公审一多案凶手，并邀吾等观审。归后与家人谈话，至二点始睡。

8月14日 晴。午前迁委会通过第二次与裕和公司签订运输物品合同，派丁兆兴赴沪，沈刚如赴渝协助照料员生迁运事宜。

8月15日 晴。午前后得清理积件不少。上午10时偕自昭、柳漪、勉仲往地方观审闻案凶犯汤时亮、李文山二人，汤为警

^① 梁、周皆“民盟”特派代表专程赴昆调查闻、李案者。著有《李闻案调查报告书》，见《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二辑，1984年6月云南历史研究所出版。

备司令部特务营连长（湖南衡阳人），李（湖北人）为该连排长，二人似为正凶可无疑，惟皆为特营官佐，而于出事之日，又皆便衣带枪（偕一军需上士在逃未获者）出营，未久即至云大会场，听到闻之演词遂“激于义愤决下毒手”，此实巧极，不无可更研究者。法官三人为陆军总司令部、省保安司令部及宪兵十三团之代表，讯时系择其预审供词要点特为重讯、并以为观审了然者，于是否有人主使特分别追问，犯人皆称无有，可以见之。11点半散庭，下午2点再开庭，余则未往，盖已无关紧要矣。下午发呈教部二代电，为平校修建费请追加及收回土木工校事；一函与傅任敢，一函与钱莘觉；一函与朱部长，又与熊校长为航空研究所处理事。晚为招考借用云大考场，约宴何教务长、丘、柳、张、李、张诸君，由冯、贺、查、朱、张作陪。饭后何酒似稍多，与查下象棋，颇话多。未散余先出矣。

8月17日 晴。上午庄前鼎来谈关于航研所处置问题，随接熊校长电，赶嘱将房舍风洞及家具准备点交与云大借用。下午小睡后接信甚多，岱孙自北平，企孙自上海，子坚自南京。随批复并急电教部贺司长请将清华经、临各费汇拨北平。

8月27日 晴热。中午各界饯送顾墨三总司令于省政府，闻一多案之凶犯二人已经定罪处决矣。下午2时赴教育会之教师节庆祝会，张尊鷗及余与勉仲有演词。晚饭又约宴耆老及各机关首长话别。

9月5日 晴热。连日收拾箱件，愈收拾愈有增加。因定明日飞渝，盖须赶做矣。午后3时半赴图书馆之师院及附中附小同人茶话会，校园中布置甚整齐清新，甚感慰，晚未出门，收拾零事至4点始睡。

9月6日 晴热。早8点起，再清理琐事。9点余赵君去中航公司购票过磅，12点余偕霍、查、赵、姚赴机场，乃待至3点1刻始起飞，到机场来送者：严燮成、李琢庵、缪云台、金华赵、

丁龙培全家、及董君父子。5点3刻降于珊瑚坝，刚如来接，须以划子过渡。至中四路61号招待所，即暂住侯华民君让出之小室。晚余又荪约饭，晤唐肇黄、殷源之、饶钦上（植物）。饭后与冯、贺、王、张诸君稍谈。

9月11日 晴。早5点半以清中汽车赴珊瑚坝机场，何、侯二君来送，一妇人适在场中生产，由郑善夫夫人为之料理，乃初闻小儿呱呱哭声不久，即见该妇人起立抱之他往矣，盖东北人之尤健者也。7点起飞，一路颇平稳，中途未停，12点20分在西郊机场降落。陈、毕、张、王、汤、邓诸君来接，入城后住骑河楼同学会内院之北上房，颇舒适。5点余至北大松公府之平津国立院校长聚餐，晤金问洙（北洋代校长）、陈荩民（工院长）、李润章、傅孟真、郑毅生、徐悲鸿、孟广喆，谈及学生公费问题等。饭时稍坐别出，至石板房佩松家饮洋酒甚好，晤其令弟佩芹及夫人。10点偕佩松、正宣至南柳巷稍坐，德章、瑞年皆已来平。11点半归。

9月12日 晴。早8点起，早点后，同人来谈者二三起。报馆记者均未见。11点偕陈、汤、毕至清华园。下车后由新南院步至体育馆、医院等处看各部修理情形，工程进行似太迟缓，应催促加快，否则不能如期完成矣。2点始午饭，4点半回城内，晚7点赴大陆银行谈季祯经理饭约，客十五六人皆北大、清华同人。

9月13日 晴颇热。日间未出门。午前接见记者二起。陆锡纯来告将赴沈阳就中正大学驻校主任，此子颇努力也。下午4点约保委会及继侗、佩松略谈开学前应准备事项。晚7点在灯草胡同14号陈宅与保委会诸君约宴，胡、傅二校长及杨、汤、郑、郑、孟广喆诸君。……饭后至东厂胡同看适之所借傅沅叔之宋板水经注，又见孟真新购古铜器多件，其中一古剑似系铁制而包以铜者，把玩间将其尖端板折，甚为不安。11点归。

9月15日 晴热。早8点起，早点后至古月堂看储存各室。

10点至颐和园外夏令营，拟参加其毕业典礼，后因待陈诚总长来平改于下午举行，遂出至燕京东大地，访陆志韦校长。后至朗润园20号逢吉处午饭，六弟、祖培、赵先舟、锡纯、祖成、祖武、祖麟皆在，亦一小团聚也。……7点赴邓健飞饭约，客除中信局由沪新来之江、徐、陈三君外，皆清华同学：岱孙、仲明、思成、佩松、王季高、王国忠。饭后9点余至国会街招待所看同人各家居住情形，梁、金、张、李继侗、吴晗、王佐良、余瑞璜及潘家。11点归。

9月17日 晴风颇冷。昨夜雷雨颇大，早起风凉，颇有初冬意味。9点偕岱孙、佩松、德章至农事试验场参观，由戴君某及汪次堪等引导至各部大致一看，颇感原来规模之大，现难维持，殊觉可惜。中午返骑河楼午饭，下午4点吴泽霖来谈。夕出访凌其峻、关颂声两家，皆未遇，在杨梦赉【处】坐谈半时许。……饭后与今甫、华炽、岱孙至长安戏院看候喜瑞之《青风寨》、宋德珠之《摇钱树》、丁至云之《玉堂春》，皆尚平妥。

9月18日 晴仍有风。上午11点约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7人会谈，留午饭。下午发电致上海丁、叶、沈，促同人早来平；致南京沈茀斋，催部拨款；致刘觉民、陈嘉促返校者。晚今甫、毅生、华炽约在恩成居便饭。饭后至长安戏院看小翠花之《排〔挑〕帘裁衣》及《双沙河》，其做工甚细腻，殆无可与比拟者。

9月19日 晴，午颇暖。上午10点与吴、张、李赴北大松公府与北大、南开代表六七人会谈新生招考及联大与补习班分发的学生问题。会后留午饭。

9月21日 晴热。上午10时在北大松公府与三校代表再商新生录取标准。中午与岱孙赴熊市长饭约，晤唐得源，新自教部来视察社会教育者。返寓小睡后，三点半与正宣、佩松赴车站，搭4点快车赴津，车中系对号入座，秩序甚好。6点半抵车站，朱继圣、陈卓人及卢开瑗来接，住朱家，毕、汤住东亚公司招待

所，适为对门。

9月22日 (在天津)晴热。早点后受培送车来，9点半出门。……晚7点赴银行公会，清华同学欢迎会，到者共八十余人，为诸君报告最近复校情形。10点散归。

9月24日 晴暖。早点后，7点3刻赴东车站，几误车矣。杜建时到站送行，惜未获多谈。10点半到平。……下午4点赴松公府，作录取之最后决定，清华录取最多，1356人，北大四百余，南开仅数十人，遂由二校再作录遗之收纳，其程度实将更低。清华处此境，未便多作主张矣。

9月28日 晴暖。上午10点赴松公府之临时大学补习班分发委员会，分发清华者为387人，则较日前估计者又多八十余人矣。

9月30日 晴暖。上午10时偕毕、戴诸君赴校，毕、汤等往土木工专接洽收回校舍事，进行尚顺利。甲所各室略为布置，下午至办公楼详细察看，备日内移入办公。夕在毕家饮咖啡稍坐，6点余进城，仍住骑河楼。

10月2日 晴冷。早起后渐有风，天气渐冷。午前出门须着驼绒袍矣。中午在松公府三校代表聚餐，饭后谈至3点始归。下午与陈、毕久谈复校准备各问题，多关于人事者。晚7点赴日使馆，……。

10月3日 晴冷。午前11点至校。原定今日起在校办公者。但因大楼各室尚未修整完竣，暂仍在工字厅后部办公，俟数日后迁往大楼。午饭在何汝揖家，饭后回甲所小睡，起后至办公楼各室察看，适岱孙来，商谈后略为改动。晚饭李剑秋备馔，仍在何家，马约翰偕其二女已搬住校内，相见甚欢。钱伟长似颇能饮，但稍嫌少年气盛耳。归寓后洗澡上床，觉甚舒快也。

10月4日 晴冷。早8点起，早点后至后工字厅办公。朱慰之已于前日来平，今早到校，问知教务处注册组所需各底卷均未携来，亦未交由第一批车送来，更为失望。

10月7日 晴、午暖晚凉。早9点李筱韩、范绪筠来谈在津接洽选购敌伪工业物资经过。李继侗来谈新生问题。中午至松公府与北大汤、郑、陈、郑，南开黄、孟，清华吴、李、朱谈联大学生分发问题、补习班学生公费问题等等。……

10月8日 晴。午前到校至后工字厅办公一时许。中午在甲所约Mr. & Mrs. Walter, S. Robertson, Bob & Mrs. Harris, 岱孙、福田、逢吉便饭，谈叙颇畅快。3点客去随即入城。夕至韩宅，郁文已于中午到平。

10月10日 晴和。早9点半到校，10点至工字厅偕同各教授赴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仪式简单，先请陈岱孙报告保管委员会之复校工作，后由余致词，告大家今后之艰难，勉以共同努力。中间有陈福田献日医官呈献军剑；孙立人由潘参谋代表赠日军旗一面、军刀一柄；熊祖同代表辛酉级捐赠钟亭修建费一百五十万元，使会场中人大感兴奋矣。会后招待校友及各教授在工字厅便餐十桌，惜未能共食，因须赴勤政殿之李主任庆祝酒会。一点客将散，与袁志仁、陈荩民再与李主任谈供煤问题，请其务代设法。

马占山与北京和平解放

蔡运升

编者按：本文系介绍在北京和平解放中，马占山的活动。作者曾亲与其事。此文写于1951年，今刊出供参考。

北京的和平解放，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主持的，傅作义先生作的对了。在酝酿过程中，邓宝珊先生出力最大，也是大家都知道的。马占山先生的推动力，似有许多人不知道吧！事实是这样：1948年秋天，沈阳尚未解放，马先生由东北回京，即抱定解放北京的决心，曾与我和王家桢先生、王之相先生四个人鸠首会议，认为京津一带驻有蒋介石重兵，牵制力很大，傅先生自己无法举动。马先生赤手空拳，有何活动更危险万分，当日在西北抗战时，所率领的挺进军旧部，虽拨归傅先生指挥，尚可纠合起来。一经说好，即秘密出城，身入军中，以这支部队作为主力，然后与傅先生及解放军联络，为保全千年古都，二百万人民，绝对取双方一致方针。请傅先生内外布置完全作个匕鬯不惊的解放。当时推王之相为秘书长，王慨然自任。王走后，马先生向我说，叔梅肯与我同生死，为了国事很值得，言下极为感慨，今犹如闻其声。

此时风声鹤唳，一日数惊。一日由傅先生司令部转到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来电，请马先生速赴南京，另畀以总司令要职云云。马先生付之一笑，立即复电谢绝。未几东北军事紧急，蒋介石亲到北方指挥。蒋走后，郑介民又来京住了几天，对特务上有些布置。郑走后，军统局副局长宋维一紧跟着来见马先生，劝赴南京，他们预备飞机。马先生严词拒绝。这时马先生的行动，他

们已注意，可是马先生为中外皆知的抗日英雄，他们不好轻易怎样。而且马先生浑身是胆，在千军万马中所向无敌，他们也不敢轻易怎样。马先生知环境已恶，佯若无事，态度越发从容。每日同我照常出去访些无政治色彩的朋友，或逛逛北海，或吃吃小馆，他的事，家里人和日随左右的副官谁都不知道，所接头的人全是个别谈话，彼此不相闻问，真是严密极了，也镇静极了。正布置中，为日无多，东北已全部解放了，解放军用兵如神，很快的就打到了京津。王化一先生衔着重要使命，偕党内同志数人秘密入京，请马先生与傅先生联络和平开城。马先生毅然引为己任，遂改变了自己出城的计划，拿出全副精神，专为此事昼夜进行。我当然是参与一切的。马与傅明着不便往来，傅先生派一李处长联系，均在夜间，到马先生家里接头。王化一诸位潜居各处，有杜超杰先生奔走其间。我们都很忙，此时解放军已围城，马先生很着急，遂传话与傅先生，派飞机接邓宝珊先生来京，共同商定。马与傅、邓三人在抗战时期同驻西北八年，是肝胆之交。且邓是副司令现职，可正式住在司令部内，天天与傅先生密商，不露一点声色，最合机宜。马先生平时常对我推重邓先生如何如何，邓一到，他就以接风名义，在家请吃晚饭，为王化一、杜超杰和我介绍见面。我一见其人，深服马先生有知人之明，断定此事必能成功。果然，邓到后不出几天，就与傅先生将一切办法都决定了，并且亲自出城都办到了。

当时围城内每日炮声隆隆，人心惶惶，城内各团体亦各有结合说要出城见解放军去。一时特务们凶恶的眼光即注意到这些人身上，竟下毒手放了炸弹，将何思源女儿炸死，简直是杀人不眨眼了。忽一日，特务头子宋维一到我寓所侦查，当然门外已安排有人，我与杜超杰避在别室，幸未遇见。宋对别人说，国防部有密电，指明我们六、七人运动开城，业经成熟云云。其势汹汹，眼看就要逮捕。幸而邓先生出城回来的快，宣布的亦快，这些特

务们都抱头鼠窜，坐飞机逃走，我们才算脱险了。事后谈起，不能不说是一场生死关头的大祸。可是我们在当时谁也未觉害怕，也不知那里来的这股勇气，我想这就是正义及和平的真精神吧。

解放以后，马先生大乐，极称赞大家，但是自己一点也不居功，并与我相约，彼此绝口不谈，直到今天，已过两年，谁听见我和马先生谈过呢。只有一、二友人处曾问过我，何以多日不见，我才简单说出一点，说我天天准备被捕，在谁家捕去，就连累了谁家，不肯教朋友遇祸，所以不来，大家才了然，并为我庆幸。一日马先生同我到前门外烟市买两条纸烟，在大街上散步，看市面很繁荣，马先生很欣快，一面走一面笑着说，看这样和平景象，咱们冒一回险算值得了。今天在群众中谁也不认识咱们两个老头子，更想不到为他们出过一点力，几乎送了老命，可是咱们并不希望人家知道，总算在自己心里是真正一桩痛快事呀。我说咱们也学学汉朝的大树将军。他说咱们还不够吧，说完我们都笑了。如今言犹在耳，马先生何在？我想到此不能再想下去了，我老泪纵横了。未几南北议和南京代表团来京，马先生认为国事可以和平解决，又以代表们都是老友，高兴的了不得，赶忙筹备招待，说我们虽是局外人，在精神上打打气亦好，遂常常在家请客，当然我亦大吃大喝，常作陪客。那些日子大家都很乐观。迨所订的条件发表，更认为无问题了，万想不到蒋介石冥顽不灵，竟悍然不纳，完全破裂了，气得马先生天天大骂，但是为日无多，蒋介石就大败而特败，大江以南传檄而定。马先生又大乐而特乐了。马先生戎马一生，老年多病，可是一提到国家，立刻就精神百倍，大发议论，声如洪钟，好象放送一样，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两个老头子忘了老不中用，常常学习，也一知半解的讨论，一说到国家的建设，他就眉飞色舞的大乐，一说到日本的侵略，他就咬牙切齿的大怒。他爱国心最切，常常说拼命一辈子，到了老年能亲眼看见我们中国成了世界上头等强国，是梦想不到的事情。谁造成的就崇拜谁。

真是快人快语，可惜他的热诚一天比一天高，他的病势却一天比一天重，竟于去年冬去世。今天我把马占山先生参加和平解放北京的一段往事实实在在地写出来，亦可作为追怀马先生的一篇纪念。

总71号目录预告

湘楚军营制	江之舟整理
当行杂记	赵沛霖整理
典务必要	丁红整理
庚子终南会暴动始末	刘朝榕
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	包世杰
宪政实行宜定宗旨管见折	杨度
日人阪谷芳郎来华调查	
币制改革材料数则	云述摘译
章太炎关于浙路借款案的演说	赵金钰辑录
章太炎先生答问	张庸辑录
章太炎致黎元洪手札	赵金敏整理
伯力交涉始末记	蔡运升

抗战时期昆明救亡戏剧运动

龙 显 球

编者按：抗战时期昆明成为大后方的中心城市之一，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戏剧运动日趋活跃。本文系龙显球亲身参加这一运动的回忆纪实，可供研究抗日救亡戏剧运动史的参考。

前 言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芦沟桥借故挑衅，打出罪恶的第一枪，开始了进攻中国本部的侵略战，在敌人疯狂的压逼下，芦沟桥守军开始为维护祖国尊严给予有力的正义还击。次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战宣言，主张“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确定全面抗战方针，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全国人民团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民族生存独立而斗争。

“八·一三”上海抗战兴起，八百壮士赢得民族骄傲，在“中国不会亡”的歌声中，进一步掀起全国抗敌救亡民族自救的巨浪。随后南京失守，武汉沦陷，广州撤退，民族解放战争走向持久阶段。云南虽地处边陲，文化落后，但处在民族危亡紧急关头，自然承担起应负的重任。由于抗战形势急转直下，外省大批机关、工厂、学校迁入云南，人口急速增长，昆明形成了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这时期昆明的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蓬勃开展，戏剧运动尤为突出，其中以话剧活动为最。

云南现代话剧的诞生，是以1936年秋云南艺术师范戏剧电影科和群众性的金马剧社成立为始。当时教育厅长龚自知从北京、上海聘请了陈豫源（北平大学戏剧系毕业，曾随熊佛西在河北定县搞实验戏剧，原籍云南）、王旦东（上海劳动大学肄业，曾参加“剧联”）为艺术专员，筹组艺师戏剧科和金马剧社（附设于省民众教育馆）。1937年新年，艺师戏剧科卖票公演出陈豫源导演的《父归》（田汉改编，菊池宽原著）和《屠户》（熊佛西著，两幕剧）。男、女生同台演戏，在当时的云南，封建的遗老、遗少们是很难同意的。何况读书是为了将来做官，荣宗耀祖，演戏是下流痞子、没出路，更败坏门风；其次学校内部教师们也多数反对卖票演戏，学校岂能卖票，成何体统？一切责难纷至沓来。陈豫源坚持售票是为了戏剧教育的广泛性，并制订演出制度，如一人一票，不得携小孩入场，前后台人员不得互串、场内不得喧哗、吃零食，开幕后场内熄灯等等，造成场内、舞台一片肃穆气氛，创建了昆明话剧演出的崭新风格。

同年金马剧社成立，是由顾子正、陈豫源、王旦东在教育厅指示下，为推动社会教育而筹备建成的，是业余群众性组织。成员多系店员、职员、中小学教师。1937年5月由陈豫源、范启新导演《姊妹花》（阎哲吾改编）演出。艺师戏剧科和金马剧社的首届演出不同之点是前者纯属正规学校教育演出，后者是一般业余爱好者的产品。总的说来，演员都是初次上台，表演难免粗糙，但严肃认真忠于剧本，这个起步是正确的良好的。

“七·七”一声炮响，惊醒了国魂。当时云南高中以上学生军事集训队将届毕业之前夕，七、八中队在朱家璧中队长指引、支持下，于八月毕业时联系在队全省各校同学举行了毕业联欢会——也是抗日宣传大会（演了三晚），除演唱救亡歌曲外，以艺师戏剧科同学为主演出了《撤退赵家庄》、《打回老家去》（马金良、龙显球导演），这是云南抗敌救亡话剧的第一声。剧情及时地反映

了现实，表现人民、士兵、爱国军官们，誓死捍卫祖国，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学生们继承了“五·四”、“一二·九”革命传统，积极动员全面抗战，尽管“皖南事变”后，当局对戏剧救亡活动有所限制，但在党的坚持抗战，反对分裂，“有理、有利、有节”的思想、政策指引下，仍然曲折的向前发展，为团结、民主、抗战救亡作出了贡献。

各团体、学校戏剧活动具体情况

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

1937年前后，云南大中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临时省工委领导下，有“学生救国联合会”的秘密组织（领导人李剑秋），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一类活动。当时学联主席是伍兴仁（云大学生），还有唐登岷（昆师学生）、谭惠英、杨润珍（女中学生）、包平章（富春中学学生）、江毓琛（云大附中学生）、朱明华（昆工学生）……等为骨干。因在当时爱国有罪的情况下，学联活动颇受局限，迨芦沟桥事变后，国共二次合作打开了活动局面，在党的领导下，学联遂作出决定，建立公开的学生救亡组织——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学抗会”）。于8月18日正式宣告成立。曾发表成立大会宣言及告同胞书（见1937年8月20日《民国日报》，原文过长从略），即日赴街头、娱乐场所持旗宣传，吐出了大众被压抑已久的积愤，多少人激动得眼内充满泪花。昆明震撼了，为民族、国家的尊严，神圣领土的完整，人民怒吼起来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回老家去！”炎黄子孙的心灵在燃烧。

学抗会在抗日救亡、要民主团结的宣传上，起到了先锋作用。我们（笔者当时负责宣传部戏剧股长职务）编辑了《云南学生》，组织了全省、市各校抗敌分会和妇女歌咏团（活动情况从略），最突出的是戏剧活动方面，在云南抗战宣传和话剧史上应占重要

的一页。

根据不完全统计，学抗会及各校分会话剧演出情况如下：

学抗会：1937年“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晚间举行纪念会，除歌咏外演出了《无名小卒》（熊佛西著）、《死亡线上》两个独幕剧。10月7日又在官渡演出《死》剧。10月28日、29日与昆师、农校联合演出了《当兵去》、《省下一粒子弹》。11月13日、14日在市内街头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以下简称《放下》，龙显球导演）。此为云南第一次街头剧演出。11月14日在莲德镇演出街头剧《放下》、《难民曲》两剧。11月28日在马街演出《放下》、《难民曲》。1938年2月22日至27日在艺师礼堂募捐演出四幕大型话剧阿英著的《春风秋雨》，龙显球、韦述陶导演，主要演员唐登岷、杨润珍、龙显球。又曾组织了深入附近昆明各县的寒假宣传队，携带剧目有《日光》、《死亡线上》、《一颗炸弹》、《难民曲》、《放下》等。

昆华女中校分会：1937年10月12日在南校场街头演出《难民曲》、《仁丹胡子》。10月20日在马街演出《放下》。1938年7月13日至20日在云瑞中学礼堂募捐公演阳翰笙著的《前夜》（四幕剧）、田汉著《晚会》（独幕）、《七十七号》（三幕剧，作者不详），导演杨其栋、谢熙湘、龙显球。1939年演出《太行山上》、《八百壮士》等剧。

昆华师范校分会：1937年12月28日为纪念云南护国起义，与学抗总会、农校联合演出《当兵去》、《省下一粒子弹》。1938年2月14日赴宜良、路南县演出《放下》、《省下一粒子弹》。3月2日、3日在本校公演《无名小卒》、《阴谋》、《警号》、《放下》等剧。

昆华农校校分会：1937年12月9日至昆明附近农村演出《难民曲》、《扫射》。又在本校舞台演出《黄浦》、《搜查》、《在关内过年》三个独幕剧。

昆华工校、虹山中学校分会：1937年10月20日至农村演出《从军》、《到前线去》。1938年7月8日至11日舞台演出《血洒晴空》、《高压下》。后来还演出《风波亭》。

南菁中学校分会：1938年1月17日舞台演出《烙痕》、《蔡东之夜》（龙显球导演）、《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三个独幕剧，后又演出《北地狼烟》。

求实中学校分会：1938年6月舞台公演《米》（洪深著），在街头农村演过几次救亡话剧。

昆华女师校分会：1938年在本校舞台演出《奴才》、《盲哑恨》、《咱们要反攻》等独幕剧，也经常至农村演出。

云大附中校分会：是救亡活动比较积极的组织之一，疏散至路南县后，曾辅导该县县中成立剧团并联合至街头演出，舞台演出过《有力出力》等剧。

云大校分会：1938年元旦在本校舞台演出《曙光》、《反攻》（杨其栋、马金良、龙显球导演），后来演出《血火》（林朴园编导）及《打回老家去》等剧。

昆华艺师校分会：（下面另有专目）

在地下党领导下的学抗会的活动比较活跃，受到国民党注意和怀疑，终于在1938年春，趁各校放假之际，突然被罗织莫须有的罪名明令解散。

云南艺师戏剧电影科

戏剧被纳入正规教育，是云南前所未有的事。全科学生约四十余人，班导师只有陈豫源一人，后来又约请王旦东担任舞美设计教师，如此而已。但他们确实成为云南戏剧活动的一支主要力量。在校三年期间共演出七届：第一届演出已见前文不再叙。第二届演出是“七·七”事变后，那时陈豫源离昆到北京去，校内无教师，此时云南六十军奉命出发抗日，龙云拨了一笔专款（旧

滇币一万二千元），指定戏剧科筹备节目演出欢送。虽无教师，同学凭一腔爱国热忱，排演了三个独幕剧，总名《抗敌三部曲》，即：《撤退赵家庄》、《血洒芦沟桥》、《全民抗战》。六十军健儿们看后增强了同仇敌忾抗日报国的决心。龙云、龚自知来看了戏，对同学们给予勉励。第三届公演时陈豫源已回到艺师，他带来了杨村彬新创作的《战歌》（三幕剧）一剧，由他导演演出，主要演员是郎蕙仙、马金良、龙显球。这次演出报刊上发表了肯定文章。第四届演出是1938年5月22日起，演出《重逢》（独幕，丁玲著）、《后防》（熊佛西著，两幕），这剧是写群众场面为主的反汉奸故事，仍由陈豫源导演。第五届演出了《雷雨》（曹禺著，陈豫源导演）。在大雷雨声中，观众不断涌进剧场。自7月1日起连演廿余场，欲罢不能。沈从文、徐嘉瑞发表文章认为是一次成功演出。主要演员有李文伟、郎蕙仙、马金良、欧维乾、杨其珍等。1938年冬，战局日紧，妥协、动摇的风声日有所闻，日机开始轰炸昆明，机关、团体、学校大量疏散。艺术戏剧科同学在严寒冰冻的日子里，以自己专业——戏剧为武器，以艺师抗分会的名义，组织了抗敌救亡宣传队，在疏散地——官渡镇六甲村及附近农村开展宣传活动（每周一次），演出《放下》、《难民曲》、《打回老家去》等剧。学生的激情，震醒农民强烈的民族意识。同时并由戏剧科同学潘藩、刘振寰、李正明、阳增祥、赵国相组成一支宣传轻骑队，深入滇中、南各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带有日帝在南京残杀我无辜人民图片，演出了《当兵去》、《放下》、《血洒芦沟桥》等剧。在爱国主义的激励下，同学们又回到昆明赶排第六届公演剧目《前夜》、《黎明》。《前夜》一剧是阳翰笙著四幕剧，因结合当时动荡情况把第四幕删去，由龙显球（陈豫源、周铭合作）执笔改写《黎明》独幕剧（发表在当时《新动向》），寓意抗战是前夜，胜利（黎明）必定到来。这戏仍由陈豫源导演，主要演员有

杨其栋、吴敏、刘焕文、郎蕙仙等。1939年6月，戏剧科同学已届毕业之期，他们选择了田汉改编的托尔斯泰名著《复活》为毕业公演剧目。这个外国戏难度比较大，也是昆明第一次上演外国剧。在陈豫源精心细致的导演下，同学们已有不少实践经验，演出显示了同学们的功力。主要演员是李文伟、郎蕙仙、吴敏、易震晓、马金良等。

另外，除舞台公演外，更主要的是辅导活动，除了在军训队毕业联欢演出外，在学抗会领导下，经常为各校戏剧活动起到骨干、辅导作用，如前面所述，学抗会及昆女中、云大、云瑞中学……等校均有戏剧科同学导演、协助演出。1939年曾为个旧募捐抗敌后援会基金，由吴敏、刘光武、雷涵芳等辅导演出《钦差大臣》。总之，艺师戏剧科是云南土生土长的戏剧队伍（后来田汉、洪深对他们曾语重心长的寄以希望），是云南戏剧教育的基本队伍。

金马剧社

1937年5月曾首次演出过《姊妹花》。全面抗战爆发后，它曾在抗日救亡戏剧工作上作出不少贡献。成员绝大多数都是青年知识分子，虽是业余性质，但为了追求理想，拯救民族免于危亡，他们艰苦地实干着。9月19日起，演出了《血洒芦沟桥》（张季纯著），《避难者》（范启新著），《开演之前》（严恭著）三个独幕剧，由范启新导演。主要演员有杨准、杨盛、纳玉华等。10月29日起，继续演出第三届，剧目是《放下》、《古城的怒吼》、《人的买卖》。第四届是在1938年元旦起上演《八百壮士》（石凌鹤著）、《生路》（范启新著）、《警号》（尤竞著）三个独幕剧。2月1日第五届公演林志音编导的《九·一八以来》（象征哑剧）、范启新编导的《谁之罪》、沙金编导的《我们的生路》。4月6日第六届公演《搜查》、《卢老虎》。前后

十个月就演出了五届，表现了他们热爱祖国的精神，虽是一些独幕剧，但工作是紧张的，及时地反映了现实。这个期间他们还配合学抗会、妇女歌咏团，到街头去宣传。也组织过轻骑式宣传队到滇西各县去演剧宣传。

从1938年中，王旦东由电影队调回金马剧社后，就转向为大型的舞台演出。6月8日起第七届演出了《飞将军》（洪深著），这是表现我空军英勇杀敌的故事，由王旦东导演，主要演员有徐蘋、王琳（柯仲平夫人）马金良、王旦东、张靖国等。同时演出《血钱》（独幕剧）龙显球导演。连演了七天，突破当时纪录。第八届演出从8月14日起，演出尤竞著五幕大型剧《夜光杯》，是以冀东伪自治政权为背景，描写爱国志士刺杀汉奸的过程。王旦东导演，主要演员是徐蘋、纳玉华、杨准、白芬等。连演十四天场场满座。九月敌机轰炸昆明，一部份人疏散，一部份人却从省外涌入昆明，联大个别民先队员也参加了演出第九届公演《黑地狱》，女主角金子由联大学生张定华扮演，此外主要演员还有程亚平，金戈、李月水、马金良等。这次演出时适逢茅盾经昆明到新疆，看了戏后在《云南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当局建立一个小剧场。第十届演出由王旦东导演，唐纳编剧的《中国万岁》，主要演员是王旦东、苏茵、程亚平、金戈等。1939年4月20日至5月1日在国民党省党部礼堂演出第十一届，剧目是吴祖光编剧的《凤凰城》，剧本深刻表现了在敌占区中国人民的不可征服性。王旦东导演，演员有樊筠、苏茵、金戈、马金良、李月水等。报刊发表了评论文章。最后一次——第十二届，是同年8月1日至12日，演出由李树棠改编、导演的《钦差大臣》（五幕剧），剧本内容是众所熟悉的，改编曾在报纸上引起不同看法和争论。主要演员有关媚如、关红英、雷涵芳、安娜、曹孟浪、李月水、程亚平、马金良等。除舞台公演外，还以程亚平为队长，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街头农村演出救亡剧本，如《一颗

炸弹》、《沦亡以后》、《放下》、《九·一八以来》等。

1939年奉教育厅命结束，另由剧社成员为主，成立了戏剧巡回教育队，有关剧教队具体情况下文专述。

西南联大的戏剧活动

西南联大原系在北平、天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于抗战开始后迁入昆明联合组成。同学们有着“五四”以来优良传统的革命意识，由于国土大片沦丧，敌人的血腥屠杀，更激发了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激情，认为抗战救亡责无旁贷。经过一些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和爱好戏剧的同学的联系，筹备演出话剧，宣传抗战救亡。1938年末演出过《夜光杯》，主要演员有徐萱、陈欧生等。还演出过《春风秋雨》，主要演员有高小文等。1939年1月“山海云剧社”在云瑞礼堂演出了《雷雨》，演员有汪雨、劳元幹、刘雷、张棣华（导演不详）。以“联大剧团”名义在1939年2月18日至25日演出陈铨根据《古城怒吼》改编的《祖国》。故事是写日寇占领下某城，一位大学教授，不顾个人一切向日寇、汉奸斗争最后牺牲殉国。孙毓棠导演，闻一多舞台设计，知名演员凤子扮演教授夫人，其他学生演员有汪雨、刘雷、张棣华、高小文、劳元幹等。这次演出台上台下都洋溢着热爱祖国的情绪，报刊上发表称赞文章，奠定了联大剧团的声誉。接着他们又到昆明近郊农村和嵩明县杨林一带宣传活动，演出了《放下》、《三江好》、《最后一计》，并到郊区工厂、部队演出。1939年8月联大同学还参加由昆明国防剧社聘请曹禺来昆导演《原野》、《黑字廿八》两剧演出，具体情况见下面国防剧社专目。这次演出后，联大剧团又公演了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大型剧《夜未央》，主要演员有罗宏孝、刘辉、邹斯颐等。此后，由于剧团内部同学思想发生分歧，矛盾日增，在剧团改选时，领导权被保守同学取得，进步同学在地下党指示下，以党所影响的学生组织

“群社”和进步同学组织了“联大戏剧研究社”。一部份进步同学仍留团内进行合法斗争。在此期间，三青团学生也组织了“联大青年剧社”。在这复杂情况之下，三个剧团先后在市内演出。青年剧社1940年7月20日起，演出了《前夜》一剧募捐，导演署名该社导师，主要演员是劳元幹、沈长泰（艺专学生）、汪雨、姚念华、董云、钱重慈等，连演十余场。9月9日起联大戏剧研究社公演《阿Q正传》，由郑婴导演，黄实饰阿Q，得到报社进步记者们拥护，大量报导演出消息，校内掀起学习鲁迅热潮。10月8日，联大话剧团公演带序幕、尾声的《雷雨》。主要演员高小文、孙令仁、许令德、汪雨、邹斯颐等，戏剧研究社的肖狄等也来协助舞台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进步学生有的离昆，戏剧活动一度消沉。8月为劝募公债，联大剧团假昆明大戏院演出了《傀儡家庭》（易卜生原著），由凤子、孙毓棠联合导演，主要演员是凤子、姜桂依、劳元幹、许令德、汪雨等。1942年6月4日起，联大青年剧社演出陈铨编剧的《野玫瑰》，这是战国策派宣传权力哲学的作品，是当时社会上一股逆流。剧本取材沦陷后的北平为背景，曲解人生，美化汉奸王立民。遭到社会进步戏剧人士王旦东、田鲁等五十余人联名反对，向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处申请缓演该剧。但处长陈保泰于6月4日在《中央日报》发表言论，认为该剧是教育部给奖作品，内容正确准予上演。从而引起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愤慨，在青年记者联谊会的支持下，报上发表了陈白尘、西涯、范启新等大量批判文章，校内同学也掀起抵制舆论，最后演员们也觉醒了，只演了三、四场即草草收兵。8月联大剧团演出了阳翰笙编剧的《塞上风云》，是描写各民族团结抗日的故事，主要演员有李文伟、樊筠、刘萍等，联大学生有高小文、陈颂声、唐培源、马如龙、王肖宗等。8月10日山海剧社、怒潮剧社（联大学生另一组织）联合演出曹禺著的《北京人》，导

演、演员情况不详，地点是西南戏院。同时联大学生另一组织青春服务社演出《青春不再》。1943年5月26日起，联大中文系同学演出《风雪夜归人》（吴祖光著），由孙毓棠导演，闻一多舞美设计。10月2日起，山海云剧社演出《家》（曹禺改编），由范启新导演，演员有徐韦、张轩子、柳凝、樊鸽、陈逸、李辛、邹小玲、胡蕊等。1944年联大同学分散参加社会上各剧团演出活动。1945年疏散归来的同学们又组织了“联艺剧社”，演出了陈白尘作《草木皆兵》，演员有肖狄、王松声、温功智、丛硕文、张定华等。另外还演出过《镀金》等独幕剧。

总的说来，联大同学迁入昆明后，在文化学术、民主革命传统的继承、抗战宣传、戏剧运动方面都发生巨大影响。

国防剧社

国防剧社是滇黔绥靖公署政治训练处成立的一个剧社。这个剧社的成立是抗战开始后，龙云表态要“以全滇人力物力贡献国家”。政训处秉承这个方针为开展抗日宣传各种措施而组成。1938年昆明已是抗战大后方重镇，各文化团体、大专院校、报社人材济济。当时政训处负责宣传任务的李济五，鉴于这种情况以及政训处宣传工作不应仅限于部队，应面向社会。经上级同意李济五为社长，1939年夏宣告成立。

国防剧社虽成立，但实际上没有自己的演员、导演，多是邀请联大、国立艺专、云南艺师戏剧科同学参加演出。第一届是1939年3月29日至4月3日邀请艺专李朴园导演，演出了《凤凰城》一剧，演员均系艺专学生，有沈长泰、邱玺、莫桂新、林倩等。第二届公演是平剧，邀约当时在昆的名雕刻家、票友江小鹣主演《文天祥殉国记》，以及《战临沂》，李鑫培饰李宗仁，赵至玉、徐敏初也参加演出。第三届演出是通过闻一多、凤子、吴铁翼（艺专校长）三人邀请曹禺到昆导演。曹到昆后经大家商定演出《原

野》、《黑字廿八》（又名《全民总动员》，曹禺、宋之的等集体创作。以下简称《黑》剧。），《原野》一剧由曹禺导演，舞台设计是闻一多、雷圭元。这里还得多说几句，就是闻先生舞台设计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每幕都绘出平面图与曹禺商议，布景制作也是根据小样绘制。《黑》剧同样，闻先生也是一丝不苟的亲手（很少一部分是艺专同学动手）绘制。《原野》一剧角色不多，由凤子饰金子、李文伟（艺师）饰焦大星、汪雨（联大）饰仇虎、樊筠（职业剧人）饰焦母、孙毓棠饰常五、黄实（联大）饰白傻子。

《黑》剧演员有四、五十人之多，这就必须动员更多的人，经国防剧社与联大剧社、艺师等剧社协商共同联合演出。决定导演团是曹禺（执行导演）、孙毓棠、凤子、陈豫源、王旦东。曹禺导演工作是认真的，笔者曾忝为场记，每一个动作、表情（包括声音），都丝毫不苟。如他在《黑》剧中扮演杨兴福（小汉奸），有被打嘴巴的一个动作，饰沈树仁（大汉奸）的马金良有顾虑，动作失实，他就一再要求演员进入角色，要体现真实情感。马只得认真打了一记，才得“这次打对了”方通过。又如《原野》一剧排练时，焦大星与仇虎相遇的场面，演员李文伟一再被指示“重做”，他被弄得汗流浃背。《黑》剧导演团人员全部参加演出，曹禺扮杨兴福、凤子扮富商女、陈豫源扮富商、王旦东扮孙将军、孙毓棠扮邓疯子，另外演员有谢熙湘扮黑字廿八，马金良饰沈树仁，还有联大、艺师许多同学参加。两个戏从八月十六日起共演了卅一场。这次可说是昆明剧人的联合公演，得到文艺界高度评价。朱自清在《今日评论》上发表文章，认为作者曹禺亲自导演《原野》取得成功，是戏剧史上的一件大事；徐嘉瑞、李乔在《云南日报》也写了剧评（后来李乔把《原野》演出誉为云南话剧演出的三大里程碑之一。其他两个剧是《清宫外史》、《孔雀胆》）。第四次演出是邀约当时在昆的西南旅行剧团演出老舍编剧的《国家至上》，张树藩导演，演员有高祥、齐格夫（齐

衡)、董林、曹藻、穆义清、贺学励、许肯等。时间是1942年4月25日至30日。第五次演出是1942年7月15日起在西南戏院公演《雾重庆》。这次演出多系邀约各剧社成员协助，顾问是孙毓棠，导演署名本社导师，演员是刘萍、张定华、周序东、拓拔大威、沈长泰、樊筠、徐守源、马金良、孙观华等，连演十余天。第六次在国民党省党部礼堂演出丁西林编剧、孙毓棠导演的《妙峰山》(五幕剧)，演员有汪雨、徐华、王肖宗、陈颂声、马莎、周序东、刘蕊、刘萍、程亚萍等，多系联大同学和金马剧社成员。时间是1942年12月中旬。第七次演出是从1945年1月15日起，演出剧目是阳翰笙著《天国春秋》六幕剧。由重庆到昆的章泯导演，演员是有《孔雀胆》演出名演员王人美、王班、宗杨等参加，另外有国立剧专毕业在昆的奚立德、张莺、陆群、奚燕、诸葛亮、张凡、刘静淑等。这次演出王人美、王班是博得观众好评的。

从以上演出过程来看，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倡导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方面是取得很大成就的。

上海影人剧团

上海抗战的烽火，使上海一部分电影演员们离沪内迁，他们组织了影人剧团，首先到了四川成都。不久因意见不同就一分为二，以明星影片公司的一部份人如王献斋、龚稼农、孙敏、周曼华、王微信、吴玲子、袁竹茹、马瘦红(布景设计师)等受昆明孙麟芳邀约，到昆明公演。上海影人剧团遂于1938年9月到达昆明，本地话剧界举行座谈会欢迎，陈豫源及一部分艺师戏剧科同学参加合作。10月10日新滇戏院(即今艺术剧院)首次公演了《芦沟桥之战》、《沈阳之夜》等剧；10月19日上演了《天罗地网》(即《缓期还债》陈绵改编)；10月20日演出田汉著的《回春之曲》；10月27日演出《雷雨》；11月6日演出《夜光

杯》；约过七天后又演出《日出》；最后一次演出是《摇钱树》。前后历时两个月。客观地说，他们演技老练，布景用的是有实感的立体景，这些方面给当时昆明话剧界起了提高的作用。不足的是有一些商业化倾向。在昆演出以后他们就分散了，如周曼华回到沦陷后的上海曾红极一时。

云南戏剧巡回教育队

云南戏剧教育队(简称剧教队)，是云南教育厅在1939年秋，以艺师戏剧科学生毕业生及金马剧社成员为主成立的两个队。云武泸区剧教队是陈豫源任队长(一队，艺师)，楚姚大剧教队是王旦东任队长(二队，金马)。现分别叙述如下：

剧教一队的副队长是肖锡荃(原国立剧专教师)，队员除艺师戏剧科毕业生外，还对外招考过女队员，全队共计廿人不足，他们活动地区是滇中、南各县。巡回演出剧目有《我们的故乡》、《包得行》、《屠户》、《伪君子》、《雷雨》、《三江好》、《放下》、《回家以后》、《死里求生》、《战地鸳鸯》、《抽水马桶》(以上两剧系陈豫源著)、《最后一计》……等。出发前陈豫源在《云南日报》发表一篇近乎宣言的文章，呼吁各界人士重视戏剧教育活动，主要大意是：“为了奠定民众的文化基础，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准，激发民众的抗战情绪，实验艺术教育，达到社会教育的目标，与抗战配合起来……穿过城市到农村去，实验出一种具体的、表证的流动演剧技术方法，为抗战、为艺术、为教育而突击，让他们得到新的生命。”这种论点今天看来还是有深远意义的。经过两个月左右筹备，1939年12月初，他们走向为抗战、为教育、为艺术实验，冒着严寒冰冻的征程。前后一年时间，他们到过宜良、路南、澄江、江川、通海、河西、玉溪、峨山、昆阳、晋宁、呈贡十一县。每到一县除了舞台公演外，逢街期至街头宣传(有歌咏和漫画)，也到过一些农

村。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很多落后地区从未看过话剧，当看过剧教队公演后，多少人都认识并承认话剧是高尚的、严肃的戏剧。同时也激发了群众的抗战到底的意识。在路南和疏散在当地的云大附中联合宣传并辅导县中成立剧团；在玉溪、通海也同样开展辅导当地学校成立戏剧组织，这就把戏剧的种子普遍洒开，为云南话剧抗战救亡工作打开了局面。

剧教二队副队长莫桂新（国立艺专毕业生，不久辞去，马金良接任），活动地区是滇西、北部。巡回剧目有《夜光杯》、《凤凰城》、《天津的黑影》、《打鬼子去》、《玉江好》、《死里求生》、《钦差大臣》、《抽水马桶》、《群魔》、《雷雨》……等剧。到过楚雄、镇南、下关、弥渡、蒙化（巍山）、祥云、大姚、姚安、禄丰、大理各县，受到群众热烈欢迎。逢街期至街头宣传除街头剧外，还张贴《日寇暴行录》、唱救亡歌曲。在大姚还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劳动，提高了宣传队的声誉，农民听到省里来了演剧队，爬山越岭来看戏。在辅导工作上也是不遗余力地培训当地学校学生们演技和组织戏剧团体。在大姚时曾一度因经费未能收到，使剧队队员生活陷入困境，得到当地开明绅士李一平（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协助，介绍几个队员任教师，所得工资大家共用，可见他们的友爱团结精神。不幸折返大理演出后发生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已巡回一年多了，主张回到昆明休整，一部分人主张继续留在各县巡回工作。恰在这时（1940年底）教育厅命令两个剧教队并为一个队，即二队并入一队。这就促使一部分人离队回昆另谋出路，王旦东等十余人不愿回昆，希冀在大理坚持下去。在没有经费、没有名义的情况下，王旦东到昆明找到国防剧社的李济五，李给予“国防剧社流动演剧队”的名义，还给了五十块钱。靠演剧收入维持生活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他们挣扎一个时期，终于结束了，有的回到昆明参加到火热的戏活剧动中。

两个队在作风上各具一格，但从实际上看，都是热爱祖国，执着于戏剧艺术，充满昂扬亢奋的热情青年，是云南本地话剧工作的骨干力量。

1941年两队合并后，队名不再冠以区域名称。名为合并，实际上二队的队员并没有参加。队长仍以陈豫源担任，不久他另有所就，改由杨其栋充任，副队长先为谢熙湘、后为李正明。老队员离去很多，从社会上吸收了一些爱好话剧的青年参加。他们前后到过滇东南各县，露益、曲靖、马龙、嵩明、安宁、禄丰、武定、罗次、禄劝、石屏、个旧、蒙自、建水各处。剧目有：《我们的故乡》、《夜光杯》、《伪君子》、《父归》、《三江好》、《盲哑恨》、《最后一计》、《抽水马桶》、《放下》……等。在蒙自、石屏、建水、曲靖是售票演出，其他各县是敞开公演，当时的老百姓太穷了，在“皖南事变”的低潮中，他们能坚持在戏剧岗位上，为抗战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值得一书的。

1943年底杨其栋调去搞映放电影工作，由范启新接充队长，副队长李正明。这时队员中有国立剧专毕业生参加。一年内到过蒙自、建水、个旧等县巡回宣传。这时省民众教育馆盖了一个小剧场命名为民众剧场，范又组织了民众剧社，他说是金马剧社的延续。1943年12月11日至20日演出《人之初》（三幕剧），范启新导演，主要演员是马少逵、欧维乾、车鸿章等。1944年6月7日，起在民众剧场以剧教队和民众剧社联合演出名义，演出了《双喜临门》，由范启新导演，演员大多数是国立剧专毕业生如张莺、石慰慈、万华、蒲柳等，连演一周。10月11日至17日演出《北京人》，仍是范启新导演，主要演员郎蕙仙、穆龙、马蕊、丁虹等。1945年9月14日起演出由胡庆燕导演的《妬误》（法·班拿特作，黎兴文译，三幕剧），主要演员是孙敦乐、胡庆燕、马少逵等。这时吴枫等还借用剧教队名义演出《母爱与妻爱》一剧（丁小曾改编），由吴枫导演，主要演员是钟耀群、钟

耀美、邹星海、吴枫等。

抗战胜利后，剧队由谢熙湘接充队长。

空军大鹏剧社

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1938年迁至昆明，他们为了活跃气氛，学生们常搞一些戏剧活动，并邀请外界人士参加，曾聘请陈豫源导演过《雷雨》，部分艺师戏剧科同学参加，未公开售票。到1941年正式成立大鹏剧社，才有了自己的成员。这时曾由刘光武、刘萍等排演过《伪君子》，仍未公开售票。直到7月7日起才假西南戏院公开演出《凤还巢》（即《再会吧，香港》，田汉、洪深合著，三幕剧），导演是陈光，主要演员有吴枫、郎蕙仙、李凯、钟耀群、刘萍等。12月11日起至15日第二届公演了《花烛之夜》（夏衍著，四幕剧），导演、演员同上届。16日第三届又上演夏衍著《愁城记》，仍由陈光导演，主要演员有朱江、凌零、刘光武、汪灼烽、贺学励、吴敏、程亚萍等。1943年3月18日起举行第四届公演《重庆廿四小时》（沈浮著），陈光导演，主要演员是刘萍、陈在划、熊俊英、高群、贺学励等。第五届是4月8日起，由陈光导演的《面子问题》（老舍著），演员是程亚平、李月水、吴敏、吴枫等。7月23日起第六届演出沈浮著的《金玉满堂》，诸葛亮、张忠海导演，演员有袁志远、张家骥、熊俊英、诸葛亮、朱江、贺学励、陈在划、郎蕙仙、邹昊、凌零、郭少尧等。年底还有陈健导演《杏花春雨江南》（于伶著），演员不详。最后一次演出是轰动全市的，被誉为昆明话剧三大里程之一的《孔雀胆》（郭沫若著）。这次演出是中国制片厂驻昆代表王晋笙以大鹏剧社名义邀约重庆电影界知名演员：王人美、陶金、王班、宗杨及剧专毕业生傅惠珍、奚立德、张莺、马蕙、谢明、诸葛亮、邵俊等。王人美饰阿瑾公主、陶金饰段功，由名导演章泯导演，画家周令钊设计服装，布景设计是陈志鹏，由音乐家赵沨

配音。阵容济济，颇有号召力。的确是一次难得的演出，因为他们表演的功力，的确精湛。观众是各阶层都有。郭沫若曾寄来一文曰《孔雀胆归宁》。报上评论层出，对于剧本主题，也有不同意见。演出时间是1944年10月25日起连演廿场，仍不能满足观众需要，又续演五场。

业余联谊剧社

业余联谊剧社是业余联谊社的一个戏剧组织，成立于1938年至1940年前后。是地下党领导下的组织，以职业青年为主，包括一部分中上层人士，并争取一部分上层的国民党和知名人士的支持。由于当时地方实力派与蒋政权的矛盾，为了抵制蒋政权的控制，因此在对抗日救亡活动上是比较开明和支持的。剧社主持人徐庚敖原是上海蚁社骨干，是当时昆明兴业营造厂秘书，还有地下党员张平、杨廷修参加组织群众活动。这个剧社名誉会长是唐弢。1938年3月4日至8日曾在云瑞中学礼堂演出徐庚敖导演、王震之等创作的《流寇队长》，主要演员有刘光武、唐萍、蒋经翔、罗化清等。第二届是1939年9月16日起演出了《顺民》、《扬子江暴风雨》、《周年血祭》。第三届演出过《米》（导演、演员不详）。

云南各界抗敌后援会

1939年9月18日以抗战剧团名义，由曹孟浪导演《保卫领空》（董每戡编剧），纪念“九·一八”演出。

益世剧社

这个剧社是《益世报》所组织的，实际上并没有自己的演员，演出过两次，都是邀请当时在昆的艺专剧团成员或“中电”剧团演员和联大同学。第一届演出：《三江好》、《黄莺儿》、

《最后一计》三个独幕剧，演员林倩、邱玺、沈长泰、劳元幹、缪钟泰等。第二届演出李朴园编剧、沈西苓导演的《伟大的女性》，演员施超、田烈、林倩、邱玺、高小文等。

中电剧团

1939年10月18日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到昆明拍摄《长空万里》一片，准备趁机在昆明演出几场话剧。到昆后昆明话剧界——剧教队、儿童剧团、电影队等举行欢迎座谈会。孙瑜、白杨、章曼苹、高占非、魏鹤龄、施超等出席参加，主客双方都讲了话，儿童剧团搞了余兴表演。

中电剧团在昆先后演了颇为精湛的两个戏，《群魔乱舞》（陈白尘著，孙瑜导演），《塞上风云》（阳翰笙著，沈西苓导演），两剧演员白杨、章曼苹、魏鹤龄、施超、田烈、白云、顾而已、兰樱、万流等。演出日期是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2日。他们演出是颇富号召力的，因演技纯青、舞美设计别具一格，给予观众深刻印象，文化界在报端发表评论，认为是促进昆明话剧运动的一股动力。

昆明儿童剧团

1939年，同济大学自上海迁昆后，有学生董林肯、于同尘、徐守濂、竺伯康及地下党员冯文礼等认为：培养儿童的社会意识、集体观念，培养下一代爱国主义精神，戏剧是最好的艺术手段。他们赤手空拳的创办起儿童剧团，团长是董林肯。在培训儿童们的歌咏、演技方面，更下了不少苦功夫。为昆明抗战戏剧救亡活动谱写了独特的儿童剧，成为灿烂的一个篇章。

他们从各小学中招来十三、四个小学生为基础，后来逐步扩大，经过短短的一个多月训练，在“八·一三”纪念日那天就冲向街头，一群十岁左右的儿童高亢地、激情地唱着救亡歌曲和诗

歌朗颂，同时演出街头剧《难童》。当昆明群众看到这些孩子们为祖国危亡，挺身而出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时，无不受到感动，甚至潸然泪下。此后他们还参加了各类募捐、慰问、联欢活动，充实活跃了当时社会抗战意识，受到进步人士的重视，扩大了剧团的影响，同时也锻炼了孩子们。当时全市廿六所小学中都有剧团的成员，在小学生救亡戏剧活动中起到骨干作用。为推广儿童演剧活动，他们曾在各小学巡回演出过《锁着的箱子》（独幕剧）和哑剧《加官》。

1939年他们参加了昆明剧人的第一届戏剧节（10月19日起共演七场）演出活动，专场演出董林肯编剧、邱玺导演的《小间谍》（三幕剧），主要儿童演员是冯淞、刘绮等。孩子们表演真切动人，场场满座，博得舆论赞扬，获得声誉。第二届是演出董林肯、于同尘编剧，邱玺导演的《小主人》（三幕），剧情是反映当时贫富不同的孩子们遭遇，呼吁“救救孩子”。曾受国民党省党部刁难，经过疏通才准予演出。演了七天八场，仍然是场场满座，这已是1940年的事了。第三届演出是1942年8月20日至9月10日演出了董林肯根据鲁迅译的《表》改编的剧本，仍沿用《表》为剧名。孙毓棠为顾问，劳元幹导演，主要演员有程抗生、徐飞飞、刘绮等。这次演出引起文艺界对儿童剧特殊性的探讨。最后一次是《飞花曲》，这已是抗战胜利以后的事了。

鲁迅剧艺社

这是私人的业余组织，社长是张凡。1939年成立。仅只演出过由吴鲁导演的《教师之家》，主要演员有杨其铸、陈洁如、张志仪、顾炎等。

青年会联谊话剧团

宗教界救亡活动也动员起来了。昆明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一

些小职员、学生等戏剧爱好者，成立了一个戏剧组织，为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尽一分自己的力量。1939年5月演出《我们的故乡》（表演、导演人员不详）。第二届是1943年5月9日起演出《夜上海》（于伶著），由朱江导演，演员有樊筠、车鸿章、罗雁、诸葛亮、熊俊英、张家仪等。共演出七天。

西南剧团

它是西南运输处职工们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万经文、万流。1940年4月17日起演出《七个淘金的孩子》，编导是万流、田鲁。9月6日至8日演出由万流导演的《我们的故乡》，主要演员有郎蕙仙、万流、刘萍、曹孟浪等。

教育部巡回演剧队

当时教育部有巡回剧队组织，1940年2月由队长王勉之率领到昆，29日起于民众教育馆演出由王勉之导演的三幕剧《汉奸的女儿》。

叙昆剧团

它是叙昆铁路局职工组织的，曾在1941年3月1日起演出过夏衍著的《一年间》，具体情况不详。

八百剧团

是一个部队的组织，1942年3月4日至11日演出白沙、张冠导演的《夜光杯》，地点是昆明戏院。余不详。

励志社励新剧社

这个剧社一部分是自己的专业人员，一部分邀请职业剧人。主要负责人侯鸣皋，曾到滇缅公路一带各县巡回演出，剧目有《人

约黄昏》、《搜查》、《放下》、《夜深沉》、《野玫瑰》……等。舞台公演是在1942年3月13日至16日演出《夜深沉》，导演侯鸣皋。1943年7月3日献金公演《群魔乱舞》一剧，导演侯鸣皋。1944年上演《戏剧春秋》一剧，仍由侯导演。以上三剧演员是樊筠、罗雁、胡蒂子、刘雷、高小文、李伟文、潘锐、缪钟泰、王薇、孙森福等。

华山剧社

它隶属于国民党军队特别党部，主要负责人却是地下党人杜宣。1943年11月20日至26日演出由狄思（杜宣）导演的《水乡吟》（忆江南），主要演员金谷、马金良、汪灼烽、马少逵、沙龙、王葆倩、吴瑛、朱琇、欧维乾、缪钟泰等。1944年2月25日起演出《心防》（夏衍著），由王逸导演，主要演员有沙龙、马少逵、孟浪、马金良等。最后一次是1944年7月25日至31日邀请社会剧团全部人员在昆华女中礼堂演出陶熊著的三幕剧《反间谍》，由张正通导演，演员有崔梦湘、沈工、金谷、束夷、赵步颜、张莺、陆群、蒲柳等。除在市区舞台公演外，他们还曾于1942年前后至滇西各县巡回宣传抗战，携带剧目不详，人员有叶露西、杜宣等参加。还组织过欢迎“剧宣五队”至军中工作的游园大会，地点是圆通公园，各人自带礼物，颇为别致风趣，主客皆欢。

缅华励志社剧团

1944年曾演出过《缅华之夜》，这是一个归国侨胞的组织，导演、演员不详。

原野剧社

为了推广戏剧活动，配合救亡宣传，业余剧人李铭、马金

良、龙显球发起组成这个剧社。1943年6月3日至10日演出由范启新导演的《长夜行》（四幕剧，于伶著），演员有贺学励、马金良、高群、高继曾、孟浪、欧维乾、婴子、陈在划、洛紫、高蕊等。演出比较认真，昆华女师全体学生购票看了戏，《昆明周报》出了特刊。1945年5月10日至20日，演出由吴枫导演的《天罗地网》，演员有钟耀群、黄毓华、李世玙、邱星海、蒋锐、何鹤、胡明等。

艺师校友会

1944年1月14日起，由马金良导演《沉渊》一剧演出。

合作剧社

它是合作联谊社职工所组织。1942年12月演出李健吾编剧的《以身作则》。1943年1月演出《沉渊》三幕剧，林柯编剧。同年不久又演出《水乡吟》，由孟浪导演，主要演员有万声、缪钟泰等。

戏剧教育训练班

系教育厅办的业余性质的短期训练班，三个月毕业，1942年12月开班，次年2月毕业时公演由范启新导演的《以身作则》。

社会剧团

它是云南社会服务处的组织，蒋伯英是主要负责人。1942年12月25日于昆明戏院演出《刑》剧（宋之的著）。由孙毓棠导演，演员有施今、王音华、周序东、张棣华、沈长泰、马金良、刘蕊、姜月英、苏辙、陈颂声、冯一之等。其中有联大、艺专学生，也有剧教队和业余剧人参加，是一次较好的演出。1944年6月17日起又演出由潘藩导演的《民族女杰》（沈蔚德著），演员束

夷、崔梦湘、金谷、孙敦乐、赵步颜、郎志仁、李宝嘉等。另外还曾应华山剧社之邀演出《反间谍》。

洪荒剧社

私人组织的剧社，仅演出过一次，是由王逸导演、于伶编剧的《女子公寓》，主要演员有罗茜、罗雁姊妹等。

国立剧专昆明校友分会

1942年8月24日起演出由侯鸣皋导演、陈白尘编剧的《大地回春》，演员有潘藩、胡庆燕、孙敦乐、马少逵、凌琯茹、陈健、范启新、朱琇、蒲柳等。

青年剧社

它是云南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除社长外，所有导演、演员都不固定。1941年成立，4月26日第一届演出陈铨编剧导演的《黄鹤楼》，演员有叶刚、刘雷、杨其栋、郎蕙仙、沈长泰、李文伟、苏玲、叶逸芳等。同年第二届演出姜桂依根据易卜生原著《海姐》改编的《权与死》，由孙毓棠导演。第三届公演了洪深编剧的《寄生草》三幕剧，导演不详，演员有俊子、朱江、向痕、徐恭谨等。时间是1943年1月7日起。其他演出已是抗战胜利后了。

国民剧社

是国民党省党部直接领导下的剧社，只演了一个戏，演出时间不过两三天，剧本受到文艺界批评。剧目是《野玫瑰》，导演孙毓棠，演员有劳元幹、姜桂依、汪灼烽、李文伟等。时间是1941年8月3日起。

西南旅行剧团

1942年继影人剧团之后，由四川到昆明的一个私人职业剧团，成员有电影从业员也有话剧专业人员。团长是张树藩，团员是刘莉影、殷子、齐格夫、高群、贺学励、金弋、陈在划、曹藻、张忠海、温容等。到昆后受到话剧界欢迎。

第一个戏是1942年3月29日演出张树藩导演的《北京人》，演员刘莉影、高群、齐格夫、殷子、贺学励、董林、陈在划、张忠海、金弋。4月4日换演由曹藻导演的《大地回春》（五幕剧，陈白尘著），演员增加了温容、费兰。11日换演由齐格夫导演的《日出》。18日换演由张树藩导演田汉著的三幕剧《名优之死》，后又换演《国家至上》（张树藩导演），后又换演齐格夫导演的《软体动物》（朱端均改编）、《狄四娘》（张道藩改编，张树藩导演），演员基本都是该团成员。以上演出地点是在国泰戏院，到7月16日后迁至西南戏院陆续演出陈白尘编剧的《结婚进行曲》‘阳翰笙编剧的《重庆廿四小时》，各戏均系张树藩导演，演出最后一次已是同年9月8日了。

邮务工会话剧社

1944年10月2日起在昆华女中演出《夜光杯》，具体情况不详。

第五军抗敌剧团

1945年2月1日至10在昆明戏院演出吴祖光编剧的《林冲夜奔》，由朱家训导演。演员有马蕙、余翼、谭梅、顾默、曹春、奚立德，孙敦乐、罗华、洪涛、何鹤等，第五军军长曾在报上公开发表有关演出文章，军队面向社会公演，军长撰文支持，实属罕见，可见当时抗战话剧的普遍开展和它的深刻影响，

射日剧团

1944年9月9日石凌鹤以防空学校射日剧团名义，演出他导演的《清宫外史》（杨村衫著），这是昆明首次古装戏的演出，连演十七场。演员多系社会职业演员，如樊筠、洪涛、张正通、朱江、刘萍、凌琯茹、朱家顺、陈在划、陈健、胡庄燕等。樊筠饰的慈禧颇得舆论赞许。

云南新运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1945年5月24日起在南屏戏院请美军剧团义务募捐公演美国古装歌舞剧《奥古拉哈玛》（OKLAHOMA）。

新中国剧社

1945年5月在胜利前夕话剧活动趋向低沉时，新中国剧社到昆，受到文艺界热烈欢迎，云南文抗会理事长徐嘉瑞即席致辞，田汉介绍了新中国剧社宗旨和情况，艰苦朴实的作风，给予戏剧界吹来一股新鲜而又令人振奋的气息。7月9日至28日前后演出由严恭导演的《蜕变》、由瞿白音导演的《金玉满堂》。

华侨互助会

这是昆明剧人为援助湘桂撤退剧人流离不幸的生活而募捐公演，剧人们又一次联合演出由张客导演的《离离草》（夏衍著），赵沨配乐，辛汉文化装设计。演员有张莺、诸葛亮、程漠、陆群、王班、赵步颜、何鹤等。时间是1945年3月15日至25日，田汉看戏后给予好评。

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

陈豫源是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奉命把昆明剧人团结起

来，成立了云南分会。1938年3月18日分会成立，昆明所有平、滇、话各剧种剧人，选出分会理事长高竹秋，理事陈豫源、王旦东、刘海清、范启新、龙金圭、王海廷，栗成之、马金良、王树萱、李鑫培等，在组织和团结戏曲艺人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激励了艺人们自尊和爱国热忱。

第一届戏剧节

当时全国定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为戏剧节。1939年10月12日起，昆明戏剧界联合全市话、平、滇剧团人员举行空前的庆祝活动，话剧界演出宋之的著四幕剧《民族光荣》（自卫队），导演团是李朴园（艺专）、凤子（联大）、陈豫源（剧教一队）、王旦东（二队）、庚敖（业余联谊社）。演员来自各剧团，如汪雨、刘雷、劳元幹、张定华、刘萍、李文伟、马金良、郎蕙仙、欧维乾等。在外侮日亟之时，表现了剧人们的团结一致救亡的意愿。

第二届戏剧节

1940年戏‘剧节昆明剧人（平、滇、话）掀起募集“剧人号”飞机活动。话剧团体参加者有联大剧团、西南剧团、剧教队、业余剧团、艺专剧社、青年剧社，联合演出曹禺新编写的《蜕变》。导演团是邱玺、陈豫源、万流；主要演员是邱玺、万流、姜桂侬、欧维乾、刘光武、马金良、缪钟泰等。连演一周后继续上演老舍著的《国家至上》，由邱玺导演，演员基本同上。

第三届戏剧节

由于“皖南事变”发生，抗战局面走向曲折，经过一度消沉，终于1945年（戏剧节已改为2月15日）又举行了第三次庆祝活动。这次活动方式有所改变，没有对外售票公演，举行了征求剧本、剧展、聚餐、晚会的形式。云南省文化运动委员会为了纪念戏剧节，

征求鼓励青年从军剧本，以八万字至十万字为限，由徐嘉瑞、孙毓棠、刘尧民、章泯、石凌鹤为评审委员。第一名获奖当时法币一万元，第二名五千元，第三名三千元。晚间庆祝会由龚自知主席，并自带份金聚餐。本来准备有节目演出，但为了结合欢迎田汉来昆改在3月31日（田汉是3月24日到昆）举行。晚会节目有赵沨、周葆灵独唱，高竹秋、李文明《五台会兄》（滇剧），另外还有平剧、大鼓、相声等。日间举行了剧展（两天），内容有剧照四十多幅，各式海报、特刊千余件，还出了特刊，有郭沫若的文章。

田汉在昆明的活动

田汉是1945年3月24日率领四维儿童剧团到昆，当晚看了旅昆剧人《离离草》的演出。29日参加了昆明剧人在大观楼举行的欢迎会，有安娥同时参加，由叶露茜主席。田汉即席讲了话，讲题是“‘五四’给吾人的课题”，主旨是要继续反帝、反封建、提倡民主。非常切合当时现实。并赋诗一首云：“孔雀开屏百鸟鸣，离人今又聚名城。滇池一水清如海，击楫争看文化兵。”云南文协分会也举行了茶会欢迎，参加人有光未然、刘思慕、常任侠、李广田、闻家驷、陈白尘、凌鹤、李何林、叶露茜等。31日出席了文化、戏剧界欢迎大会，看了各项演出。4月15日在文协分会讲习班以“新阶段与新戏剧”为题讲了课。在《正义报》发表了《薛尔望》独幕剧，并为四维儿童剧社找出路与远征军二〇七师联系奔走，后来还与洪深等共同筹办第四届戏剧节。

平、滇剧、花灯的活动

一般戏曲界剧人多迫于生活，因袭于旧观念，但在抗战声中也能激于民族危亡千钧一发之际，为国家作出一定的贡献。这时许多艺人要求演出结合抗战的戏，苦于无适合的剧本，只好在传统剧目中选择了抗暴、杀敌报国之类。金碧游艺园平戏院的吴继

兰、李鑫培先后演出《打渔杀家》、《天门阵》等剧，并在演出《董小宛》一剧时当场画兰义卖，所得捐献前线将士。云南剧抗分会成立时演出过平剧《潞安州》、滇剧《江油关》，表现了陆登守城壮烈牺牲精神，马邈屈膝投敌的丑恶脸嘴。陈豫源还组织过新平剧《战临沂》的演出，由李鑫培饰李宗仁、赵如泉饰张自忠。1938年秋，剧抗分会组织了为前线募捐寒衣公演，有艺人琴湘玲、琴湘君、琴湘云姊妹、赵君玉等演出《徐策跑城》等剧。云南六十军出征，雅集社票友演出欢送场，演出《霸王别姬》等剧目，师长鲁道源也粉墨登场。以后还举行过两次义演，由陈豫源主演《木兰从军》、《陆文龙》。抗战期间，前后来昆著名演员很多，如吴继兰、琴氏姊妹，袁湘云、曼云、汉云姊妹，李蔷华、李薇华姊妹，金素琴（来昆一个多月，曾演出过《战金山》等剧）、陈佩卿、赵如泉、赵君玉、曹百岁、李雅琴、杜文林、王丙辰……等，他们在每次义演中都积极参加，或为票友扮演配角。他们曾说过：“我们是中华儿女，不为抗日出一分力，心里怎么也不好过。对日寇的侵略我们遭过罪，吃过苦，前方将士为了抗日流血牺牲，我们在后方不出点力，还算什么中国人！”这是真实情感的流露啊！

厉家班：他（她）们是1939年由厉彦芝为班主，以他自己的子女慧良、慧斌、慧敏、慧兰、慧森等为骨干的科班，演出认真，一丝不苟，得到观众赞许。曾把滇剧《火烧松明楼》、《南诏慈善夫》故事由张子明改编为平剧，后又结合抗战编写《戚继光平倭记》，演出取到好的反应。又特为厉慧敏排演了《荀灌娘》、《花木兰》两剧公演。还演出过《班超》以及《吴越春秋》，从这些剧目可以看出他们是结合抗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四维剧社：胜利前夕四维剧社（社长冯玉昆）到昆，给平剧界带来蓬勃朝气，曾前后演出田汉编剧的《江汉渔歌》、《南明双忠记》、《武松与潘金莲》、《梁红玉》、《桃花扇》、《新儿

《女英雄传》、《荀灌娘》等改良平剧，连续演了一个多月，观众一致认为是最精彩的演出。至于票房组织除雅集社外，还有云社、云南省电话局票房、邮政局票房、广播电台票房、凤鸣社（属海口五三兵工厂）、德社、杰社以及后来的华社等等平剧票房，真可谓风起云涌，抗战中他们都积极参加义演募捐公演，表现了爱国热情。

滇剧界是比较薄弱的一环，但在老剧人栗成之、刘海清、李海云、李文明等的引导下，全体演员也为抗战作过贡献，演出过《卧薪尝胆》、《毛焦骂秦》、《保国图》、《大报仇》、《杀妾劳军》等有意义剧目。比较突出的是高竹秋，他弃官终身从事滇剧，他以剧抗分会理事长身份，曾为滇剧改良呕心沥血地作过不少工作，团结了不少剧人参加历次戏剧节义演，并自编自演了《新探亲》、《一碗虾仁》等剧。后来因滇剧大本营新滇剧院被敌机炸毁，失去演出场地，有的到外县谋生，有的只好到茶社清唱。在滇剧岌岌可危之际，1942年省主席龙云提议由官方主办了一个“滇剧改进社”，认为“欲谋滇剧之改进，必须创立新基”，“以实验改进旧戏，培养戏剧人材为宗旨”。主任理事是缪云台，主任监事是陆崇仁，具体主持工作是常务理事杨据之。培训班规定四年毕业，实际招得男女学生廿多人。成立之初曾断续实验公演过六次，多属募捐性质。当时能由官方出办地方戏剧团，还是难能可贵的，这项措施为抗战，为延续滇剧都是有所贡献。惜所用非人，领导作风恶劣，后来还是分崩离析，1946年被下令解散。

农民救亡花灯：旧花灯是不能上高台演出的，被认为有伤风化，可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王旦东认为用农民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救亡宣传，效果会是好的。因此，他试用农民自己熟悉的词汇、曲调试编成抗战戏曲，并邀约一部分喜爱花灯的农民演员参加演出，以玉溪花灯调为主组成了“农民救亡灯剧团”。他编写了《张小二从军》、《茶山杀敌》、《新别窑》、《新四郎探母》、《汉

奸报》等现代花灯剧本，还编过花灯小调《抗战十二花》、《抗战十二将》、《送郎参军》等，花灯剧从此有了剧本，一改口传心授的方法。内容也从“干哥”“干妹”变为抗日青年、反汉奸的故事，王旦东是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从话剧、滇剧等剧种中吸取营养，如分本、分场、表演、化装各方面的手法，并建立了导演和舞台监督制度，从内容到形式都大大提高了花灯艺术。在昆明首次公演就轰动全市，连演卅余场，后来还到滇南、滇西大小数十个县城演出，得到广大农民的喜爱，从而各地也出现“农民灯剧团”的组织，其影响是深远的。是抗日激流中的一支。

其它活动

文化界在救亡戏剧方面的宣传活动也是不遗余力的，当时《云南日报》、《正义报》、《益世晚报》都有有关戏剧电影的副刊（每周一次），报导本市戏剧活动，以及演出评论，理论研究，甚至剧本著作，其它各报也有这类文稿发表。1940年田鲁、孟浪曾创办了一个《综合艺术》，1941年岑生（龙显球）、邵毅律创办了《影剧周刊》，都是着重发表有关戏剧的文章。此外，孟浪还搜集了当时各剧团演出的资料，如剧照、说明书、海报、特刊等等组成戏剧图书馆。

尾语

岁月匆匆，过去火热的斗争虽已逝去，但每一忆及，那激昂、那悲愤就会涌上心头。去年戏剧界纪念抗战四十周年，来自全国各地戏剧老兵们，新交旧识重聚一堂话当年，总是激动亢奋不能自己。畅谈各自亲预其役之事，这些活材料，核实了许多疑难史实。

笔者垂垂老矣，时不我待！为了弥补我昆明戏剧史料空白，

特将自己亲历，以及多年采访、搜集所得，整理成篇，聊备史学家们参考。年代久远，难免记忆漫漶而有遗误之处，这就靠知情者补正了。

1986年10月

政治研究所

五言长律二十韵

何事堪研究，分明为救穷。依稀元老院，仿佛太清宫。
鹤俸三千块，蜂房四五重。电灯珠错落，煤火雾溟濛。
迥与栖流异，还教旅店同。疏狂青眼客，强项白头翁。
会议三缄口，升堂一鞠躬。装成循吏样，做出大儒风。
瓦缶雷鸣盛，山川晦气钟。不堪为隐豹，甘作可怜虫。
奢愿何时遂，伤心往事空。悲歌穷困里，差缺有无中。
此地权居处，他山学错攻。文章容代倩，薪水许通融。
不给星期假，何须日记工。课程无夏楚，教授俨冬烘。
题纸多相背，言词半不通。洋洋偏伟论，衮衮笑诸公。
皋比人如虎，轻车马似龙。何如商总办，意气自多雄。

引自民国《时餘笔记》

里见甫与宏济善堂

任常毅 译

说明：宏济善堂是日本侵华期间，由伪南京维新政府戒烟总局出面，在上海开设的贩卖鸦片、海洛英等毒品的最大毒窟，也是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推行“以战养战”，在长江以南日军占领区进行鸦片买卖的最大据点。

宏济善堂的公开主持人盛幼庵，是曾任两广总督盛宣怀之侄，因排行第三，人称盛老三。但实际主持者是日本人里见甫（又称里见夫）。

里见甫1916年6月毕业于日本“同文书院”第13期。由于谙通中文，毕业后被派往四川，在日本贸易公司“新利洋行”任职。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萧条时期，经商失败辞职返国。时隔不久，重至中国，并定居北京。经《朝日新闻》驻北京特派员大西斋、《每日新闻》记者波多野乾一等人的推荐，任天津《京津日日新闻》记者。两年后在北京创办《北京新闻》。1928年入满铁株式会社，充任满铁驻南京办事处特约员，负责向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推销铁路器材，并从事搜集情报活动。在此期间，曾往武汉搜集中国共产党及工农红军的各种资料，为波多野乾一在战后撰写《中国共产党史》一书，提供了基本素材。

“九·一八”事变后，里见甫奉命到关东军第四课任职，专事“宣传工作”，是伪满通讯社的创始人之一，凡关东军不宜公开从事的活动，都由里见甫负责进行。1934年，里见甫又奉命在天津创办《庸报》，该报是日本在华北发行量最大的一张报纸。

“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把种植和销售鸦片作为侵华的“国策”，里见甫被作为推行“国策”的重要人物，往上海经营鸦片。

1938年3月，日本在南京成立伪维新政府时，设有戒烟总局的机构。5月，里见甫即奉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兼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之命，以戒烟总局的名义，通过盛幼庵成立“宏济善堂”，由盛任总经理，里见甫任副董事长，专门从事鸦片毒品的买卖。

当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鸦片市场。宏济善堂成立后，在上海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楠本实隆的支持下，逐渐垄断了上海鸦片的运输和销售。

最初，鸦片和海洛英等毒品主要来自波斯（今伊朗），从1939年开始，即以伪蒙疆自治政府和热河所产的鸦片为主要来源。年销售量日益增大。

鸦片的收入，除一部分作为税收，用作伪维新政府的财政收入外，主要充作日本军方的特务机关经费，甚至连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新闻记者，也从里见机关领取费用。1942年4月，在日本翼赞选举中，时任日本内阁工商大臣的岸信介，还从里见机关中得到五百万日元的资助。

抗日战争结束后，里见甫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关押在巢鸭监狱，关押18年后被美国释放。1965年3月21日病死。

里见甫在远东国际法庭接受审判时，供认了他在上海成立宏济善堂，从事鸦片等毒品罪恶活动的某些事实。本文所收各件均译自（日）江口圭一编：《日中战争期间阿片政策》一书。

里见甫口述宣誓书

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
由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对荒木贞夫等人的审判宣誓书
我即李鸣，本名为里见甫。我凭良心宣誓下述事实为真实情况。

1937年9月或10月，我作为新闻记者来到上海。我以前是在天津。1938年1月或2月，楠本实隆中佐问我能否为特务贩卖一大批的鸦片。他说此批鸦片正从伊朗运往这里的途中。

特务部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的参谋部的一部分。其职

务，是处理日军占领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诸问题。

这批鸦片，于1938年春到上海，存放在军队所使用的码头仓库中。码头和仓库都派有卫兵。每箱一百六十磅，即一千九百二十两。

鸦片从伊朗运来后，开始时，我每次少量地卖给中国商人。我一接到中国商人的鸦片订货，便派遣部下去特务部，由特务部命令仓库发给我的部下多少鸦片。在仓库，将鸦片从库中取出交给商人。

时间与地点事先都商定好了。价款是在交鸦片时由商人支付的。我由鸦片贩卖中所得的钱，以个人的名义存入台湾银行。我每月向楠本中佐报告一次或两次。

鸦片贩卖价格，是由特务部的军官与我协商决定。我告诉他们当时的市价，他们通知我贩卖的价格。这一程序，特务部是承认的。

按特务部的指令，我从存款中将原价款支付给三井物产公司，然后，把扣除我本身各项费用后的余款交给特务部。

从伊朗的鸦片货物到达时起，直到1939年3月^①维新政府成立时止，我把鸦片卖给了中国商人，按上述方法做了付款。

在维新政府成立时，解散了上海的特务部，同时成立了兴亚院上海支部。其职务在于，处理中国占领区内的日本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事情。楠本中佐当了兴亚院上海联洛部的副支部长。兴亚院的经济部负责鸦片和麻醉剂。兴亚院决定将鸦片的交易交给维新政府。维新政府在内政部下面设了戒烟总局。

为了分配鸦片，组织起了宏济善堂。它是商业公司，其股东是八家大鸦片商。戒烟总局局长朱曜委托我做宏济善堂的副董事长。宏济善堂没有董事长。宏济善堂的契约以及各项规定要在与维新政府协议之后，由兴亚院来起草。由于兴亚院的承认，我接受

^① 时间似有误，以1938年3月为当。——译者。

了副董事长的职务。

戒烟总局向宏济善堂提供了分配鸦片的特别许可。特务部以前所拥有的尚未贩卖的鸦片，经他们之手转到兴亚院，兴亚院再把它交给戒烟总局。

在1939年末前后，宏济善堂也贩卖过蒙古鸦片。蒙古鸦片是从蒙古^①由铁路、飞机以及船舶运来的。但其大部分是由中华航空株式会社的飞机运送的。这些来自蒙古的鸦片，采用与伊朗鸦片不同的途径处理的。

东京的兴亚院本部，向蒙古政府通知各联络部所需要的鸦片数量。蒙古政府将鸦片发送到华北的中央分配地北京，华中、华南的中央分配地上海。鸦片由这两个中央分配地向两地区内各城市发送。

蒙古鸦片一到，便收藏到政府仓库里。宏济善堂从戒烟总局得到由仓库提取鸦片的许可，然后将鸦片送到戒烟总局设立的检查所，并在那儿将鸦片进行包装、分类，盖上收税的戳子。

宏济善堂贩卖鸦片的价格，是以应向蒙古政府交付的鸦片价格加上运费，以及保险费，戒烟总局所规定的关税、特别税、还有做为宏济善堂净收入8%以下的手续费的总合。由兴亚院决定应付给蒙古政府的款额。兴亚院的方针是尽可能扩大蒙古政府的利益。

宏济善堂从贩卖伊朗鸦片中获得的盈利额约有2000万美元以上；在有特务部期间向特务部交付，没有特务部后则向兴亚院交付。鸦片分配的方针，由南京政府^②及兴亚院来决定。而且，其方针建立在：一、蒙古政府的年收入；二、南京政府的年收入之上。

鸦片的供给，到底没有达到满足需要的程度。实际的鸦片使用，根本没有积极地禁止。戒烟总局与宏济善堂都组织了走私监视队，而其目的在于防止非合法的鸦片走私或吸食鸦片。

① 指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译者。

② 系指南京伪维新政府及此后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下同。——译者。

直到1943年末，学生们以及更有教养的某阶级的高手所掀起的反对鸦片的示威运动几次兴起。我把它当成为辞职的好机会，得到南京政府以及兴亚院的许可后辞了职。

宏济善堂所卖的鸦片的数量，在1943年达到最高额。我所卖出的鸦片的数量记不准有多少了，但我记得大体上伊朗鸦片为四千箱，蒙古鸦片为一百万两上下。

有关鸦片吸食者的准确统计始终也没有调查清楚。

宏济善堂没有参与海洛因或吗啡的制造乃至贩卖。但是，我相信从大连和天津有相当数量的海洛因走私运进上海。这些仅仅是供那些无钱买鸦片吸食的人使用的。

里见甫 Hajime Satomi

1946年6月28日

当着下面署名的军官，里见甫宣誓如上并署了名。

证明书

我，上原英男，在此通过日英两种语言，将里见甫所邀作证的誓言由英语，由日语向英语，真实地、正确地进行解释。而且，其誓词的性质和目的，由该宣誓者而更加充分理解。

上原英男 H.oyebara

鸦片买卖契约书

关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经济部部长马永魁（以下只称甲方）与宏济善堂理事长李鸣（以下只称乙方）间的鸦片买卖，立契约如下：

第一条：由甲方卖给乙方的鸦片数量，自成纪736年7月至成纪737年6月的一年时间内定为700万日元。

第二条：乙方根据另纸的鸦片月别领取清单领取鸦片。

第三条：交售地点定为张家口机场。

第四条：出售价格，一两（三十六瓦）定为蒙币14元，吗啡

含有量标准为9%，最低要保证5%以上。

第五条：出售鸦片的价款结算，依据期限为六十日的付息汇票（日息一分三厘），每月十五日、三十日分两次由甲方开出。

在期限内支付不完时，乙方对未付的余额，以日息二分三厘的延滞利息支付给受理汇票的银行。

第六条：乙方严守第二条所定的领取数量以及领取期限。

第七条：甲方对于张家口机场的现货交付完了后出现的损失，不负其责任。

第八条：本契约所定事项，及对本契约条项产生疑义时，由甲方进行解释。

第九条：本契约的有效期间，由成纪思汗736年7月至成纪737年6月，定为一年。

做为缔结上述契约的证据，本契约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成纪思汗736年7月15日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经济部长 马永魁

华中宏济善堂理事长 李 鸣

药品月别领取清单

至成纪思汗736年（公元1941年）8月止，为456,000两，9月为544,000两，由10月到12月，每月600万两，即小计280万两。由成纪思汗737年1月至6月，每月700,000两，小计420万两，合计700万两。

另外，以上的数量，原则上航空运输。由于航空公司方面的不可抗力，造成发送量的减少为不得已。

鸦片转让契约书

关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经济部长马永魁（以下只称为甲方）与华中宏济善堂理事长李鸣（以下只称为乙方）间的鸦片转让，立契

约如下：

第一条：由甲方向乙方转让的鸦片数量，自成纪⁷³⁷年（1942年）11月至成纪⁷³⁸年（1943年）6月八个月内定为二百万两（一两为36瓦）。

第二条：乙方根据另纸的鸦片月别领取清单，按期领取鸦片。

第三条：现货交接地点定为张家口机场。

第四条：转让鸦片的质量，吗啡含有量标准为9%，最低保证在8.5%以上。

第五条：转让价格，一两合蒙币十六元。

第六条：转让鸦片的货款结算，依期限为九十日的付息汇票（日息一分三厘）进行，每月15日、30日分两次由甲方开出。

期限内支付不完时，对于期限之后的未付款，乙方以日息二分三厘的延滞利息向受理汇票的银行支付。

第七条：乙方严守第二条所定的领取数量及领取日期。

第八条：甲方对于张家口机场的现货交付完了后出现的损害，不负其责任。

第九条：本契约所定事项及对本契约条款的解释产生疑义时，在甲乙双方协议后决定。

第十条：本契约的有效期间，为自成纪⁷³⁷年11月到成纪⁷³⁸年6月，共八个月。

做为缔结上述契约的证据，本契约写成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成纪⁷³⁷年10月18日
民国³¹年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经济部长 马永魁
华中宏济善堂理事长 李 鸣

鸦片月别领取清单

月	别	数 量 (两)
成纪737年		
民国31年	11月	250,010
成纪737年		
民国31年	12月	250,000
成纪738年		
民国32年	1月	250,000
成纪738年		
民国32年	2月	250,000
成纪738年		
民国32年	3月	250,000
成纪738年		
民国32年	4月	250,000
成纪738年		
民国32年	5月	250,000
成纪738年		
民国32年	6月	250,000
计		2,000,000

不过，如果航空公司方面的不可抗力而使运送量减少，造成改变领取日期、及发送数量为不得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资料丛刊即将出版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资料丛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重点项目之一。全书约400万字，由李宗一、章伯锋负责主编，即将由武汉出版社出版。早在五十年代之初，近代史研究所即组织科研人员，开始从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著名的专家和学者金毓黻、聂崇岐、荣孟源等曾先后主持过这项工作。历经三十多年的辛勤劳作和努力，发掘和翻译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本书所选录的四百馀万字的资料，就是从这部分资料中精选出来的。其中收入的中外文书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及未刊稿本占全书很大比重。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资料分散，又少前人成果可以借鉴和利用，本书是在广泛搜集的基础上，经过筛选和多年的努力编辑定稿的。编者按照北洋军阀兴衰的历史过程，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袁世凯独裁统治时期，第二阶段为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第三阶段为直系军阀统治时期，第四阶段为北洋军阀覆灭时期。全书所辑录的资料，始于1912年袁世凯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止于1928年张作霖皇姑屯被炸案，重点在1912—1928年间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的内政外交以及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包括人民群众活动与社会生活等有关政局的各个侧面。

依据编者在前言中所说，编辑出版此书，是为了供作民国史和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者之参考，所以该书具有三个特色：一，本时期的各主要重大政治事件均列有专题，所选资料具有一定的系

统性；二，很多专题史料是在研究的基础上编成，所选资料少而精；三，既注意资料搜集的广度，又注意资料的深度。例如由从事民国史研究多年的同志负责编纂的第一辑《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对于民国初年一些重大对外交涉事件，诸如善后大借款、中俄蒙古问题、日本侵略山东、二十一条交涉等专题资料，多选自北京政府外交文电和翻译的日、俄、美等国的外交文书。关于洪宪帝制和护国战争，则利用了当时袁世凯政府推行帝制的内部密电，披露了北洋军阀各派系间既争斗又妥协的实情，适可弥补已刊资料多偏重于反袁斗争这一不足。关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专题，重点选译了日本外务省档案及俄国外交文书，比较系统的提供了二十一条形成的背景、日本统治集团的决策，以及日俄勾结，图谋宰割中国的种种黑幕。这些资料均为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所未载。又如第二辑《皖系军阀与日本》，收入资料除中文档案资料外，还从《日本外交文书》和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及日文资料中，选译了数十万字的资料，分列日皖勾结、西原借款、中日军事协定、直皖两系军阀矛盾、日美在华争夺、南北议和、直皖战争、日本对华的方针政策等专题，从纵横各个方面，比较系统地反映了1916年至1920年间，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勾连日本，大搞武力统一，挑起南北战争，造成社会极度混乱的真实历史。再如第三辑《曹锟、吴佩孚的统治》及第四辑《奉系军阀的兴衰》，均收入大量中文未刊文电及日、英、美等国外交文书资料，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资料丛刊，还编有各主要时期北洋军队的编制与军费统计，民初的政党及其活动，北洋时期的苛捐杂税以及民众反抗斗争等专题资料，反映了1912至1928年这段历史各个侧面的情况，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综合性的资料书。可以预料，此书的出版，对于推动和开拓民国史和北洋军阀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将会起到积的极作用。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70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闻少华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刘建光

近代史资料
JIN DAI SHI ZI LIAO

总70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
主编章伯锋 副主编庄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201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册

ISBN 7·5004·0221·X/K·23 定价：3.00元